Lingnan University

Digital Commons @ Lingnan University

Theses & Dissertations

Department of Cultural Studies

2007

性別話語的協商：中國當代婦女研究對女性主義話語的接受與建構 (1980-2000)

Wai Pang CHENG

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 https://commons.ln.edu.hk/cs_etd

Part of the [Women's Studies Commons](#)

Recommended Citation

鄭威鵬 (2007)。性別話語的協商：中國當代婦女研究對女性主義話語的接受與建構(1980-2000) (碩士論文, 香港嶺南大學)。檢自 http://dx.doi.org/10.14793/cs_etd.8

This Thesis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the Department of Cultural Studies at Digital Commons @ Lingnan University.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in Theses & Dissertations by an authorized administrator of Digital Commons @ Lingnan University.

Terms of Use

The copyright of this thesis is owned by its author. Any reproduction, adaptation, distribution or dissemination of this thesis without express authorization is strictly prohib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性別話語的協商

——中國當代婦女研究對女性主義話語的接受與建構(1980-2000)

鄭威鵬

哲學博士

嶺南大學

二零零七年

性別話語的協商

——中國當代婦女研究對女性主義話語的接受與建構(1980-2000)

鄭威鵬

此論文為文化研究哲學博士學位課程之部分要求

嶺南大學

二零零七年

論文撮要

性別話語的協商

——中國當代婦女研究對女性主義話語的接受與建構(1980-2000)

鄭威鵬

哲學博士

1980 年代以來，女性主義話語(Feminist Discourse)在中國當代婦女研究的引入與發展，無疑是跟中國內地的再度現代化同步的，它既是中國現代化進程的時代產物，同時也這個現代化大計的其中一個非常重要的構成部分。事實上，除了為新時期的中國人民帶來現代性的想像外(例如西方女性主義話語的「性別平等」觀念以及科學性格)，女性主義話語亦實際上夾帶著「主體」、「個體自由」等作為現代性標記的概念。

本論文將會借助知識考古學的方法(Archaeology of Knowledge)，透過話語分析(Discourse Analysis)，探討改革開放以來對女性主義話語的接受、建構與變遷，尤其是其間種種的文化協商。本論文將會把焦點集中在中國當代婦女研究的頭兩個發展階段(1980 年代初至 1993 年、1993 至 2000 年)，從中分別抽取在中國當代女性主義話語中的一系列關鍵概念(key concepts)，透過一些具有分析意義或重要的相關話語事件(discursive events)個案，追溯這個理論旅行的歷史過程。

本論文提出的主要立論是：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中國當代婦女研究對於女性主義話語的接受與建構，是一個充滿文化協商的過程，它開始於後文革與改革開放的雙重語境之中，面對中國社會主義的遺產與債務，其間障礙重重，無法得到真正的開展，而直至 1995 年聯合國第四次世界婦女大會的舉行、聯合國成員國對《北京宣言》、《行動綱領》等兩份全球性的綱領文件的簽定，契機才逐漸出現。可以這麼說，在這一個文化協商的過程中，借著歷史性的契機，中國當代婦女研究透過對於女性主義話語的接受和建構，在新自由主義邏輯與社會主義的既有體制之間，在話語以至體制上，為現實中的婦女以及自身建構了一個迴轉與生存的環境。

聲明

本人謹此聲明，本論文為原創性之研究成果，所有已發表或未發表著作之引用，均已適當註明出處。

SIGNED

(鄭威鵬)

二零零七年二月

性別話語的協商

——中國當代婦女研究對女性主義話語的接受與建構(1980-2000)

鄭威鵬

哲學博士

論文審查委員會：

SIGNED

(主席)

游靜博士

SIGNED

(校外考試委員)

潘毅博士

SIGNED

(校內考試委員)

陳清僑教授

SIGNED

(校內考試委員)

羅永生博士

導師： 陳清僑教授

副導師： 陳順馨博士

代教務會核准

SIGNED

(饒美蛟教授)

研究及高級學位課程委員會主席

2007年7月17日

日期

目錄

第一章 導論：在現代性語境中的女性主義話語.....1	
(關鍵詞：文化協商)	
第一節 論題的總整架構	
第二節 文獻回顧	
第三節 研究方法	
第四節 論文結構	
第二章 現代化的性別問題，性別的現代性.....20	
(關鍵詞：女人、有性的人、主體、現代性)	
第一節 有性的人——打造(女性)「主體」	
第二節 性別的現代性想像	
第三章 在國家政策、學科建構與文化批判之間.....57	
(關鍵詞：婦女問題、婦女研究、婦女學)	
第一節 婦聯系統對婦女學的初步接受與新時期的現代性想像	
第二節 「婦女學」作為一種科學方法，「女性主義」作為一種文化批判	
第四章 將社會性別納入主流.....107	
(關鍵詞：社會性別)	
第一節 Gender 初抵國門：「性別」，還是「社會性別」？	
第二節 婦聯系統對於「社會性別」概念的接受情況	
第五章 改革開放中的「婦女與發展」話語.....139	
(關鍵詞：發展、婦女與發展研究)	
第一節 「婦女與發展研究」的中國境遇	
第二節 「(婦女)發展」意味著什麼？	
第六章 結論.....159	
參考文獻.....171	

鳴謝

感謝我的論文導師陳清僑教授以及陳順馨博士三年多來的指導。由最初擬報讀哲學博士學位的傾談開始，直至我把論文一章一章的寫出來之後的反覆討論，她/他們都給予了悉心的指導，沒有她/他們的指點、鞭撻與鼓勵，要完成這一篇工程浩大的論文，大概是沒有可能的。

感謝留京研究期間，婦聯研究所的劉伯紅老師、季仲贊與李線玲所給予的通力協助，為筆者在尋找文獻與鎖定資料範圍上，提供了必要之幫助。也感謝留京期間認識並成為知交的徐妍的照顧，讓炎炎的八月涼快了不知多少。

感謝戴綿華老師、校外考試委員潘毅博士、墨美姬教授、游靜博士、許寶強博士、羅永生博士、薛翠博士、林靄雲以及葉蔭聰在不同場合所給予的支持和寶貴意見。其中特別感謝林靄雲，是她把我引向這個既困難又充滿挑戰性的題目。

感謝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一直以來所給予的精神和物質上的支持，也感謝系裡的每一位成員，學問從來都不是一個人的事。

感謝獨立媒體的姊妹兄弟，尤其是聰頭和靄雲，每每在我感到困頓時伸出援手，給予支持、鼓勵和意見。

感謝我的爸爸以及我中大時期的「師傅」石元康老師，對於我來說，他們的自由與寬容，是最好的身教，畢生受用。

最後，特別要感謝我的家人梁寶以及兩頭頑皮的小貓，而一切盡在不言中。

第一章

導論：在現代性語境中的女性主義話語

關鍵詞：文化協商

第一節 論題的總整架構

本論文所希望探討的，乃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至 2000 年)中國當代婦女研究對於女性主義話語的接受、建構與變遷，尤其是其間種種的文化協商。

要考察中國當代婦女研究對於女性主義話語的接受以及建構，「現代化」或「現代性」自然是一個繞不過去的核心語境。如果「現代化」是指人類近代在政治經濟制度方面的全方位轉型，而「現代性」是指在這個歷史過程中，人類在個體-群體心性結構及其文化制度方面相應的形態變化，¹ 那麼，中國當代婦女研究對女性主義話語的接受以及建構，顯然既是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的中國現代化進程的時代產物，同時也是這個現代化大計的其中一個非常重要的構成部分。

1978 年，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三中全會確定以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尤其是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國家發展工作重點後，中國全國隨即展開了影響深遠的改革開放。但此後不久，隨著改革對社會主義體制的鬆動，婦女下崗、階段就業、男

¹ 劉小楓著：《現代性社會理論緒論：現代性與現代中國》，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6 年，頁 2。

女就業不平等、離婚率上昇、賣淫、拐賣婦女、女嬰被殺等等新舊的「婦女問題」，開始湧現。面對改革開放時期接踵而來的種種婦女問題，在八十年代初，婦聯組織以及來自學術界的自發性力量開始有意識地引入國外婦女研究的成果，並提出「婦女學」學科化的構想，除了希望藉此對婦女的許多新的情況與問題作出理論上的解釋外，亦希望為婦女運動的實踐提供理論上的指導，讓前線的婦女工作自我更新，適應新的情勢。

但我們知道，婦女學原本是舶來學科，誕生於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以後的西方(主要指美國)女權運動。當時，由於這一場社會運動的參與者有很多是大學的女學生與女教師，所以她們很快便把這場運動帶進了高等院校。然而，她們不單在社會領域中考慮性別不平等的問題，而且更從教育體制、學術領域以至知識體系本身著手審視性別不平等。於是，一批女性主義學者開始對西方的知識體系進行梳理與質疑的工作。一方面，她們發現以往的知識體系是以男性為中心的，偏頗地以男性的角度來觀察世界以及建構知識，而女性則在這個知識體系中受到貶抑甚至缺席；另一方面，她們則看到知識生產中的性別權力關係，看到性別作為人類社會的其中一個基本組織原則，是以往的知識體系所忽略的，看到這種忽略導至了人們作為常識接受的許多偏頗與謬誤的理論，看到這些理論在鞏固性別不平等關係上起了相當重要的作用。換言之，女性主義至此已由一場政治運動擴展為一場思想和文化的運動；而隨著這一場運動在教育體制以及學術領域中的滲透，女性主義學者一步一步的把性別視角引進了歷史、文學、人類學、心理學、社會學、教育學等各個學術領域，並開始逐步建立一門獨立的婦女學學科；反過來說，她們同時亦借助了這些學術領域的理論資源，進一步建構以及完善自己的理論體系。² 可見，婦女學一開始便與(西方)女性主義話語

² 王政著：〈淺議社會性別學在中國的發展〉(2001)，《越界：跨文化女權實踐》，天津市：天津人民出版社，2004年，頁94-95；王政等著：〈高等教育中的婦女學—中美比較〉(2002)，《越界：跨文化女權實踐》，頁123-128，133-141。

緊密結合，要把婦女學引入中國的文化語境，女性主義話語是無法直接繞過的。事實上，伴隨著這一場中國當代婦女研究的重構運動的，正正是對於女性主義話語的(再度)接受以及建構。可以這麼說，中國當代婦女研究的建構，基本上是跟女性主義話語的接受與建構同步的，二者互相借助，又互為辯證，是一個辯證性的雙重歷史過程。

此外，女性主義話語本身亦實際上夾帶著「性別平等」、「個體自由」、「主體」等等作為現代性標記的概念和價值。事實上，女性主義話語正正是現代性話語的其中一個非常重要的構成部分。可以這麼說，對於中國女性主義話語的接受以及建構的研究，同時也是有關中國現代性的研究。

之所以選擇以中國當代婦女研究作為切入點，考察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中國內地對女性主義話語的接受以及建構的情況，是因為：(一)如前所述，婦女學原本是舶來學科，是女性主義的直接產物，而女性主義也是婦女學最重要的理論資源。所以對於女性主義話語，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的中國當代婦女研究是無從規避的，無論如何取態，它們都必須與之展開對話。故此，要考察八十年代以來中國內地對女性主義話語的接受以及建構的情況，中國當代婦女研究便成為了最能夠集中體現其間話語之間的種種翻譯、碰撞、衝突和協商的歷史過程之研究個案之一。(二)跟其他的領域相比，中國當代婦女研究的發展總離不開現實中的婦女問題，具有強烈的現實性，跟中國現代化之間，可謂關係密切。故此，考察八十年代以來中國當代婦女研究對女性主義話語的接受以及建構，也同時讓我們有機會得以看看，女性主義話語與中國現代性之間種種的內在緊張、衝突以至文化協商。

立論

本論文提出的主要立論是：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中國當代婦女研究對於女性主義話語的接受與建構，是一個充滿文化協商的過程，它開始於後文革與改革開放的雙重語境之中，面對中國社會主義的遺產與債務，其間障礙重重，無法得到真正的開展，而直至 1995 年聯合國第四次世界婦女大會的舉行、聯合國成員國對《北京宣言》、《行動綱領》等兩份全球性的綱領文件的簽定，契機才逐漸出現。可以這麼說，在這一個文化協商的過程中，借著歷史性的契機，中國當代婦女研究透過對於女性主義話語的接受和建構，在新自由主義邏輯與社會主義的既有體制之間，在話語以至體制上，為現實中的婦女以及自身建構了一個迴轉與生存的環境。

這裡所說的後文革語境，指涉的是經歷十年文革後，八十年代中國社會(尤其是人文知識界)所廣泛掀起的一場針對 1950-1970 年代(即毛澤東時代)社會主義主流文化思想的反撥與批判的運動，而其中尤其突出的是八十年代的人道主義思潮。姑勿論粗略收於「人道主義」這把大傘下不同話語之間的千差萬異，³ 這些不同形態的人文話語都分享著一種共同的關於「人」的理念，「即在普遍意義上將『個人』視為絕對的價值主體，強調其不受階級關係、社會歷史，乃至文化建構限定的自由和自我創造的屬性，以此對抗毛澤東時代尤其是『文革』時期國家對個人的壓抑與監控。」⁴ 至於毛澤東時代所倡導的「男女都一樣」的性別意識形態，則被認為是國家以「抹消性別」或「無性」狀態壓抑人性與個體的罪證，而作為對這種性別意識形態的反撥，「性別」成為了標識「人性」的主要認知方式。可以想像，在這種文化語境中，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國當代婦女研究對於女性主義話語的接受與建構，「女性」、「性別」、「個體」和「主

³ 指「馬克思主義人道主義」、「新啟蒙主義」和「生存/生命哲學(文化哲學)」。關於八十年代人道主義思潮中這三種不同形態的人文話語，詳情可參考本論文第二章的相關介紹。

⁴ 賀桂梅著：《人文學的想像力：當代中國思想文化與文學問題》，開封市：河南大學出版社，2005 年，頁 78。

體」等人道主義話語中所常見的詞彙，都成為了其間舉足輕重的關鍵概念；可以說，它們既形塑同時也限制了對於作為外來話語的中國當代女性主義的接受與建構。

如果說，人道主義話語對於國家意識形態的反抗，是一種針對社會主義歷史的話語反撥，但與此同時，實質對應的則是資本/市場關於「個人」的重組，那麼在八十年代中國當代婦女研究對於女性主義話語的接受與建構中，對「女性」、「性別」、「個體」、「主體」等概念的強調，對應的同樣是新國家意識形態對於「個人」的重構，讓對抗於「非人」的國家機器的自由個體得以被釋放，並作為自由的勞動力，被有效地組織到正在成形的自由市場之中，成為改革開放的現代化大計的核心構成。

然而，面對中國社會主義的遺產與債務，八十年代中國當代婦女研究在對女性主義話語的接受與建構中，對於人道主義話語以至自身的學科建構的籲求，卻始終冒著被扣「宣揚實踐資產階級女權主義」的政治大帽子的危險，仿佛「帶著手銬腳鐐在跳舞」。儘管如此，八十年代亦同時見證著中國婦女研究界如何透過「婦女學」的建構，自政治意識形態的領域漸次分離，以取得婦女研究自身的相對獨立性之嘗試。正是這一場自我疆界劃定與建構的運動，為九十年代的中國當代婦女研究，打造了進一步接受與建構女性主義話語的話語空間。

進入九十年代，隨著鄧小平南巡(1992年)，市場經濟全面展開，中國社會經歷了階級/階層結構上的重大重組，資本私有化進程造成了貧富的二極分化，「婦女問題」愈演愈烈，層出不窮，在制度上仍然享有一定平等權利的婦女，在現實中卻遭遇到進一步的衝擊。面對現實中的婦女問題以及對於建構婦女學的籲求，九十年代初中國當代婦女研究開始有系統地引入女性主義的首席概念「社會性別」(Gender)及其理論，並得到婦聯與學界之廣泛接受。筆者認為，社會性

別的概念和理論之所有獲得廣泛接受，是因為它為中國當代婦女研究界提供了一件火力強大的分析工具，對應於後文革的性別重構現象，在保住性別差異這個基點的前提下，復又能夠穿透這個基點本身，在社會結構與文化體制的深處，尋找現實中赤裸裸的性別不平等的真正根源。

然而，中國當代婦女研究界之所以在九十年代廣泛接受「社會性別」的概念和理論，更關鍵的卻在於第四次世婦會對於《北京宣言》、《行動綱領》等綱領性文件的簽定，以及國務院於世婦會同年對於《中國婦女發展綱要(1995-2000 年)》的頒布。可以這麼說，在這一個文化協商的過程中，借著歷史性的契機，中國當代婦女研究透過對於女性主義話語的接受和建構，在新自由主義邏輯與社會主義的既有體制之間，在話語以至體制上，為現實中的婦女以及自身建構了一個迴轉與生存的環境。

故此，中國當代婦女研究的發展可以分為(一) 1980 年代初至 1993 年；(二)1993 至 2000 年等兩個階段。至於 2001 年至今的發展，由於比較晚近，加上 1995 年國務院頒布《中國婦女發展綱要(1995-2000 年)》之後，中國有關婦女發展的國家規劃方略都以五年為一個單位，而中國當代婦女研究的發展又與中國現代化的進程密切相關，因此本論文的研究範圍亦將以 2000 年為界限。

第二節 文獻回顧

有關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中國內地對女性主義話語的接受與建構史的研究，可謂寥寥無幾，以中國當代婦女研究為研究個案的，就更是鳳毛麟角。總括而言，相關的研究可分為兩大類，以下是對這些研究成果的簡要回顧。

(一)有關個別學科的女性主義話語接受史的研究。由於文學批評是新時期其中一個較早引入女性主義的學術領域，⁵ 迄今為止在這個領域相關的接受史研究亦比較多。這些著作或考察女性主義文學批評是如何被傳入中國，被中國的批評家所借用、改造，從而形成自己的女性主義文學批評的歷史過程，如林樹明的《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在中國》與《多維視野中的女性主義文學批評》、陳志紅的《反抗與困境：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在中國》、賀桂梅的〈當代女性文學批評的三種資源〉(有關女性主義的部分)；⁶ 或針對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對於新時期的女性文學在寫作與美學上的影響，如西慧玲的《西方女性主義與中國女作家批評》、楊莉馨的《異域性與本土化：女性主義詩學在中國的流變與影響》。⁷ 廣義地說，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可算是中國當代婦女研究的一支(也是重要的一支)，而上述著作在考察中國當代文學批評對女性主義話語的接受與建構，以至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對新時期女性文學的影響，都有相當的貢獻。不過，這些研究的重點只集中在文學批評這個特定的學術文化領域，這固然有助於我們對中國當代女性主義話語接受史的一個面向有所把握，卻遠非全豹。

(二)有關中國當代婦女研究對女性主義話語的接受與建構史的研究。相對於第一

⁵ 在過去二十多年來，中國內地文學批評及研究界在介紹與應用女性主義理論方面，著述甚多，現只舉數種著述為例，一窺其發展情況。在理論引介方面，在 1992 年，北京大學出版社便推出了張京媛所編的譯文集《當代女性主義文學批評》；1994 年，康正果則推出了《女權主義與文學》一書(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至於理論應用方面，孟悅與戴錦華、劉慧英、陳順馨、徐坤等，則分別就著不同的課題，先後出版了多種女性主義批評著作，其中包括《浮出歷史地表：中國現代女性文學研究》(孟悅與戴錦華著，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 年)、《走出男權傳統的樊籬：文學中的男權意識的批判》(劉慧英著，北京：三聯書店，1995 年)、《中國當代文學的敘事與性別》(陳順馨著，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 年)、《雙調夜行船——九十年代的女性寫作》(徐坤著，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 年)等等。

⁶ 林樹明著：《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在中國》，貴州人民出版社，1995 年；陳志紅著：《反抗與困境：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在中國》，杭州：中國美術學院出版社，2002 年；林樹明著：《多維視野中的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 年；賀桂梅著：〈當代女性文學批評的三種資源〉，《人文學的想像力：當代中國思想文化與文學問題》，開封市：河南大學出版社，2005 年，頁 100-113。

⁷ 西慧玲著：《西方女性主義與中國女作家批評》，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3 年；楊莉馨著：《異域性與本土化：女性主義詩學在中國的流變與影響》，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 年。

類的著作來說，這一類著作以廣義的中國當代婦女研究為研究對象，對女性主義話語的接受史有一較整全的考察，其中又可以分為三個子類：

1、從社會科學的角度切入的相關研究。美國學者 Sharon R. Wesoky 在《中國女性主義面向全球化》(*Chinese Feminism Faces Globalization*)中，從社會運動研究的角度切入，考察了九十年代中國民間婦女運動在北京的興起。Wesoky 指出，第四次世婦會為中國的非政府婦女運動組織，打開了接觸國際婦女組織和國外基金的契機，並讓女性主義的話語得以進入中國婦女工作的最前線。與此同時，她又指出，這些非政府婦女運動組織跟國家與官方婦女組織(以婦聯為代表)之間，一直處於一種既緊張對抗又互相合作的共生狀態(symbiosis)。可見非政府婦女運動組織在中國的發展，在某程度上始終離不開官方建制的因素。此外，Wesoky 在《中國女性主義面向全球化》中，透過考察國內多份婦女報刊由 1984 年至 1996 年的內容以及三份有關國內婦女研究著作的書目，亦曾經就中國民間婦女運動界對女性主義話語的接受，作出了概念史的研究。⁸ 不過，此書的重心在社會運動的問題之上，所以對女性主義話語接受史的考查也就比較簡略。話雖如此，本論文基本上部分上承了 Wesoky 有關中國非政府婦女運動組織跟國家與官方婦女組織之間關係的看法，因此也就特別強調國家與婦聯組織在中國女性主義話語接受史中的作用。

2、由中國當代婦女研究的當事人親自撰寫/口述的相關紀錄或研究。這一類著作又可以再分為兩個次子類：(a)中國當代婦女研究的當事人由個人的經驗出發，縷述接觸以至接受女性主義的過程，如王政的〈心智的選擇〉、杜芳琴的〈我的婦女研究歷程〉；⁹ 其中亦間或有對女性主義話語的接受與建構的情況，作出

⁸ Sharon R. Wesoky, *Chinese feminism faces globalization*, New York : Routledge, 2001.

⁹ 王政著：〈心智的選擇〉，李小江等著：《女性？主義——文化衝突與身份認同》，江蘇人民出版社，2000 年，頁 203-226；杜芳琴著：〈我的婦女研究歷程〉，李小江主編：《身臨“奇”境——性別、學問、人生》，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0 年，頁 171-211。

整體的概述與評論，如戴錦華的〈女性主義：文化立場、性別經驗與學術選擇〉。

¹⁰ (b)中國當代婦女研究的當事人親自撰寫的相關研究，如王政的〈當代中國婦女研究〉和〈淺談社會性別學在中國的發展〉、閔冬潮的〈Gender(社會性別)在中國的旅行片段〉。¹¹ 由於作者置身其中，這一些著作為後來的研究者提供了不少寶貴的第一手資料，以更準確地把握有關女性主義話語的接受與建構的語境。不過，正因為這些作者同時置身在她的研究對象當中，這些著作亦無可避免地成為了整個話語的接受與建構過程的一部分。因此，這些著作的內容往往會隨著作者的不同立場而有所偏重。儘管如此，這一些「偏重」卻無疑為本論文提供了不少具討論價值的話語分析個案，以重構雲譎波詭的歷史圖像。

3、由思想史或話語分析的角度切入的相關研究。這一類研究可以美國學者白露(Tani E. Barlow)的論文〈“婦女”的政治與協議：解/建構國族女性〉(Politics and Protocols of *Funii*: (Un)Making National Woman) 和著作《中國女性主義中的女性問題》(*The Question of Women in Chinese Feminism*)為代表。¹² 白露在〈“婦女”的政治與協議：解/建構國族女性〉中，透過知識考古學的方法，以「婦女」、「女性」、「女人」等關鍵概念作為分析個案，考察了中國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幾場有關性別的討論，以追溯女性話語在後毛年代的話語流變及其文化政治。至於《中國女性主義中的女性問題》，則把分析的稜鏡擴展至整個二十世紀的中國，對接近一個世紀的女性主義思潮中的「女性」範疇，作出了知識考古學式的考查。雖然研究的焦點有異，但本論文的研究方法無疑跟以上的著作一脈相承，而白

¹⁰ 戴錦華著：〈女性主義：文化立場、性別經驗與學術選擇〉，《猶在鏡中：戴錦華訪談錄》，北京：知識出版社，1999年，頁136-190。

¹¹ 王政著：〈當代中國婦女研究〉，《越界：跨文化女權實踐》，天津市：天津人民出版社，2004年，頁65-91；王政著：〈淺談社會性別學在中國的發展〉，《越界：跨文化女權實踐》，頁92-114；閔冬潮著：〈Gender(社會性別)在中國的旅行片段〉，《婦女研究論叢》，2003年第4期，頁3-9，19。

¹² Tani E. Barlow, "Politics and Protocols of *Funii*: (Un)Making National Woman", *Engendering China: Women, Culture, and the State*, Edited by Christina K. Bilmartin & al.,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London, England: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 339-359; Tani E. Barlow, *The Question of Women in Chinese Feminism*, Durham and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4).

露有關中國八、九十年代的女性話語的話語分析，亦為全面考察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中國內地對女性主義話語的接受與建構，奠定了必要而良好的基礎。

因此，從話語分析出發，考察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中國當代婦女研究對女性主義話語的接受與建構，無論在研究的廣度或深度上，都還有充分的研究空間，而本論文正擬通過話語分析的方法，對這個理論旅行的歷史過程進行比較完整、深入的研究。

第三節 研究方法

本論文的研究方法，主要受益於薩依德(Edward W. Said)的「理論旅行」(Traveling Theory)、劉禾的「跨語際實踐」(Translingual Practice)、福柯(Michel Foucault)的「知識考古學」(Archeology of Knowledge)以及大衛遜(Arnold I. Davidson)的「概念空間」(Conceptual Space)的理論。本論文將自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中國當代婦女研究的兩個發展階段(1980 年代初至 1993 年、1993 至 2000 年)，分別抽取一系列關鍵概念，透過一些具有分析意義或重要的相關話語事件(discursive events)個案，借助知識考古學的方法，以話語分析考察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當代婦女研究對於女性主義話語的接受、建構與變遷，尤其是其間種種的文化協商。

在這裡，值得追問的是：當一個語詞、概念、理論或者話語從一種語言向另一種語言「旅行」，到底發生了什麼？關於理論或觀念旅行的過程，薩依德發現一般都包含了四個主要階段：

首先，有一個起點，或類似起點的一個發勒環境，使觀念得以發生或進入話語。第二，有一段得以穿行的距離，一個穿越各種文本壓力的通道，使

觀念從前面的時空點移向後面的時空點，重新凸顯出來。第三，有一些條件，不妨稱之為接納條件或作為接納所不可避免之一部分的抵制條件。正是這些條件才使被移植的理論或觀念無論顯得多麼異樣，也能得到引進或容忍。第四，完全(或部分)被容納(或吸收)的觀念因其在新時空中的新位置和新用法而受到一定程度的改造。¹³

介紹過「理論旅行」的一般性理論架構之後，薩依德隨即考察了馬克思主義哲學家盧卡奇(Lukacs)有關「物化的社會現實」和「整體性的批判思考」之間關係的理論，是如何由原來的語境向同樣重要的馬克思主義文學批評家戈德曼(Goldmann)和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的思想「旅行」。但令人奇怪的是，正如美籍中國學者劉禾所觀察到的，薩依德的實際討論並沒有超出一種通常的論點，即理論總是回應著在變動中的社會和歷史的環境，但對於理論的旅行層面本身，卻著墨不多。她認為，薩依德的討論過份地肯定了理論的首要性，而未能成功解答以下的問題：交通/翻譯的工具是什麼？

通過壓抑翻譯的工具，旅行成為了一種抽象的思想，以致於理論在哪個方向旅行(從西方向東方，還是相反)，出於什麼目的(是文化交流、帝國主義，還是殖民化？)旅行，或者使用哪一種語言、為了哪些受眾旅行，這些問題都變得無足輕重了。¹⁴

同樣令人詫異的是，作為當今最重要的後殖民研究學家之一的薩依德，在有關理論旅行的實際討論中，一直都把分析視域侷限於第一世界的內部，對於涉及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的權力關係的理論旅行問題，卻始終沒有觸及。

劉禾指出，語言之間的交往同時也是民族鬥爭和國際鬥爭的場所，這對於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之間的關係，尤其如此。有鑑於此，她提出了「跨語際實踐」

¹³ 賽義德著，馬海良譯：〈理論旅行〉，《賽義德自選集》，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年，頁138-139；Edward W. Said, "Traveling Theory", *The World, the Text, and the Critic*,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pp. 226-227.

¹⁴ 劉禾著，宋偉杰等譯：《跨語際實踐：文學、民族文化與被譯介的現代性(中國，1900-1937)》，北京：三聯書店，2002年，頁29。

的觀念。在《跨語際實踐：文學、民族文化與被譯介的現代性(中國, 1900-1937)》與《語際書寫：現代思想史寫作批判綱要》等著作中，透過研究中國與西方在二十世紀初歷史性的文化交往(對西學的大量翻譯)，她考察了：

新詞語，新意思和新話語興起，代謝，並在本國語言中獲得合法性的過程，不論這過程是否與本國語言與外國語言的接觸與撞擊有因果關係。也就是說，當概念從一種語言進入另一種語言時，意義與其說發生了「轉型」，不如說在後者的地域性環境中得到了(再)創造。在這個意義上，翻譯已不是一種中性的，遠離政治及意識形態鬥爭和利益衝突的行為。相反，它成了這類衝突的場所，在這裏被譯語言不得不與譯體語言對面遭逢，為它們之間不可簡約之差別決一雌雄，這裏有對權威的引用和對權威的挑戰，對曖昧性的消解或對曖昧的創造，直到新詞或新意義在譯體語言中出現。¹⁵

無疑，中國現代知識傳統的建構起始於對西學的翻譯、接受與挪用，以回應近代以來中國對現代化或現代性的國族籲求。如果中國現代性無可否認地是以翻譯活動為始點，借用劉禾的用語，把中國現代性理解為「在翻譯中生成的現代性」(translated modernity)，¹⁶ 也就未嘗不可。可以這麼說，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中國當代婦女研究對於女性主義話語的接受與建構，也是一種「在翻譯中生成的現代性」。因此對於本論文的研究來說，「跨語際實踐」的理論也就特別相干。所以，本論文的研究重點並不在於技術意義上的翻譯，而是在於話語翻譯/接受的歷史條件，以及由不同的語言之間的接觸所引發的話語實踐。

但無論是薩依德的「理論旅行」，還是劉禾的「跨語際實踐」，均明顯地以福柯的「知識考古學」作為研究的方法論基礎。但到底甚麼是知識考古學呢？我們知道，知識考古學是一套由已故當代法國思想家福柯所一手開創的獨特的歷史研究方法。正如福柯所言，他早在《瘋狂與文明：理性時代的癲狂史》(*Madness*

¹⁵ 劉禾著：〈個人主義話語〉，《語際書寫——現代思想史寫作批判綱要》，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1997年，頁29。

¹⁶ 語出《跨語際實踐：文學、民族文化與被譯介的現代性(中國, 1900-1937)》一書，見劉禾著，宋偉杰等譯：《跨語際實踐：文學、民族文化與被譯介的現代性(中國, 1900-1937)》，頁7。

and Civilization : A History of Insanity in the Age of Reason) 、《診所的誕生：關於醫學知覺的考古學》(Birth of Clinic : An Archaeology of Medical Perception) 、《事物的秩序：關於人文科學的知識考古學》(Order of Things : An Archaeology of the Human Sciences)等著作中，已開始循著這個方向思考問題以及進行研究，儘管他在以上各書中均沒有系統地說明知識考古學是甚麼。可以這麼說，福柯是先有知識考古學的實踐，才回溯地確立知識考古學的理论與方法。爲了在理論與方法上總結他前期在知識考古學方面的實踐，也爲了對這些實踐作出修正與批判，並且爲了回答人們提出的「甚麼是知識考古學」的疑問，福柯寫作了著名的《知識考古學》一書。¹⁷

簡言之，知識考古學所要探索的對象，是「話語」(Discourse)，¹⁸ 而所謂「話語」，指的是「由所有具有時效性的陳述所構成的整體」(the totality of all effective statements)或「一個陳述群」(a group of statements)。¹⁹ 知識考古學並不關心某一知識是否符合外在對象，而是著眼於關於某一對象的話語是如何形成的，也就是說，話語中的特定陳述以及陳述間的關係得以產生的條件與規則。福柯稱這種話語得以產生的條件與規則爲「話語型構」(discursive formation)。換言之，知識考古學是一種限於話語本身的內部研究。福柯指出，我們可以從四個方面描述某一話語的話語型構，它們分別是：「對象」(object)、「陳述模式」(mode of statement)、「概念」(concept)與「理論或主題選擇」(theoretical or thematic choice)；它們各自擁有自身的規則(福柯稱之爲「構成的規則」(rules of formation))，但又互相關涉，爲同一的話語劃定疆界。²⁰ 值得注意的是，這些規則並不是話語的純粹形式結構，而是話語的具體運作規則，即「話語實踐」(discursive practice) 的

¹⁷ Michel Foucault, *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 translated by A. M. Sheridan Smith, London ; New York : Routledge, 1992, pp.14-17; 米歇爾·福柯著，謝強、馬月譯：《知識考古學》，北京：三聯書店，1998年，頁18-22。

¹⁸ Same as 17, pp. 26-27; 同註17，頁31-32。

¹⁹ Same as 17, p. 27, 74; 同註17，頁31，92。

²⁰ Same as 17, p. 38; 同註17，頁47。

規則；正是具體的話語實踐，讓各種規則系統間的關係得以落實與確立。

然而，福柯並不認為一個既定的話語型構是由單一的對象系統、單一的陳述模式、單一的概念架構，以及單一的理論或主題所規定的。事實上，同一的話語型構可以包含不同的對象系統、陳述模式、概念架構以及理論觀點。故此，福柯所謂的話語型構，與其說是一個統一的系統，倒不如說是一個「擴散的系統」(*systems of dispersion*)；它規定了一個領域，其中包含了大量不同甚至互相衝突的陳述，關鍵是要符合一定的規則。²¹ 此外，儘管話語中的各種系統間的關係由話語型構所規定，這些關係卻不是靜態與不動的，具體的話語實踐有可能會引入一些新的或不確定的東西，改變既有的關係，形成一種雙向迴路的辯證。²²

換言之，本論文希望以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中國當代婦女研究為個案，自它在不同時期所涉及的一系列關鍵概念，以一些具有分析意義或重要的相關話語事件(*discursive events*)個案為切入點，借助知識考古學的方法，以話語分析所要探討的，是女性主義話語在中國當代婦女研究領域中得以被接受、挪用與建構的歷史條件以及話語規則，以及由這個過程而引發的種種話語實踐。如前所述，這是一個充滿文化協商的過程，故此也可以說，本論文所希望探討的，乃這一個文化協商過程中的種種歷史條件以及話語規則，以及由這個過程而引發的種種話語實踐。然而問題是，要作出這樣的具體分析，將從何入手？為此，下文將在知識考古學的基礎上，提出「概念空間」的觀念。

如前所述，「概念空間」首先由美國學者大衛遜所提出。在《性態的興起：歷史知識論與概念的構成》(*The Emergence of Sexuality: Historical Epistemology and the Formation of Concepts*)中，大衛遜指出，一個特定概念的意涵往往由它所置

²¹ Michel Foucault, *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 p. 25, p. 31-37; 米歇爾·福柯著，謝強、馬月譯：《知識考古學》，頁 37-47。

²² Same as 21, p. 74-76; 同註 21，頁 93-95。

身的「概念空間」所界定，即一個由可茲識辨的規則所構成的空間，而這樣的一個空間則決定了陳述與概念、概念與概念之間，可以與不可以構成怎樣的關係。他指出，這一種概念與概念之間的特定連結方式，又可以稱為「思辯的風格」(Style of Reasoning)。他以「變態」(Perversion)的概念為例子指出：直至十九世紀末，一種屬於精神病學的思辯風格(Psychiatric Style of Reasoning)才真正的出現。他指出，「變態」的概念是這一種新的思辯風格的一個構成部分，而正是這一種思辯風格把一系列相關的概念，以特定的方式連結起來。當然，「變態」一詞在精神病學興起以前，早已存在。但他指出，語詞上表面的連續性往往掩蓋了概念上的不連續性，隨著時空的變異，同一的語詞也不一定指向同一的概念。他以中世紀神學家奧古斯丁(Saint Augustine)的《上帝之城》(*The City of God*)為例指出，儘管「變態」(Perverse, Perversae)一詞早已於該書出現，但對於奧古斯丁來說，「變態」更多地意味著意志的缺陷、自覺地對上帝的背叛。這是一種價值上顛倒，以低等的善取代高等的善，顛三倒四，是非不分。故此，在奧古斯丁的思想裡，跟「變態」剛好相反的，是「皈依」(Conversion)的概念。但對於精神病學的思辯風格來說，「變態」則跟意志與道德無關，而是一種有關性本能的疾病，在生理與心理上植根於一個人的個性。故此，根據這一種思辯風格，跟「變態」剛好相反的，是正常的性慾。事實上，在精神病學的思辯風格中，「變態」概念的作用，正正在於把性變態現象跟邪惡或不道德的行為區分開來。大衛遜指出，以上的分析証明，奧古斯丁的「變態」概念與十九世紀的精神病學思辯風格並不是處於同一的概念空間。²³ 故此，要從概念入手，確定一個特定話語的話語型構，就必須確定由一系列相關概念所構成的概念空間，而這個空間基本上是由一套特定的思辯風格所規定的，讓其間的概念以一種特定的方式連結起來。

²³ Arnold I. Davidson, *The Emergence of Sexuality: Historical Epistemology and the Formation of Concept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London, England: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 136-140.

由是觀之，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中國當代婦女研究對於女性主義話語的接受與建構，首先可被視為一項薩依德意義上的「理論旅行」，或劉禾意義上的「跨語際實踐」。若果我們可以把話語理解為一個由一系列相關概念所構成的概念空間，而這個空間基本上是由一套特定的思辯風格所規定的，讓其間的概念以一種特定的方式連結起來，那麼，中國當代婦女研究對於女性主義話語的接受、建構與變遷，則大概可以被理解為一種跨語際和語言內部的概念空間的重構與(再)創造。在這裏被引入的話語不得不與其被引至的文化語境對面遭逢，其間有話語間的衝突、挪用與協商，直到新的話語在其被引至的文化語境中，以某種形式被接受與建構。

但問題是：在嚴格的意義上，本論文所要進行的，算得上是一項福柯式的知識考古學研究嗎？正如福柯自己所言，若果要對在時間上離我們較遠的歷史時期(例如西方十七世紀的古典時期)進行知識考古學的研究，我們需要做的只是描述，若果我們要對在時間上離我們較近的歷史時期(例如西方的現代時期)進行同類的分析，我們需要的卻是自我們仍然活在其中的話語環境「抽離」：

我們可以自緩慢的演變中，發現古老話語的話語型構；但當我們有義務質疑仍然跟我們難分難解的所聽所言，要確定一個我們仍然活在其中的話語系統，就像尼采式的哲人，知識考古學者被逼訴諸文化批判的大鐵鎚，對「當下」迎頭痛擊。²⁴

無疑，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的短短二十多年只能算作「當下」，若果我們仍然跟我們的所聽所言難分難解，我們又將如何可能自我們仍然活在其中的話語環

²⁴ “One can discover from a gradual movement the old latent configurations; but as soon as it's a matter of determining the system of discourse within which we are still living, at the moment we obliged to put into question the words that still resonate in our ears and which are indistinguishable from those we are trying to speak, then the archeologist, like the Nietzschean philosopher, is forced to resort to the blow of the hammer.” See Michel Foucault, “Discourse of History”, *Foucault Live: Collected Interviews, 1961-1984*, edited by Sylvère Lotringer, New York: Semiotext(e) (1996), p. 30. (按：中譯為筆者所譯。)

境「抽離」，對之進行福柯式的知識考古學研究？因此，與其說本論文要對中國當代婦女研究對於女性主義話語的接受與建構，進行一項嚴格意義上的知識考古學的研究，倒不如說，深受知識考古學的影響，本論文主要希望通過話語分析的方法，考察女性主義話語在中國當代婦女研究領域中得以被接受、挪用與建構的歷史條件以及話語規則，以及由這個過程而引發的種種話語實踐。換言之，筆者無可避免的將會成為或已然是他所要考察的對象的一部分，他無法自他仍然置身其中的話語環境完全抽身，對之有一完全的整體把握。但筆者認為，對「當下」作出某意義與程度上的話語分析，還是可能的，那怕這只是一種局部和暫時的知識：一種通向「未來」的知識。

我們知道，「文化研究不僅以描述、解釋當代文化與社會實踐為目的，而且以改變現存權力結構為目的」。²⁵ 換言之，文化研究並不滿足於對文化僅僅作靜止、客觀與抽離的研究，其表現為一種對於現實的強烈介入性和干預性。因此，作為一項文化研究，本論文以中國當代婦女研究對女性主義的接受與建構史為中心，作出深入的話語分析，對於像中國當代婦女研究這樣一個尚在建構的領域來說，無論在理論或實踐上，無疑都具有深遠的意義。

第四節 論文結構

本論文的結構如下，第一章為導論，提出本論文的論題總整架構，交待論文的主要立論，對相關的研究作出簡要的文獻回顧，指出論文的基本研究方法。

論文的第二至三章構成論文的第二部分，將通過幾個具體研究個案的分析，探

²⁵ 引自陶東風、石磊著：《文化研究》，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年，頁11；原文見J. D. Slay and L. A. Whitt, "Ethics and Cultural Studies", Grossberg, Letal. Ed., *Cultural Studies*,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1.

討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至 1993 年期間，中國當代婦女研究對於女性主義話語的初步接受與建構情況，尤其是其間種種的文化協商。其中，第二章將以中國當代婦女研究的重要開拓者之一李小江的著作為分析個案，從「婦女問題」在改革開放年代的大量湧現，人道主義話語在後文革時代的興起，人們對現代化/現代性的想像等文化語境，考察性別是如何廣泛地成為一個社會議題，人們是如何談論性別，而這些與性別有關的話語，又是如何形塑並同時限制了作為外來話語的中國當代女性主義話語的接受與建構。第三章則將探討八十年代的中國婦女研究界(包括婦聯系統與學術界)，是如何透過「婦女學」的建構，自政治意識形態的領域漸次分離，以取得婦女研究自身的相對獨立性，透過自我疆界的重新劃定與建構，為九十年代的中國當代婦女研究，打造進一步接受與建構女性主義話語的話語空間。

至於論文的第四至五章，則構成論文的第三部分，其中，第四章將通過考察九十年代中國當代婦女研究對「社會性別」概念及其理論的接受與建構史，指出第四次世婦會對於《北京宣言》、《行動綱領》等綱領性文件的簽定，和國務院於世婦會同年頒布的《中國婦女發展綱要(1995-2000 年)》，對於整個中國當代女性主義話語的接受與建構史的關鍵轉折意義，以及其間種種的文化協商。至於第五章，則透過考察「婦女與發展」研究這個九十年代興起的研究領域，從一個側面，進一步探討女性主義話語在後世婦會的語境中的發展情況，並指出：在這一個文化協商的過程中，借著世婦會的歷史性契機，中國當代婦女研究如何透過對於女性主義話語的接受和建構，在新自由主義邏輯與社會主義的既有體制之間，在話語以至體制上，為現實中的婦女以及自身建構了一個迴轉與生存的環境。

第六章則為全文的結論，將總結和檢討整個論文，並同時指出，面對全面市場化與全球化資本主義的掠奪性經濟邏輯，對於中國當代婦女研究與女性主義者

來說，中國社會主義的既有體制的確提供了走出歷史困局的一定可能性。但筆者認為，若果不從女性主義的根本公義觀，甚至廣義的社會主義公義立場出發，改變中國當下對社會弱勢社群不公不義的體制本身，則中國當代婦女研究與女性主義者心目中的性別公義，甚至廣義的社會公義，將不會真正的到來。

第二章

現代化的性別問題，性別的現代性

關鍵詞：女人、有性的人、主體、現代性

1984 年，當時任教於鄭州大學中文系的李小江，在《未定稿》1984 年第 1 期上發表了〈馬克思主義婦女理論的研究起點和要點〉一文。¹ 同年，李再接再厲，在《馬克思主義研究》1984 年第 1 期上發表了論文〈人類進步與婦女解放〉，在婦女界(全國婦聯)引起了爭議，並惹來了諸如「反馬克思主義」之類的指責。² 翌年，李在《改革中的婦女問題》一書中，再發表了論文〈論中國婦女解放的特點和道路〉，提出中國婦女解放具有「立法超前」的性質，它主要是社會主義革命而不是女權運動的結果。³

然而，何謂「立法超前」？1950 年，新中國建國後不久即頒布了「新婚姻法」。新法廢除了童養媳，反對封建包辦式婚姻，提倡自由戀愛，確立了嚴格的一夫一妻制。1954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頒布了第一部憲法，在法律上進一步確立了男女平等的公民社會權利與政治權利。此外，新中國政府爲了提高婦女的社會經濟地位，在土改中落實了男女平等的經濟權利，並在城鎮中鼓勵家庭主婦參加社會勞動。五十年代中期，在一遍掃盲與全民文化運動中，許多勞動婦女都得到了再教育的機會，而所有適齡的女孩跟男孩一樣，享有同等的教育權利。李指出，婦女解放須以社會物質文明的高度發展以及婦女自身對發展的自覺追求爲條件，所

¹ 李小江著：〈馬克思主義婦女理論的研究起點和要點〉，《未定稿》1984 年第 1 期，頁 7-17。

² 李小江著：《走向女人：新時期婦女研究紀實》，鄭州市：河南人民出版社，1995 年，頁 9-10。

³ 同註 2，頁 10。

以中國婦女解放是在社會生產條件低下、女性自我意識闕如的情況下，透過新中國政府「立法超前」實現的。⁴

可以想像，這對於以推動馬克思主義的婦女解放理論為己任的官方組織全國婦聯來說，構成了怎樣的挑戰；但有趣的是，《改革中的婦女問題》一書，正正是由河南省婦聯所編的。

之後，李小江陸續發表了〈馬克思主義婦女理論的歷史-邏輯範疇〉、〈馬克思主義婦女學的體系框架〉(1986 年)、〈怎樣看待當前婦女問題和婦女研究〉(1988 年)、〈改革與中國女性群體意識的覺醒〉(1989 年)等論文，先後出版《女子與家政》(1986 年)、《夏娃的探索——婦女研究論稿》(1988 年)、《女人的出路》、《女人——一個悠遠美麗的傳說》、《性溝》、《女性審美意識探微》(1989 年)等著作，主編《西方女權運動文選》(1987 年)、《華夏女性之謎》(1988 年)、「婦女研究叢書」(1988-90 年)等文集及叢書；並分別於 1985 年在河南未來研究會名下成立「河南省婦女研究學會」，與 1987 年在鄭州大學成立婦女研究中心。

可以這麼說，李小江自 1983 年發表第一篇有關婦女研究的論文以來，在建設中國婦女研究的事業上，可算一帆風順。然而，正如王政所言，作為民間學者的李小江，卻一直與官方組織全國婦聯處於既緊張又合作的關係；⁵ 在 1989 年六四事件之後，根據李小江自己的複述，婦聯便有權威人士在 1989 年 12 月 25 日的《中國婦女報》上，對她進行了不點名的批判：

近來在國際大氣候、國內小氣候影響下，我們婦女解放事業這塊陣地，決不是真空。如有文章，無視六十多年來黨領導的婦女運動的光輝成就，貶低廣大

⁴ 李小江著：《走向女人：新時期婦女研究紀實》，頁 45。

⁵ 王政著：〈當代中國婦女研究〉(1998)，《越界：跨文化女權實踐》，天津市：天津人民出版社，2004 年，頁 73-74。

婦女群眾的覺悟，抹殺了她們為革命、為建設、為自身解放而進行鬥爭的歷史，說婦女是「依賴層」，說中國婦女解放是「恩賜的」、「超前的」，而另一方面宣揚實踐已經證明在我國行不通的資產階級的女權主義。

同志們，中國婦女解放這塊園地，是我們黨開拓、發展的社會主義陣地，決不允許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想侵蝕。⁶

根據馬克思主義的婦女解放理論，婦女的被壓迫主要源於私有制與階級壓迫，只要無產階級革命成功，實行男女平等，婦女才能得到徹底的解放；而事實上，新中國建國不久，即取消了私有制，並在憲法、經濟、文化與教育的層面上，全面落實了有關男女平等的國策。但明顯地，李小江是以(一)社會物質文明的高度發展以及(二)婦女自身對發展的自覺追求，作為真正的婦女解放的條件的；⁷而在婦聯的幹部看來，李的觀點一方面無疑否定了官方婦女解放理論中的階級優位性（對於婦女解放，階級只成為了必要條件，而非充分條件），另一方面則讓婦聯一直以來的工作成效，甚至本身存在的合法性成疑，對於文革後恢復工作不久、隨即便碰上因改革開放而來種種的棘手「婦女問題」的婦聯來說，這無疑構成了根本的挑戰。⁸

然而，有趣的是，早在〈馬克思主義婦女理論的研究起點和要點〉一文中，李小江已明確指出：「我們必須用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觀和辯證唯物主義的方法，去澄清有關婦女的一系列問題，從而建立起人類科學中，馬克思主義的婦女理論體系」⁹；她指出，「女權主義」¹⁰基本上只屬於二十世紀「雛型的婦女理論」。

⁶ 引自李小江著：《走向女人：新時期婦女研究紀實》，頁45；李所言的婦聯中的權威人士，指原婦聯副主席羅琮，而羅琮的原文則見：羅琮著：〈讓中國婦女運動的歷史告訴現在〉，《中國婦女報》1989年12月25日，第三版。

⁷ 李小江著：〈怎樣看當前婦女問題和婦女研究〉，《求是》1988年第11期，頁33。

⁸ 有關婦聯在文革之後的處境，以及如何面對因改革開放而來種種「婦女問題」，詳情見本文第三章。

⁹ 李小江著：〈馬克思主義婦女理論的研究起點和要點〉，頁8。

¹⁰ 關於Feminism一詞的中譯，在中國歷史上有很多不同的譯法。跟二十世紀許多中國新名詞的來源一樣，Feminism一詞的中譯是從該詞的日譯再轉譯過來的。總括而言，Feminism一詞的中譯可以分為兩類：音譯與意譯。根據音譯，Feminism一詞的中譯是「弗彌涅土姆」；而根據意譯，Feminism則曾分別被翻譯成「女權主義」、「女性主義」、「女子主義」、「婦女主義」、「男女平權」。

主義」等(王政等著：〈高等教育中的婦女學—中美比較〉，《越界：跨文化女權實踐》，頁 124；張京媛著：〈前言〉，張京媛編：《當代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2，頁 3-4)。但跟二十世紀不少中國新名詞的命運一樣，這些新名詞的意譯最終取代了音譯(Lydia H. Liu. *Translingual Practice: Literature, National Culture, and Translated Modernity — China 1900-1937*,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p.36；劉禾著，宋偉杰等譯：《跨語際實踐：文學、民族文化與被譯介的現代性(中國, 1900-1937)》，北京：三聯書店，頁 49)，迄今則只有「女權主義」與「女性主義」兩個中譯仍然為人所使用(王政等著：〈高等教育中的婦女學—中美比較〉，頁 124；張京媛著：〈前言〉，頁 3-4)。

對於 Feminism 一詞的中譯，一直都頗多爭議，可謂眾說紛紜，莫衷一是。就以 1980 年代以來中國內地的學界來說，有的學者認為「女權主義」與「女性主義」都不是對 Feminism 的恰當中譯，因為 Feminism 有別於其他各種「主義」，它不是由幾條教條、定義和一系列的概念所組成的一個固定的封閉理論體系，它是一個開放的、動態的、各種思想交鋒交融的場所。此外，它向來包括理論與實踐，「主義」二字只道出了半片圖像，而「女權」、「女性」等未能完全表達它在歷史上的豐富內涵。

有學者則主張用「女性主義」翻譯此詞，因為她們認為「女權主義」中「權」字作「權利」、「權力」解，但 Feminism 不單是一場女性向男性爭取「權利」、「權力」的政治運動，隨著運動本身的發展，它已深化為一場改造男性中心的等級文化與社會體制的深刻廣泛的文化鬥爭。二十世紀初中國引進 Feminism 時，歐美第一波 Feminism 如日中天，以「女權主義」作中譯，是恰當與可以理能的；但時至今日，歐美的 Feminism 已有了很大的進境，仍舊死守「女權主義」一詞便顯得過時，且窄化 Feminism 的內涵(王政著：〈《社會性別研究選譯》序〉(1998)，《越界：跨文化女權實踐》，頁 60-61)。

有學者則以「女權主義」和「女性主義」分別指稱歐美婦女解放運動的兩個時期，而「女權主義」反映的是早期婦女解放運動對婦女在政治、經濟、教育、法律、文化上的基本權利的爭取。在文學領域中，女權主義時期的努力，包括使女性作家及批評家能夠發表作品和受到公眾閱讀，並在教育機構中獲得教授女性著作以及進行女權主義批評的權力。在 Feminism 的第二個時期，由於我們已進入了後結構主義的性別理論時代，關注點已由「女權」過渡至「性別」，所以選用「女性主義」一詞較為合適(張京媛著：〈前言〉，《當代女性主義文學批評》，頁 4)。與此同時，亦有的學者選用「女權/女性主義」來表現 Feminism 的不同意義以及對它的不同理解，她們認為這個譯法可以反映該詞的內涵在當今後現代後殖民世界的種種差異與混雜的語境中，往往隨境而變，單純的譯詞已無法表現如此複雜的情況(王政著：〈《社會性別研究選譯》序〉，頁 63)。

有的學者則堅持以「女權主義」指稱西方的 Feminism，認為女權主義是西方工業文明的產物，因此用它來指稱中國及其他非工業文明國家的婦女解放理論與實踐，是不恰當的。在這裏，西方女權主義與中國婦女解放運動被認為有一本質性的分野，因為她們認為中國婦女解放不是(西方)女權主義而是民族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的結果(李小江著：〈前言：誰能告訴我，甚麼是 Feminism〉(2000)，《女性？主義——文化衝突與身份認同》，江蘇人民出版社，2000，頁 1-5；李小江著：〈引文〉(2000)，《女性？主義——文化衝突與身份認同》，頁 1-12)。

與此同時，有的學者也堅持以「女權主義」作 Feminism 的中譯，但所持的卻是不同的理由。她們指出，二十世紀初中國知識份子引進 Feminism 時，「女權主義」一詞被看作是中國步入現代文明的褒義標誌，後來它在二十世紀中國政治話語中卻演變成貶義詞，故此為了對這一段被抹去的歷史的肯定與繼承，她們主張沿用「女權主義」作 Feminism 的中譯。此外，她們認為當代國際婦女運動的發展擴大與豐富了「女權」概念的含意，它為女性所爭取的已遠遠不只是與男性同等的政治經濟權，還包括「女性的人權」，反對一切男性中心等級文化對女性的暴力、殘害與剝削。同時，當代國際婦女運動還強調「賦權」(empowerment)的概念，故「女權」亦作「使女性具有權力與力量」解。還有，經過考察「女性主義」一詞 1980 年代在中國出現的歷史，她們注意到該詞的使用同中國內地流行的性別本質主義關係密切。儘管性別本質主義也是西方 Feminism 的其中一支，但那不是主要的傾向，而且近年來已為 Feminism 理論所反對(王政著：〈《社會性別研究選譯》序〉，頁 62-63)。

的其中一條線索(另一條線索是以研究婦女的自然屬性為對象的自然學派和心理學派)，¹¹ 這一條線索「基本上是社會學性質的」，它「以現實生活中具體問題為基本出發點，無論是社會性的婦女參政運動，還是衝擊家庭結構的個性解放，它的直接目的都在探索一條現實可行的出路，這和人類科學中的婦女理論是有區別的。」¹²；而馬克思主義的婦女解放理論「不可避免地要受到以上兩種因素的影響，同時，又要對這兩條線索進行批判地檢驗」，¹³ 可見李的立場跟女權主義，畢竟還是存有一定距離。另一方面，李一直明確地把女權主義界定為「西方資本主義的特產」，¹⁴ 不一定適合以社會主義革命為背境的當代中國國情，可見李跟她的批評者一樣，在意識形態上，也把女權主義與資本主義視為一丘之貉。那麼，同樣是馬克思主義的支持者，李為什麼會反被她的批評者劃入「資產階級女權主義」的陣營？

然而，筆者之所以提出以上的問題，目的與其說是想指出李小江的批評者的錯誤，倒不如說是希望將這一些有關性別的話語(包括李小江的在內)，重新納入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中國當代社會與性別有關的整體話語環境中去考察：為什麼性別會廣泛地成為了一個社會議題？關於這個議題人們曾經說過些什麼？尤其重要的是，與性別有關的話語，*如何形塑同時又限制了往後對於作為外來話語的中國當代女性主義話語的接受與建構？其間存在著怎樣的文化協商？在這樣的時代背境中，女性主義話語到底又蘊含了怎樣的現代性想像？*換言之，弄清人們種種有關性別、女性主義的說法是否正確並不是那麼重要，*重要的是人們在談論性別、女性主義等等議題這個事實本身，簡單來說，即人們是如何以及在怎樣的語境中談論這些議題。*

然而，為了行文上的精簡以及方便，本文主要還是以「女性主義」作為 Feminism 的翻譯。不過，隨著討論的語境以及對象的不同，本文亦會作出相應的調節，採取該詞的其他譯法。

¹¹ 李小江著：〈馬克思主義婦女理論的研究起點和要點〉，頁 8。

¹² 同註 11。

¹³ 同註 11。

¹⁴ 李小江著：《夏娃的探索——婦女研究論稿》，鄭州市：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 年，頁 33。

八十年代以來，李小江一直都是中國當代婦女研究的重要開拓者之一，相對於官方的馬克思主義婦女理論以及西方的女權主義，其獨特的理論立場自有重要的歷史地位，而將其置於中國八十年代後文革以及改革開放的雙重語境下，一粒砂含萬千界，實包含了豐富的話語信息量，值得我們把她作為一個歷史個案仔細解讀。

第一節 有性的人——打造(女性)「主體」

「有性的人」是李小江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末期提出的一個重要概念，簡單來說，李認為：「人是有性徵的，抽象的人從來就不存在。有史以來，人，要麼是男人，要麼是女人，從降生的那一刻起，便先天地預示了他(她)的不同生活道路，並因此造成了各不相同的行為方式和心態結構」。¹⁵ 其實，正如李在〈婦女研究在中國〉一文中所言，早在同年(1988年)稍早完成的著作《性溝》中，已蘊含了相同的理論命題，以上引文甚至隻字不易的來自《性溝》一書，¹⁶ 可見「有性的人」是李早前相關思想的概念結晶。當然，李在同年更早出版的著作《夏娃的探索——婦女研究論稿》中，已提出了類似的理論命題；只是跟《夏娃的探索》一書相比，在話語型構上，〈婦女研究在中國〉、《性溝》等稍後的著作還是存在著一些細緻的差異的(詳後)。

表面看來，從以上的引文，李小江似乎是個十足的「性別本質主義者」，即認為男女有其內在的不同本性。事實上，美籍中國學者王政即持這種觀點，並指出李小江的性別本質主義立場，跟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中國當時的意識形態環境以及馬克思主義人道主義的興起有關：

¹⁵ 李小江著：〈婦女研究在中國〉，《未定稿》1988年第22期，頁23。

¹⁶ 李小江著：《性溝》，北京：三聯書店，1989年，頁53。

七十年代後期和八十年代的時代特點是人們對性別差異表現出高漲的興趣。這個興趣的一部分來自對「文化大革命」中的無性的和動盪的政治年代的反抗。城市婦女對於以男性為標準的男女平等極其不滿並且迸發了「做女人」的熱情。但對於理論學者來說，這個性別差異的問題也與新馬克思主義的批判有著緊密的聯繫。著名的「異化」理論使得「異化」和「人性」這些詞進入中國思想和文學話語。

這一性別化的進程與婦女研究的興起同步進行。當許多婦女以接受女性味的服飾和社會角色來表示對「男女平等」的否定時，一些女學者開始走得更遠了。她們不僅要把婦女從外表上同男性區分開來，而且要把婦女在理論上從階級中分離出來。

如果說婦聯的婦女問題研究意味著脫離階級分析的統治，那麼一些女學者則明確地將婦女做本質主義的理論抽象來挑戰階級理論。¹⁷

而李小江正是這個過程中婦女研究界的其中一個關鍵人物。

但筆者認為，可否把李小江的理論立場稱為性別本質主義，這問題似乎比王政所論的遠為複雜，況且性別本質主義這個概念本身的含意，也不是毫無歧義的；故此若我們要對李的理論立場作出一準確而公正的定位，則必須回到李的理論文本本身及其相關語境，儘量對其相關論述作出話語型構上的復原，而這亦是本章餘下部分的主要工作。

有性的女人，有性的男人，有性的人

無疑，在二十世紀的中國語境中，八十年代的人道主義思潮，的確為我們了解李小江的性別論述，提供了一項重要的話語線索。事實上，從李小江八十年代的幾部重要著作中一些話語型構上的細緻差異，我們或許可以首先看看其中的一點端

¹⁷ 王政著：〈當代中國婦女研究〉，頁 76-77。

倪。

如前所述，李小江是在 1988 年的論文〈婦女研究在中國〉中，首次提出「有性的人」這個概念的，而跟〈婦女研究在中國〉一文同樣或類似的理論命題，則早已於同年稍早出版或完成的《夏娃的探索》、《性溝》等著作中，相繼出現。不過，值得注意的是，對於同樣或類似的理論命題，三者卻有不同的表述。

在《夏娃的探索》的第一章〈籠罩在女界的謎團〉中，開章不久，李小江便隨即以新中國成立以後婦女地位的變遷，為整部著作拉開了序幕：「在此之前(按：指新中國成立之前)，女人屬於男人，是父權家庭的奴隸——社會上沒有女人。在此之後，女人和被壓迫人民一起獲得解放——社會上有男人也有女人，卻沒有女性。」¹⁸ 李的意思是：在封建社會年代，由於女人隸屬於男人，是父親與丈夫的財產、父權家庭的奴隸，女人並沒有被作為「人」看待，所以「社會上沒有女人」；但在 1949 年解放以後，由於「男人能辦到的，女人也能辦到」的「男女平等」的形式主義，強調女人的「非女性化」，¹⁹ 加上文革時期女人的生理特徵和「女人氣」被視為「反四舊」的對象之一，在社會上聲名狼籍，儘管女人終於得到了解放，被作為「人」一般看待，但與此同時，女人並沒有被作為「女性」看待，所以「社會上有男人也有女人，卻沒有女性」。

儘管女人藉著新中國的男女平等國策，得以進入原本屬於男人的社會，並在法律上得到跟男人一樣的政治、經濟與社會權利，但代價一方面卻是女性與女性問題在社會生活中的銷聲匿跡(但並不代表問題不再存在)，另一方面則是女人的主體意識的斷送。李小江指出，「主體意識是『自主的人』的基本特點之一」，²⁰ 而在「男人能辦到的，女人也能辦到」的具體政治時空中，或許套用跟李同時代的文

¹⁸ 李小江著：《夏娃的探索——婦女研究論稿》，頁 15；另，引文中重點為原著所有。

¹⁹ 指女人的「男性化」而非「中性化」，大躍進時期的「鐵姑娘」形象，可謂其中的表表者。

²⁰ 李小江著：《夏娃的探索——婦女研究論稿》，頁 220。

藝批評家孟悅和戴錦華的話來說：

在以往家長式的父皇之位上，如今端坐的不是任何一個私有社會的個人，而是一個集體——民族群體的化身。女人確實不再臣服從屬於男人，但她與男人同樣從屬於這一個凌駕於一切之上的中性的集體或集體的象徵，在這個巨大的集體面前，她的確與他人無別，也只能與人無別，既無高下尊卑之別，又無性別以及個性之別。²¹

而這個巨大的集體，正是新中國的無產階級。換言之，女人在喪失性別之餘，同時也失掉了主體性，其潛台辭是：女人的性別自覺同時意味著女人的主體性解放；可以這麼說，跟當時強調抽象的普遍主體性的人道主義話語略為不同，李強調的是一種「有性的」主體性；但跟同年稍後出版或完成的《性溝》、〈婦女研究在中國〉等著作不同的是，李在《夏娃的探索》中所強調的，主要是女人的主體性，而所謂「有性的」主體，在這部著作中，更主要指女性。

在《性溝》中，李小江則把上述的理論命題，進一步擴展至男女性別身上，指出：「人是有性徵的，抽象的人從來就不存在。有史以來，人，要麼是男人，要麼是女人」。²² 至於女人在無性別年代所經歷的「去女性化」遭遇，李則嘗試歸因於歷來公/私領域的劃分本身所蘊含的性別政治：

在以男性為中心的社會裡，將「性徵」與女人一起封閉在家庭生活和私人領域，的確可以造成這樣一種「性」與「社會」無關、「社會人」與「性徵」無緣的假象。這是因為，社會是男性的，女人作為「性服務」的工具歸同於男人，致使「性」的本來面目發生扭曲。這種扭曲也反映在人的觀念中：在無視女人的人格身份的時候，人類不可能正確地評價自身；而在無視「社會人」的性別身份的時候，人類也模糊了自身的面目。²³

²¹ 孟悅、戴錦華著：《浮出歷史地表：現代婦女文學研究》（1988年），北京：中國人民出版社，2004年（再版），頁29。

²² 李小江著：《性溝》，頁53。

²³ 同22，頁53-54。

在一個以男性為中心的社會中，性別與社會無關，它只屬於私人領域；當女人進入這個無視性別的社會領域，她的性別也就在自覺與不自覺之間給隱沒了。

由以上兩段出自《性溝》的引文，我們會發現，李小江的性別論述，已漸漸由單一性別(女性)到男女兩性、女人到人類，作出了重點上的轉移；而在〈婦女研究在中國〉一文中，李更把這個理論命題進一步的往前推，正式提出「有性的人」的概念，指出：

「有性的人」的視角，不能簡單地等同於「男人的」或「女人的」某一方面，它實則是一種包容兩性的對比的視角。因而，作這個視角考察，不單純地服務於「男權的」或「女權的」現實目的，而是有助於我們對人自身的全面認識。它也是人類在尋求「自由而全面地發展」的道路上不可逾越的階段。²⁴

在這裡，李小江明確地把「有性的人」的概念提昇至哲學人類學的高度，指出：這個視角不單有助於男人或女人認識自身的性別，更有助於人類「對人自身的全面認識」，而這認識也是「人類在尋求『自由而全面地發展』的道路上不可逾越的階段」；她甚至認為，這一視角為人類帶來的，是「哲學上的一種革命」。²⁵ 可以這麼說，李所努力建構的這一套性別本體論(詳後)，可算是中國八十年代的人道主義話語的某種「有性的」版本，與後文革一片個體解放的呼喚，緊密呼應。

人啊，人？ 那一種人道主義？

然而，正如賀桂梅所言，八十年代的人道主義話語經常被泛泛地稱為一種「思潮」，但實際上它卻體現為不同的知識類型和具體表現型態。賀指出，從知識系譜或理論資源上而言，八十年代的人道主義話語可以區分為三種型態：(一) 國

²⁴ 李小江著：〈婦女研究在中國〉，頁 23。

²⁵ 同註 24，頁 23。

際共運的異端馬克思主義人道主義；(二)以五四新文化運動為主、包括從文藝復興到十九世紀歐洲的現代**啟蒙話語**為理論資源的新**啟蒙**主義；(三) 以及從十九世紀開始、在批判現代工業社會的基礎上產生的生存/生命哲學(文化哲學)。²⁶ 若果，李小江的性別論述可算是八十年代的人道主義話語的某種「有性的」版本，那麼，它跟以上三種人道主義話語的知識類型又有著怎樣的關係呢？

美國學者白露(Tani E. Barlow)曾經指出，李小江在《夏娃的探索》一書中，大量借用了同期的新**啟蒙**主義代表之一李澤厚的許多重要概念，「主體」、「反思」、「意識」、「沉積」、「內化」等經常在李澤厚的著作中出現的重要概念，李小江均照單全收；不同的是，李小江在運用此等概念時所指向的，是一個「有性的」主體。

27

白露認為，在八十年代的「文化熱」中，為了回應毛澤東式的馬克思主義以及改革開放的時代籲求，李澤厚等知識份子均有向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早期(1890-1930)的中國馬克思主義取經，而李澤厚透過閱讀歐洲**啟蒙**主義哲學家康德(Kant)的著作，所著力建/重構的，正是一種講求創造性的現代主體的馬克思主義哲學。²⁸

然而，李澤厚的新**啟蒙**主義立場跟當時的馬克思主義人道主義之間，還是有一點距離的，賀桂梅便曾經指出：「在關於馬克思主義與人道主義的討論相近的時間，李澤厚提出了『主體性哲學』，使得相關的討論偏離馬克思主義而獲取了新的表達形式，並成為八十年代中後期新**啟蒙**主義思潮的主導性表述」。²⁹ 李在重新闡

²⁶ 賀桂梅著：《人文學的想像力：當代中國思想文化與文學問題》，開封市：河南大學出版社，2005年，頁78。

²⁷ Tani E. Barlow, *The Question of Women in Chinese Feminism*, Durham and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 280.

²⁸ Same as 27, p. 270.

²⁹ 賀桂梅著：《人文學的想像力：當代中國思想文化與文學問題》，頁88。

釋康德哲學的基礎，指出人類歷史以至人本身是在實踐中形成，這使得人具有能動地改造社會的能力；與此同時，由於由人類勞動活動產生的自然合規律的結構、形式沉積於人的心理結構之中，所有人具有認識歷史能力。因此，人無論在實踐還是認識上，都是歷史的「主體」。³⁰ 換言之，李透過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康德式重新詮釋所要突出的，是人類的主體性本身，而並非其時馬克思主義人道主義論述中那廣義的「人」或「人性」。

然而，就算李小江的性別論述在概念上跟李澤厚的有不少的重合，「主體」、「異化」、「反思」、「意識」、「沉積」、「內化」等表面相同概念的存在，倒不即可證明李小江與李澤厚在理論上實屬一丘之貉；要知道同一的概念在不同的理論或話語中便有不同的意涵。事實上，在《夏娃的探索》中，李澤厚的名字明顯是缺席的。但筆者認為，與其在八十年代的新啟蒙主義與馬克思主義人道主義之間，二擇其一，為李小江的思想作出知識類型上的定位，倒不如把李的思想看作新啟蒙主義與馬克思主義人道主義在話語型構上的某種混種，而這在話語分析上，亦似乎有著更強的解釋力。

正如賀桂梅所言，在七、八十年代的社會轉型過程中，「人」的問題得以被提出，它是作為國家意識形態的馬克思主義對自身提出的公開質疑。在這一場公開的自我批判運動中，「『階級性』和『階級鬥爭』這一源自馬克思主義並由列寧發揚的範疇被看作一種『異化』的脫離了人的本性的主體組織形式」。³¹ 例如，在〈人是馬克思主義的出發點〉一文中，作者王若水(也是這場運動的重要論者之一)便曾經指出：

馬克思說人的本質是「一切社會關係的總和」，這裡說的社會關係，當然最重要的是階級關係(在階級社會裡)。舊的人道主義的一個根本缺陷，就是企

³⁰ 賀桂梅著：《人文學的想像力：當代中國思想文化與文學問題》，頁 88。

³¹ 同註 30，頁 81。

圖超越這種關係。這一點，過去批判得很多了。另一方面，既然是「一切社會關係的總和」，那就決不僅僅限於階級關係。多年來有一種流行的觀點，就是把人性全部歸結為階級性，人與人的關係只有階級關係。這種觀點，既不符合現實情況，也不符合馬克思主義。單純從階級觀點看人，這是走到了另一個極端。³²

在這一場批判運動中，文學是首先展開這一場意識形態鬥爭的戰場，而「階級性」與「人性」之間的對抗形象，亦成為了這一時期的文學中一種具普遍性的意識形態表述體系。³³ 理論界對人道主義的討論，則主要集中在(一) 人道主義與馬克思主義的關係 (二)人性和人的本質(三) 異化等三方面的問題；³⁴ 其理論資源則主要求諸馬克思的《1844 年經濟學-哲學手稿》，《手稿》中「異化」、「人道主義」等概念成為了論述者闡釋「也有馬克思主義的人道主義」的重要依據。³⁵

若果筆者以上的分析大體正確，則李小江可能只不過是以當時一套為大家所共享的新啟蒙主義詞彙，策略性地重新闡釋馬克思主義人道主義，而加上李所一直強調的婦女研究在中國學界的邊緣性，馬克思主義人道主義反而得以在李的論述中，以某種喬裝的版本繼續存在下來；事實上，「主體」、「意識」等新啟蒙主義語的主要概念，的確比「人性」、「人的本質」等概念更具有理論上的力度，更能突顯出人的能動性、實踐力以及創造性；可見以上的話語嫁接，可能不單有策略上的考慮，也有理論建構上的理由。

或許，我們可以從另一側面，在話語型構上，看看李小江的性別論述跟八十年代的馬克思主義人道主義到底有著怎樣的關係。我們知道，李其中一個最富爭議性的論點，是所謂「婦女歷史的三階段論」。其實，早在〈馬克思主義婦女理論的

³² 王若水著：〈人是馬克思主義的出發點〉，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國內哲學動態》編輯部編：《人性、人道主義問題討論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年，頁 41-42。

³³ 賀桂梅著：《人文學的想像力：當代中國思想文化與文學問題》，頁 81-84。

³⁴ 〈編者說明〉，《人性、人道主義問題討論集》，無頁碼；同註 33，頁 84。

³⁵ 周揚著：〈關於馬克思主義的幾個理論問題的探討〉，引自賀桂梅著：《人文學的想像力：當代中國思想文化與文學問題》，頁 85。

研究起點和要點》一文中，李已提出了這個極具爭議性的論點，且為《夏娃的探索》、《性溝》等後來的著作所沿用。

按照當時官方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論觀點，人類社會的發展經歷了五種基本形態，它們分別是：原始氏族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和社會主義社會。李指出：「每一次社會形態的演變，都是因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而導致生產關係發生變化的結果」；³⁶ 但這裡所說的生產力，僅指人類生產生活資料(食物、衣服、住房以及為此必須的工具)的生產力，而不包括人類自身的生產，即種的繁衍。李指出，由於人類社會在歷史上產生了分工，把「種的繁衍」從社會生產(人類生活資料的生產)中分離出去，在歷史上一段很長的時間中，女人幾乎是外在於社會的，她們被封閉在家庭中，隔絕在社會生產以外，主要成為生兒育女的家庭工具。所以，在人類歷史中，女人雖然大體上也經歷了五種社會形態，但這種經歷大都是間接的，是通過家庭(父親、丈夫)在社會生產中的位置所間接發生的。李認為，雖然人類社會形態迄今發生了五次大的演變，「但在婦女的歷史上，只出現了三個劃時代的階段，它們是：婦女主持社會的**母權時代**、婦女陷入家庭的**奴隸時代**和男女共同主持人類事物的**解放時代**。這三個時代，正相當於人類進化的自在、自為和自由三大階段。」³⁷

李小江指出，人類進化的自在階段，相當於婦女歷史上、以自然血緣關係為基礎的母權時代，在這一個階段中，人類以生存、存種的基本需求為最高生活目的，而非人為的社會生產力開拓。但李認為，夫權社會才是人類自覺的社會生活的真正起點。在夫權社會時代，(男)人自覺的以人類存在的社會形態取代了人類存在的自然形態，讓社會生產力得以發展，人口增加，財富積累，母權的自然社會瓦解，人類的進化自在進入了自為的階段；而人類生活的最高目的，亦「從活著

³⁶ 李小江著：〈馬克思主義婦女理論的研究起點和要點〉，頁 12-13。

³⁷ 同註 36，頁 13；另，引文中重點為原著所有。

變成爲**活得更好**一些。」³⁸ 然而，人類達至這一次對自身存在形式的根本性革命，代價卻是人類的其中一半（女人）被貶低、被奴役，被封閉在家庭中，專事生育，操持家務，幾乎與社會生活隔絕。

直至十八世紀的法國大革命，十九世紀的工業革命，以及二十世紀以來的種種民族獨立和被壓迫人民的解放運動，婦女解放終於有了長足的發展：先是婦女走出家庭，參與社會生產，然後是爭取就業、參政、參議等一系列公民權利。然而，李小江引用列寧的思想指出，婦女在社會上和人類中的位置跟生產手段的私有制有不可分割的關聯，婦女的真正自由、全人類的普遍解放，只有通過共產主義革命才能真正的實現，結束人類社會漫長的自爲階段，向自由階段飛躍。³⁹

基本上，在不否定官方馬克思主義的歷史五階段論的前提下，李小江的「婦女歷史三階段論」策略性地爲解釋婦女在歷史上的發展軌跡，另闢蹊徑；但究其實質，筆者卻有理由相信，李的「婦女歷史三階段論」另有所本，跟她同時代的馬克思主義人道主義倡導者相近，在理論資源上同樣地訴諸馬克思的《1844 年經濟學-哲學手稿》，打造自己的理論。或許，我們可以從同期另一馬克思主義學者孟慶仁撰寫的論文〈“五階段”，還是“三階段”——人類社會歷史發展的普遍規律探析〉中，⁴⁰ 看看其中的一點端倪。

首先，孟慶仁在〈“五階段”，還是“三階段”〉一文中，開宗明義即指出，把五階段論「當作人類社會歷史發展的普遍規律或一般規律，當作馬克思主義和唯物史觀的基本原理，其實，這並不真正符合馬克思的唯物史觀思想」⁴¹，而真正符合

³⁸ 李小江著：〈馬克思主義婦女理論的研究起點和要點〉，頁 14；另，引文中重點爲原著所有。

³⁹ 同註 38，頁 14-15。

⁴⁰ 孟慶仁著：〈“五階段”，還是“三階段”——人類社會歷史發展的普遍規律探析〉，《未定稿》1986 年第 20 期，頁 6-11。另外，之所以選擇以孟慶仁的論文作爲比較研究的個案，是因爲當時有關馬克思主義人道主義的討論，較少從馬克思的唯物史觀切入，爲馬克思主義人道主義探源。

⁴¹ 同註 40，頁 6。

馬克思唯物史觀的，正是三階段論。

根據孟慶仁，馬克思的唯物史觀理論可分為三個時期。在第一個時期，馬克思寫作了《1844 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德意志意識形態》等著作，為他的唯物史觀理論的日後發展奠定了重要的哲學基礎。孟指出，在寫作《1844 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的時候，馬克思把人類社會的發展歷程大致劃分為(一)人還沒有異化(二)產生了人的異化和異化發展(三)揚棄異化即人的復歸等三大階段。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馬克思則以所有制的形式，把人類社會的歷史發展過程劃分為部落所有制、古代公社和國家所有制、封建或等級的所有制、資本主義所有制和共產主義所有制等前後相繼的五個階段。但孟認為，五階段的劃分並沒有否定三大階段的劃分；和三大階段的劃分相比，五階段的劃分是更加具體化了。首先，馬克思在《1844 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便提出了私有制是異化勞動的結果，而《德意志意識形態》不過是把人的異化具體化為所有制形式的問題；所以實際上《德意志意識形態》和《1844 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的思想還是一致的，前者是後者在理論上的進一步發展。其次，馬克思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不過是把《1844 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的第二大階段(異化的階段)具體化為古代公社和國家所有制、封建或等級的所有制、資本主義所有制等三個小的階段，至於五階段論中的第一和第五階段，則和三階段論中的第一和第三階段的內容相一致。

在第二個時期，馬克思則寫作了《政治經濟學批判》、《剩餘價值理論》等著作，是他的政治經濟學研究時期。孟指出，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的導言裡，把人類社會的歷史發展表述為亞細亞的、古代的、封建的和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所依次演進的幾個時代。孟認為，《政治經濟學批判》以生產方式作為劃分階段的標準，比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用所有制形式更為科學與準確；而《政治經濟學批判》和《德意志意識形態》的歷史階段劃分基本上是一致的。在《剩餘價值理論》中，馬克思則把人類社會歷史的發展過程，從勞動者和勞動條件之間關

係的角度，劃分為(一) 原始共產社會中，勞動者和勞動條件之間維持在一種「原有的統一」(二) 「原有的統一」的分離、對立，從而使社會生產力得到巨大的發展(三)通過共產主義革命，勞動者和勞動條件之間的「原有的統一」得以恢復等三大階段。明顯地，馬克思在這裡把人的異化具體化為勞動的異化，其中包括勞動者和勞動條件之間的分離，可見《剩餘價值理論》中的三階段論跟馬克思第一個時期的思想，是一脈相承的。

在第三個時期，馬克思則通過人類學的研究，探討人類社會歷史的發展過程。他認為，人類社會的發展，是從古代公社所有制的原生社會形態，到以私有制為基礎的次生社會形態，再回復到古代類型的集體所有制的最高形式的過程。在這些大的階段中，又可分為若干小的階段：在原生社會階段，可劃分為血緣公社、農業公社等依次出現的再次生形態；在次生社會階段，則可以劃分為奴隸公社、封建公社等依次出現的再次生形態；至於原生社會形態的復歸階段，則可以進一步劃分為低級和高級階段。

表面看來，〈“五階段”，還是“三階段”〉一文所要討論的，(正如副題所示)主要是「人類社會歷史發展的普遍規律」，但不難看出，作者孟慶仁的本意似乎是希望以馬克思主義人道主義的立場，把《1844 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的異化論與官方馬克思主義的歷史五階段論策略性地調合，並明確地指出，《1844 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的異化論才是馬克思的唯物史觀思想的真正根本。事實上，孟便明確地指出官方的歷史五階段論所本的列寧、斯大林，與馬克思本人相比，對人類社會歷史過程的研究其實並不那麼詳細和全面，而毛澤東則繼承了列寧和斯大林的這些思想，把二人著作中所提及的五種社會形態或生產關係的依次更替，(錯誤地)凝固為固定的公式，並說成是馬克思思想的基本原理。

由此可見，李小江的「婦女歷史三階段論」，無論在型構(三階段論)與實質內容(異

化論)上，均有意無意的與同時代的部分馬克思主義人道主義倡導者同構同質，其基本結構為「原生-異化-復歸」，其中主要的分別是，李提出的是一個「有性的」版本，而在理論資源上，李跟同代的馬克思主義人道主義者，均指向馬克思的人道主義以及唯物史觀思想的根本：《1844 年經濟學-哲學手稿》。

事實上，李小江亦曾經在一次多年後的事後回顧中，明確地點明她在八十年代所努力一手建立的「有性的人」理論，正正發源於曾經在同年代大熱的《1844 年經濟學-哲學手稿》。⁴² 李指出，她在八十年代通讀馬克思著作的過程中，發現在馬克思那裡，根本沒有什麼我們後來所謂完整的「婦女解放理論」，有的只是一些片段或對時下婦女問題的討論。但她又指出，正正在《1844 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馬克思在「性別」問題上有過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完整的哲學表述：

男女之間的關係是人與人之間的直接的、自然的、必然的關係。在這種自然的、類的關係中，人同自然界的關係直接地包含著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而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直接地就是人同自然界的關係，就是他自己的自然的規定。因此，這種關係以一種感性的形式、一種顯而易見的事實，表明屬人的本質在何種程度上對人說來成了自然界，或者，自然界在何種程度上成了人的屬人的本質。因而，根據這種關係就可以判斷出人的整個文明程度。男女之間的關係是人與人之間最自然的關係。因此，這種關係可以表現出人的自然的行為在何種程度上成了人的行為，或者，人的本質在何種程度上對人說來成了自然的本質，他的屬人的自然界在何種程度上對他說來成了自然界。⁴³

對於馬克思這一段高度抽象又帶點晦澀的性別論述，李小江認為它「引出了本體論的思考，即，將『性』看做是人的自然屬性和社會屬性的中介」。⁴⁴ 值得注意的是：(一)李更主要是從本體論的角度，來思考「性別」的；(二)從李的理論引

⁴² 李小江著：〈重理「宗師」遺產——讀馬克思的《人類學筆記》及其他(1840s-1880s)〉，《女人讀書：女性/性別研究代表作導讀》，江蘇省：江蘇人民出版社，2006 年，頁 12-26。

⁴³ 馬克思著，劉丕坤譯：《1844 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人民出版社，1979 年，頁 72；引自李小江著：〈重理「宗師」遺產——讀馬克思的《人類學筆記》及其他(1840s-1880s)〉，頁 22；重點為李著的引文所有。

⁴⁴ 同註 42，頁 22；重點為筆者所加。

伸，她對引文中「自然的」、「自然界」等用詞的理解，似乎是介乎本體論與生物學之間的進路。其實，李對馬克思的性別論述的闡釋，正正跟她在《性溝》、〈婦女研究在中國〉等著作中提出的「有性的人」理論相同；她在〈婦女研究在中國〉一文中曾經提到：

我在《性溝》(將由三聯書店出版)一書中闡明了筆者對人的基本規定性的看法：無論從群體還是從個體，從發生學還是從發展進程中考察，人的基本規定總是體現在三方面：(1)人是相對獨立的生物個體；(2)**人是有性的**；(3)人是社會關係的產物。任何情況下，**這三種規定性總是相依相存的，互相滲透，互相制約，同步發展的，沒有孰優孰劣孰先孰後之分**。也就是說，沒有作為生物個體的存在，不成其為人；沒有社會屬性的生物個體的存在，不稱其為人。前者是人類存在的前提，直接隸屬於自然，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後者是人類存在的本質屬性，是人對自然的超越；而中者在這其間，**恰恰也是一個中介，是人類作為自然的人和社會的人(無論是群體還是個體)的具體的存在形式**。⁴⁵

在這裡，李小江首先明確地把人視為**一個存在整體**，而這個存在整體則包括了人的自然屬性、人的性別以及人的社會屬性等三方面的基本規定。此外(也是更重要的)，性別是人的**具體的存在形式**，是人的自然屬性和社會屬性的具體存在中介。換言之，在李的「有性的人」理論中，性別不單指一般性別研究中的生物性別 (sex)和社會性別(gender)，它更主要指一種**在本體論上具有統合作用的具體的存在形式**。無疑，在理論資源上，《1844 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為李的「有性的人」理論提供了一個重要的支點；但筆者卻認為，「有性的人」理論還有一個更重要同時也更強大的理論統合點：西蒙•德•波娃(Simone de Beauvoir)的「有性的」存在主義哲學，也就是八十年代的人道主義話語中的第三種理論資源。

作為具體的主體存在形式的「性別」

在八十年代的主要著作中，李小江雖然也有提及波娃的名字，但實際上並沒有怎

⁴⁵ 李小江著：〈婦女研究在中國〉，頁 22-23；重點為筆者所加。

樣詳細討論過波娃思想的內容；就算偶爾提及，也僅僅把波娃的思想視為西方婦女理論的其中一支(存在主義)，而其西方女性主義理論經典《第二性》，則被李歸類為「存在主義婦女理論」。⁴⁶ 直至九十年代中，李才開始提及她與同代人初次接觸《第二性》的經驗：

第一次看到《第二性》，是在 1985 年，是一位在華留學生送給我的朋友，爾後朋友留學時又送給了我。我第一次拿到《女性的奧秘》，也是 1985 年，一位朋友托朋友從英國買來的。我十分欽佩西方女學者在我們之前已經做了那麼多工作；但更多地受惠於她們的，不是觀點而是他們直面女人剖析女人研究女人的勇氣。⁴⁷

近年來，第一本引起人們廣泛興趣、專門談女人的書是法國女作家西蒙娜·德·波伏娃的《第二性》。《第二性》是一個號角、一部宣言，曾經遭到查禁遭到非議，招來聲勢浩大的新女權運動。它在中國受到人們普遍青睞——不同於早期在西方出版的厄運：沒有人禁它、批它，甚至沒有多少人論它、評它，僅僅一個書名就是一種衝擊——譯者逕自在「第二性」前加了個「女人」，霍然攪起人們心底的波瀾。一時間，「女人」不脛而走，遍布大街小巷；從《女性的奧秘》《女性的困惑》《女性的恐懼》，直到《女性的目光》《女性的身體》《女性的性感魅力》——女人整個被肢解了，赤裸裸地陳列在書封上廣告上銀屏上電視上，似乎要掀起一個「黃潮」⁴⁸

在這一些回顧中，李小江分別對自己以及同代的婦女研究者在八十年代初次接觸西方婦女研究著作的閱讀環境，以及當時一般讀者對《第二性》一書中譯的接受與反應，作出了部分的歷史還原；但在這些敘述中，主角顯然不是頂頂大名的《第二性》，而是它在中國國土上首次出現時的整體文化氛圍。有趣的是，在對《第二性》一書中譯的最初接受情況的複述中，李一直都有意無意的把書名與副題之間的次序倒了過來，把原為副題的「女人」置於正題的位置上(參考圖一)。⁴⁹ 或許，出版社當初真的有意以朱紅色突出「女人」二字，期望達至李所言的那種轟

⁴⁶ 李小江著：《夏娃的探索——婦女研究論稿》，頁 21，29。

⁴⁷ 李小江著：《走向女人：新時期婦女研究紀實》，頁 12-13。

⁴⁸ 同註 47，頁 41。

⁴⁹ 西蒙·波娃著，桑竹影、南珊譯：《第二性—女人》(節譯本)，長沙市：湖南文藝出版社，1986 年。

動效應，致使李多年來一直把《第二性》一書中譯的名字搞混了；⁵⁰ 但筆者更感興趣的，倒是這一個「誤會」在癡候閱讀上的意義：在八十年代末期，李出版了《女人——一個悠遠美麗的傳說》，⁵¹ 而書名正副題的結構，正正巧合地跟她對《第二性》一書中譯書題「悠遠美麗」的誤會同構。

圖一

直至 1999 年，適逢《第二性》出版五十周年，李小江才首次正式對《第二性》一書，作出了全面的評論。⁵² 其實，早在 1985 年，李已有機會接觸到《第二性》的英譯本，並於《第二性》首個中譯(節譯本)出版的同年(1986 年)，發表譯文〈走向解放的“第二性”〉，⁵³ 算是中國首批較全面地接觸《第二性》原著的學人之一。饒有意味的是，李在〈世紀末看“第二性”〉一文中，甫一開始便提到 1991 年底往丹麥講學時發生的一樁逸事。在為阿胡斯大學婦女研究中心的演講作準備時，面對中心所開出的題目「談談《第二性》對中國婦女的影響」，李才發現此

⁵⁰ 李小江的這個誤會一直延續至九十年代末，而仍未變改，實在令人深思；請參考李小江著：《女人讀書：女性/性別研究代表作導讀》，頁 206。

⁵¹ 李小江著：《女人——一個悠遠美麗的傳說》，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 年。

⁵² 李小江著：〈世紀末看“第二性”〉，《讀書》1999 年第 12 期；本文修訂本見李小江著：《女人讀書：女性/性別研究代表作導讀》，頁 205-217。

⁵³ 李小江譯：〈走向解放的“第二性”〉，《海外譯叢》，北京：三聯書店，1986 年第 2 輯；見「真我性別研究網站」，「李小江專題」(<http://202.199.159.238/cdoc/lxjzt-2.asp>)；根據題目，〈走向解放的“第二性”〉有可能是原著最後一章的翻譯，待考。

書對中國婦女的影響，並沒有西方婦女以及她們想像中的那麼大。接著李又指出：「我告訴她們，在中國大眾讀者中，這本書的影響不在它的內容，而是它的名字——但卻不是它的本名『第二性』，而是台灣中譯者和大陸盜印人另外附加的名字『女人』——最早在大陸面世的書名是《女人——第二性》，一個『女人』，比『第二性』的說法更重要、更觸目，是因為在我們的意識形態中，女人原本是『被壓迫、被奴役』的第二等級，說她是『第二性』，不是什麼新鮮的或犯忌的觀點，但說到『女人』，並且用作書名，卻有些震耳發聵的作用」⁵⁴，因為對於當時文革結束後不久、「男女都一樣」的意識形態仍然陰魂不散的中國社會來說，「女人」二字像是「別有意味的挑戰」。⁵⁵

接著，李小江把《第二性》的主題歸結為書中的一個名句：「女人不是天生的，是被造成的」，是按照男性的願望和意志被造就出來的；並引用《第二性》的原句：「我們將以存在主義的觀點去研究女人，給她們的全部處境以應有的重視」，⁵⁶ 把她的思想明確定位為存在主義，指出：「存在主義講究人的主體創造性，以為通過個人的努力可以改變世界存在的『普遍的荒謬』，賦個人之『存在』以『價值』——從這個意義上講，它對女人的自主獨立應該是一種鞭策。」⁵⁷

然而，李小江並不認同像「女人不是天生的，是被造成的」這樣的說法，雖然她明白波娃這樣講，是希望「反對以自然-生理結構為基礎的性別本質主義，企圖為女人的獨立和平等在理論和觀念上掃清道路」，⁵⁸ 但她指出：「我在『走向女

⁵⁴ 李小江著：〈世紀末看“第二性”〉（修訂本），頁 206。

⁵⁵ 《第二性》中譯書題中的「女人」二字之所以像是「別有意味的挑戰」，或許正如戴錦華所言，那是因為：「彼時的中國社會主義女性，尚置身於社會主義體制所造就的女人於政治、經濟、法律層面上的男女平等之中……她們所面臨的，不是公然的性別歧視或針對女性的社會放逐，而是絕對平等表象之下的微妙的雙重標準，是雙重角色……於是，充滿了『錯位』與誤讀地，波伏瓦對『女性/第二性』的命名，對應著中國知識女性對這一歷史生存現實的指認與批判」，見戴錦華著：〈歲月留痕 Simone de Beauvoir——西蒙娜·波伏瓦在中國〉（手稿）。

⁵⁶ 同註 54，頁 210。

⁵⁷ 同註 54，頁 210。

⁵⁸ 同註 54，頁 212。

人』的起點，就是必須面對『天生是女人』的種種不便；我的婦女研究的起點，就是盡量客觀地(而不是理想地)面對生為女人種種不可改變的、自然的和歷史的命運」，⁵⁹ 她甚至認為，「女人不是天生的，是被造成的」有些像「男女都一樣」的性別意識形態；⁶⁰ 而「我們今天在破波娃的『人造女人』的神話，則是要在本體論的起點上重建女人的主體地位…在尊重自然的基礎上認同女人的主體身份」。⁶¹ 但難道波娃的存在主義，不正正是在尊重自然(人的生理性別)的基礎上，在本體論的起點上重建女人的主體地位？筆者認為，波娃的存在主義婦女理論與李本人的「有性的人」理論，基本上具有高度的同構性；李把波娃那合乎「人的自然屬性-人的性別-人的社會屬性」的三元辯證的哲學架構，納入一般性別研究的「生物性別 Vs. 社會性別」二元對立結構中，是因為純粹的誤讀？還是因為「女人不是天生的，是被造成的」是西方女權主義(尤其是它的社會性別理論)經常引用的波娃名句，李才必須跟波娃劃清界線？

正如學者桑福特(Stella Sandford)所言，在六十年代，《第二性》一書的內容的確在很大程度上，被英美的女性主義者化約為像「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生成的」這樣的金句，並被當時的社會學以及政治學理論視為「社會性別」理論的根據；但她指出，《第二性》一書中原本並無「社會性別」的概念，而波娃的「女人」(la femme or les femmes) 概念，亦對一般性別研究中「生物性別 Vs. 社會性別」的區分，構成了根本的挑戰。⁶² 她指出，《第二性》一書的哲學基礎並不是社會學或政治學，而是「存在主義倫理學」；而從這一個角度出發，「女人」更主要的是一種「在世存在的模式」(Mode of Being-in-the-world)。⁶³ 有趣的是，跟李小江相似，波娃明確地把人視為一個存在的整體；儘管人的自然屬性(生理與心理)與社會屬性等人

⁵⁹ 李小江著：〈世紀末看“第二性”〉(修訂本)，頁 211。

⁶⁰ 同註 59，頁 212。

⁶¹ 同註 59，頁 212。

⁶² Stella Sandford, "Contingent Ontologies: Sex, gender and "woman" in Simone de Beauvoir and Judith Butler," *Radical Philosophy* No.97, 1999(September/October), pp. 21-22.

⁶³ Same as 62, p. 22.

的「實存性」(facticity)，無可避免地對人的自由構成了束縛，但人正是同時在這有限的基礎上，實現人的超越性，開展人的自由；⁶⁴ 對於波娃來說：

只有當人類「生理上的事實」，在一個整體與具體的存在處境中被活出(lived)或被存活(existed)——在這處境中，也只在這處境中，它們賦予了人的存在的意義——它們才是有關痛癢的。⁶⁵

依照波娃的存在主義哲學，女人的自然屬性只有在被活出或被存活過的情況下，才具有「意義」，而女人透過其主體所開展的存活，並不會消解其自然屬性的本體論地位。⁶⁶ 桑福特指出，正正因為波娃所要開展的，是一套存在主義的本體論，波娃在不否定女人的自然屬性的同時，既不落入本質主義之窠臼，又能突出女人的主體性。⁶⁷ 依此看來，把波娃的婦女理論理解為一套「有性的」存在主義哲學，也就不無道理。

換言之，在李小江與波娃的性別理論體系中，性別均被視為人的具體的存在形式，是人的自然屬性和社會屬性的具體存在中介；而人則被視為一個存在的整體，其中包括人的自然屬性、人的性別以及人的社會屬性等三方面的基本規定。跟一般性別研究的「生物性別 Vs. 社會性別」二元對立架構不同，李小江與波娃的體系，均把人納入一種「人的自然屬性-人的性別-人的社會屬性」的三元辯證的架構中。

相對於馬克思的《1844 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第二性》的「女人」概念無疑為李小江的「有性的人」理論，提供了一個更為有力的理論統合點，讓她能夠把自己以及同代女性的性別經驗和不同的理論話語，統合到一個存在的整體。

⁶⁴ Stella Sandford, "Contingent Ontologies: Sex, gender and "woman" in Simone de Beauvoir and Judith Butler," p. 22.

⁶⁵ Same as 64, p. 24; 按：中譯為筆者所譯。

⁶⁶ Same as 64, p. 24.

⁶⁷ Same as 64, p. 24.

既遠且近，「女權主義」

然而，我們可否就此把李小江的思想，收歸女性主義沸沸揚揚的旗下？正如筆者在本章開首處所提到的，早在〈馬克思主義婦女理論的研究起點和要點〉一文中，李已明確指出：「我們必須用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觀和辯證唯物主義的方法，去澄清有關婦女的一系列問題，從而建立起人類科學中，馬克思主義的婦女理論體系」⁶⁸，而李亦一直明確地把「女權主義」界定為「西方資本主義的特產」，⁶⁹不一定完全適合以社會主義革命為背境的當代中國國情；而它基本上又是社會學性質的，「以現實生活中具體問題為基本出發點，無論是社會性的婦女參政運動，還是衝擊家庭結構的個性解放，它的直接目的都在探索一條現實可行的出路，這和人類科學中的婦女理論是有區別的」⁷⁰；後來，在《走向女人》一書中，她更乾脆的說：「我不是女權主義者」。⁷¹可見把「西方資本主義」與「女權主義」掛鉤的這種話語型構，還是李跟她的婦聯論敵所共享的。

不過，對於發源於西方的「女權主義」，李小江的態度跟她的婦聯論敵，始終還是有所區別的。在《夏娃的探索》一書中，李曾經指出：對於八十年代的婦女研究界來說，婦女研究的發展存有三大禁區。一是「性」的禁區，即在強調女人的社會屬性的同時，忽略其在生理上的性別差異，結果是男女兩性均被消融在「男女都一樣」的國家機器意識形態中。二是「階級」的禁區，即認為婦女的問題，歸根究底，首先還是一個階級的問題，只要無產階級革命成功，實行真正的男女平等，所謂婦女問題，也就迎刃而解。三是「女權主義」的禁區，即認為女權主義是西方資本主義的特產，若把它拿到以社會主義革命為背境的當代中國實行，

⁶⁸ 李小江著：〈馬克思主義婦女理論的研究起點和要點〉，頁 8。

⁶⁹ 李小江著：《夏娃的探索——婦女研究論稿》，頁 33。

⁷⁰ 同註 68。

⁷¹ 李小江著：《走向女人：新時期婦女研究紀實》，頁 3。

根本就是行不通的。⁷²

對於「階級」的禁區，李小江提出了著名的「性別先於階級」優位論：「女性的生成和進化先於階級，並在本質上超越階級」，⁷³ 但其出發點卻正正是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觀本身：

馬克思主義婦女理論的前提，是對整個婦女的抽象，即對婦女的國家、民族、時代、階級、年齡進行揚棄而獲得的觀念的一般。無產階級婦女作為婦女的一部分，是特定歷史時期的產物，它不能囊括婦女的全部存在和婦女的整個歷史進程，因此在認識上只能作為一個具體的「特殊」，理所當然地隸屬於婦女的「一般」。⁷⁴

對於「女權主義」的禁區，李小江則認為：「當今世界，當今中國，許多政治家已經正視兩種制度(甚至多種制度)並存的現象，並給予政策上的認可，那我們為什麼不能在婦女問題上正視不同社會制度中婦女尋求解放的不同道路，並給予應有的尊重呢？」若我們不去考察西方「女權主義」的起因、發展與性質，「只因其在西方社會，便仍然用一項『資產階級』的帽子扣將過去，顯然是不科學、也不盡公道的。」⁷⁵

在這裡，我們清楚的看到，李小江如何巧妙地把一個在政治上相當敏感的問題，轉化為一個看似在政治上中性、但實際上不乏現實回音的認識論甚至哲學人類學

⁷² 李小江著：《夏娃的探索——婦女研究論稿》，頁 30-34。

⁷³ 同註 72，頁 32。

⁷⁴ 同註 72，頁 32。「一般」與「特殊」是馬克思主義傳統中的一對重要概念。馬克思主義哲學認為，人們認識物質是從認識具體事物開始的，即從個別到特殊、再由特殊到一般，物質則是最高度的科學概括和最一般的科學抽象。恩格斯把「物質」和「事物」進行了嚴格的區分，指出馬克思主義的「物質」是純粹的抽象，是撇開事物的差異的最一般共性和共同點，不是感性地存在著的東西，而是通過感性認識而飛躍到理性認識的東西，列寧則把物質高度抽象為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實在」；見趙士瑞著：〈馬克思主義哲學中的事物發展觀與物質觀〉

(http://big5.china.com.cn/xxsb/txt/2005-10/13/content_5997364.htm)。

⁷⁵ 李小江著：《夏娃的探索——婦女研究論稿》，頁 33。

的問題。有趣的是，李的論述似乎並沒有意思離開馬克思主義話語本身的規定，她更關心的，顯然是如何在既有的話語秩序中，通過其「性別先於階級」優位論，把(婦聯的)「無產階級婦女解放理論」與她自身的婦女解放理論立場，作出恰當的(重新)理論分判與定位。也許，正正是基於這種呼之欲出的理論(政治)僭越，加上李在以上引文中所暗含的「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雙修」的改革時代命題，⁷⁶ 在八十年代，作為馬克思主義的支持者，李才會不無反諷地被她的批評者劃入「資產階級女權主義」的陣營；而這亦是李與她的同代人在接受與建構中國當代女性主義話語時，所不得不面對並受其制約的話語環境的一部分。不過，筆者希望強調的是，李更主要是站在婦女學學科建設的高度，來看待發源於西方的「女權主義」，把後者主要看成一種有效並值得參考的研究方法。在某程度上，對於西方「女權主義」的這種唯科學傾向，是李跟婦聯系統中的部分婦女理論工作者所共享的，這一則是對改革時代的婦女問題的實際回應，再者也關乎八十年代以來中國婦女學的建設大業，至於相關的情況，筆者將會在第三章作更詳細的交待。

第二節 性別的現代性想像

然而，李小江跟她的同代人(包括婦聯系統中的同行)，儘管在理論立場上千差萬別，甚至南轅北轍，但對於現代性，卻多多少少分享著十分類近的想像。事實上，八十年代以來，女性主義話語以及婦女/性別研究在中國內地的引入、接受與建構，差不多是跟中國內地的再度現代化同步的。可以這麼說，對中國女性主義話語的接受以及建構的研究，同時也是有關中國現代性的研究。

雖然現代化首先為中國廣大婦女帶來的，正正是因改革開放而來的種種棘手「婦女問題」，但現代化本身所夾帶的種種進步想像，卻無疑為當時仍然處於「後發」

⁷⁶ 引文中的「當今世界，當今中國，許多政治家已經正視兩種制度(甚至多種制度)並存的現象，並給予政策上的認可」，很難不令人聯想到中國改革開放所蘊含的「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雙修」的時代命題。

階段的中國的(男女)國民，在在提供了無限的憧憬空間；而不無吊詭地，現代化也同時為新時期「婦女問題」的解決，或多或少提供了部分的契機和資源；發源於西方的女性主義話語，正是其中一例；筆者將會在第三至五章對此作出更詳細的交待，故暫且按下不表。筆者倒希望在這最後一節中，以李小江的性別論述為切入點，嘗試具體透析出李跟她的同代人，所或多或少分享著的對於現代性的(歷史)想像的一些側面；套用美籍中國學者王斑的話說：「隨著啓蒙、革命和進步等大敘述在二十世紀末的逐步衰退，一個更為宏大、更虛幻的敘述正在登場。這就是資本主義現代化的敘述」，⁷⁷ 不錯，李跟她的同代人所或多或少分享著的現代性想像的主角，正是來勢汹汹但又令人充滿憧憬的資本主義現代化的大敘述。

建構市場女性主義？

事實上，對於中國的改革開放與現代化，一直以來，李小江的態度都是頗為正面的。在《夏娃的探索》一書中，她便曾明確地指出，改革開放與現代化對於中國的婦女解放來說，長遠而言，明顯是利多於弊的。首先她認為，改革開放一方面突顯了原有的婦女問題，並使之尖銳化，另一方面則帶來了一系列新的婦女問題。究其原因，那是因為：(一)在改革開放以前，在全國生產力普遍低下的情況下，婦女的社會性解放是通過社會主義制度與立法，所超前實現的。在如此的情況下，許多婦女問題(例如婦女的素質問題)反而被淡化，甚至被掩蓋了；改革開放只不過是在生產力水平上把社會還原，因此不可避免地突顯了一系列與之相應的原有婦女問題。(二)中國婦女的素質原本就普遍偏低，改革開放要求社會的整體進步，向婦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而突顯了婦女的普遍素質問題。⁷⁸

李小江承認，從暫時的利益來看，改革開放對婦女是不大有利的，因為當經濟效

⁷⁷ 王斑著：《全球化陰影下的歷史與記憶》，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頁1。

⁷⁸ 李小江著：《夏娃的探索——婦女研究論稿》，頁209-210。

益成為了主要原則，素質普遍偏低的婦女，也就不得被無情淘汰；但李又認為，改革開放同時為中國的婦女解放，提供了一個重要的契機以及有力的推動：

而今，社會在前進中無暇顧及婦女，婦女解放的擔子終於落在婦女自己身上。也就是說，正是改革帶來的一系列問題和壓力，將在社會範圍內促使我國婦女**自我意識和解放意識的普遍覺醒**。我們承認，改革給社會進步提供了**機會**，也給婦女成才提供了許多新的機會。但只是覺醒了的婦女，才有可能真正適應改革，奮鬥自強，抓住機會，促進自身的和婦女的解放。⁷⁹

不無吊詭的是，李小江一方面承認，面對改革開放所打開的競爭局面，兩性所具備的社會條件以及面對的限制是相當不同的；另一方面卻認為改革開放「給婦女成才提供了許多新的機會」，關鍵是中國婦女自身必須有相應的「自我意識和解放意識的普遍覺醒」，抓住機會，自強不息，從而達致真正的(婦女)解放。在這裡，李明顯地把改革開放以來的婦女問題**個人化**；雖然她也察識到婦女問題的社會根源、改革開放對婦女的不利面向，但改革開放卻更多地被她視為婦女解放的難得機遇。於是中國當代婦女問題的焦點，在李的現代性/性別論述中，巧妙地被轉移至「自我意識和解放意識的普遍覺醒」之上；只要婦女能真正覺醒，「才有可能真正**適應改革**」，婦女問題也就迎刃而解。

難怪白露會把李小江的思想稱為「市場女性主義」(Market Feminism)。⁸⁰ 白露認為，李小江與改革開放的掌舵人均相信，改革開放所需要的，是具有更高科學知識與國民生產力的「知識主體」(Knowing Subject)；⁸¹ 而李跟同代的人道主義思想家(如李澤厚)均認為，中國在社會以及經濟上的整體改革，亦將有助避免重蹈文化大革命的覆轍，因為改革開放將建設一個以理性與創造性主體為基礎的公共領域。⁸² 若果把八十年代人道主義對人的本質的貌似抽象的探求，放回改革開

⁷⁹ 李小江著：《夏娃的探索——婦女研究論稿》，頁 210-211；重點為筆者所加。

⁸⁰ Tani E. Barlow, *The Question of Women in Chinese Feminism*, pp. 268-295.

⁸¹ Same as 80, p. 274.

⁸² Same as 80, p. 270.

放的整體語境當中，是否正如賀桂梅所言：「『現代化』再度被作為民族國家建設的目標而提出，把政治的個人轉化為非政治色彩的個人，實則是建構更適宜於市場需要的『經濟個人』。人道主義話語中所蘊含的『主體的經驗主義』和『本質的唯心主義』這一阿爾都塞所謂的『結構典型』……必然導致一種個人主義的倫理價值，而在個人/社會的想像關係當中，『市場』則成為使個體『自由』地實現其價值的最好機制」？⁸³ 筆者認為，把李的思想稱為「市場女性主義」，是言重了，難免有陷入冷戰思維之嫌。固然，對於中國的改革開放與現代化，李的態度都是相當正面的，但李的論述重點卻在於婦女解放，把李的思想簡單的歸結為「市場女性主義」，似乎是把論述的重點轉移了，納入到另一套話語型構。但李跟同代人所同屬的人道主義話語，卻無疑為九十年代全面開展的市場經濟，有意無意的作了一次廣泛的意識形態清場，重構了個人與國家、個人與社會之間的想像關係，讓個人主義話語與市場經濟話語，在歷史的偶然中得以接合，打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虛幻盛世。然而筆者認為，李小江對現代性的(歷史)想像，不單蘊含在她的主體哲學，更加蘊含在她的**歷史哲學**思想當中，並與同代人的現代性(歷史)想像，相互呼應，有意無意的為改革開放的動力，提供了意識形態上的合法基礎。

歷史唯物主義的歷史進步論

我們知道，現代性的其中一個標記，正是「直線式進步史觀」對古典「循環式史觀」的替代，⁸⁴ 而歷史背後的發展動力，則可以是「精神」、「理性」（黑格爾），或「社會生產力」（馬克思），不同的學派，對此解釋各異。

⁸³ 賀桂梅著：《人文學的想像力：當代中國思想文化與文學問題》，頁 86-87。

⁸⁴ 其間的歷史過程，可參考 Reinhart Koselleck, "Historia Magistra Vitae: The Dissolution of the Topos into the Perspective of a Modernized Historical Process", in *Futures Past: On the Semantics of Historical Time*, translated by Keith Tribe,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 London: MIT Press, 1985, pp. 21-38.

基本上，在〈馬克思主義婦女理論的研究起點和要點〉(1984 年)等早期著作中，李小江可算是一位歷史進步論者，而當時對於她來說，歷史背後的发展動力，主要是社會生產力。在她那著名的「婦女歷史的三階段論」中，她便把由婦女主持社會的母權時代向婦女陷入家庭的奴隸時代之歷史轉折，理解為社會生產力發展的結果，隨著人類的進化，人類自為的社會形式取代了人類自在的自然狀態，「人類生活的最高目的從活著變為活得更好一些」⁸⁵；而真正的婦女解放，則只有通過共產主義才能實現，因為婦女在社會上的被奴役地位，是跟生產手段的私有制密切相關的。⁸⁶不過，李又指出，婦女生活的形式和內容，跟歷史上的社會形態的關係，大都是間接的，婦女的歷史境遇、社會地位以及基本規定性，跟社會形態的演變有關，但關係不大。如前所述，跟當時官方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論觀點一脈相承，李也認為人類社會的發展經歷了五種基本形態：原始氏族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和社會主義社會；但她又認為，進入父系氏族社會(奴隸社會)以後，由於婦女們總是被封閉在家庭中，被貶低與被奴役，很少或乾脆沒有參與社會生產，婦女們只有透過家庭(父親或丈夫的)，才間接地經歷了歷史上五種基本的社會形態。所以，儘管從父系氏族社會到資本主義社會前期，社會形態經歷了三次重大的轉變，婦女生活的形式和內容卻沒有發生過根本性的改變。⁸⁷

可以這麼說，在〈馬克思主義婦女理論的研究起點和要點〉這一篇李小江的早期論文中，雖然李承認，(起碼直至資本主義社會前期) 婦女生活的形式和內容，跟歷史上的社會形態的關係大都是間接的，但她仍然肯認社會生產力對社會形態整體發展的重要作用。儘管李當時在描述婦女的歷史境遇時所使用的「自在」、「自為」、「自由」等字眼，具有濃烈的人道主義異化論的色彩，但論述背後的主導話語仍然是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論。而婦女在歷史上的被貶低、被奴役與被隔

⁸⁵ 李小江著：〈馬克思主義婦女理論的研究起點和要點〉，頁 14；引文中重點為原文所有。

⁸⁶ 同註 85，頁 15。

⁸⁷ 同註 85，頁 12-15。

絕，則**更多地**被視為**歷史進化的後果**，而非**進步的代價**或**(婦女)最終解放的契機**。簡言之，中國婦女的歷史圖像在李的婦女歷史三階段論中，主要被呈現為一種**時間的敘述**，而社會生產力，則被視為歷史背後的主要發展動力。

然而，在 1989 年出版的《性溝》當中，李小江卻改變了自己原有的歷史哲學立場。儘管在話語形構上，《性溝》跟〈馬克思主義婦女理論的研究起點和要點〉等早期著作之間，仍然有著一定的重疊性；但筆者認為，事隔五年，李的性別論述已產生了微妙而重大的話語變化，並與其時改革開放的時代籲求和巨大陣痛互相呼應，在對歷史作出深細的探尋之餘，亦帶出了一種對中國現代性的幽微的歷史想像。

「外來者」的故事：歷史發展的「空間敘述」

在《性溝》中，李小江的其中一項最重大的轉變，是對「父權社會(奴隸社會)替代母系社會」這個歷史過程的重新闡釋。如前所述，在〈馬克思主義婦女理論的研究起點和要點〉一文中，雖然李認為婦女的生活，跟歷史上的社會形態的關係大都是間接的，但她仍然認為社會生產力對社會形態的整體發展，有著重大的作用；而母系的自然社會形態之瓦解，正是社會生產力發展的必然結果。然而，在《性溝》中，李卻對此作出了部分的重大修正。

首先，李小江指出，典型的母系血緣社會大多出現在以(前)農業為主的原始民族中，其地理環境則全部處於相對封閉的狀態。在母系血緣社中，主要的生產勞動是養殖和種植等定居式勞動，其**承擔者主要為女性**。至於男性，則**主要從事狩獵和捕魚等野外勞動**，並負責保衛氏族的安全。這樣的性別勞動分工促進了財富的增長，而財富的增長則大大促進了人口的發展。因為人口增長，進一步突出了對物以及更大面積的居住地的需求，也促成了氏族內部血緣關係的複雜化(一方

面，在生存方式上，由大的氏族向小的(對偶)家庭分化；另一方面，在血緣關係上，由小氏族向大部落聚合)。⁸⁸

但李小江認為：(一)在母系血緣社會中，只有性的分工，還沒有社會等級的分化，而且當時，兩性都有參與生產活動，對物的需求的增加，並不即意味著愈來愈對男性力量的單方面肯定；況且在母系社會中，女性所從事的生產活動的價值，是遠遠高於男性的，所以生產力的增長，並不必然導致母系社會的瓦解。(二)人口的增長並不必然導致生育力以至女性地位的貶值，因為在血緣社會中，氏族的強大，正正是建基在人口的量之上。(三)氏族內部向小的對偶家庭分化，並不必然意味著母系向父系，甚至父權的轉化。向小的對偶家庭的分化，完全可以建基在原來的母系血緣基礎之上。(四)母系血緣社會主要從事農業生產，而在文明後的父權社會中，男人從事的主要生產仍然是農業。換言之，父權社會是在母系社會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其社會生產性質，並不存在顛覆母系制的經濟上的必然因素。即使發明新的生產工具，也不意味著女性不能勝任農業生產。所以，生產力的發展與新的生產工具的發明，並不是母系社會向父權社會過渡的唯一動因，它更多地是父權制的結果。(五)個體觀念與私有意識可算是父權制誕生的基礎，但問題是：當時在這樣一個封閉的、財產共有、血緣相近、以氏族為單位的母系社會部落內部，若果沒有「他者」的介入，打破原有的封閉狀態，是不會自發衍生出個體觀念以及私有意識的。此外，即使衍生出私有觀念，也並不即意味著母系社會必然向父權社會轉化。反過來說，以母親在母系社會中的優勢，似乎更有利於女性的私有意識的萌芽。⁸⁹總而言之，在李看來，母系血緣社會向父權社會之轉化，並不是社會生產力發展的必然結果。

那麼，由母系血緣社會向父權社會轉化，其起因到底是什麼？李小江認為，由母

⁸⁸ 李小江著：《性溝》，頁 65-66。

⁸⁹ 同註 88，頁 66-68。

系向父權的轉化，是人類由依屬自然向征服自然的進化過程；而在依存、受惠與受制於自然的原始生活，自然力被神化，除非逼於一種**外在的生存壓力**，人不容易自覺的產生一種要征服自然的自覺的社會意識。李認為，在當時的條件下，這很大程度上是來自部落擴張所引起的自發的**部落戰爭**。⁹⁰

李小江指出，部落戰爭所產生的影響，是十分巨大的：(一)在戰爭中，面對部落的脅逼，第一次喚起了敵我雙方的「我」的群體意識。(二)戰爭第一次把純粹「他者」引入以彼此認同的氏族生活與人的意識之中，戰敗者為奴(他/她們不少是女性，李認為最早的父權家庭，也許正是通過女俘虜的佔有而誕生)，他/她們的出現導致了氏族社會內部的等級意識與等級制度的萌芽；主奴制度的誕生，意味著超越血緣的社會等級制度的出現，並導致了血緣社會的解體。(三)自我意識進一步演變為掠奪意識與佔有意識，人類第一次意識到財富與人口的增加，不僅可以通過自然，也可以通過侵略(戰爭)，甚至以犧牲人本身的自然生命為代價，通過人自身的力量積極取得。李認為這一切必然做成以「生育」為主的母親自然價值觀念以及女性社會地位的貶值，⁹¹ 最終導致母系社會解體，父權社會躍上歷史的舞台，操演父權政治的千年好戲。

有趣的是，李小江在這裡企圖對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論與新提出的戰爭論，作出了某種折衝的融合。李指出，人類在母系社會年代，從事的是「自然生產」，而惟其進入父權社會年代，人類才開始從事超越自然的「社會生產」，生產力得以飛躍，進入文明社會的年代。李並不否認社會生產力在文明史上的重要作用，但她指出我們並不能就依此合理解釋仍未有「社會生產」的母系社會，以及由母系社會向父權社會轉化的歷史過程。在這裡，部落戰爭被視為這個歷史過程中「具

⁹⁰ 李小江著：《性溝》，頁 70-71。

⁹¹ 同註 90，頁 72-78。

決定性作用」的「誘發」因素。⁹² 跟李八十年代早期著作背後的歷史哲學觀念略有不同，對於由母系社會向父權社會轉化的歷史轉折，李更多地將之視為一個由封閉到開放的**空間變化的結果**，這一空間變化並非來自母系社會原有的自然自在狀態，而是來自與其他部落的激烈交遇(戰爭)，由一種外在的生存壓力，掀起了原有氏族內部社會結構的質變。換言之，由〈馬克思主義婦女理論的研究起點和要點〉到《性溝》，中國婦女的歷史圖像，已逐漸由一種時間的敘述轉移為一種空間的敘述；而正正在這一種空間的敘述中，我們可以看到一種與改革開放的時代籲求相互呼應的中國現代性(歷史)想像。

正如王宇所言，自五四以來的文學作品，「**文明與愚昧的衝突**」實際上是一個世紀性的命題，而這一個命題一開始便被置於一個有關空間的寓言：「**外來者**」的故事框架當中——一個有著文明背景(代表現代性)的外來者(通常是男性)來到一個封閉、落後的傳統空間中，以啓蒙者與救贖者之姿，企圖啓蒙與打救處於**蒙昧**封閉狀態的原住民(通常是女性)。王指出，現代性首先是一種時間觀念，這種觀念把時間視為一種線性不可逆的、無法阻止地流失的歷史過程；而在中國的現代性語境當中，現代性的表述不僅需要被置於現代與傳統的時間關係中，而且需要被置於西方與本土的空間觀念中。故此，對時間化了的空間或空間化了的時間的體驗成為了二十世紀中國人的深刻而獨特的現代性經驗，而在文學作品中，這種經驗則被轉化為「**外來者**」的故事框架。王指出，八十年代的文學作品，在新啓蒙話語的語境當中，不少仍深刻地滲透著這種「**外來者**」故事的結構原型，而性別政治作為最普遍與古老的意識形態，則保證這一結構原型在二十世紀不同時間的成功接受與運作。⁹³

依此看來，李小江的戰爭論與中國二十世紀的「**外來者**」故事，基本上是同構的：

⁹² 李小江著：《性溝》，頁 72。

⁹³ 王宇著：《性別表述與現代認同：索解 20 世紀後半葉中國的敘事文本》，上海三聯書店，2006 年，頁 151-171。

不管是母系社會，還是臨界現代的近/現代中國，**外來者(外來部族/西方)才是文明進程的真正驅力所在；而事有湊巧的是**，在這兩套不同的敘述中，男性(啓蒙者/戰士)與女性(被啓蒙者/母系社會中的女性)的關係均被用來作為新與舊、文明與自然、進步與落後等等二元對立的象徵表述。可以這麼說，在這裡李與她的同代人(以至二十世紀的先行者)所分享著的，是一種對中國現代性的同構的歷史想像。

然而，由上述的同構性質，我們是否即能推衍出含蘊在《性溝》一書中的現代性歷史想像？或許，我們可以從李小江對由母系社會向父權社會轉化的過程之歷史評價，看看其中的一點端倪。首先，雖然父權社會對母系社會的取代，在歷史上讓女性長期地滯留下來，承受著千年的痛苦與抑壓，但李卻認為：

在當時的並無法權的原始社會中，母系血緣社會向父權社會轉變，在本質上並不是性別權利的轉換，而是人類社會權利的真正確立；表面是男性對女性的勝利，其實正是人類征服自然的起點——然而遺憾的是，在人類**有意識地**征服自然的漫長歷程中，**下意識中**卻恰恰是依照自然的分工首先完成了對男女的社會分工，將女性作為人類的自然存在長期地滯留下來。⁹⁴

吊詭的是，若人類不能極限度地駕馭自然，人便永遠不能超越自身的自然分工，進入文明階段；但人類的文明化卻首先以歷史上女性的異化，作為必需付的代價；李進一步指出，只有在女性向人類社會最終的真正回歸，在社會生活確立主體身份，人類才能完成對自然的真正超越，取得自身真正的終極解放。⁹⁵ 明顯地，跟〈馬克思主義婦女理論的研究起點和要點〉相比，在《性溝》一書中，婦女在歷史上的被貶低、被奴役與被隔絕，**更多地被視為歷史進步的必須代價或(婦女)最終解放的契機**；而這跟李的「婦女歷史三階段論」中的「原生-異化-復歸」結構，基本上是同出一轍的，指向的都是對(女性)主體復歸的現代性歷史想像。

⁹⁴ 李小江著：《性溝》，頁 79；重點為原文所有。

⁹⁵ 同註 94，頁 80。

話語的碰撞和文化協商

可以這麼說，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後文革與改革開放的雙重語境之中，性別以某種特定的形式，廣泛地成爲了一個社會議題。在這一個過程中，透過人道主義話語的修辭，中國當代婦女研究初步嘗試讓「性別」本身成爲一個問題。但由於八十年代一切有關性別的討論，暫時仍然無法跟既有的階級話語完全分離，在借助既有的話語資源(中國社會主義話語)的前提下，有關性別問題的話語重構往往體現爲種種新舊話語之間的矛盾與碰撞。*在此，人道主義話語成爲了嘗試緩解這些話語矛盾的文化協商工具。*

然而，如前所述，與其說人道主義話語終極緩解了上述的種種話語矛盾，倒不如說它本身正是這些矛盾的顯現。正如我們將會在下一章所看到的，「性別」要自階級話語取得進一步的分離，並讓中國當代婦女研究對女性主義的話語的進一步接受與建構成爲可能，還需要一個相對獨立的話語及體制空間的打造：「婦女學」的學科建設，讓因時代的話語轉折而來的種種新舊話語之間的矛盾與碰撞，得以被轉化和接合。

第三章

在國家政策、學科建構與文化批判之間

關鍵詞：婦女問題、婦女研究、婦女學

1978 年，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三中全會確定以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尤其是經濟建設)爲中心的國家發展工作重點後，中國全國隨即展開了影響深遠的改革開放。但此後不久，隨著改革對社會主義體制的鬆動，婦女下崗、階段就業、男女就業不平等、離婚率上昇、賣淫、拐賣婦女、女嬰被殺等等新舊的「婦女問題」，開始紛紛湧現。

面對改革開放時期接踵而來的種種婦女問題，婦聯組織率先建立婦女理論研究機構，全國婦聯、各省、市婦聯先後成立了婦女研究所、研究室，專事婦女問題，進行婦女現狀調查與婦女理論研究。與此同時，各地婦聯亦牽頭聯繫社會各界專家、學者以及其他熱心人士，相繼成立不同的婦女學會、研究會等，成爲掛靠在各地婦聯的團體會員，直接面對現實中的婦女問題，探討研究解決的對策與方法，爲決策部門提供政策依據，並喚起廣大社會的關注。除此以外，亦有來自不同學科的學者，在他們力所能及的範圍內從事婦女理論研究的工作以及婦女學學科的建設，並建立了一些有關的自發性的民間學術團體。

隨著改革開放的發展，婦女出現了許多新的情況與問題，固然需要作出理論上的解釋，而基於實際的理由，婦女運動的實踐亦亟需理論上的指導，自我更新，以適應新的情勢；與此同時，跟對外開放相適應，國外一些婦女研究的成果的引入，

亦引起了話語的交鋒，引發了國人(尤其是婦女研究界)對婦女問題，以至婦女研究本身的重新反思與定位；而「婦女學」的引入與提出，正是其中一個最具爭議性的話語事件，並讓原本以階級(甚至階級鬥爭)為中心的馬克思主義婦女解放理論話語，產生了微妙的話語轉移。本章第一節便將從八十年代初至九十初這一段期間，婦聯系統的婦女研究對於婦女學(以至女性主義話語)的初步接受情況，一窺其基礎理論在話語型構上的轉移，看看其間種種的文化協商，並從中透析出種種關於現代性的想像。

如前所述，對於婦女學(以至女性主義話語)的初步接受與建構，來自學術界的自發性力量，也在期間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角色。不過，跟婦聯系統的婦女研究略為不同的是，對於學術界的婦女研究學者來說，婦女學引入與提出，更多地意味著的，是對新中國「男女都一樣」的性別意識形態以及文革期間愈演愈烈的政治集體主義的有意撥反。如果說在這一場話語轉移運動中，婦聯系統的婦女研究逐漸突顯出作為社會問題的「婦女問題」的相對獨立性；學界的婦女研究則響應了後文革氛圍中對於個體性以及思想/學術自主的籲求。本章第二節便將以李小江的《夏娃的探索——婦女研究論稿》與孟悅、戴錦華的《浮出歷史地表——現代婦女文學研究》為代表個案(二者均為李小江 1986 至 1992 年間所主編的「婦女研究叢書」中的重要著作)，¹ 探討學界的婦女研究其時對於婦女學(以至女性主義話語)的接受與建構情況，其間的種種文化協商，指出這一場婦女研究運動本身的文化批判性格，並說明其中不同的論述在性別政治上的細微差異，以及對於現代性不同的文化想像。

¹ 「婦女研究叢書」由李小江主編，1986 至 1992 年間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出書共十五種。

第一節 婦聯系統對婦女學的初步接受與新時期的現代性想像

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動亂期間，由於「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方針佔了統治地位，提出「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是指導婦女徹底解放的唯一正確的思想」，婦聯的「基本任務就是發動廣大婦女積極投入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兩條路線的鬥爭」，各級婦聯在不同程度上中斷了工作，全國婦聯更中斷了工作達十一年之久，而婦女理論研究工作亦隨之而中斷。²

文革結束，全國婦聯恢復工作後隨即於 1979 年成立了婦女運動史研究室，從事歷史資料的搜集與研究工作，並於 1981 年創辦內部刊物《婦女史研究資料》，主要刊登婦女運動文獻資料、專題資料介紹、人物介紹、研究論文，交流全國婦運史研究資料和訊息。³ 正如美國學者白露(Tani E. Barlow)所言，全國婦聯之所以在恢復工作後不久，隨即成立婦女運動史研究室，一方面是因為全國婦聯亟希望透過婦女運動史的資料搜集與書寫，儘快重新確立革命婦女主體在後毛政治體制與意識形態中的位置，並重申婦聯作為代表了廣大中國婦女利益的組織的代表性；另一方面則因為文革後民眾對婦聯本身的政治代表性產生了廣泛的質疑，有一種論點甚至認為，對於一般的婦女民眾來說，「婦女解放」只是一項由上而下、無甚意義、與己無關的政治恩賜，加上改革開放觸動了原有的社會主義體制，性別不平等的問題日漸復現，而恢復婦女運動史的研究室，在某程度上正正成為了婦聯藉以緩解這種不明確的過渡狀態的中介。⁴

然而，隨著改革開放的漸次開展，種種的婦女問題層出不窮，全國婦聯也就不得

² 胡新穎、張艷霞著：〈新中國 50 年婦女研究綜述〉，李秋芳主編：《半世紀的婦女發展——中國婦女五十年理論研討會論文集》，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2001 年，頁 561。

³ 李靜之著：〈婦聯系統理論研究機構一覽〉，熊玉梅、劉小聰、曲雯主編：《中國婦女理論研究十年》，北京：中國婦女出版社，1992 年，頁 567。

⁴ Tani E. Barlow, *The Question of Women in Chinese Feminism*, Durham and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 255-260.

不調整策略，決定把婦女理論研究作為首要工作之一。1983 年，全國婦聯成立研究室，直屬全國婦聯書記處領導，主要工作是展開對婦女運動現狀的調查與政策研究，為書記處指導工作服務，並指導婦聯工作的內部刊物《婦女工作》。《婦女工作》除了傳達中共中央及全國婦聯對婦女工作的指示，傳達全國各地區的種種婦女工作訊息外，還刊登各種調查報告、研究論文，探討現實中的婦女問題，反映婦女工作的最新情況，介紹婦女理論研究的最新成果，表揚新型的婦女人物。此後，各省、自治區、市乃至一些地區和縣婦聯也成立了相應的研究機構，從事婦女現狀的調查研究與婦女理論研究。此外，全國二十七個婦女管理幹部院、校均開設了婦女理論教研室、組或類似的教研機構，以應付最新情況。⁵

除了建立本身的研究機構外，自 1981 年起，各省、自治區、市婦聯亦牽頭聯繫社會各界專家、學者以及其他熱心人士，就著婦女問題、婚姻家庭、性科學、婦女學、婦女理論等等不同的課題，成立相應的研究會、學會，掛靠在各地婦聯，展開多種形式的研究活動。⁶

為了加強婦女理論研究，在第六次全國婦女代表大會(1988 年 9 月 1 日至 9 月 6 日在北京舉行)後，全國婦聯更以婦女運動歷史研究室和全國婦聯研究室課題組為基礎，於 1990 年 1 月正式成立了全國婦聯婦女研究所。研究所的主要任務是：研究婦女解放運動的理論、歷史和現狀，在馬克思主義的基礎上，建立中國婦女理論研究體系；進行調查研究，以深入了解現實中的婦女問題，為政府制定婦女政策和立法提供依據；聯繫各級婦聯理論研究機構、各種婦女研究團體以及各界關心婦女解放的人士，推動全國婦女理論研究和訊息交流的工作；開展國際學術

⁵ 李靜之著：〈婦聯系統理論研究機構一覽〉，熊玉梅、劉小聰、曲雯主編：《中國婦女理論研究十年》，頁 567-569。

⁶ 例如，就婦女問題成立的相應研究會或學會，有北京婦女問題研究會、河西省婦女問題研究會等，關於婚姻家庭方面議題的，有北京市婚姻家庭研究會、天津市婚姻家庭研究會等，性科學方面的有黑龍江省性科學學會，婦女學方面的有上海市婦女學學會、江蘇省婦女學研究會等，婦女理論方面的，則有湖北省婦女理論研究會、廣西婦女理論研究會等，不一而足；同註 5，頁 570-572。

交流，溝通中外婦女研究的訊息，進行中外婦女運動的比較研究。⁷

活動方面，在八十年代初至九十初這一段期間，全國婦聯便分別於 1984 年 9 月、1986 年 10 月和 1991 年 9 月，舉行了第一、第二以及第三次全國婦女理論研討會；⁸ 在第二次全國婦女理論研討會上，與會者更曾就「要不要建立婦女學」的問題，展開了論爭。⁹

引入婦女學，論爭婦女學

其實，早在 1982 年，在《國外社會科學》雜誌上，已第一次出現了「婦女學」一詞；¹⁰ 而以研究家庭社會學起家的上海大學社會系教授鄧偉志，同年亦於〈婦女問題雜議〉一文中，連續兩次使用「婦女學」這一概念。¹¹ 1983 年，《美國女作家短篇小說選》出版，編者朱虹在編者序中介紹了美國大學中婦女研究的發展情況。1984 年，何培中在《國外社會科學》雜誌上發表了一篇摘譯自日本《思想的科學》期刊、署名白井厚的文章〈爭取女權運動的歷史和婦女學〉。¹² 在該文中，白井厚認為：「婦女解放的閃電所誕生的產物是婦女學」，「婦女學是針對六十年代大學改革運動和黑人運動的進展，隨著美國大學成立了黑人學而創立的，目的在於糾正以前以男子為中心的學術上的謬誤，客觀地分析婦女的狀況，

⁷ 李靜之著：〈婦聯系統理論研究機構一覽〉，熊玉梅、劉小聰、曲雯主編：《中國婦女理論研究十年》，頁 574。

⁸ 之後，全國婦聯亦曾於 1996 年 11 月召開了第四次全國婦女理論研討會；研討會的部分內容後來結集成書，見康玲主編：《婦女發展與對策——第四次全國婦女理論研討會論文集》，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8 年。

⁹ 羅曉露、趙憶寧著：〈中國婦女問題理論研究的現狀與發展〉，北京：《瞭望》，第 51 期，1986 年，頁 33；李靜之著：〈婦聯系統理論研究機構一覽〉，熊玉梅、劉小聰、曲雯主編：《中國婦女理論研究十年》，頁 575-576；王政著：〈當代中國婦女研究〉(1998)，《越界：跨文化女權實踐》，天津市：天津人民出版社，2004 年，頁 66。

¹⁰ 羅曉露、趙憶寧著：〈中國婦女問題理論研究的現狀與發展〉，頁 33；孫曉梅著：〈中國婦女學研究綜述〉，《婦女工作》，第 6 期，1991 年，頁 23；王政著：〈當代中國婦女研究〉，頁 66。

¹¹ 〈鄧偉志〉，陶春芳主編：《中國婦女研究年鑑：1991-1995》，北京：中國婦女出版社，1997 年，頁 416；原文刊於《解放日報》，1982 年 11 月 26 日。

¹² 丁娟著：〈我國婦女學科體系研究狀況〉，熊玉梅、劉小聰、曲雯主編：《中國婦女理論研究十年》，頁 193；王政著：〈當代中國婦女研究〉，頁 66-67。

提倡克服性別歧視的新婦女生活方式及人的解放」。¹³ 然而，對於「婦女學」的引介，至此仍然比較簡略。

及至 1984 年，鄧偉志在第九期的婦聯刊物《婦女工作》上發表了〈完善與發展婦女學問題〉一文，才正式提出婦女學這一概念，並指出在中國建立婦女學的時機已至，逼在眉睫。鄧認為，有了「婦女學」的招牌或形式，才會或多或少促使人們從「學」的角度去思考研究，自覺地充實其內容；此外，中國自五四以來已有不少寶貴的婦運經驗(尤其是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的婦女工作經驗)，這一些經驗有的已上昇為理論，但更大部分的則有待於上昇為理論，有待於組織成一個完整的科學體系；加上中國近年出現了大批潛心發展和完善婦女學的理論工作者與婦女工作者，不少跟婦女研究相關的活動和組織相繼出現，建立中國婦女學的時機正在到來。¹⁴

但我們知道，婦女學原本是舶來學科，誕生於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以後的西方(在此，主要指美國)女權運動。當時，由於這一場社會運動的參與者有很多是大學的女學生與女教師，所以她們很快便把這場運動帶進了高等院校。然而，她們不單在社會領域中考慮性別不平等的問題，而且更從教育體制、學術領域以至知識體系本身，著手審視性別不平等。於是，一批女性主義學者開始對西方的知識體系進行梳理與質疑的工作。一方面，她們發現以往的知識體系是以男性為中心的，偏頗地以男性的角度來觀察世界以及建構知識，而女性則在這個知識體系中受到貶抑甚至缺席；另一方面，她們則看到知識生產中的性別權力關係，看到性別作為人類社會的其中一個基本組織原則，是以往的知識體系所忽略的，看到這種忽略導至了人們作為常識接受的許多偏頗與謬誤的理論，看到這些理論在鞏固性別不平等關係上起了相當重要的作用。換言之，女性主義至此已由一場政治運

¹³ 引自丁娟著：〈我國婦女學科體系研究狀況〉，熊玉梅、劉小聰、曲雯主編：《中國婦女理論研究十年》，頁 193。

¹⁴ 同註 13，頁 193-194。

動擴展為一場思想和文化的運動；而隨著這一場運動在教育體制以及學術領域中的滲透，女性主義學者一步一步的把性別視角引進了歷史、文學、人類學、心理學、社會學、教育學等各個學術領域，並開始逐步建立一門獨立的婦女學學科；反過來說，她們同時亦借助了這些學術領域的理論資源，進一步建構以及完善自己的理論體系。¹⁵ 可見，婦女學一開始便與(西方)女性主義話語緊密結合，要把婦女學引入中國的文化語境，女性主義話語是無法直接繞過的。或許正正是因為這樣的話語背景，婦女學的概念引入不久，在社會上便引起了很大的反響。

1984 年，全國婦聯召開了第一次全國婦女理論研討會。儘管會上提供的文章大部分為有關婦女問題的調查報告，會議也主要圍繞經濟改革和婦女就業、婦女素質等等問題展開，還沒有就婦女學的學科化建設問題作出討論，¹⁶ 研討會本身卻無疑為各方正在成形的新的婦女研究力量，無論在話語與社群網絡的層次上，**造就了第一次較大規模的聚合和接合(articulate)的機會**。翌年，奚杏芳便在《中國婦女》上發表了〈建議開展” 婦女學”研究〉一文，一方面由第一次全國婦女理論研討會出發，對近年婦女學研究的「新潮頭」作出了簡述，另一方面則指出婦女理論研究的重要性，並表明：「很希望我們的《中國婦女》給婦女學研究以一席之地，以反映當前婦女研究的新成果，傳遞新訊息」，加上文章以「**建議開展” 婦女學”研究**」作為題目，其對在中國建立婦女學的籲求，可謂呼之欲出。¹⁷ 但 1986 年 1 月 27 日，當鄧偉志在《中國婦女報》上發表了〈迎接婦女學的黃金時代〉一文，《中國婦女報》亦自同期開始特闢「理論探討」一欄，促進婦女學的建立，中國婦女學的建構以及相關的爭議，才正式拉開了序幕。¹⁸

¹⁵ 王政著：〈淺議社會性別學在中國的發展〉(2001)，《越界：跨文化女權實踐》，頁 94-95；王政等著：〈高等教育中的婦女學—中美比較〉(2002)，《越界：跨文化女權實踐》，頁 123-128，133-141。

¹⁶ 李靜之著：〈婦聯系統理論研究機構一覽〉，熊玉梅、劉小聰、曲雯主編：《中國婦女理論研究十年》，頁 575。

¹⁷ 奚杏芳著：〈建議開展” 婦女學”研究〉，《中國婦女》，1985 年，第 12 期(總第 328 期)，頁 5。

¹⁸ 鄧偉志著：〈迎接婦女學的黃金時代〉，《中國婦女報》，1986 年 1 月 27 日，第三版。

跟〈完善與發展婦女學問題〉一文相似，鄧偉志在〈迎接婦女學的黃金時代〉中重申，在中國建立婦女學的時機已至，因為一方面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的婦女工作經驗，已經分門別類的上昇為局部理論、中間理論，「距離再上昇、被歸納為系統的婦女學理論，只有一步之差」；另一方面，從婦聯組織到社科單位，近年都有大批人為建立婦女學而忙碌，人們對創建婦女學的願望相當強烈；換言之，主客條件已備，只欠東風。此外，鄧認為婦女學黃金時代至少應該有三個標誌：（一）婦女學的體系大體成形；（二）婦女學的網絡初步建立起來，具體方法是透過院校裡婦女學課程的開設，科研系統裡婦女學研究所、婦女學研究會的成立，婦女學論著的出版，讓婦女學得以體制化，以此為基礎一步一步的發展；（三）婦女學的理论應為廣大婦女工作者所掌握、運用，指導婦女工作，指導社會工作。¹⁹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一）〈迎接〉一文撇除了〈完善〉一文中提及的五四婦運經驗，把焦點完全集中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的婦女工作經驗，將中國婦運史上有過的資產階級成份巧妙地剔走了；（二）〈迎接〉一文進一步把婦女學的目的，明確地鎖定為「指導婦女工作」；（三）〈迎接〉一文完全略去婦女學原本的西方意識形態背景(部分來自資產階級意識形態)及其政治性(女性主義)，雖然表面看來，鄧似乎仍然把婦女學收納在馬列主義的政治意識形態之下，但筆者認為，鄧可能更主要是希望透過策略性地將婦女學非政治化(相對於中國婦運史上有過的資產階級女權運動，也相對於西方女性主義話語)，突顯出婦女學的「學科」性質與社會工作實務性質，為以指導婦女工作為目的的婦女學，劃出一片相對獨立的領地，讓各方婦女研究的力量得以聚合/接合，開花結果。況且，就算鄧骨子裡並沒有以上的意圖，但在效果上，它卻無疑為一個相對獨立的話語空間的誕生，播下了重要的種子；（四）然而更重要的是，《中國婦女報》以〈迎接婦女學的黃金時代〉一文作為「理論探討」一欄的開欄篇章，而該欄又開宗明義以促進婦女學的「儘早建立」為宗旨，²⁰ 可見「迎接婦女學的黃金時代」已不單是個別

¹⁹ 鄧偉志著：〈迎接婦女學的黃金時代〉。

²⁰ 〈編者的話(「理論探討」欄)〉，《中國婦女報》，1986年1月27日，第三版。

婦女研究工作者的預見和期望，而是一份婦聯轄下的官方刊物所明確倡導的方案。

但原婦聯副主席羅琮卻抓住了婦女學原本的意識形態背景，在 1986 年 3 月 8 日的《經濟日報》發表了署名文章〈重視婦女問題理論的研究〉。在該文中，羅不同意「婦女學」傳入中國的一些具體說法，她認為「現在有一種說法：『婦女學』的研究起源於六十年代美國的女性講座運動，到七十年代傳到了日本等等。同事實不符」，²¹ 並指出：

至於資產階級的女權運動者研究工作，也起源於十八世紀中、下葉，其後二百多年來，有起有落。美國自二十世紀六十年代起，由於社會內部矛盾的尖銳與種族問題的迭起，涉及到婦女，一度掀起了爭取和男子平等權利的高潮。這次高潮，被稱為『女權運動的第二次高潮』。這是美國中產階級爭取男女平權的運動，屬於資產階級女權運動的範疇。對於資本主義國家婦女運動中有益於我們的部分應該借鑒，但我們的婦女解放理論，同美國、日本等國家六十年代興起的所謂『婦女學』，無論在思想體系、服務對象、奮鬥目標等方面，都是不同的。²²

雖然羅琮提到「對於資本主義國家婦女運動中有益於我們的部分應該借鑒」，但她強調，美日等地的婦女學跟中國的婦女解放理論，無論在思想體系、服務對象與奮鬥目標上，始終有別；而歸根究底，**兩者的關鍵差別在於政治意識形態上的對立**；羅在以上的引文中，便一直強調婦女學跟資產階級、資本主義以至資產階級女權運動之間的意識形態關連，這無疑是跟馬克思的婦女理論互相矛盾的。所以，對於羅來說，無論婦女學有多少「部分」值得中國的婦女工作者借鑒(至於那一部分值得借鑒，羅倒沒有說得很清楚)，作為一個意識形態的「整體」，它始終跟馬克思的婦女理論有著不可通約的矛盾。無疑，從羅所身處的意識形態環境

²¹ 引自丁娟著：〈我國婦女學科體系研究狀況〉，熊玉梅、劉小聰、曲雯主編：《中國婦女理論研究十年》，頁 194。

²² 同註 21。

看來，她對婦女學的批判在很大程度上是政治性的。但當羅提到「對於資本主義國家婦女運動中有益於我們的部分應該借鑒」時，她卻似乎同時在暗示：相對於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婦女學在學術的意義上仍具有一定的相對獨立性；況且，跟文革時期向階級極度傾斜的意識形態環境不同，羅在〈重視婦女問題理論的研究〉中並沒有否認「婦女問題」本身的相對獨立性，這也可以証諸改革開放以來婦聯的轉向及其一切舉措。然而，問題是：對於像羅這樣的婦聯老幹部來說，面對新的情勢，原來的馬克思婦女理論固然需要更新，但對於婦女學原本的意識形態背景，她們也不可能視若無睹；故筆者認為，與其把羅對於婦女學的反應視為兩種政治意識形態之間的直接衝突，倒不如將之視作全國婦聯在新舊話語交替間的真空狀態的癥兆，似乎更為貼近現實的情況。

換言之，對於婦女學，羅琮與鄧偉志的意見，似乎並沒有表面看那麼對立，從以上的引文看，起碼羅並不否認婦女學具有一定值得借鑒的「學」的成份；可以這麼說，二人均在不同程度和意義上同意意識形態與學術之間某種分離的可能性；〈重視婦女問題理論的研究〉一文發表之後不久，1986年3月25日在《社會報》上刊登的一篇署名童瞳的回應文章〈中國應該有婦女學——與羅琮同志商榷〉便把話說得更為直白：

更不能因為「婦女學」在提出之初，在奮鬥目標等方面與我們不一樣，我們就拒絕用這名字。哲學、經濟學、法學各國都有，不同社會制度、不同階級的哲、經、法，就不一樣。瓶與酒，有時也可以分離呀！²³

所以筆者認為羅琮跟鄧偉志、童瞳等之間的最大分歧，主要在於：（一）她們心目中婦女學的意識形態成份(酒)與學科性質(瓶)之間的分離程度和意義；（二）她們對於「婦女學」這個名字本身的理解以及接受程度。童瞳在〈中國應該有婦女學〉一文中提到：「任何一門學科的形成，都有個過程，都是分階段的。有了『學』，

²³ 童瞳著：〈中國應該有婦女學——與羅琮同志商榷〉，《社會報》，1986年3月25日，第三版。

至少意味著在一定程度上擠入學科之林」，所以「我國應該有婦女學，出婦女學書，建婦女學會，發展馬克思主義的婦女學理論，建立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婦女學，這才是合乎科學的」。²⁴ 可見，在童的心目中，「婦女學」這個名字主要代表了科學，是可跟酒(社會制度、意識形態)分離的瓶，是已有一百年歷史的「體用論」中的「用」；而在羅的心目中，「婦女學」這個名字則恐怕更多地代表了西方資產階級(以至資產階級女權主義)的意識形態。

然而，這一場圍繞著婦女學所開展的論辯，卻一直延續至同年 10 月舉行的第二次全國婦女理論研討會。在這一場研討會中，有不少的與會者來自非婦聯系統，如全國的社科與高校，其中有不少人更是之前一年河南省未來學會婦女學會所舉辦的「婦女研究訊息交流會」的主要參與者，²⁵ 可見面對新的情勢，當時的婦聯系統爲了更新原來的馬克思婦女理論，已開始向婦聯系統以外的學術力量招手；而証諸往後中國婦女研究的發展，婦聯與非婦聯系統一直都保持著一種既有一定張力但又緊密合作的關係。在內容方面，是次研討會討論了六個議題：(一)改革與婦女解放；(二)婦女在人類繁衍中的價值與作用；(三)婦女形象與婦女觀；(四)婦女就業問題；(五)婦女在精神文明建設中的作用；(六)要不要建立婦女學的問題。²⁶ 跟兩年前的第一次全國婦女理論研討會相似，這一次研討會也是主要圍繞著因改革開放而來的婦女問題來展開討論的，議題比第一次研討會的還要多，而其中最觸目的一點是：「要不要建立婦女學」的問題最終被拿上了桌面，面對面的作出正式的公開討論。

對於「要不要建立婦女學」的問題，研討會上大體有三種意見：(一)有一種意

²⁴ 童瞳著：〈中國應該有婦女學——與羅琮同志商榷〉。

²⁵ 王政著：〈當代中國婦女研究〉，《越界：跨文化女權實踐》，頁 66；杜芳琴著：〈我的婦女研究歷程〉，李小江等著：《身臨“奇”境——性別、學問、人生》，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0 年，頁 175。

²⁶ 羅曉露、趙憶寧著：〈中國婦女問題理論研究的現狀與發展〉，北京：《瞭望》，第 51 期，1986 年，頁 33；李靜之著：〈婦聯系統理論研究機構一覽〉，熊玉梅、劉小聰、曲雯主編：《中國婦女理論研究十年》，頁 575-576。

見認為，婦女學是一門有獨立體系、內涵的綜合性邊緣學科，應該建立中國的婦女學；(二) 有一種意見則不同意提「婦女學」，因為「婦女學」一詞是歐美資產階級女權運動者所首先使用的，中國的婦女理論研究不宜使用這一概念；(三)也有一種意見認為，中國的婦女理論研究尚屬初創階段，建立「婦女學」的條件尚未成熟。²⁷ 此外，在研討會以外，亦有人提出不同的理由，指出「沒有必要建立婦女學」：有一種意見認為，中國應該發展的是馬克思主義的婦女解放理論，所以沒有必要另外建立婦女學；也有一種意見認為，婦女問題應當放到各個學科領域去研究，建立婦女學只會把婦女問題帶到一個狹窄的境地。²⁸

在這一次研討會中，儘管對於「要不要建立婦女學」，各方的意見相當分歧，但相對於第一次全國婦女理論研討會，「要不要建立婦女學」起碼第一次正式成為了一個被認為值得分開來討論的專題，一種對於新的話語接合點(不管是「婦女學」，還是有待進一步發展的「馬克思主義的婦女解放理論」)的更明確的籲求，可謂呼之欲出。

無論如何，在第二次全國婦女理論研討會之後，「婦女學」的確逐漸為更多來自婦聯與非婦聯系統的婦女研究者所接受(有關非婦聯系統的婦女研究工作情況，筆者將於下一節具體交待)，婦女研究也隨之而取得了進一步的發展；「婦女學」無疑為往後的婦女研究工作提供了一個新的話語接合點，並打開了一個新的話語空間。

²⁷ 羅曉露、趙憶寧著：〈中國婦女問題理論研究的現狀與發展〉，頁 33。

²⁸ 丁娟著：〈我國婦女學科體系研究狀況〉，熊玉梅、劉小聰、曲雯主編：《中國婦女理論研究十年》，頁 194；孫曉梅著：〈中國婦女學研究綜述〉，《婦女工作》，第 6 期，1991 年，頁 23。

有條件的接受，有條件的重構

然而，婦聯系統對於婦女學的接受，可算是「有條件的接受」：首先，正如羅琮對婦女學的批評所示，在以馬克思主義婦女解放理論為傳統的婦聯系統中，婦女學不僅意味著一種新的研究視角與方法，它更加意味著一種被認為跟馬克思主義無關甚至對立的意識形態：一種被認為跟西方的資產階級、資本主義以至資產階級女權運動有關連的意識形態。難怪在九十年代初，全國婦聯婦女研究所的丁娟會把人們對婦女學的爭議的關鍵，歸結在**婦女學與馬克思主義婦女解放理論的關係**之上。丁指出，關於這一關係主要有三種觀點：一種觀點認為婦女學與馬克思主義婦女解放理論風馬牛不相及；一種觀點則認為婦女學是一門有別於馬克思主義婦女解放理論的全新學科；還有一種觀點(丁娟等自己的觀點)認為，馬克思主義婦女學在「內涵與外延兩個方面繼承了馬克思主義婦女解放理論。一方面，它繼承和堅持了馬克思主義婦女觀的理論原則，全面吸取和發展了這一理論的成果；另一方面，它以馬克思主義婦女理論為指導，科學地概括和總結了當代婦女解放運動的實踐，並運用科學的最新成果，對婦女領域的方方面面的新現象給予了理論描述和科學概括與預測。馬克思主義婦女學的產生，不但沒有否定馬克思主義婦女理論，而且是對它的發揚光大和豐富發展。」²⁹ 由此可見，在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初，不管人們對婦女學採取怎樣的態度，或希望建構何種形態的婦女學，馬克思主義話語仍然是當時的主流，始終是一道不可逾越的話語界線；結果，人們更多地傾向選擇重新界定馬克思主義婦女理論的內涵與外延，而非徹底擯棄馬克思主義話語本身。

其實，從以上丁娟的引文，我們或多或少都可以看到，在這一場話語重構的運動中，馬克思主義婦女理論在話語型構上到底發生了怎樣的微妙轉移，讓馬克思主

²⁹ 丁娟著：〈我國婦女學科體系研究狀況〉，熊玉梅、劉小聰、曲雯主編：《中國婦女理論研究十年》，頁 195；按：引文原出自丁娟主編：《婦女工作知識手冊》，紅旗出版社，1988 年，頁 2，現引自丁娟著：〈我國婦女學科體系研究狀況〉，頁 195。

義婦女理論原本的內涵與外延得以擴充，以應付婦女領域中日趨複雜的情勢。細析以上的引文，我們會發現，丁事實上對「馬克思主義婦女理論」與「馬克思主義婦女解放理論」作出了巧妙的區分。雖然，在以上丁娟的引文中，字面上「馬克思主義婦女理論」或「馬克思主義婦女觀」仍被等同於「馬克思主義婦女解放理論」；但從「它(按：指婦女學)以馬克思主義婦女理論為指導，科學地概括和總結了當代婦女解放運動的實踐，並運用科學的最新成果，對婦女領域的方方面面的新現象給予了理論描述和科學概括與預測」，我們卻可以看到作者如何巧妙地擴展馬克思主義婦女理論的研究範圍，而不僅僅局限於婦女解放運動的研究。

曾幾何時，「馬克思主義婦女解放理論」是「馬克思主義婦女理論」或「馬克思主義婦女觀」的主要內容，在有關的論述中，兩者差不多是一對可以互相置換的概念。但在丁的論述中，對「馬克思主義婦女理論」與「馬克思主義婦女解放理論」作出巧妙的區分，卻一方面為「馬克思主義婦女解放理論」在新的話語環境中重新找到定位，保住太歲，另一方面則讓「馬克思主義婦女理論」能夠自「馬克思主義婦女解放理論」的話語牢籠中釋放出來，騰出空間，正式迎接「婦女學」的進駐，與之接合，成就新的「馬克思主義婦女學」。

以上提及的那一種巧妙的區分，其實也見諸第三次全國婦女理論研討會的若干討論之上。1991年9月23日至25日，全國婦聯在北京召開了以「馬克思主義婦女觀在中國的實踐與發展」為主題的第三次全國婦女理論研討會。在內容方面，是次研討會分別討論了六個議題：(一)馬克思主義婦女觀在中國的傳播；(二)馬克思主義婦女觀在中國的發展；(三)馬克思主義婦女觀的內涵；(四)新時期如何進一步發展馬克思主義婦女觀；(五)婦女參政問題；(六)婦女就業問題。³⁰ 很

³⁰ 白立君著：〈馬克思主義婦女觀在中國的實踐與發展(上)——第三次全國婦女理論研討會綜述〉，《中國婦女報》，1991年10月11日，第三版；陳新欣、古剛著：〈馬克思主義婦女觀在中國的實踐與發展(下)——第三次全國婦女理論研討會綜述〉，《中國婦女報》，1991年10月18日，第三版。

明顯，這一個主題是對當時的中共總書記江澤民在 1990 年發表的「三八講話」，號召「全社會共同樹立馬克思主義的婦女觀」的具體回應。³¹

除了首兩個有關婦女運動史研究的專題外，是次研討會的內容，其實主要集中在(一)現實中的具體婦女問題；(二)馬克思主義婦女觀的內涵，以及如何在新時期進一步發展馬克思主義婦女觀等問題之上。關於馬克思主義婦女觀的內涵，會上有一種觀點認為，馬克思主義婦女觀就是馬克思主義關於婦女解放的學說。但在會上卻有另有一種觀點不同意以上的看法，認為馬克思主義婦女觀是：(一)關於婦女解放、實現男女平等的思想武器，是用辯證唯物主義、歷史唯物主義觀察、分析婦女問題，指導婦女解放運動；(二)馬克思主義者對婦女與婦女問題的根本看法。³²

至於馬克思主義婦女觀的核心問題，有一種觀點為是婦女解放；但有另一種觀點卻認為，馬克思之前已有人提出婦女解放的要求，現代西方女權運動也主張婦女解放，故馬克思提出的男女平等觀點，才是馬克思主義婦女觀的核心問題所在，以區別於非馬克思主義的婦女觀。此外，也有一種觀點認為婦女觀是觀察、分析任何社會的婦女問題的最基本觀點，具有延續性，而婦女解放理論要解決的是婦女受壓迫的社會問題，具有階段性，所以馬克思主義婦女觀的內涵顯然比婦女解放理論廣闊，把馬克思主義婦女觀的核心歸結為婦女解放，也就顯得不科學。另外，也有一種觀點認為馬克思主義婦女觀的核心是「性別覺悟」，但有另一種觀點卻認為此一概念容易混淆馬克思主義婦女觀的社會性與階級性。³³

³¹ 胡新穎、張艷霞著：〈新中國 50 年婦女研究綜述〉，李秋芳主編：《半世紀的婦女發展——中國婦女五十年理論研討會論文集》，頁 565。至於江澤民「三八講話」的出現，根據全國婦聯副主席黃啓琮的複述，則似乎跟 1989 年六四後中共在意識形態上的收緊有關，具體情況可參考黃啓琮著：〈談談婦女問題〉，《中國婦女研究年鑑：1991-1995》，頁 8-9。

³² 白立君著：〈馬克思主義婦女觀在中國的實踐與發展(上)——第三次全國婦女理論研討會綜述〉。

³³ 同註 32。

從以上有關馬克思主義婦女觀的內涵以及核心問題的討論，我們發現，人們也對「馬克思主義婦女觀」與「馬克思主義婦女解放理論」，作出了區分，為馬克思主義婦女觀打開了話語的空間。無論把馬克思主義婦女觀的核心問題，設定為馬克思所提出的男女平等觀點，還是馬克思主義用來觀察、分析任何社會的婦女問題的最基本觀點，論者都對「馬克思主義婦女觀」、「馬克思主義婦女解放理論」兩者作出概念上的分離，讓「馬克思主義婦女觀」得以鬆脫「馬克思主義婦女解放理論」的話語束縛。

儘管在是次研討會中，「要不要建立婦女學」再沒有成為一個被認為值得分開來討論的專題，與會者討論的重點是馬克思主義婦女觀，而非婦女學；但婦聯中不少接受了婦女學的婦女理論研究者當中，一直都有融合婦女學與馬克思主義婦女理論的嘗試(由丁娟等的嘗試，可見一斑)；所以筆者認為，在有關「新時期如何進一步發展馬克思主義婦女觀」的討論上，與會者對於如何透過專著、歷史、教材、工具書等建構與宣傳馬克思主義婦女理論之討論，在實質上，可算是對於此前有關建構中國婦女學的討論之延續。

就以同年出版、由山西省婦聯編的《馬克思主義婦女觀概論》(1991年)為例，對於「為什麼要研究馬克思主義婦女觀」的問題，它便曾經提到：「伴隨現代社會的發展和女性解放運動的演進，伴隨社會主義改革的深化和女性解放意識的提高，關於婦女問題的理論，無論在國外還是在我國，都正以前所未有的廣度和深度迅速發展。」它指出，婦女問題的研究已經走出一般性號召的階段，在理論和學術上開始了專門的探索，產生了婦女史學、婦女人類學、婦女文學等一系列新的研究領域。故此，**婦女問題已不僅僅是婦女解放的問題**，婦女問題的解決，也不單憑靠若干具體女性學科的研究可以完成，所以必須在更高的層次上對婦女問題作出理論的概括與說明。此外，它又提到，伴隨著五、六十年代的西方女權運動，西方女權主義和相應的婦女研究，得到了相當的發展。它認為這一發展對於

婦女理論的研究，顯然具有相應的借鑑意義；但它又指出，當一些人將女權主義理論體系不加批判的硬搬過來，作為發展中國婦女理論的先驗性模式，則難免出現偏差。故此，「在婦女理論研究面臨如此錯綜複雜和具有較大難度的情況下，馬克思主義婦女理論的研究，便成為了一種客觀的必然和時代的需求」。³⁴

所謂「關於婦女問題的理論，無論在國外還是在我國，都正以前所未有的廣度和深度迅速發展」，就中國國內的情況而言，指的自然是自八十年代(尤其是 1986 年以來)開始展開的、有關建構中國婦女學的種種討論與工作。有趣的是，對於「馬克思主義婦女觀」與「馬克思主義婦女解放理論」所作的概念區分，也同樣出現在以上這一段對中國的婦女理論研究近況的概述與分析之中。既然馬克思主義婦女理論已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釋放，結合八十年代以來種種有關建構中國婦女學的討論與工作成果，重申馬克思主義婦女理論的研究，也同時意味著馬克思主義婦女理論本身重大的話語重構。

在九十年代的後八九政治時空，對應於江澤民的「三八講話」，重申馬克思主義婦女理論或馬克思主義婦女觀自有其現實的需要，但更重要的是，透過如此的重申，中國婦女研究者得以保住她/他們自馬克思主義婦女理論的內部，所努力擴展與開拓的相對獨立的話語空間。而這樣的話語重構，無疑為九十年代中國婦女研究打開了進一步接受女性主義話語的空間。³⁵

第二，就算婦女學被人們接受，它一般都會被**非政治化**，略去其原來的西方意識形態背景(部分來自資產階級意識形態)及其政治性(女性主義)，**突顯婦女學的「學科」性質與社會工作實務性質**，丁娟、童瞳等便把這種取向歸結得更為乾脆：**婦**

³⁴ 陶春芳主編：《馬克思主義婦女觀概論》，北京：中國婦女出版社，1991 年，頁 4-5。

³⁵ 有關九十年代中國婦女研究對於女性主義話語進一步接受的情況，見本文第四至五章。

女學是一種科學的理論與研究方法³⁶。或許，婦女學跟馬克思主義婦女理論在意識形態背景上互相對立，但作為一門科學，它卻被認為可以跟馬克思主義婦女理論互通有無，並發揚光大和豐富馬克思主義婦女解放理論的科學成果。值得注意的是，在非婦聯系統的婦女研究工作者中，這一種傾向就更為明顯，本文將於下一節對此作出更詳細的交待。可以這麼說，在改革開放的現代化過程中，**婦女學同時也被視為現代性本身的一部分**。吊詭的是，現代化既為中國帶來了種種的婦女問題，但與同時，現代化也為中國婦女研究界帶來了婦女學，而這一件強而有力的武器有一個別名，叫「賽小姐」。³⁷

就以《馬克思主義婦女觀概論》為例，它便以整整一章討論了馬克思主義婦女觀與西方女權主義理論的關係。如前所述，婦女學是西方六十年代女權運動與女性主義的直接產物，而就該書的這一章的具體內容而言，除了詳細介紹西方女權主義理論的產生背景與具體內容，指出馬克思主義婦女觀與西方女權主義理論的聯繫與區別，³⁸ 更主要的恐怕是：提出如何正確認識和把握兩者的關係，「在對女權主義理論批判吸收的基礎上發展馬克思主義婦女觀」³⁹，那些被視為有益於發展馬克思主義婦女觀的女權主義理論的成份，正正是六十年代以降西方婦女學的具體研究成果。⁴⁰

固然，《馬克思主義婦女觀概論》一書充分體識到西方女權主義理論本身的意識

³⁶ 丁娟著：〈我國婦女學科體系研究狀況〉，熊玉梅、劉小聰、曲雯主編：《中國婦女理論研究十年》，頁 195；童瞳著：〈中國應該有婦女學——與羅琮同志商榷〉，《社會報》，1986 年 3 月 25 日，第三版。

³⁷ 在大力提倡「民主」與「科學」的五四年代，人們依二詞的英文 democracy 與 science，把二詞音譯為「德先生」與「賽先生」，自此「德先生」與「賽先生」二詞，便在近代中國不逕而走。但「德先生」與「賽先生」二詞的性別是明顯不過的，因此對應於中國當代婦女研究的科學主義傾向，筆者把她/他們心目中的婦女學大胆稱作「賽小姐」。

³⁸ 陶春芳主編：《馬克思主義婦女觀概論》，頁 240-267。

³⁹ 同註 38，頁 267。

⁴⁰ 根據《馬克思主義婦女觀概論》一書，這些成果包括：（一）西方女權主義理論的操作性、具體性研究方面的細緻性；（二）西方女權主義理論貼近女性生活，探討女性特點；（三）西方女權主義理論近二百年的實踐，為馬克思主義婦女理論的形成與發展提供了研究基礎與經驗教訓；詳情見陶春芳主編：《馬克思主義婦女觀概論》，頁 268-269。

形態背景(部分來自資產階級意識形態)，並指出西方女權主義理論與馬克思主義婦女觀在意識形態上的關鍵區別，但它更強調的恐怕是：西方女權主義理論/婦女學在把握婦女現狀的理論有效性，及其對具體婦女工作與婦女解放運動的指導性，而西方女權主義理論/婦女學正正在這兩方面補充了馬克思主義婦女觀的不足。⁴¹ 此外，在如何正確認識及吸取女權主義理論的合理成份的問題上，它認為存在著「兩種極端主義的錯誤傾向」。一種是對女權主義理論全盤肯定的態度，企圖以女權主義理論指導婦女解放運動；另一種則對女權主義理論持全盤否定的態度，認為女權主義不過是資產階級知識女性的鬥爭形式，與無產階級的婦女解放運動毫無關係。它指出後一種傾向：

片面地認為女權主義運動是資本主義國家的資產階級的女性運動，忽視了女性在階級社會中始終處於被壓迫地位，她們的鬥爭對人類的解放是有益的這一事實，忽略了女權主義者追求沒有性別壓迫的男女平等的理想社會與馬克思主義要消滅一切剝削和壓迫的理想是相一致的事實。⁴²

並否定女權主義理論對把握婦女現狀的理論有效性，以及對具體婦女工作與婦女解放運動的指導性。該書認為：「從這一意義上說，如同對於任何事物簡單的全盤否定都難於成立一樣，全然不承認西方女權主義理論的可取之處，也是不科學的。」⁴³ 由此可見，婦聯在九十年代初對婦女學進一步的理論探源中，更傾向於接受婦女學本身的**理論性與社會工作實務性質**。

其三，跟一部分非婦聯系統的婦女學的學術取向相比，**婦聯系統的婦女學更傾向以婦女問題、婦女的社會屬性作為研究對象**；箇中的原因，其實也不難理解：面

⁴¹ 根據《馬克思主義婦女觀概論》一書，這些不足包括：(一) 馬克思主義認為消滅私有化和剝削，使家務勞動社會化，是婦女解放的必要客觀條件，卻輕忽了西方女權主義所重視的婦女自我覺醒等主觀條件；(二) 馬克思主義認為婦女受壓迫的根本根源是私有制經濟，卻輕忽了西方女權主義所重視的如傳統思想文化等更隱蔽更深刻的因素的作用；(三) 馬克思主義對西方女權主義內部的發展不夠關注，輕忽了其中社會主義女權主義、馬克思主義女權主義等等的實踐成果；詳情見陶春芳主編：《馬克思主義婦女觀概論》，頁 269-271。

⁴² 陶春芳主編：《馬克思主義婦女觀概論》，頁 272。

⁴³ 同註 42，頁 273；按：重點為筆者所加。

對改革開放時期接踵而來的種種婦女問題，全國婦聯的其中一項重要職能，正是透過調查、研究與其他活動，探討研究相應的解決對策與方法，為決策部門提供政策依據；如前所述，加上婦聯組織在後文革的危機中，亟需重建自身的認受性，作為號稱代表了廣大婦女利益的婦聯組織，在婦女學的開拓中，自然選擇了更具現實意義的「婦女問題」作為研究對象。儘管在九十年代初，對於婦女學的研究對象，應為一切跟婦女相關的研究議題，還是「婦女(的社會)問題」，尚有爭議；⁴⁴ 但就中國婦女學在九十年代的具體發展而言，最終似乎是「婦女問題」派勝出了(具體情況詳見第四章)。或許，因為「婦女問題」更傾向強調的是婦女的社會屬性與時代問題，「婦女問題」往後在婦聯系統(以至非婦聯系統)的婦女學領域中的當道，正正為中國婦女學在九十年代中對 gender(社會性別)概念所作出的廣泛接受，提供了有利的接受環境；而 gender 最終以「社會性別」的譯法得以在中國婦女學界廣泛流通，筆者認為正正跟以上的取向對「婦女(的社會)問題」的強調有關。至於中國婦女學界對 gender(社會性別)概念的接受情況，本文將於第四章另作交待，故此暫且按下不表。

總之，儘管在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初，婦聯系統對婦女學的接受是有條件的，但它卻無疑為中國婦女研究往後的發展劃出了一片相對獨立的領地，讓婦女研究新舊話語之間的過渡得以完成，並向前推進，迎戰九十年代中期以後因進一步全面市場化而產生的種種婦女問題。

社會主義本身就是一項現代化工程

正如筆者在第二章所言，中國八十年代的婦女理論研究工作者，儘管在理論立場上千差萬別，甚至南轅北轍，但對於現代性，卻多多少少分享著十分類近的想像。

⁴⁴ 王曉瑜著：〈十年婦女解放基本理論研究概述〉，熊玉梅、劉小聰、曲雯主編：《中國婦女理論研究十年》，頁 307。

雖然中國八十年代以來的再度現代化，首先為中國廣大婦女帶來的，正正是因改革開放而來的種種「婦女問題」，但現代化本身所夾帶的種種進步想像，卻無疑為當時仍然處於「後發」階段的中國國民，提供了無限的憧憬空間。

我們知道，現代性的其中一個標記，正是「直線式進步史觀」對古典「循環式史觀」的替代；⁴⁵ 而對於婦聯系統的婦女理論研究工作者來說，歷史的發展也往往被視為一個直線式的進步歷程。《馬克思主義婦女觀概論》一書的〈緒論〉便曾經指出：

人類社會的發展，不管其道路多麼曲折，總是向著高度的物質文明和高度的精神文明的方向發展，向著最大限度地調動一切人的積極性，使一切人都能充分發揮自己的創造力，也就是向著普遍解放的方向發展，婦女的解放有著深刻的社會意義，它是社會普遍解放的尺度。⁴⁶

相當明顯，〈緒論〉對歷史的想像也是直線進步論式的，社會主義更被視為人類普遍解放的樞紐，這對於婦女解放來說，尤其如此，因為：「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在人類社會歷史上第一次為婦女的真正解放，提供了現實發展的可能性」⁴⁷；而馬克思主義則是「人類普遍解放的理論，也是婦女解放的理論。」⁴⁸ 可以這麼說，在婦聯系統的婦女理論研究工作者看來，社會主義本身就是一項現代化的工程，也是現代性的其中一項標記，它為人類帶來了普遍解放，也為婦女帶來了真正的解放。儘管婦女解放在社會主義的實踐發展中面臨著一系列的問題(其中突出和集中地表現為如何使社會主義制度同婦女解放的實際進程得到較好的結合)，改革開放使婦女問題變得更突出與複雜，但對於她們來說，社會主義本身

⁴⁵ Reinhart Koselleck, "Historia Magistra Vitae: The Dissolution of the Topos into the Perspective of a Modernized Historical Process", in *Futures Past: On the Semantics of Historical Time*, translated by Keith Tribe,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 London: MIT Press, 1985, pp. 21-38.

⁴⁶ 陶春芳主編：《馬克思主義婦女觀概論》，頁 1。

⁴⁷ 同註 46，頁 3。

⁴⁸ 同註 46，頁 1。

才是這些問題的根本解決道路。⁴⁹ 作為中國現代化工程的主要開展場域，社會主義的制度固然有待完善，但社會主義本身卻同時被視為這項浩大工程背後的主要歷史動力。

可以這麼說，在文革結束後不久的歷史時空，雖然一個深刻的社會變革(改革開放)已經肇始，但對於中國八十年代的婦女理論研究工作者來說，她們所首要面對的，恐怕並不是公然的性別歧視或針對女性的社會放逐(因為她們大都尚置身於社會主義體制所造就的女人於政治、經濟、法律層面上的男女平等之中)，而是毛澤東以至文革時代所提倡的「男女都一樣」意識形態以及形式主義式的絕對性別平等。對於她們來說，這一種中國社會主義史上的「歷史偏差」，在取消性別的同時也取消了人的個體性，但更重要的是，它對在現實中實際存在的新舊「婦女問題」(由早已存在的婦女「雙重負擔」問題到改革開放年代所出現的種種新的「婦女問題」)，構成了某種話語的遮蔽。而透過對婦女學的初步接受與建構，中國八十年代的婦女理論研究工作者正正希望打造一個相對獨立的話語空間，糾正以上的「歷史偏差」，讓婦女、婦女問題等性別議題得以自階級的問題分離，在人們的認知與分析視野中浮現。

然而，以上「歷史偏差」的存在，並無損中國八十年代的婦女理論研究工作者對於作為現代化工程的中國社會主義本身的相信。因為對於她們來說，社會主義既已然構成了她們現實生活的實際環境，同時也為「婦女的真正解放，提供了現實發展的可能性」。⁵⁰ 更加酷烈的現實還沒有到來。

⁴⁹ 陶春芳主編：《馬克思主義婦女觀概論》，頁3。

⁵⁰ 同註49，頁1。

第二節：「婦女學」作為一種科學方法，「女性主義」作為一種文化批判

如前所述，對於婦女學(以至女性主義話語)在中國八十年代的初步接受與建構，相對於婦聯系統，學術界也在期間發揮了相當重要的角色。事實上，自八十年代中期以來，便開始陸陸續續出現了好一些自發性的婦女民間學術研究團體，其中包括活躍於高等院校的學術沙龍以及社會性的學術組織。

1985 年，河南省未來研究會婦女學會在鄭州成立，創辦人是當時任教於鄭州大學中文系的李小江。同年 8 月，婦女學會召開了全國「婦女研究訊息交流會」，來自史學、法學、政治學、社會學、教育學、文學、語言學、心理學、醫學和性學等不同領域的學者，在會上分別介紹了各自學科內國內外有關婦女研究的情況、個人的研究成果與計劃，算是民間首次就婦女研究所作出的較大規模的跨學科學術交流活動。

同年 9 月，北京外國語學院婦女學研究會在北京正式成立。婦女學研究會是由幾位中外教師發起的，活動形式主要是沙龍，每兩周一次，討論題目則包括：國內外婦女的情況、女性如何看待自身與社會、女性學在中國的建立等。

在長沙，則有知識婦女組成婦女問題探討會，對婦女理論問題進行綜合探討，其中包括：女性在商品經濟活動中的競爭力、女性的就業困難、女大學畢業生就業分配困難、愛情與婚姻等。探討會後來還自籌資金，於 1988 年創辦了小報《女界號》，探討婦女問題。

1987 年 5 月，婦女學研究中心正式在鄭州大學成立。這是在河南省未來研究會婦女學會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創辦人與中心的主任同樣是李小江。中心的宗旨是利用課題研究的形式，組織國內婦女研究的學術力量，為研究者提供相關訊息，促進有關婦女的研究，並驅使婦女研究儘快走上學科建設的道路。同年 7 月，中

心與河南《婦女生活》雜誌合辦了「婦女學學科建設座談會」，被邀參加座談會的則主要是來自各科研單位和高校中從事婦女研究的學者。此外，美國與聯邦德國的女學者也聞訊參加了會議。1990年初，中心還舉辦了「中國婦女社會參與與發展研討會」，集合國內學術界、教育界、新聞出版界、婦女幹校系統、婦聯系統等有關研究人員以及港台、國外的一些從事婦女研究的學者，從中國婦女的現狀、中國婦女研究的專題和課題等進行了交流。

1988年，婦女問題沙龍在北京大學成立，主持人是當時北京大學歷史系副教授、中國美國史研究會副會長齊文穎。沙龍每隔周二、三在北京大學圖書館舉行，研討的題目包括：婦女就業、中國婦女史、五四以來的中國婦運與婦女生活、馬克思與恩格斯的婦女解放思想等。

同年，中央黨校部分師生成立了「中央黨校婦女問題研究會」。該會主要以社會主義婦女解放理論，改革中的婦女問題(例如經濟改革中出現的「婦女回家」現象)作為自己的研究重點，並在《中國婦女報》發表一系列的學術論文，引發討論。天津師範大學的杜芳琴、閔冬潮等則組織了「婦女歷史與現狀」研究組，研究範圍包括：中國婦女史、國際婦運史、婦女的政治參與、發展中國家婦女的比較研究等。

此外，上海復旦大學的婦女問題研究小組、汕頭大學的婦女之聲、上海婦女沙龍、北京管理科學院婦女研究所等民間婦女研究學術團體，亦分別陸續於各地成立，以上所述，不一而足。⁵¹

可見，除了關心婦女問題以及個別地從事婦女研究外，跟婦聯系統相像，中國學

⁵¹ 劉今秀著：〈民間婦女學術團體一覽〉，熊玉梅、劉小聰、曲雯主編：《中國婦女理論研究十年》，頁 580-584。

界早在八十年代中已有人提倡婦女研究的學科化建設，其中像李小江(詳後)、杜芳琴(見本文第四章)等學者，更成為了日後中國婦女研究的學科化建設的靈魂人物。然而，相對於婦聯系統，八十年代的中國學界又是在怎樣的語境下，開始陸續成立自發性的婦女研究學術組織，並對婦女學(以至女性主義話語)進行初步的接受與建構？

若我們回到中國八十年代初的社會文化的歷史時空，我們會發現：除了人道主義話語在人文思想界的當道外，對於中國學界的婦女研究學者來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隨著意識形態環境的鬆動，而在整個中國社會出現的一場更為廣泛的思想解放運動(人道主義思潮也是其中一個重要的構成部分)，也同樣重要。

文革結束後不久出現的這一場思想解放運動的文化標誌之一，是七十年代末突然迸發的外國哲學、尤其是文學作品的「翻譯熱」，在很短的時間之內，由文藝復興到二十世紀的歐美人文、哲學、社會科學理論以及文學作品，不同時代、不同領域以至不同流派의思想和作品都差不多是「同時」湧入國門，對當代中國當代文化構成了自五四以來所僅見的第二次重大的西學衝擊，而這正為八十年代的人道主義思潮、八十年代中的「文化熱」的出現，提供了最重要的文化基礎。⁵²

正如賀桂梅所言，在整個八十年代，當代人文思想界的主導潮流是對毛澤東時代(尤其是文革時代)社會主義主流文化思想的批判，而其中一個時代主題是對以五四為代表的「啓蒙」主題的宣揚，並潛在地把毛澤東時代等同於五四運動之前的前現代封建歷史，進而將八十年代視為上承五四運動的新的「啓蒙」時代，從而

⁵² 「文化熱」是中國八十年代人文思想界興起的重要文化運動之一，其中以(一)提倡「科學精神」的「走向未來叢書」編輯群(以金觀濤為代表)、(二)以引介歐陸人文、哲學主要著作為目標的「文化：中國與世界」系列叢書的編輯群(以甘陽為代表)、(三)以弘揚固有的優秀中國傳統文化為宗旨的「中國文化書院」(以湯一介為代表)等形成了三股最主要的推動力量。詳情可參考陳來著：〈思想出路的三動向〉(1987年)，甘陽主編：《八十年代文化意識》，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頁541-547；Wang Jing, *High Culture Fever: Politics, Aesthetics, and Ideology in Deng's China*,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6), pp. 37-117.

為八十年代的中國現代化提供歷史依據。⁵³

對於「啓蒙」主題的強調，正如戴錦華所言，反映在中國八十年代的思想與文化上，則體現為對「科學」(以自然科學為代表)的高度宣揚，正正是科學「為『啓蒙』賦予了具體內涵」。⁵⁴ 這或許可以部分解釋中國學界的部分婦女研究學者(例如本節往後將會討論的李小江)，在有關中國婦女研究學科建設的討論中，為什麼會如此強調婦女學本身的科學性格，以及這種對科學的「強調」本身的特定文化批判意涵。或許，正正是在這種時代氛圍的引領下，促使了中國學界的部分婦女研究學者，開始把中國婦女研究的學科建設提上議事程，加上婦聯系統差不多在同一時期所提出的婦女學學科建設議程，讓中國在八十年代踏上(在某種意義上)至今未竭的「婦女學的黃金時代」。

我們知道，對於一門學科的學科建設來說，有系統的學術出版是一個不可或缺的重要環節。事實上，在八十年代初至九十初這一段期間，婦女研究界亦開始注意透過出版，較有系統的引介與發表國內外婦女研究的成果，例如北方婦女兒童出版社出版的「婦女理論叢書」和李小江主編的「婦女研究叢書」；而其中尤其以「婦女研究叢書」最具影響力，本章餘下的部分，便將以該叢書的其中兩本重要著作——李小江的《夏娃的探索——婦女研究論稿》(1988年)與孟悅、戴錦華的《浮出歷史地表——現代婦女文學研究》(1988年)——作為代表個案，從兩個側面，探討學界的婦女研究對於婦女學(以至女性主義話語)初步的接受與建構情況，並指出其中不同的論述在性別政治、文化批判性格以及對於現代性的文化想像之細微差異。

⁵³ 賀桂梅著：《人文學的想像力：當代中國思想文化與文學問題》，開封市：河南大學出版社，2005年，頁17-25，34-53。

⁵⁴ 戴錦華著：《隱形書寫：90年代中國文化研究》(1999年)，江蘇省：江蘇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二版)，頁46-48。

之所以選擇以李小江的《夏娃的探索——婦女研究論稿》與孟悅、戴錦華的《浮出歷史地表——現代婦女文學研究》作為分析的切入點，是因為：(一)作為中國八十年代以降婦女研究界最重要與具影響力的學者與思想家之一，李早在八十年代中期已力主與開始落實中國婦女學的學科建設，並於《夏娃的探索》一書，初步提出了其「有性的人」的婦女/性別理論、對於中國婦女學的整體定位，以及她心目中的婦女學的體系架構，⁵⁵ 以《夏娃的探索》作為切入點，也就順理成章。但由於筆者已於第二章詳細交待了李小江有關「有性的人」的婦女/性別理論，故此本章將會把焦點集中在她有關中國婦女學的論述，看看另一套有別於婦聯系統的、對於中國婦女學的定位和建構。

(二)至於《浮出歷史地表——現代婦女文學研究》一書的重要性與影響力，就更是家喻戶曉(起碼在婦女研究與婦女文學研究界內)，書名中「浮出歷史地表」一語，更是不逕而走，在自覺或不自覺間，成為了不少當代婦女研究與婦女文學研究著作的口頭禪，其重要性與影響力，亦可見一斑。然而，選擇以《浮出歷史地表》作為另一代表個案，恐怕更主要還是因為：雖然孟悅和戴錦華在《浮出歷史地表》中並沒有直接討論婦女學，但從該書對女性主義、拉康(Jacques Lacan)的心理分析與阿爾杜塞(Louis Althusser)的結構馬克思主義等理論話語的綜合挪用，相對於李小江所主張的那種充滿了人道主義話語色彩與科學主義味道的馬克思主義婦女學，我們可以清楚看到孟戴二人如何另闢蹊徑，早在八十年代中後期，即以結構主義的理論話語為利器，透過現代婦女文學的個案，把婦女研究轉化為一種指向國家以至資本主義的文化批判。跟李小江相似，孟戴二人在《浮出歷史地表》中均把「父權」視為頭號的批判對象，但跟李略為不同的是，孟戴二人並不認為父權體制已經隨著社會主義解放運動的到來而大體消失，父權體制

⁵⁵ 其實，李小江早在1986年已於〈馬克思主義婦女學的體系架構〉一文中，初步提出了她心目中的婦女學體系架構，而《夏娃的探索》中的相關部分，則是在〈馬克思主義婦女學的體系架構〉一文的基礎上的進一步發展；見李小江著：〈馬克思主義婦女學的體系架構〉，《中國婦女》，1986年第9期，頁8-10。

的殘餘會隨著馬克思主義的進一步發展而被清除，與此相反，她們認為**社會主義解放運動以後的所謂新國家政體，不過是父權體制的某種延續**。可以這麼說，《浮出歷史地表》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它早在八十年代中後期，已把性別政治的文化批判矛頭尖銳地指向國家本身以及性別以外的其他領域，比同代的婦女研究工作者，先行了不知多少步。

此外，透過現代婦女文學的個案分析，《浮出歷史地表》一書亦**充分體認到資本主義與父權體制之間千絲萬縷的關係**，結合該書後結構主義式的文化批判進路，我們可以清楚看到**一種有別於歷史進步論的、有關現代性的文化想像**。難怪戴錦華在九十年代會轉向大眾文化的研究，因為市場經濟正接替國家意識形態的統領位置，透過大眾文化，與父權體制重新「接軌」，締造充滿了(性別與階級)不公義的虛幻盛世。由此可見，《浮出歷史地表》一書具有令人驚奇的前瞻性，它預示了九十年代初中期「人文精神」論爭以至九十年代末期新左派，對於大眾文化以及市場經濟的文化批判，所以值得回到它的文本，看看它對於中國現代性所可能具有的批判威力。

李小江：作為人類科學的「婦女學」

如前所述，早在八十年代中期，李小江已力主建設中國婦女學。⁵⁶ 李指出，中國解放以來，雖然隨著 1950 年新婚姻法與 1954 年憲法的頒布，婦女走出家庭，參

⁵⁶ 就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初的情況而言，關於中國婦女學的學科建設，除了在鄭州大學分別成立河南省未來研究會婦女學會(1985 年)與婦女學研究中心(1987 年 5 月)，召開全國「婦女研究訊息交流會」(1985 年 8 月)，與河南《婦女生活》雜誌合辦「婦女學學科建設座談會」(1987 年 7 月)，舉辦「中國婦女社會參與與發展研討會」(1990 年)，主編「婦女研究叢書」(1986 至 1992 年)，以及撰述和出版《馬克思主義婦女學的體系架構》(1986 年)、《夏娃的探索——婦女研究論稿》(1988 年)等論文與著作，提出自己的婦女學體系構想外，李小江早在 1985 年 9 月已在鄭州大學正式開設「婦女文學」課程，並於 1993 年 5 月正式成立只有短短一年壽命的鄭州大學國際友誼女子學院，是國內最早以科系的形式建設中國婦女學的學者。詳情見李小江著：《公共空間的創造》，李小江主編：《身臨「奇」境——性別、學問、人生》，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0 年，頁 3-38；李小江著：《告別昨天——新時期婦女運動回顧》，鄭州市：河南人民出版社，1995 年，152-162。

與社會勞動，在法律上與男性平權，其社會地位已大大提高，但這並不意味著現實中種種的婦女問題，已得到了完全的解決。首先，父權、男尊女卑等等舊的意識形態仍存在，八十年代初隨著計劃生育政策而出現的溺棄女嬰、虐待婦女現象，便是舊意識形態的重新抬頭的反映。其次，隨著中國改革開放的開展，婦女就業困難等新的婦女問題也相應出現。再者，既有的婦女工作與婦女理論研究之間脫節，根本無法觸及很多婦女問題的本質。由於婦女問題的現實壓力，人們開始意識到婦女理論研究的重要性。但李認為，這一種籲求在社會上的許多領域中並未引起足夠的重視，反映在學術領域，則是對婦女理論研究的普遍漠視，這一方面無形中影響到婦女解放的實際歷程，另一方面則掣肘了「**整個人類科學的系統化建設**」。⁵⁷

話語重構的政治：「婦女解放」、「婦女問題」與「婦女理論」

李小江又指出，具體而言，發展婦女理論研究的障礙，主要來自幾種存在於女界和學術界的偏見。首先，有一種觀點認為：「**理論研究與婦女實際問題相去甚遠**」，婦女理論根本無法指導現實中的婦女問題。但李認為，隨著婦女的職業化、知識化與現代化，自強的婦女已不再滿足於就事論事的宣傳，而是**要求對於自身的理性認識**，產生了深入開展婦女理論研究的籲求。⁵⁸

其次，有一種偏見則把婦女理論僅僅視為一種工具或手段，具體而言，即**把婦女理論和婦女解放等同**，或把婦女理論純粹看成婦女工作的工具，忽略婦女理論本身的學術性質及其在人類科學中的位置。在這一種偏見的影響下，不少知識婦女仍然把婦女理論和具體婦女政策等同，僅僅看作婦聯的專職工作，缺乏在學術領域轉向婦女研究的自覺；而理論界的男性更把婦女研究看成女人自己的事，將

⁵⁷ 李小江著：《夏娃的探索——婦女研究論稿》，鄭州市：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15-18。

⁵⁸ 同註 57，頁 18。

婦女研究「排除在理性科學之外」。⁵⁹

所以李小江認為，在深入進行婦女研究之前，有必要先搞清楚婦女理論與婦女解放運動之間的辯證關係。首先，她認為：「**婦女理論就是對婦女所作的哲學上的抽象。**」至於抽象的對象方面，「在實際運動中，婦女理論研究可以面對不同的對象，形成各種相對獨立的理論範疇。而**婦女解放**，作為實際運動本身，則是**婦女理論所面對的具體的對象之一。**」⁶⁰ 回顧歷史，婦女理論與婦女解放的發展同步，但並不同，二者互相關連，卻各自有著自身的發展軌跡：「對婦女運動來說，它的任務總是面對婦女的現實，以具體的措施和政策去推動婦女解放的實際進程。而婦女理論，則是以婦女的抽象為基礎，把握婦女運動的本質，在觀念上溝通『女人範疇』與其他社會範疇的關係。」⁶¹

李小江又指出，各門人類科學的理論建設，都有一個由簡單走向複雜、由現象走向本質、由分析走上綜合的過程。李引用馬克思的話指出：「人類始終只提出自己能夠解決的任務，因為只要仔細考察就可以發現，任務本身，只有在解決它的物質條件已經存在或者在形成過程中的時候，才會發生」，而「婦女理論作為一門複雜的、具有高度綜合性的研究課題，並不是古來即有，而是**人類高度文明、長足進步的結果，是世界性婦女解放運動的直接產物。**」⁶² 就歷史的軌跡而論，近代婦女理論的發展可以分為三個階段：(一)第一階段，由法國大革命至巴黎公社革命，人們提出了資產階級女權主義理論，代表中產階級婦女的利益，向傳統的男性中心社會要求婦女權利；(二)第二階段，由巴黎公社革命至第二次世界大戰，人們提出了無產階級婦女解放理論，強調婦女問題與無產階級的共同利益所在，敦促婦女投身社會革命，在人民解放運動中尋找真正的婦解出路；(三)第三

⁵⁹ 李小江著：《夏娃的探索——婦女研究論稿》，頁 19。

⁶⁰ 同註 59，頁 19-20；重點為筆者所加。

⁶¹ 同註 59，頁 21-22。

⁶² 同註 59，頁 20；重點為筆者所加。

階段，由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至今，不管是社會主義國家還是西方資本主義世界，婦女解放都已經得到不同程度上的實現，並帶來了一系列新的婦女問題：一方面是婦女走向社會，參與社會勞動，帶來了很多新的社會問題，另一方面是婦女角色變化與傳統價值的直接衝突，引發了六十年代西方的新女權運動。⁶³ 正因為當代的婦女解放為社會帶來了一系列新的婦女問題，它們又無法被傳統文明與經典科學所解釋以至解決，當代婦女理論研究也就相應而出，「在人類本體的認識框架上填補傳統理論中的重大空白，從而為人類科學的系統化建設提供了一個重要的契機。」⁶⁴

綜合以上李小江的論述，我們會發現：(一)跟婦聯相似，李也對「婦女理論」與「婦女解放」作出了概念上的區分；但跟婦聯相當不同的是，雖然李也體認到婦女解放/工作/政策需要婦女理論的支持，但在她的心目中，婦女理論並不是婦女解放或婦女工作的工具，反過來說，婦女解放只是作為人類科學的婦女理論的其中一項具體研究對象而已。有趣的是，李在這裡沒有乾脆放棄「婦女解放」的概念，而是在話語形構上，為「婦女解放」與「婦女理論」的關係，作出了巧妙的重新安排：跟婦聯剛好相反，李顯然把兩者的關係倒過來了，讓「婦女解放」收攝於「婦女理論」以至「人類科學的系統化建設」的大計裡。李曾經說過，「婦女理論」與「婦女解放」之間，存在著的是「辯證的關係」，但就她實際的論述來說，「婦女理論」的話語優位性卻似乎更為突顯。

(二)對於婦女理論，李小江有相當明確的界定，那就是：「對婦女所作的哲學上的抽象」。換言之，李更強調的是婦女理論的學術性質。與此同時，在李的心目

⁶³ 李小江著：《夏娃的探索——婦女研究論稿》，頁 20-21。

⁶⁴ 同註 63，頁 22；重點為筆者所加。此外，值得一提的是：李小江敏銳地察識到「婦女問題」以至「婦女理論」，對於傳統學術的各個領域在知識論上的根本挑戰，這顯然比九十年代中期才引入斯科特(Joan W. Scott)的〈社會性別：一個有效的歷史分析範疇〉的同行，在觀念上先行了許多步。有關李的相關論點，另可參考李小江著：《夏娃的探索——婦女研究論稿》，頁 75-78；斯科特的文章，則見李銀河主編：《婦女：最漫長的革命》，北京：三聯書店，1996 年，頁 151-176。

中，婦女理論的學科化，也是人類科學的系統化建設的其中一個重要契機。可見李的關懷主要還是婦女理論的學科性質，指向的是(女)人對自身的更深切的理解，與其時人道主義話語的時代籲求，可謂裡應外合、互相呼應。⁶⁵

(三)但李小江強調，這種對於「婦女理論」的籲求，卻並非事出無因：它本身正是「婦女解放」的結果。作為產生這種籲求的原因，婦女解放有主觀與客觀的兩個面向。在主觀的一方面，李認為，隨著婦女的職業化、知識化與現代化，婦女產生了對於自身更深入的理性認識的需求，故此產生了深入開展婦女理論研究的要求。在客觀的一方面，**正因為婦女解放為社會帶來了一系列新的「婦女問題」，舊的理論話語無法應對，當代婦女理論研究也就相應而出。**來到這裡，我們會發現：除了把「婦女解放」收攝於「婦女理論」以至「人類科學的系統化建設」的大計之下，李更進一步把「婦女解放」解釋成「當代婦女理論」產生之歷史動因，跟「婦女問題」組成了一道具有強烈的歷史目的論意味的因果鍊(婦女解放 → 婦女問題 → 婦女理論)，以証成「當代婦女理論」出現的必要性與必然性。

(四)故此，跟婦聯不同的是：李小江並不把「婦女問題」僅僅視為「婦女解放」的障礙；與此相對，李更傾向把「婦女問題」視為「婦女解放」的歷史結果，以及後者的真正實現的歷史契機。可見，同樣的概念(婦女解放、**婦女問題**、婦女理論)在李的「概念空間」的重構工程中，都取得了相當不同的位置與意義。

除了工具主義的偏見外，李小江又指出，發展當代婦女理論研究的主要障礙，還來自對馬克思主義的教條主義的理解：

不是用馬克思主義的方法去解析當代社會新的歷史現象，而是把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中的語錄，看作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具體到婦女問題，便是

⁶⁵ 關於李小江的思想跟八十年代的人道主義話語之間的關係，詳情見第二章。

片面地引用經典著作中關於「婦女解放」的現成結論，將特定歷史條件下婦女運動與階級鬥爭的關係看作永恒不變的定律，反對對婦女問題進行理論上的抽象。這種做法貌似「馬克思主義」，並且可以輕而易舉地用「反馬克思主義」去捧打不同意見，但本質上卻恰恰與馬克思主義的精髓——歷史唯物主義背道而馳，並且違背了科學的建設的基本方法——抽象法。⁶⁶

李小江認為，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經典馬克思主義著作中，嚴格來說，並沒有一本有關婦女的專著。他們有關婦女的見解主要表現在兩方面：一是人類學方面的研究，在起源的意義上考察婦女問題，確定婦女被壓逼的現象的歷史性；二是對空想社會主義婦女觀的肯定，即認為「婦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尺度」。但跟主張改良的空想社會主義不同，馬克思主義主張婦女與被壓迫的人民聯手，通過階級鬥爭，爭取自身的解放。因此，馬克思主義的經典理論中，婦女問題始終未能得到獨立的抽象，而是主要被看作階級社會中的一個具體現象而已，⁶⁷ 是其局限。

接著，李小江再次引用馬克思與恩格斯的話指出：「一切劃時代的體系的真正的內容都是由於產生這些體系的那個時期的需要而形成起來的」⁶⁸，而馬克思主義理論本身也不例外，有其歷史性以及時代的局限。李認為，時代不同了，我們必須揚棄「歷史的結論」，依照歷史唯物主義的方法，重新認識和解釋這個時代的新問題，更新與發展馬克思主義，即「促進整個人類科學的系統化建設和成熟。」

⁶⁹ 婦女理論屬於人類科學，也就同樣需要揚棄「歷史的結論」，依照歷史唯物主義的方法，對婦女問題以至婦女本身進行獨立的抽象，作系統的理論研究，從而使之科學化與學科化。⁷⁰

⁶⁶ 李小江著：《夏娃的探索——婦女研究論稿》，頁 26。

⁶⁷ 同註 66，頁 23-24。

⁶⁸ 同註 66，頁 24-25。

⁶⁹ 同註 66，頁 25。

⁷⁰ 同註 66，頁 25。

在這裡，李小江進一步從馬克思主義話語的內部，劃分了對馬克思主義的教條主義的理解以及科學的理解。有趣的是，李恰好透過對手(教條主義馬克思主義)所採取的相類策略，首先重新界定何謂真正的馬克思主義(科學的馬克思主義)，既將對手的論點收納在同一的話語中，同時又排除在此一話語現下的合法使用領域以外(因為時代不同了，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中有關「婦女解放」的現成結論已經過時)，然後從而取得自身論點的話語合法性。可見李所採取的「排除策略」，比她的對手所採取的更為機巧，配合她心目中的婦女理論以至人類科學系統化建設的大計，把所謂真正的馬克思主義，由經典著作中的一堆現成結論重新界定為一種科學方法，即抽象法。在這裡，回應中國八十年代的「新啓蒙」修辭，「科學」成為了一種重新劃定疆界的話語策略。

「婦女學」：有階級屬性，又沒有階級屬性？

李小江指出，伴隨著一門學科理論的成熟，建立一門新的學科，本是無可厚非的。但在中國，「婦女學」的概念卻出現在學科建設之前，故此難免引起爭議。對於「婦女學」的批評，一種來自婦女界，認為「婦女學」這一概念是伴隨改革開放而來，在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中並不存在，所以「婦女學」與「資產階級女權主義」是同義詞，跟社會主義互相矛盾。另一種批評則來自理論界，認為婦女問題早已包容其他社會問題中，傳統的學科早已足夠處理婦女問題，根本無需要對婦女進行獨立的抽象，並另立一門獨立的學科。⁷¹

對於第一種批評，李小江指出，「婦女學」作為一個科學概念，並沒有階級屬性。因此，它並不屬於資產階級範疇，跟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無關，而是「人類科學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⁷² 李復又指出，「婦女學」固然較早在西方的發達資本

⁷¹ 李小江著：《夏娃的探索——婦女研究論稿》，頁 26-27。

⁷² 同註 71，頁 27。

主義國家出現，是五、六十年代新女權運動的產物；但基於現實的壓力與時代的需求，西方的婦女研究才超越了階級的局限，較早地完成了對婦女的理論抽象。而且，經過了二十年的發展，婦女研究也逐漸擺脫了女權運動的局限，走上發展學科自律性的軌道。⁷³ 故此，「無論是『婦女研究』還是『婦女學』，這些概念本身是沒有階級屬性、也沒有中西之分的。」⁷⁴

此外，李小江又指出，在西語中並沒有使用「婦女學」這個概念，只有「婦女研究」(Women's Studies)這個總稱，把人文學科各個領域中有關婦女的研究統統囊括在內，它「既不是一本現成的教科書，也沒有形成一套完整的理論體系。」⁷⁵ 故此，問題的關鍵不在於概念(「婦女學」)之爭，而是在於不同的世界觀導致的不同的婦女理論，即婦女哲學的具體內涵。有多少種世界觀就有有多少種婦女理論。李指出，正如歷史有資產階級的婦女理論，有中產階級的婦女理論，有存在主義的婦女理論，有新女權主義的婦女理論，也有馬克思主義的婦女理論，因為馬克思主義也是一種世界觀。而「作為馬克思主義哲學體系中的婦女理論，也將是一個開放的結構。它也必須運用歷史唯物主義的方法，吸收歷史的營養，揚棄歷史的糟粕，科學地認識和把握婦女的存在和發展，並以此為指導，去建設馬克思主義婦女學。」⁷⁶

我們知道，「婦女學」原本是 Women's Studies 的其中一個中譯(另一個是「婦女研究」)，而李小江所理解的「婦女學」的含意(具有套完整理論體系的婦女學)，亦包含在 Women's Studies 這一概念原來的含意之中；但有趣的是，李卻透過概念上有意無意的誤解或誤置，巧妙地把 Women's Studies 的概念一開為二，一方面指作為人類科學、而且並無階級屬性的「婦女學」或「婦女研究」，另一方面

⁷³ 李小江著：《夏娃的探索——婦女研究論稿》，頁 27-28。

⁷⁴ 同註 73，頁 29。

⁷⁵ 同註 73，頁 29。

⁷⁶ 同註 73，頁 29-30。

則指作為不同世界觀的產物的「婦女理論」。作為一種世界觀的產物的馬克思主義理論，自然有它的政治以至意識形態的取態，但這卻無礙馬克思主義婦女學本身的科學成份。在這裡，我們清楚看到，李首先如何透過突顯「婦女學」的科學性格，將「婦女學」去政治化、去意識形態化，然後又把不同的婦女理論理解為不同世界觀的產物，讓原本就充滿了強烈意識形態取向的馬克思主義，得以跟作為人類科學的「婦女學」順利接合成具有「一個開放的結構」的「馬克思主義婦女學」。

但歷史上具體的婦女研究，到底又是如何或如何可能超越自身的階級屬性呢？如前所述，對於李小江而言，那是抽象法。

「抽象法」的文化政治

李小江曾經指出：「當代社會，隨著具有普遍意義的社會問題的上升，階級問題日益淡化，婦女運動也早已超出了階級的局限，成為各個國家、各個民族、社會各階層中普遍關注的問題」；⁷⁷ 不管「階級問題日益淡化」的說法是否真的對應現實，但可以肯定的是：李正正透過她所主張的抽象法，具體地淡化了婦女或婦女問題所可能具有的階級屬性，讓作為人類科學的婦女學取得相對的獨立性。換言之，對於李來說，抽象法既是一種科學方法，也是一種話語策略，讓婦女學取得存在的合法性。

首先，李小江從「人類」、「婦女」等兩個概念的關係指出：「婦女是人類的一部分，它的所有活動，都受制於整個人類的社會活動。但是，我們如果從人類入手，那麼，就只會得到一個關於人類總體的混沌表象。只有先對人類社會中的各部分進行抽象，在抽象的研究中，達到一個簡單的規定，然後，再從各部分的進程中

⁷⁷ 李小江著：《夏娃的探索——婦女研究論稿》，頁 79。

掉轉頭來，回到人類社會。這時候的人類，就不再是一個關於整體的混沌的表象，而是一個豐富的、由許多規定和關係形成的總體了。」⁷⁸

然後，李小江又指出：「婦女」從屬於「人類」，它的規定性必須在「人類」這個整體中得到確定；同時，正因為「婦女」是形成「人類」的許多簡單規定性中的一個一般，我們必須首先對這個一般進行抽象，才能更豐富地把握「人類」這個整體。對於李來說，這是馬克思主義婦女學的起點，也是馬克思主義婦女學的存在理由。⁷⁹

在這裡，透過抽象法，李小江在相當具體地把「婦女」自「人類」這個整體分離了出來的同時，在實際的效果上，也將「婦女」自「階級」分離了出來。當然，這一種分離之所以成立，必須以李上述的一系列話語策略為前設：透過突顯「婦女學」的科學性格、將「婦女學」去政治化、去意識形態的同時，也為「婦女」劃出了一片(在某種意義上)遠離「階級」論述的獨立領地。在這一片沒有階級屬性的獨立領地之上，透過抽象法，「婦女」既成為了科學認知的對象，也同時成為了得以(暫時)遠離現實中的階級政治的自由主體。因此，綜合以上對李有關婦女學的論述之分析，抽象法既是概念性的，也是政治性的；儘管它意欲遠離的，正是現實中的種種意識形態政治，為婦女學/婦女劃出一片相對獨立的疆土，任其自由馳騁。

《浮出歷史地表》：批判父權，批判國家，批判現代性

跟李小江的《夏娃的探索——婦女研究論稿》不同，孟悅和戴錦華在《浮出歷史

⁷⁸ 同註 77，頁 84。

⁷⁹ 同註 77，頁 85-88。李小江對於「一般」概念的使用，明顯出自馬克思主義的傳統，跟「特殊」構成了一對相對的概念。關於「一般」與「特殊」這一對概念的具體意涵，可參考本文第二章註 74。

地表——現代婦女文學研究》一書中並無直接討論婦女學，但從該書對女性主義、拉康的心理分析與阿爾杜塞的意識形態理論的綜合挪用，我們可以清楚看到孟戴二人如何將西方婦女研究的具體成果，轉化為一件犀利的文化批判武器，而矛頭主要指向的，正是二千年來歷久不衰的父權統治秩序。

一如書名的副題所示，《浮出歷史地表》一書所討論的，是中國現代婦女文學。除了緒論外，該書依中國現代婦女文學的發展年期分為三個部分：第一部分由 1917 至 1927 年，連同年代總論在內，共五章，討論了「五四」十年出現的廬隱、沅君、冰心、凌叔華等四位「五四」女作家；第二部分由 1927 至 1937 年，連同年代總論(兩章)，共分七章，討論了在三、四十年代崛起的丁玲、馮鏗、草明、白朗、羅淑、林徽音、蘇雪林、沉櫻、白薇、蕭紅等多位女作家；第四部分由 1937 至 1947 年，連同全書結語，共分三章，則討論了蘇青、張愛玲等兩位活躍於日戰佔領區的女作家。

父權是一切權力及統治的起源

如前所述，《浮出歷史地表》的其中一個主要的批判對象，正是惡名昭著的父權統治秩序。但對於該書的作者來說，父權的問題不單純是男女權力不平等或性別關係的問題，因為「歷史地看，父權與夫權不僅是人類一切權力及統治的表現形式之一，而且是一切權力及統治的起源」，「正是隨著性別之權和性別統治的出現，人類，或曰，民族近兩千年的歷史才成為一部統治與被統治的歷史。至少性別統治的出現意味著統治本身的出現。」⁸⁰ 而作為被壓迫的性別群體，女性自始至今都是這一個統治結構的歷史見證者，是「一切已然成文的歷史的無意識」。⁸¹ 換言之，作者不單對性別問題作出了女性主義式的批判，她們同時也把女性主義

⁸⁰ 孟悅、戴錦華著：《浮出歷史地表：現代婦女文學研究》(1988 年)，北京：中國人民出版社，2004 年(再版)，頁 3；重點為筆者所加。

⁸¹ 同註 80，頁 3-4。

的視角伸向體現於歷史上不同的統治形式和領域的統治結構本身，而在她們的眼中，父權體制正是這一個根本的統治結構的濫觴。

該書兩位作者認為，其實早在自給自足的農業社會年代，男耕女織的社會性別分工，已為日後父權統治秩序的出現製造了產生的條件。固然，她們同意這種分工或許出於自然及兩性的生理條件，但在父系社會取代母系社會之際，這一分工卻成為了男性佔有生產資料以及生產力的依據，並成為父權統治秩序的基礎。在父權統治秩序出現之後，層階化了的男耕女織的主輔結構，更導致了生產資料以及生產力的「父子相繼」，從而進一步鞏固已經建立了的父權統治秩序；而在這一個過程中，**家庭**正正是其中的關鍵性樞紐：中國古代的家庭不單是依據社會分工而結合的社會生產單位、因社會成員繁衍而擴大的單位，它更是父權社會將男耕女織與父子相繼統合為一個統治整體的「**國家機器**」。⁸²

作者認為，家庭打從誕生的一刻起，便是以男性為中心，體現的是一種嚴格的男性秩序以及男性同性同盟的統治原則；不過，家庭對女性的意義遠遠大於對男性，女性一生都受命於由父、夫、子組成的男性世代同盟，女性的本質與地位亦即她的家庭地位：女性，一方面因受困於家庭而被拒斥於社會以外，另一方面又被轉化為傳宗接代工具、妻、母、婦等父權統治秩序所可以接受的職能。作者指出，事情微妙之處在於：**男性社會透過家庭既把對自己的統治最具威脅的女性排除在秩序之外，同時又把女性轉化為可以接受的東西，重新納入秩序之內**。⁸³

作者又指出，父權統治秩序的確立，同時又做就了一個與之完全相應的意識形態體系：人倫。倫即主次、上下、尊卑、等級，它規定著君臣、父子、兄弟、夫婦、男女之間的主次、上下、尊卑的等級關係；而作為「五倫之始」的「夫婦之序」，

⁸² 孟悅、戴錦華著：《浮出歷史地表：現代婦女文學研究》，頁 4 -5。

⁸³ 同註 82，頁 5-7。

強調的正是女性的屈從：由「女」變「婦」，意味著，是女性自身主體的喪失。

⁸⁴ 至於父權社會的文化符號體系(例如語言)，則透過話語的陳述與踐行，將女性作為被強制客體化的事實遮掩，從而鞏固父權文化的唯一合理性。作者引用法國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家克莉絲特娃(Julia Kristeva)的理論指出，女性若要進入這一種為男性所把持的話語體系，一就是借用男性的語言、概念、立場，用男性規定的符號體系所認可的方式說話，即作為男性的同性進入話語；一就是用不言或異言來言說，用話語體系中的空白、縫隙與異常的排列方式來言說。⁸⁵

兩位作者認為，作為帶有特異性的符號體系的文學，也主要是男性的天地。雖然不同於道德倫理、法律條文那一類帶有強逼訓令性質的話語系統，男性作家筆下的作品，卻無疑更接近日常生活的性別觀念，展示了封建社會(的男性)如何對女性以至兩性關係作出種種的描述、想像、要求和塑造。⁸⁶

例如，古代中國文學中一種經常出現的修辭手法，即將所寫女性形象「品物化」，借物象喻女性外觀，便充分體現了父權話語體系的某種再現的宰制性。在古代詩詞中，「如花似玉」、「弱柳扶風」、「眉如遠山」等是常見的譬喻，但有時騷人墨客會乾脆略去所要形容的人身，逕直以物象取代之，於是纏足女子便直接以一雙帶著酒香的「金蓮」，踩著妙曼的「蓮步」，姍姍來遲。作者認為，這一個象徵化的過程不單洩露了男性欲望主體的性欲望，更加值得注意的是，那些用之於女性的物象，「並不都是那麼直接無諱的性象徵，它們是一些摻雜了過多文化雜質的物象，在其覆蓋下，女性在被視做性對象的同時被視為物對象——客體。」⁸⁷ 當女性被品物化為花、玉、弱柳或金蓮之時，其可攀可折可摘可把玩之意味，便隱然可見。在這裡，品物化不單表現了一種對女性的欲望，與此同時，它也借助物

⁸⁴ 孟悅、戴錦華著：《浮出歷史地表：現代婦女文學研究》，頁 7-10。

⁸⁵ 同註 84，頁 11-13。

⁸⁶ 同註 84，頁 13-14。

⁸⁷ 同註 84，頁 14。

象摒除了女性自身的欲望，故此它所表現的，更主要是男性的欲望權；而從心理分析的角度看，它的功能便主要在於撫慰父權社會裡的男性成員所普遍感受到的閹割焦慮。此外，透過品物化，父子們亦可以把作為他者的女性，納入自己的父權統治秩序。可以這麼說，女性惟有以客體-物的方式，成為「可把握」，始能被父權秩序所接受，獲得某種秩序內的安頓；否則，作為不甘為物的美麗女性，她們只會被描述為妖魅或令人怖慄的邪惡，古典小說《聊齋誌異》中「狐妖美女」的故事，便是其中頗具代表性的例子。⁸⁸

然而，這一種品物化的譬喻，尤其花草之喻，不單見用於描述女性，也常常見用於(男性)文人自身。例如，《離騷》中的抒情主角便時而是男性，時而又毫不掩飾地把自喻為女性，並用上一般象徵女性用的「花草之喻」自指，以寄寓作為臣子那懷才不遇的怨騷。跟把女性品物化的作品相似，在這一類男性作家以花草或女性自喻的作品中，總有兩種不變的角色，一為主體、駕馭者、使用者或賞識者，一為客體、服從被動者、待取用者。但孟悅和戴錦華認為：

重要的不在於性別混淆，而在於這種關係式中的性別角色是從不混淆的。無論是寄託芳草還是寄託女性，都表現了作者們對作為客體價值、待他人取也值得他人取的「物」的地位的認同，特別是對夫婦、男女兩項關係中那一從屬角色的認同，這角色自然是女性角色。⁸⁹

孟、戴由此進一步引申，從心理分析的角度指出：就以父子關係來說，只要存在父的權威，子似乎只能是一個非男性；而作為父子關係政治化的君臣關係中，面對唯一絕對的父親(君)，社會上所有的普通男性(臣)，無論尊卑，都只能是一個非男性。換言之，在父權的象徵秩序中，無論是兒子還是臣子，實際上都處於被閹割的地位。「在這種被閹割的心態下，士大夫文人們自喻女性是很相宜的，這

⁸⁸ 孟悅、戴錦華著：《浮出歷史地表：現代婦女文學研究》，頁 14-16。

⁸⁹ 同註 88，頁 17。

些女性形象不過是裝填了他們『陰屬』情感的載體而已。」⁹⁰

革命和解放以後：民族、人民或國家只是父權的延續？

這一種父子相繼的父權權力循環，直至「辛亥革命」以及「五四新文化運動」，才第一次根本地被動搖或打斷，而女性亦第一次從父權文化的無意識浮出歷史地表。在過去短短的一二百年中，作為性別群體的女性所遭遇到的變化，可謂翻天覆地：她們就在一世紀的時光中，「從法定的奴隸變成法定的主人，從物體變成主體，從他人的『他人』變成自己。」⁹¹

但正如作者所指出，中國婦解運動從一開始就不是以女性自身的性別自覺為前提的社會運動，婦女平等問題最初也是由近代史上對民族歷史有所反省的男性先覺者所首先提出的，後來又被新中國政府以法律規定下來。那麼，擁有平等權利的中國女性公民又在多大程度上享有解放意義上的自由和自主，並成為真正的主體呢？當然，從秋瑾的時代開始，中國便出現了一批真正代表新社會力量的女社會活動家、女演講家、女革命家，自二十世紀初始，亦出現了第一批女留學生、女科學家、女學者、女作家，而在概念譜系中也出現了「女性」這樣的概念和它所標誌的女性性別群體(有別於傳統中妻、婦等「從人者」的女子)，對父權統治秩序構成了根本的挑戰與反叛。⁹²

然而，父權統治秩序並沒有那麼容易死掉，它似乎沒有隨著革命的到來而徹底消失。事實上，當民族群體要打倒一個舊的父權秩序時，它與女性群體是站在同一陣線的。但當這一民族群體建立了新的統治秩序，而這新的秩序又帶有明顯的父權影子時，女性的利益和訴求便跟民族群體產生了分歧和衝突，於是她重新成為

⁹⁰ 孟悅、戴錦華著：《浮出歷史地表：現代婦女文學研究》，頁 18。

⁹¹ 同註 90，頁 23。

⁹² 同註 90，頁 24-27。

了被排斥者和異己，重新被放逐到解放以前的狀態。此外，隨著封建秩序的分解，資本主義式的都市市場亦日益正規化，而擺在女性性別群體面前的，除了是一個女性公民享有一定自由的公共空間外，同時也是一個不斷將女性商品化(品物化)的色相市場。換言之，**透過新的統治秩序和資本主義式的都市市場，父權秩序得以借屍還魂，甚至更上一層樓。**⁹³ 結果：

女性確確實實只剩下自我，她失去了一度擁有的社會關注，她的問題和反抗不再被社會接受，而她的反抗之聲在整個時代大潮中又是那麼微弱，甚至在某種意義上被主流文化所削弱。⁹⁴

之後，隨著新中國的建立，同工同酬、婚姻自主、男女平等法律、政策的出台，女性性別群體似乎最終取得了真正的解放。但孟悅和戴錦華卻認為，事實並沒有如此簡單。不錯，在新的政權下，女性不再是家長、丈夫、兒子等男性的從屬，但「從屬」卻似乎並沒有就此消失。「在以往家長式的父皇之位上，如今端坐的不是任何一個私有社會的個人，而是一個集體——民族群體的化身。」⁹⁵ 自此，女性的確不再從屬於男性，因為**她跟男性同樣從屬於一個凌駕一切個人之上的中性的集體**；在這一個集體面前，女性的確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平等權利，但代價卻是性別以至個體差異之消失。女性最終獲得了平等，卻同時失去了自由和自主。

至此，我們可以清楚看到《浮出歷史地表》之所以獨特之處。跟李小江相似，孟悅和戴錦華也同意人類從父系社會到前期資本主義的歷史，其實就是父權的歷史；而且也認為父權統治秩序的出現，與財產或生產工具/資料的佔有、父子相繼與家庭的制度的出現、人倫意識形態的建立有關；其結果是，女性在歷史上長期被封閉在家庭和氏族裡，沒有權利公開介入社會，參與生產活動和公共事務。

⁹³ 孟悅、戴錦華著：《浮出歷史地表：現代婦女文學研究》，頁 27-28。

⁹⁴ 同註 93，頁 28。

⁹⁵ 同註 93，頁 29。

⁹⁶ 然而，對於這一段漫長的父權歷史，《夏娃的探索》與《浮出歷史地表》卻從相當不同的角度出發，進行了各自的解釋。可以這麼說，李主要是從**歷史唯物主義與人道主義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視角，去解釋這一段父權歷史的。正如筆者曾在第二章所指出的，李在《夏娃的探索》中基本上仍然恪守經典馬克思主義中有關人類社會形態的發展軌跡的「五階段論」，並指出：「每一種社會形態的演變，都是因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所導致的生產關係發生變化的結果。」⁹⁷ 但由於在歷史上長期被排除在社會以外，雖然婦女的發展也經歷了五種社會形態，但這種經歷都是通過男人(父親或丈夫)在社會生產中的地位而間接發生的。若從婦女自身的**主體性與社會地位**的發展軌跡來看，婦女的發展在歷史上只出現過母系時代、奴隸時代和解放時代等三個劃時代的階段。至於孟悅和戴錦華，則主要綜合了**女性主義、拉康的心理分析與阿爾杜塞的意識形態理論**，嘗試解釋在父權的物質制度出現以後，父權統治秩序賴以維持下去的「**社會-心理動力**」**機制或意識形態基礎**。

但筆者認為，李小江與孟悅和戴錦華更根本的不同，主要在於兩者對於「父權」的性質和歷史，存在著相當不同的理解與評價。固然，兩者都沒有將父權的問題單純的化約為男女權力不平等或性別關係的問題，同時也把父權視為一種社會制度，甚至「國家機器」。然而，李卻明顯的把父權的歷史鎖定在人類文明的一個特定歷史時期(由父系社會時代至資本主義前期)，而孟和戴卻把父權視為歷史上所有權力及統治的起源。換言之，李從歷史唯物主義的角度出發，所企圖說明的，是歷史上某個特定時期的權力和統治秩序的父權性質，以及婦女在這種權力和統治秩序下的處境；而孟和戴則更希望點出一切權力和統治結構本身的父權本質，把女性主義引入到有關權力和統治本身的思考。

⁹⁶ 李小江的相關論述，見李小江著：《夏娃的探索——婦女研究論稿》，頁 43-48。

⁹⁷ 同註 96，頁 43。

連帶地，對於五四新文化運動與新中國政權，李小江與孟悅和戴錦華都有著相當不同的歷史定位與評價。跟李小江相似，孟悅和戴錦華也把五四運動視為中國婦女解放的起點。對於李來說，開始的時候，五四主要是一場反對帝國主義的青年學生愛國運動；但隨著形勢的轉變，這場運動很快便發展成為反封建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於是也就漸漸突出了婦女解放的問題。⁹⁸ 然而，李認為中國婦女解放運動的最大特點，卻在於它跟社會主義革命的結盟，她甚至斷言：「中國婦女在社會生活的每一個進步，都是傳播馬列主義和社會主義政策具體實施的結果——這就是中國婦女解放運動的最基本的特點。」⁹⁹ 所以，中國婦女解放運動在李的眼中：

既表現出婦女自我意識的覺醒，又體現出民族意識的覺醒；它既突出了婦女問題，又把婦女問題納入全民性的社會問題；它既強調了婦女的特殊利益，又將婦女運動與勞工運動、與階級問題聯繫起來；它既向現存社會呼籲人權，要求男女平等，又尖銳地揭露了當時社會的腐朽，將婦女解放與實現社會主義聯繫在一起。¹⁰⁰

跟孟悅和戴錦華不同，李小江明顯地把中國婦女解放運動與社會主義革命的關係，理解為互相助長的關係；但在這一個關係中，社會主義革命仍然佔有主導的地位：中國婦女解放運動被認為是社會主義革命的直接產物；¹⁰¹ 更準確地說，社會主義革命讓中國婦女解放運動得以擴展，突破原有的階級侷限。

與李小江剛好相反，孟悅和戴錦華並不認為中國近代民族解放運動、社會主義革命是中國婦女解放運動的好拍檔，而父權統治秩序亦沒有隨著民族解放運動、社會主義革命對婦女解放運動的進一步擴展而徹底消失，因為中國近代民族解放運動、社會主義革命以至新中國政體本身就是父權統治秩序的延續。依此看來，李

⁹⁸ 李小江著：《夏娃的探索——婦女研究論稿》，頁 145-146。

⁹⁹ 同註 98，頁 157。

¹⁰⁰ 同註 98，頁 155-156。

¹⁰¹ 同註 98，頁 157。

有關中國婦女解放運動與社會主義革命之間的關係的論述，在話語型構上，其實跟孟和戴所反對的父權統治結構並沒有太大的差別。當然，李也反對新中國解放以來集體主義對個體的壓制，但對於她來說，那是時代與政治上的偏差(文革、教條馬克思主義)、父權思想的殘餘、社會主義革命未臻徹底所致，社會主義體制本身跟父權並無任何關係。但兩者真的無關嗎？

無疑，從心理分析的角度看，作為「象徵秩序」的父權統治秩序，本身就具有一定的抽象性；但正如孟和戴所言，隨著新中國政體的成立，「在以往家長式的父皇之位上，如今端坐的不是任何一個私有社會的個人，而是一個集體——民族群體的化身」¹⁰²，父權統治秩序本身可謂得到了進一步的抽象化：正因為它變得抽象，它不再屬於任何人，但正因為它不屬於任何人，不無吊詭地，它可以是任何人。換言之，在孟和戴看來，新中國政體的成立並沒有帶來父權統治秩序的真正結束，而是它的完美高峰。

現代性呵，太父權了！？父權呵，太現代了！？

在孟悅和戴錦華的眼中，既然社會主義革命與新中國政體均被視為父權統治秩序的某種延續，這對於中國婦女解放運動以婦女研究者來說，顯然是意味深遠的。正如筆者在第二章所提到的，對於李小江來說，父權社會的吊詭之處在於：正正是父權社會讓人類能夠透過某程度的異化，脫離母系社會，提高生產力，由自在的自然狀態進入自為的文明狀態，而文明卻須以歷史上婦女的異化處境為代價。但李相信，隨著社會主義革命最終的貫徹實現，生產力將會得進一步的提昇，人類文明亦將由自為的階段進入自由的階段，而那將是真正的婦女解放時代的到來。但問題是：如孟和戴所言，如果社會主義革命與新中國政體真的只是父權統治秩序的某種延續，那麼，中國婦女的真正解放會否如李所預測的，會隨著改革

¹⁰² 孟悅、戴錦華著：《浮出歷史地表：現代婦女文學研究》，頁 29。

開放而真正到來？況且，李本人也不否認父權體制與資本主義之間的親密關係，當市場經濟、社會主義革命與新中國政體這一部父權體制的三頭馬車一往無前，中國婦女解放還會到來嗎？由於《浮出歷史地表》只談到 1949 年的中國現代婦女文學，孟和戴對此沒有(也無需)解釋，但從《浮出歷史地表》的整體理論架構，我們卻可以推演出現代性的陰暗及其延續，而且它的臉背後還有一張臉，叫父權。

或許，中國現代性的吊詭，正正是源於中國近代民族主體(男性)面對西方現代民族國家時，所引起的普遍的閹割焦慮的產物。孟悅和戴錦華指出：「經歷了兩千年渾沌的服人、從人的過去後，『五四』時代那些『父親的女兒』以一聲嚴肅的宣佈——『我是我自己的』——叛離了家庭，開始了她們從物體、客體、非主體走向主體的成長過程」¹⁰³，但長久以來作為「空洞的能指」的女性，由於沒有其他足以使她區別於其他主體的解釋或定義，她找不到自己的語匯，她仍然處於一片匱乏與空白。¹⁰⁴

孟悅和戴錦華認為，女性主體的這種成長中的匱乏與空白，反映的不僅是女性自身，而且也是整個新文化的結構性缺損。例如，在五四時期就出現了宣傳和論述馬克思主義的文章，但馬克思主義作為一門科學的主要部分——其有關生產方式的理論、其對資本的分析、其意識形態理論——在中國思想界的地位，卻遠遠不如其對階級、階級鬥爭的教義的影響深遠。換言之，馬克思主義並不是主要作為一門科學，而是作為意識形態被接受。同馬克思主義一樣，在新文化的結構性缺損下，女性並沒有找到一個反神秘化的、科學的、求真的傳統以至語匯系統。孟和戴指出，我們的現代史並沒有允許科學和反神秘化的文化選擇，新文化更多地是一種自鴉片戰爭以來，中國近代民族主體面對西方現代民族國家時，對自身政

¹⁰³ 孟悅、戴錦華著：《浮出歷史地表：現代婦女文學研究》，頁 30。

¹⁰⁴ 同註 103，頁 31-33。

治前途的普遍焦慮的投射。¹⁰⁵ 結果，女性同人、個性解放、民主、科學等的命運相似，在未及出現、未及得到解決以前，已成為了「緩解這種焦慮，象徵性地滿足這種政治願望的一個意識形態籌碼。」¹⁰⁶ 而不無吊詭地：

這一系列的結構性缺損，正是為了意識形態的完滿。沒有對馬克思主義和達爾文學說的偏重選擇，則沒有我們關於民族政治前途的構想和解釋；而沒有女性的神秘化，婦女解放也不便會像看上去那麼完整。¹⁰⁷

這樣說來，如果女性最終只能陷身於一片匱乏與空白，被壓制，被消音，有關女性的科學沒能被成功地建立，那是沒有什麼好奇怪的。因為中國近代民族主體的巨大政治焦慮似乎一直延續至今(現在，則化身為像「與國際接軌」、「發展是硬道理」那樣的口號)，它需要像女性這樣一個足以暫時象徵性地滿足其政治願望的意識形態籌碼：女性愈空白，它就愈滿足、看上去愈完滿。或許，這正是性別的(中國)現代性的其中一個最重要的意涵。

八十年代中國婦女研究的文化地形圖

無疑，在八十年代後文革的歷史時空中，不管是李小江，還是孟悅和戴錦華，其論述的文化批判性格，都是明顯不過的，矛頭均或顯或隱的指向毛澤東時代(尤其是文革時代)的社會主義主流文化。但如前所述，由於李跟孟戴二人對於社會主義體制本身的判斷相當不同，在她看來，新中國解放以來集體主義對個體的壓制，亦只是時代與政治上的偏差(文革、教條馬克思主義)、父權思想的殘餘、社會主義革命未臻徹底所致，因此她並不認為社會主義體制本身跟父權之間會有任何本質上的關係。然而，隨著九十年代中國社會急速捲入全面市場化、資本主義全球化的進程，社會上貧富加劇分化，而貧富的二極分化在現實中又表現為階

¹⁰⁵ 孟悅、戴錦華著：《浮出歷史地表：現代婦女文學研究》，頁 33-35。

¹⁰⁶ 同註 105，頁 35。

¹⁰⁷ 同註 105，頁 35。

級、性別、民族(漢族 vs.少數民族)、城鄉和地域(沿海 vs.內陸地區)之間差距的進一步擴大，¹⁰⁸ 孟戴在《浮出歷史地表》中有關社會主義體制本身的父權本質的判斷，就不得不叫人反問：如果社會主義革命與新中國政體真的只是父權統治秩序的某種延續，中國婦女的真正解放真的會如李所言，會隨著社會主義革命(通過改革開放)的最終貫徹實現而真正到來嗎？就現實的情況而言，孟戴的判斷似乎是不幸言中。與此同時，不無吊詭的是，李小江和不少同代人對於國家意識形態的反抗，在八十年代的具體歷史語境中，似乎正正反過來為新國家意識形態取得了某種合法性。

此外，從本章的整體分析所見，雖然李小江跟學界以及婦聯系統的婦女研究工作者，透過具體的論述以及學科建設，將「婦女學」去政治化、去意識形態，在一定程度上確讓「婦女」得以自「階級」分離，為「婦女」劃出了一片相對獨立的話語及體制的領地，並為中國當代婦女研究打造了進一步接受和建構女性主義的話語及體制的空間；但與此同時，中國當代婦女研究在九十年代的發展(以至對女性主義話語的接受和建構)，也就不得不局限在體制內的這「一片相對獨立的領地」。¹⁰⁹

不錯，在八十年代的具體歷史時空中，中國當代婦女學的初步學科建設，的確在一定程度上讓「婦女」或「性別」的問題，初步得以自「階級」的問題分離，在話語及體制上取得相對的獨立性；但與此同時，隨著九十年代中國社會急速捲入全面市場化、資本主義全球化的進程，階級日趨兩極分化與性別化(女性化)，婦女學這一片去階級的相對獨立的話語及體制領地，卻反而讓婦女的階級問題，變得難以直接言說。無疑，婦女學的學科建設，在一定程度上確讓「婦女」得以自「階級」分離，為「婦女」劃出了一片相對獨立的話語及體制的領地；但正如

¹⁰⁸ 有關詳情見本文第四至五章，尤其是第五章。

¹⁰⁹ 有關詳情見本文第四至五章。

我們將會在往後兩章(第四、五章)所看見的，其代價卻是：性別話語對於階級話語的取代及遮蔽，階級問題被轉化為性別問題的同時，也讓階級議題與性別議題的重新接合，變得困難。¹¹⁰

怪不得戴錦華在九十年代會轉向大眾文化的研究，因為市場經濟正接替國家意識形態的統領位置，透過大眾文化，與父權體制重新「接軌」，締造充滿了(性別與階級)不公義的虛幻盛世。在以往家長式的父皇之位上，如今端坐的不是任何一個私有化社會的個人，也不是族群體體的化身，而是一個更難把握、更難對付，同時也更加威力強大的匿名集體，它的名字叫：市場。

¹¹⁰ 有關在九十年代中國社會中，階級與性別議題及其話語的互相借重和遮蔽的關係，亦可參考戴錦華的相關分析，見戴錦華著：〈「故事」裡的故事——後社會主義時代的性別與階級表述〉，《性別中國》，台北市：麥田出版社，2006年，頁125-158。

第四章

將社會性別納入主流

關鍵詞：社會性別

2005 年，爲了紀念聯合國第四次世界婦女大會於北京召開十周年，全國婦聯除了於北京舉行「北京+10」會議，回顧當年於世婦會通過的《北京宣言》、《行動綱領》等十年來的推展外，¹ 自 7 月開始，更於婦聯刊物《中國婦運》開設了紀念第四次世婦會十周年的專欄，分六期連續刊登「提高社會性別主流化能力」系列文章，「以期從不同的角度，結合中國的實際，將社會性別主流化的概念、機

¹ 1995 年 9 月 4 至 15 日，聯合國第四次世界婦女大會於北京舉行。會議的主題爲：以行動謀求平等、發展與和平，次主題則爲：健康、教育和就業。期間，有 189 個國家的政府代表團、聯合國系統各個組織和專門機構、政府間組織和非政府組織的代表 15000 多人，出席了會議以及大會期間同時舉行的「非政府組織婦女論壇」（按：聯合國舉辦的世界婦女大會以聯合國成員國爲參與單位，只有政府代表才能出席會議。不過，每次世婦會舉行的同時，聯合國都會安排舉辦「非政府組織婦女論壇」，而第四次世婦會的「非政府組織婦女論壇」則於同年 8 月 31 日至 9 月 8 日在懷柔舉行）。大會制定並通過《北京宣言》和《行動綱領》等兩份全球性綱領文件，指出提高全球婦女地位的主要障礙，並制定了今後的戰略目標和具體行動，以進一步加速執行第三次世界婦女大會通過的《內羅畢戰略》。有關第四次世婦會的產生背景、內容以及舉行概況，見〈世界婦女大會〉，「新華網」(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3-06/25/content_936402.htm)；曾文卿著：〈聯合國世界婦女大會背景簡介〉，《用女性的眼睛看世界——記第四屆世界婦女大會非政府組織論壇》，香港：新婦女協進會，1996 年，頁 6-7；《北京宣言》、《行動綱領》等兩份文件的詳情則見「中國婦女研究網」(<http://www.wsic.ac.cn/>)「北京+10」專區。

另外，聯合國婦女地位委員會於北京世婦會開幕前的兩年即開始起草《行動綱領》。但文件完成之後，由於許多組織的代表感到《行動綱領》的篇幅太長，需要另一個用概括性的、號召性的語言，表達各國政府對《行動綱領》承諾的文件。所以 1995 年 3 月，世婦會最後一次籌備會議上，七十七國集團起草了《北京宣言》草案，提交會議；見第四次世界婦女大會、'95 北京非政府組織婦女論壇叢書編委會編：《第四次世界婦女大會中國組委會工作紀實》，北京：中國婦女出版社，1998 年，頁 256。

制、方法等介紹給廣大讀者，探索在全球化背景下實現性別平等和社會公正的可持續發展之路」²；而該系列的首篇文章〈什麼是社會性別主流化〉則由全國婦聯婦女研究所副所長劉伯紅執筆，詳細交待了「社會性別主流化」的背景、基本概念、目標和特點。

「社會性別主流化」即英文的 *gender mainstreaming*，而 *gender mainstreaming* 一詞最早出現於 1985 年在肯尼亞首都內羅畢舉行的聯合國第三次世界婦女大會上，並在第四次世界婦女大會的《北京宣言》和《行動綱領》中，得到集中的反映。正如劉伯紅所言，*gender mainstreaming* 有不同的翻譯，「性別觀點主流化」、「性別平等主流化」、「性別主流化」等等的譯法，不一而足，但劉本人卻堅持，「為準確反映詞意，我們使用了『社會性別主流化』的表述。」³ 表面看來，此亦不足為奇。事實上，若果隨手一翻 2005 年度全國婦聯婦女研究所所出版的刊物《婦女研究論叢》以至婦女研究界內的著作，我們都不難發現「社會性別」(*gender*) 一詞。可見此一譯法，起碼在界內已取得了一定的認受性。然而，若我們乘搭時光穿梭機，回到 1995 年第四次世界婦女大會的現場，認真翻查當時剛剛新鮮出爐的中文版《北京宣言》和《行動綱領》，我們想必會驚訝的發現：事實上，「社會性別」一詞並沒有出現在這兩份全球性的綱領文件上，更遑論「社會性別主流化」的提法。在中文版的《行動綱領》上，出現得最多的是「將性別觀點納入所有政策和方案的主流」命題的同義而不同形式的表述。在這裡，*gender perspective* 被翻譯成「性別觀點」，而非「社會性別觀點」。就算是劉伯紅在〈什麼是社會性別主流化〉一文所引用的內部資料《第四次婦女問題世界會議報告》的相關段落中，亦只有「將性別觀點納入所有政策和方案的主流」的提法。⁴

更有趣的是，若果我們再次搭上時光穿梭機，回到 1993 年的歷史時空，造訪一

² 〈編者按〉（「提高社會性別主流化能力」系列），《中國婦運》，2005 年 7 月，頁 14。

³ 劉伯紅著：〈什麼是社會性別主流化〉，《中國婦運》，2005 年 7 月，頁 14。

⁴ 聯合國：《第四次婦女問題世界會議報告》（內部資料），第 202、204、205 款，1995 年，北京。

直被認為是大陸首次較有系統地引介與探討社會性別理論的「第一屆中國婦女與發展研討班」(簡稱「天津班」)，⁵ 並讀一讀劉伯紅在研討班後撰寫的綜述文章，我們會更驚訝的發現：儘管劉已在該文中提到「社會性別觀」、「社會性別視角」、「社會性別的角度」等等的表述，但當時她卻逕直把「社會性別視角」理解為「女性視角」，並指出：

從女性視角對婦女現狀的探討是婦女自己從事的和與婦女共同從事的研究，而不僅僅是以婦女為對象的研究，這是一種自強、尊重女性智慧、重視實際經驗的方法。她們從社會性別的角度，對以往的歷史文化和現存的社會制度重新審視，進行分析和實証。

雖然劉伯紅對「社會性別視角」的「轉述」跟其原義相比，並不算有太大的偏離，但劉在引文中以「女性視角」轉譯「社會性別視角」，加上像「這是一種自強、尊重女性智慧」那樣隱隱回響著婦聯的「四自」話語(女人要自立、自信、自強、自尊)的片段，我們有理由相信：對於「社會性別」，劉當時似乎仍然處於「格義」的階段，大多以已有與熟悉的話語去轉(誤)譯一個剛抵國門的新的概念與理論。

然而，筆者更感興趣的是：作為女性主義話語的首席概念 gender，自 1993 年以來，到底是如何具體進入中國的文化語境(尤其是婦女研究界)，其間又經歷了怎樣的歷史轉折、文化協商以及話語型構上的建構與重構，並最終被接受與接合成為現在所理解的「社會性別」概念。

固然，早在 1993 年以前，學界已有人注意到 gender 的概念，甚至作了一定程度

⁵ 該研討班由天津師範大學婦女研究中心、政法系以及中華海外婦女學會聯合主辦，全名「中國婦女與發展——地位、健康、就業研討班」，於 1993 年 7 月 11 至 25 日在天津師範大學舉行；見劉伯紅著：〈“中國婦女與發展”——研討要點綜述〉，《婦女研究論叢》，1993 年第 4 期，頁 59-62；杜芳琴主編：《中國婦女與發展：地位、健康、就業》，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 年。

的引介，⁶ 但 1993 年所舉辦的天津班，無疑是國內首次對於社會性別概念及理論的較有系統的引介。九十年代以降，gender 的概念隨著婦女研究的學科化而日趨建制化，儘管這對於學界⁷與婦聯的意義各有不同，但由於婦女研究近二十多年來在國內的發展離不開現實中的婦女問題，具有強烈的現實性，故此，無論是婦聯還是學界，它們對 gender 的概念的接受與建制化舉措，都離不開這個大背景。但筆者認為，婦聯在這個過程中所扮演的，是一個更為樞紐的位置，因為一方面婦聯在國家體制所具有特殊功能，有一定的力量讓基層的意見「下情上達」化而為具體的婦女政策，另一方面，因為婦聯跟廣大婦女的長期連結，學界必須借助婦聯，才能跟它的研究對象連繫上來。故此，本章將會回到這個大背景，重點看看婦聯系統在九十年代是如何具體地接受與建制化 gender 這個外來的概念，為女性主義話語的移入，劃開了進一步的文化協商的空間。

第一節 Gender 初抵國門：「性別」，還是「社會性別」？

如前所述，1993 年於天津師範大學舉行的「中國婦女與發展——地位、健康、就業研討班」，是國內首次較有系統地引介社會性別概念與理論的場合，而「中華海外婦女學會」則扮演了其中「溝通中西婦女研究」的關鍵角色。⁸

⁶ 例如，《浮出歷史地表：現代婦女文學研究》的作者之一戴錦華在 1998 年的一次訪談中，便提到當年她跟孟悅一起寫作《浮出歷史地表》一書時，曾就女性主義的一些基本問題和術語的翻譯、使用，作出討論，其間便重點提到，她們當時非常希望突出 sex 與 gender 之別；見戴錦華著：

《猶在鏡中：戴錦華訪談錄》，北京：知識出版社，1996 年，頁 146-147。此外，若證諸《浮出歷史地表》原書，讓人更驚訝的是：其實，「社會性別」一語早已於該書出現，但那是否正是 gender 的對應翻譯，由於該書在「社會性別」一語後並無任何外語標識，而且也沒有另作任何概念上的說明，所以暫且無從定斷。但可以肯定的是，早在 1993 年以前，學界已有人注意到 gender 這一概念。有關「社會性別」在《浮出歷史地表》一書的具體出處，見孟悅、戴錦華著：《浮出歷史地表：現代婦女文學研究》（1988 年），北京：中國人民出版社，2004 年（再版），頁 25、27。

⁷ 這裡所言的「學界」，主要指在引入 gender 的概念及其理論的過程中，與婦聯系統一直保持緊密合作關係的國內外婦女研究學者（詳情見後文）。

⁸ 在該研討班上，有系統地引介到社會性別概念及其理論的文章，包括仇乃華著：〈以婦女與發展研究的視角看婦女與社會經濟變革〉，杜芳琴主編：《中國婦女與發展：地位、健康、就業》，頁 73-81；王政著：〈美國婦女健康運動的起因與發展〉，同前書，頁 182-204；徐午著：〈從社會學性別觀的角度看第三世界的婦女與健康〉，同前書，頁 205-218。值得注意的是，雖然三文均涉及社會性別概念及其理論，但在譯名上，則只有王政的文章以「社會性別」作為 gender 的中譯。

中華海外婦女學會(CSWS)最初主要由王政、鮑曉蘭、鍾雪萍、陳俊英、蘇紅軍等大陸留美女性研究生所組成，1989年於美國洛杉磯成立，是一個女性主義的學術與行動組織，從事有關中國女性、性別和發展問題的研究與活動，⁹而天津班正是中華海外婦女學會與國內學者首次合作的學術項目。自此之後，中華海外婦女學會一直跟國內學界、社科院與全國婦聯等，保持著緊密的合作關係，合作舉辦各種研討會、研討班、翻譯、出版、培訓班以及婦女扶貧與發展項目，其中包括第二、三屆的「中國婦女與發展研討班」¹⁰、《西方女性主義研究評介》(1995年)、《社會性別研究選譯》(1998年)、《社會性別與發展譯文集》(2000年)等書的出版，不一而足。¹¹

中華海外婦女學會有意識地引進社會性別概念和理論，其志在發展中國婦女學，並予以學科化的目的，是相當明顯的。就以《西方女性主義研究評介》與《社會性別研究選譯》為例，儘管二書作為話語表述在整體佈局上的重點有異——前者著力於西方女性主義，而後者則著力於社會性別——二書均十分有意識地分別呈現了千差萬別的西方女性主義或社會性別理論，在不同人文與社會學科中的表現與發展型態，以及它們與種種現實中的婦女問題的連繫。在《西方女性主義研究評介》一書中，編者便開宗明義的指出，編彙此書的目的，主要在於借鑒西方女性主義的經驗，為創建中國婦女學研究體系訂立基礎。故此，當該書所收「每篇

⁹ 具體情況可參考：王政著：〈心智的選擇〉，李小江主編：《女性？主義》，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0年，頁216-217；Wang Zheng, “How Did the CSWS Started? - A partial history in Wang Zheng’s Memory” (<http://xiaolan.wikispaces.com/wangzheng>)；〈海外中華婦女學會〉，「維普資訊網」，見 http://engine.cqvip.com/content/d/81711x/2004/000/002/sk02_d1_9767817.pdf。

¹⁰ 1997年，「第二屆中國婦女與發展研討班」由江蘇社會科學院與中華海外婦女學會聯合主辦，簡稱「南京班」；「第三屆中國婦女與發展研討班」則於1998年12月1至5日舉行，由四川婦女聯合會與中華海外婦女學會聯合主辦，全名「社會性別、貧困與農村發展參與式研討會」（簡稱「成都班」）；兩會詳情見：金一虹、劉伯紅主編：《世紀之交的中國婦女與發展——理論·經濟·文化·健康》，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徐午、許平、鮑曉蘭、高小賢主編：《社會性別分析：貧困與農村發展》，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

¹¹ 鮑曉蘭主編：《西方女性主義研究評介》，北京：三聯書店，1995年；王政、杜芳琴主編：《社會性別研究選譯》，北京：三聯書店，1998年；馬元曦主編：《社會性別與發展譯文集》，北京：三聯書店，2000年。

論文的結尾都附有註釋和建議閱讀的書目，以供有興趣的讀者對所述專題做進一步探討和研究」，¹² 其學科化的企圖，也就不難理解。至於《社會性別研究選譯》，編者更在附錄部分，收入了美國密執安大學婦女學中心 1996 年秋季課程簡介，旨在「使讀者看到婦女與社會性別研究和高校婦女學方面的密切聯繫」，¹³ 其背後的目的，可謂明白不過。當然，這個學科化進程是離不開現實中的婦女問題的，尤其在 1995 年世婦會通過《北京宣言》和《行動綱領》之後，「將性別觀點納入所有政策和方案的主流」在政策層面成為了關鍵命題，中國婦女學的建構本身也就無可避免地同時具有某種現實關懷的面貌。我們甚至可以說，正正是這些現實中的條件以及新的局面，讓自八十年代中即響起的、對於婦女學學科化的籲求，得到了有條件地實現的土壤(詳後)。

其實，類似的情況，也出現在大陸學界對社會性別概念與理論的接受和建構上。就以經常與中華海外婦女學會合作的大陸婦女研究學者杜芳琴為例，她在 1993 年成立的天津師範大學婦女研究中心，從一開始就比較關注婦女學的學科建設，並將婦女史始終作為重點學科進行研究和教學。但如前所述，中國婦女學的學科建設由始至終離不開現實中的婦女問題，1993 年舉行的「中國婦女與發展——地位、健康、就業研討班」，一如正題與副題所示，便開宗名義有著現實問題的對應。儘管如此，天津班以至中心其後進行的一系列面向農村婦女、結合研究與培訓的發展項目，仍然有著一以貫之的學科建設考慮，除了便於多學科人員的參與，也希望透過納入不同學科的研究視野與方法，一磚一瓦的為杜心目中的婦女學學科建設打造基礎。杜之所以接受社會性別的概念和理論，亦應放在如此的語境作理解。事實上，自杜正式接受社會性別的概念以及理論以來，她便一直有意識地把這些初抵國門的概念工具結合到中國婦女學(尤其是婦女史)的具體學科建設上；在上一個世紀末，她更向美國福特基金會申報了一個國內學者聯

¹² 鮑曉蘭著：〈前言〉，《西方女性主義研究評介》，頁 3。

¹³ 王政著：〈序〉，《社會性別研究選譯》，頁 4。

合申請的「發展中國的婦女與社會性別學」的課題，得到資助後，於 2000 年 1 月正式展開一個聯絡了十所大學、包括四個學科在內的集翻譯、研究、編教材、培訓師資、開課試點、經驗推廣的綜合課題。¹⁴

但問題是：為什麼會是 gender？而九十年代中以後，學界與婦聯又為什麼會開始廣泛接受 gender 的概念及其理論？其間又經歷了一個怎樣的文化協商的過程？對此，我們或許可以從當初決定以「社會性別」翻譯 gender 的譯者的實際考慮入手，看看這一場概念/理論旅行所蘊含的文化政治。

王政在〈“女性意識”、“社會性別意識”辨異〉一文中開宗明義的指出，¹⁵ gender 是當代婦女理論的核心概念、女性主義學術的中心內容，源於六十年代末出現的美國當代女性主義者對於「生物決定論」的批判與攻擊。提出 gender 的一個重要步驟是對 sex 與 gender 作出區分，前者指嬰兒出生後從解剖學的角度來實証的男性或女性，而後者則指在社會文化中形成的男女有別的期望特點以及行為方式的綜合體現。作出這樣的區分的意義在於，女性所扮演的性別角色，並非由女性的生理所決定，而是由社會文化所決定的。故此，男女的性別角色是可以在社會文化的變化中改變的。王又指出，初期的女性主義者主要用 sex role 來指稱社會對女性的規範，但由於 sex role 仍然與 sex 有明顯的連繫，所以在七十年代上半

¹⁴ 杜芳琴接受社會性別概念與理論、並以之建設婦女學學科的詳情，請參考：杜芳琴著：〈我的婦女研究歷程〉，李小江主編：《身臨“奇”境——性別、學問、人生》，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0 年，頁 171-211；杜芳琴著：〈發展高等院校的婦女研究和婦女教育：做什麼和怎麼做？〉（2000 年），《婦女學與婦女史的本土探索——社會性別視角和跨學科視野》，天津市：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 年，頁 91-96。至於杜有關社會性別與中國婦女史學科建設之間的關係的具體思考，可參考：杜芳琴、蔡一平著：〈中國婦女史學科化建設的理論思考〉（1998 年），《中國社會性別的歷史文化尋踪》，天津市：天津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8 年，頁 1-26。杜芳琴其他有關結合社會性別與中國婦女學學科建設的活動與工作，可參考：蔡一平、王政、杜芳琴主編：《賦予歷史以社會性別》，天津市：天津師範大學婦女研究中心，1999 年；鄭新蓉、杜芳琴主編：《社會性別與婦女發展》，西安：陝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 年。

¹⁵ 王政著：〈“女性意識”、“社會性別意識”辨異〉，《婦女研究論叢》，1997 年第 1 期，頁 14-20；亦見王政著：〈“女性意識”、“社會性別意識”辨異〉，《越界：跨文化女權實踐》，天津市：天津人民出版社，2004 年，頁 25-52；王政著：〈“女性意識”、“社會性別意識”辨異〉，杜芳琴、王向賢主編：《婦女與社會性別研究在中國：1987-2003》，天津市：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 年，頁 77-93。

葉，她們便選擇了 *gender* 這個新詞來指稱有關女性的社會文化含意。

但王政接著引用蓋兒·魯賓(Gayle Rubin)的著作〈婦女交易：性”政治經濟學”筆記〉(*The Traffic of Women: Notes o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Sex*)¹⁶指出，有關 *gender* 的理論，要待至 *gender* 開始被視為一種系統之後，才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她指出，受此一發展影響，女性主義者開始將 *gender* 視為一種制度，並從各個方面探討這種制度在各個文化與歷史時期的形態和演變的過程。

接著，王政又引用歷史學家琼·斯科特(Joan W. Scott) 八十年代末的論文〈社會性別：一個有助歷史分析的範疇〉(“Gender”: A Useful Category of Historical Analysis)一文¹⁷，從後結構主義理論的角度，對 *gender* 作出了新的闡述，指出：「社會性別是諸多社會關係中的一份子，是基於能觀察到的兩性差別之上的；社會性別是表示權力關係的一種基本途徑」；把 *gender* 作為一種社會關係來考察意味著：對它的考察必須是歷史的、具體的，而不能是超越社會歷史的、本質主義的。但王政指出，雖然 *gender* 是西方女性主義者對自身歷史、社會、文化的剖析過程中發展出來的理論框架，她們所闡述的狀況與我們的狀況不盡相同，「將社會性別看做一種制度一種社會關係的認識卻是我們可以借鑒的。」¹⁸

王政接著指出，她之所以選擇以「社會性別」翻譯 *gender*，是因為：在文革之後，由於社會上對「男女都一樣」的去性別化的性別意識形態的普遍反撥，代之而被主張的，是強調性別差異(尤其是生理性別差異)的「女性意識」、「性別意識」

¹⁶ 魯賓的原文見：Gayle Rubin, “The Traffic in Women”, Rayna R. Reiter ed., *Towards An Anthropology of Women*,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1975, pp. 157-210；中譯：蓋爾·魯賓 (Gayle Rubin)著，王政譯：〈女人交易：性的”政治經濟學”初探〉，《社會性別研究選譯》，頁 21-81。

¹⁷ 斯科特原文見：Joan W. Scott, “Gender: A Useful Category of Historical Analysis”, *Gender and the Politics of Histor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8, pp. 28-52；中譯：琼·斯科特(Joan W. Scott)著，劉夢譯：〈社會性別：一個有效的歷史分析範疇〉，李銀河主編：《婦女：最漫長的革命》，三聯書店，1996 年，頁 151-176。

¹⁸ 王政著：〈”女性意識”、”社會性別意識”辨異〉，《婦女研究論叢》，1997 年第 1 期，頁 20。

等概念。她以 gender consciousness 的通行譯詞「性別意識」為例指出，用「性別意識」來翻譯 gender consciousness，表達的仍然是這樣的後文革性別意識形態，而這「沒能轉達 gender 在當代女權主義中的含義」。她解釋，中文的「性別」二字本身便包含了這樣的性別意識形態，用既有的語言來翻譯 gender，不僅會造成理解的問題與概念的混淆，也會重陷於現存觀念的窠臼，反而鞏固了既有的社會性別文化。故此，王主張以「社會性別」翻譯 gender，突出概念本身所指涉的社會文化制度面向；其好處是，「社會性別」中兩個詞組是中文裡常用的，但合起來卻讓人有陌生的感覺，不能想當然的以既有的觀念去套；但其缺點則是：「社會性別」一詞仍然拖著盛載了文化包袱的「性別」二字，未能充分表達 gender 概念原有的理論重點。

在學理上，以「社會性別」翻譯 gender，突出原概念本身所指涉的社會文化制度面向，本是無可厚非；但問題是：若果「性別」二字在漢語中原本就具有 gender 的意涵，¹⁹ 我們又該如何理解像「社會性別」這樣一個近乎同義重複的譯詞？固然，在日常漢語中，「性別」二字的確兼具 gender 與 sex 的意涵，但問題或許正正在於這樣的詞義含混性，在無法突出 gender 概念原有的理論重點之餘，同時也讓王政等引介的 gender 理論無法跟後文革云云的性別論述醒目地有所區別，從中脫穎而出。如此說來，以「社會性別」翻譯 gender，似乎既有學理上的理由，也有文化政治上的考慮。但問題是：在九十年代中以後，婦聯和學界又為什麼會開始廣泛接受 gender 的概念及其理論？如此廣泛接受的話語條件又到底是什麼？

¹⁹ 李小江便認為，在漢語中，性(sex)是身體的，而「性別」(gender)則是一種身份，是由性而生的社會身份；見李小江著：《女性性別的學術問題》，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2005年，頁162。

第二節 婦聯系統對於「社會性別」概念的接受情況

正如筆者在前兩章所指出的，後文革的性別重構現象所意味著的，一方面是對「男女都一樣」的性別意識形態所代表的集體主義的反撥，另一方面則是改革開放所引發的勞動市場重組以及傳統性別結構的復返。固然，改革開放為個體自由帶來了較為寬鬆的空間，但社會上種種的「婦女問題」又逼在眉睫，時刻威脅著婦女既有的發展與生存的空間。故此，對於婦聯以及婦女研究學界來說，如何能夠在重新講求性別差異之餘，又不致於成為父權主義的共謀，親手把廣大婦女送回虎口，便成為了理論和實際上的頭號難題。由是觀之，婦聯與學界之所以在九十年代廣泛接受「社會性別」的概念和理論，似乎也就不難理解了。

性別意識之必要？社會性別之必要？

1996 年，在世婦會通過《北京宣言》和《行動綱領》之後的一年，全國婦聯婦女研究所機關刊物《婦女研究論叢》曾經以「世婦會與《行動綱領》」為專題，討論《行動綱領》中的核心命題：「將性別觀點納入所有政策和方案的主流」。該專題包括了兩篇文章，其一是全國婦聯婦副主席黃啓璪同年 6 月 19 日在全國婦聯常委會暨省、市婦聯主席工作會議上的總結講話，其二是有關中央黨校婦女研究中心所召集的一次相關專題研討會的記錄。²⁰ 若果比對二文的題目以至內容，我們不難發現二文對於《行動綱領》核心命題的表述，有著一項不可謂無關痛癢的用語上的細微差異：一是「性別觀點」，一是「性別意識」。有趣的是，若我們仔細翻查一下中文版的《北京宣言》和《行動綱領》，我們想必會發現：在這兩份文件上，出現過的是「性別觀點」一詞，而非「性別意識」。可以這麼說，「性別意識」一詞在此擔當了一重文化轉譯的功能，所對應的是後文革語境底下的性別政治。

²⁰ 黃啓璪著：〈黃啓璪談：性別觀點納入決策主流〉，《婦女研究論叢》，1996 年第 3 期，頁 4；李慧英著：〈將性別意識納入決策主流的討論〉，《婦女研究論叢》，1996 年第 3 期，頁 5-7、18。

事實上，在中央黨校婦女研究中心的專題研討會上，與會者便把以上的問題說得非常直白。例如，中國社科院馬列所的副研究員李楯便指出：「我們國家絕大多數人包括女性沒有性別意識，在這裡有個盲點。解放以來，我們常講，一是只有具有階級性的女性，沒有抽象的女性，二是時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樣。形成了非性化的角度，是不可能性別意識的。」²¹ 當然，提倡「性別意識」，也有實際上的考慮。固然，男女平等是中國的國策，有相關的政策條文可依。但全國婦聯書記處書記康冷卻指出：「沒有歧視婦女的條文，並不等於在實踐上能保證男女平等。」事實上，「現實中有偏見，特別是對女性偏見。」在此，政策條文上形式主義式的平等，反而遮蔽了現實中赤裸裸的性別不平等問題，康冷舉例說：「我們婦聯提到婦女受教育的問題，教委認為沒有必要，因為他們從不反對婦女受教育，男女在教育的權利上一向是平等的。」所以有一種論點認為，既然中共那麼重視男女平等問題，就沒有必要再談什麼性別意識，否則就有失公正。²²

劉伯紅在「第二屆中國婦女與發展研討班」上，便曾經把中國理解「社會性別」概念的文化背景和前提歸納為四：(一)男女平等作為新中國立國以來的基本政治法律制度和意識形態，形成了中國式的兩性平等關係和社會文化；(二)女權主義的主張不單成為國際婦女運動的旗幟，而且也成為一種國際的政治潮流，各國政府衡量決策的正確與否的標準；(三)中國處於社會轉型期，出現了新的問題，需要新的回答；(四)中國婦女一方面臨著對歷史上男女等同、無性別意識的反思，另一方面又面臨現實中由於社會變化和改革催生的性別分化和歧視的擠壓；而對於「社會性別」概念，中國學者則取得了四方面的共識：(一)提倡「社會性別」觀念是為了提倡男女平等；(二)「社會性別」視角是深刻地觀察性別歧視、增強性別敏感的鑰匙；(三)不同的社會發展政策對男女構成不同的影響，因此應

²¹ 李慧英著：〈將性別意識納入決策主流的討論〉，頁 6。

²² 同註 21，頁 6。

將社會性別觀念納入各項發展決策的主流；(四)性別分析是增強性別觀念、提高性別敏感的前提。²³

如此看來，王政所憂慮的那種強調性別差異的後文革性別意識形態，反而促成了婦聯與學界（尤其是婦聯）對於「社會性別」概念的接受。首先，提倡性別差異、性別意識（尤其是女性意識），無論對於婦聯對治現實中的婦女問題、填補性別平等政策在條文與實踐之間的落差，還是對應後文革的性別反思，有其必要性；而「社會性別」一語正正保留了「性別」二字、這個現實中的性別政治所仍然需要的文化包袱。其次，「社會性別」的概念與理論所強調性別本身的社會文化制度面向，同時又為婦聯提供了一件火力強大的分析工具，在保住性別差異這個基點的前提下，復又能夠穿透這個基點本身，在社會結構與文化體制的深處，尋找現實中赤裸裸的性別不平等的真正根源。由此可見，婦聯對於「社會性別」的接受，可算是一種有條件與折衷式的接受。歷史的轉折往往兜兜轉轉，看來王政當初所憂慮的，反而成為了「社會性別」概念的通行証。

此外，以上的觀察和分析，也可以証諸婦聯在世婦會後，所舉行的幾項重要活動與出版之上。例如，在《中國婦女研究年鑑：1991-1995》和《中國婦女研究年鑑：1996-2000》等婦聯系統的重要出版、第四次全國婦女理論研討會和中國婦女五十年理論研討會等活動中，我們便不難發現「社會性別」概念的踪影。²⁴《中國婦女研究年鑑：1996-2000》的編者甚至在前言中，開宗明義的指出：

《中國婦女研究年鑑：1996-2000》編輯思想是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和鄧

²³ 金一虹、劉伯紅主編：《世紀之交的中國婦女與發展——理論·經濟·文化·健康》，頁 97-98。

²⁴ 陶春芳主編：《中國婦女研究年鑑：1991-1995》，北京：中國婦女出版社，1997 年；劉伯紅主編：《中國婦女研究年鑑：1996-2000》，北京：中國婦女出版社，2004 年；「第四次全國婦女理論研討會」於 1996 年 11 月舉行，見康冷主編：《婦女發展與對策：第四次全國婦女理論研討會論文集》，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8 年；「中國婦女五十年理論研討會」則於 1999 年 12 月舉行，見李秋芳主編：《半個世紀的婦女發展：中國婦女五十年理論研討會論文集》，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2001 年。

小平理論為指導，應用科學的社會性別觀念，力求比較客觀、全面、系統記載和反映 1996-2000 年間婦女研究的成果和信息。²⁵

可見在上個世紀九十年代的下半葉，在婦聯系統中，「社會性別」概念已取得了一定程度的認受性。此外，在《半個世紀的婦女發展：中國婦女五十年理論研討會論文集》的一篇附錄中，編者更指出，關於社會性別視角對中國婦女研究的意義，界內研究者已在以下幾方面形成了共識：

(一)提倡社會性別視角的目的是主張男女平等，縮小兩性實際存在的不平等差距；(二)社會性別視角是深刻觀察性別關係、認識性別差異與歧視的鑰匙，它通過對經濟層面背後性別結構的揭示，豐富和補充了人們以往對性別不平等起源的認識；(三)不同社會發展政策會對男女帶來不同的影響，社會發展不能簡單的等同和代替婦女發展，單純的經濟增長不能“自然”帶來婦女的進步，因此，應將社會性別觀點納入各項社會發展政策的主流，探討包括性別平等在內的可持續的社會發展模式；(四)性別分析是增強性別觀念、提高性別敏感的前提。性別分析重視比較女性相對於男性而存在的關係，從而確認其在社會上的地位。²⁶

十分明顯，這四點共識跟上述劉伯紅就中國理解「社會性別」概念的文化背景和前提，基本上是同出一轍。由此可見，婦聯和學界對於「社會性別」的接受，可算是一種有條件與折衷式的接受：講求性別差異、性別意識((尤其是女性意識)，對於現實中的性別政治，仍然是必須的；與此同時，穿透性別差異這個基點本身，在社會結構與文化體制的深處，尋找現實中的性別不平等的真正根源，也同樣重要；而「社會性別」正正為婦聯和學界提供了一個如此有力的話語接合點。

但正如王政所憂慮的，由於「社會性別」一語仍然保留了「性別」二字及其夾帶的性別文化包袱，「社會性別」概念及其理論的核心：反性別本質主義，也就吊

²⁵ 中國婦女研究年鑑編輯部著：〈前言〉，劉伯紅主編：《中國婦女研究年鑑：1996-2000》，頁 3。

²⁶ 全國婦聯研究所著：〈當前婦女研究的熱點問題及主要觀點〉，李秋芳主編：《半個世紀的婦女發展：中國婦女五十年理論研討會論文集》，頁 624。

詭地變得眉目不清。而在跨語際書寫的過程中，由於披上了性別本質主義的外衣，在效果上，「社會性別」一語卻不無吊詭地同時為中國九十年代某種形式的性別本質主義，提供了部分的復歸和出現的條件。這無疑是「社會性別」概念及其理論在中國當代文化語境中的歷史吊詭。

當然，上述的歷史吊詭，也源於「社會性別」理論本身的內部困難。正如美國女性主義政治哲學家艾莉斯·馬利雍·楊(Iris Marion Young)所指出的，正是女性主義所標舉的「性理性別 VS. 社會性別」區分，很諷刺地維持了男性女性間的二元論，早先具有批判解放力量的「性理性別 VS. 社會性別」區分，後來反而強化既有的男女區隔與不平等。²⁷ 況且，正如荊子馨所精闢地指出的，反本質主義至少有兩個問題。首先，它輕率地拒絕了任何形式的本質主義，只視它們為社會和文化的建構，所以無法與那些具有特殊本質化形式的壓制性權力相抗衡，而那些力量在相當程度上仍持續規範著人民的活動。其次，反本質主義基於對理論純潔性的考量，忽略了本質化範疇所具有的強大而民粹式的肯定力量。²⁸ 雖然，荊子馨的批判矛頭不單指向反性別本質主義，但筆者認為，其論述也適用於「社會性別」理論，且讓我們能夠進一步把握「社會性別」理論本身的內部困難。原來的「社會性別」理論尚且如此，更何況是在跨語際書寫的過程中，在意識形態上並不純潔的「社會性別」的這一譯語？可見，在中國的當代文化語境中，「社會性別」理論本身的內部困難，似乎不無吊詭地以某一種形式給放大了。

固然，「社會性別」的此一譯語本身的特點跟中國後文革及改革開放的雙重語境之間的某程度上的對應性，無疑為中國婦女研究界對於「社會性別」概念的接受，提供了部分的重要話語條件。但筆者認為，婦聯與學界之所以在九十年代廣泛接

²⁷ 艾莉斯·馬利雍·楊(Iris Marion Young)著，何定照譯：《像女孩那樣丟球：論女性身體經驗》，台北市：商周出版，2006年，頁21-22。

²⁸ 荊子馨著，鄭力軒譯：《成為「日本人」：殖民地台灣與認同政治》，台北市：麥田出版，2006年，頁259-260。

受「社會性別」的概念和理論，也跟第四次世婦會所通過的《北京宣言》和《行動綱領》有關。不錯，早在八十年代，女性主義話語已經不同途徑被引入；但對於中國婦女研究界最影響深遠以及最廣泛被接受的女性主義文本，在某意義上說，可算是《行動綱領》這份世婦會的綱領性文件。

作為女性主義話語的《行動綱領》

然而，若果我們仔細翻閱《北京宣言》與《行動綱領》等兩份文件，「女性主義」一詞明顯是找不到的，「女權主義」一語也只在《行動綱領》中出現過一次，那麼，筆者又為什麼會把它們收歸女性主義的陣營？

如前所述，在中文版的《北京宣言》與《行動綱領》上，出現得最多的是「將性別觀點納入所有政策和方案的主流」這個核心命題。然而，除了這個核心命題之外，出現得最多的還有「賦予婦女權力」(Women Empowerment)的提法，而這兩者恰好是西方婦女發展理論中的「社會性別與發展」(Gender and Development, GAD)模式的核心元素。從觀念的源頭上講，「社會性別與發展」模式正正屬女性主義話語的一部分。

在西方婦女發展理論的發展中，由於人們對發展與婦女問題的看法不同，導致了在婦女與發展領域中所出現的不同干預婦女與發展的手段與方式，若依它們對婦女與發展的關係的認識，可以歸結為「婦女參與發展」(Women in Development, WID)、「婦女與發展」(Women and Development, WAD)和「社會性別與發展」模式。²⁹

²⁹ 有關「婦女參與發展」(WID)、「婦女與發展」(WAD)、「社會性別與發展」等模式的具體內容，本文參考：伊娃拉.M.斯格博(Eva M. Rathgeber)著，仇乃華譯：〈婦女參與發展、婦女與發展、社會性別與發展：研究與實踐的趨向〉，王政、杜芳琴主編：《社會性別研究選譯》，頁 170-190；原文見：Eva M. Rathgeber, “WID, WAD, GAD: Trends in Research and Practice”, *Journal of*

回顧歷史，在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在國際發展項目的主導思想是：現代化(通常等同於工業化)會提高發展中國家的生活水平。這一發展模式認為，隨著經濟的發展，現代化的好處，即較好的生活條件、較高的工資及教育，以及充分的醫療服務等就會一點點沁入到社會各階層。但在此期間的現代化理論著作卻極少把婦女作為一個單獨的分析單位來看待，因為他們假定男性的經歷具有普遍性，可以涵蓋女性的經歷，而且當社會日益現代化，所有的人(包括女性)都會平等受益。

到了七十年代，有不少人開始對以上的現代化理論提出了質疑。他們指出，在此前的二十年內，婦女的相對地位非但沒有提高，而證據表明，婦女在某些領域的地位甚至有所下降。因此，有人開始提出「**婦女參與發展**」(WID)的模式。

在 1970 年代早期，經濟學家鮑斯魯普(Ester Boserup)發表了《婦女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Women's Role in Economic Development)一書³⁰，分析了社會現代化過程中傳統農業實踐發生的變化，指出這些變化對於男人和女人的工作所產生的不同影響。鮑斯魯普的研究之所以具有特別意義，是因為她在發展研究的領域中，首次系統地使用了性別這一變量，讓學界開始注意兩性分工和發展之間的關係，以及現代化政策對兩性造成的不同影響。

首先使用「婦女參與發展」一詞的是國際發展學會的哥倫比亞特區華盛頓婦女委員會。之後，美國自由主義女權主義者開始明確地提出「婦女參與發展」(WID)的模式，倡導法律與行政的改革，以保證婦女更好地融入經濟體系，積極參與發展。在策略上，「婦女參與發展」模式的項目通常是創收活動，向婦女傳授一門具體技術或手藝，有時組織婦女結成銷售合作社，而在向婦女傳授技術的同時，

Developing Areas 24 (1990), pp. 489-502.

³⁰ Ester Boserup, *Women's Role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70.

也教授一些有關衛生、識字、育兒方面的知識。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婦女參與發展」(WID)模式關注的是如何促進婦女作為生產者積極參與經濟活動，它相信自由主義的信念，認為以市場為基礎的現代化將有助於婦女爭取平等。然而，該模式並不對現存的秩序與制度(包括社會性別制度)提出質疑，而現存的秩序與制度(尤其是社會性別制度)正是阻礙婦女積極參與社會的根源之一。

七十年代後期，則出現了「婦女與發展」(WAD)或稱新馬克思主義的觀點。該派提倡者認為不存在什麼「將婦女納入發展」的問題，因為婦女從來都是發展的一部分，只不過現在婦女是為全球資本主義系統服務罷了。部分地受依附理論³¹的影響，他們認為加入現有發展模式只會加重對資本主義的依賴，並產生更多的剝削。

與「婦女參與發展」(WID)相比，「婦女與發展」(WAD)無疑更具批判性，但也未能對父權體系、不同的生產方式與婦女的從屬地位之間的關係，作出全面的分析。「婦女與發展」(WAD)學派不主張對婦女問題的分析獨立於男性面臨的問題之外，因為他們認為面對全球資本主義體系，兩性同樣處於不利的地位。反過來說，「婦女與發展」(WAD)的假設是：當國際結構變得更加平等時，婦女的地位

³¹ 「依附理論」發源於六十年代在美國、拉丁美洲等地興起的「依附理論學派」(dependency school)。1950年，阿根廷經濟學家勞爾·普雷維什(Raul Prebisch)指出，世界經濟乃一體系，這個體系由核心(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和邊陲(非西方不發達國家)兩個部分之間不平等的經濟關係所構成，核心國家透過不公正的貿易條件剝削邊陲國家，而這正是導致不發達國家貧窮落後的根本原因。普雷維什的「核心—邊陲」概念，後來通過弗蘭克(A.G. Frank)和阿明(Samir Amin)等人發展成為依附理論。見張敦福著：〈依附理論的發展歷程和新進展〉，「就愛學習網」(<http://www.92study.com/lunwen/jingjixue/200512/20051217130717.html>)；Gilbert Rist, *The History of Development: from Western Origins to Global Faith*, translated by Patrick Camiller, London: Zed Books, 1997, pp. 109-122.

就會改善。同時，婦女在經濟、政治和社會結構中的缺席仍被看作是一個首要問題，但解決的方式是積極的干預策略，而非對社會性別體制的根本改變。

至於八十年代興起的「社會性別與發展」(GAD)理論與實踐，則與社會主義女性主義相連，因此把資本主義與男權制同時視為婦女受壓迫的根源。該派發展模式的提倡者對資本主義的批判與馬克思主義相似，但他們對婦女問題的分析卻超出了以階級作為分析的馬克思主義。他們把婦女所受的壓迫放到整個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體制中來考察，尤其關注社會性別的體制，探討不平等的兩性關係是如何形成，並於階級、種族、民族以及其他不平等的社會關係相互作用下，同時對婦女產生影響。因此，該模式以「社會性別與發展」(GAD)為關注點，不僅只以保證婦女更好地融入既有經濟體系為目標，而是通過社會性別分析對整個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體制作出根本的批判，採取「賦予婦女權力」的方式，爭取兩性間真正的平等與公正。此外，該模式亦包括了摩塞(Caroline O. N. Moser)所首創的「社會性別計劃」(Gender Planning)。摩塞所提出的這一發展計劃與培訓方式，主要是要在政策制定、計劃設計及實施的整個過程中，都把社會性別作為中心因素，以婦女解放為目的，達至兩性之間的平等與公正。故此，在摩塞的計劃模式中，國家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³²

儘管，在起草《北京宣言》與《行動綱領》的過程中，產生了不少爭議，³³但兩份文件在理念上跟西方婦女發展理論中的「社會性別與發展」模式還是一脈相承的，其中尤其以「將性別觀點納入所有政策和方案的主流」與「賦予婦女權力」等「社會性別與發展」模式的核心命題與概念，在文件中佔有了最醒目的位置。

³² 有關摩塞的「社會性別計劃」觀念，詳情見 Caroline O. N. Moser, "Gender Planning in the Third World: Meeting Practical and Strategic Gender Needs", *World Development* 17, 11(1989), pp. 1799-1825; 中譯：卡羅琳·摩塞 (Caroline O. N. Moser) 著，劉東曉譯：〈第三世界中的社會性別計劃：滿足實用性和戰略性社會性別需要〉，王政、杜芳琴主編：《社會性別研究選譯》，頁 266-304。

³³ 當時相關的情況可參考：曾嘉燕著：〈激流暗湧——平等、發展、和平與《行動綱領》〉，《用女性的眼睛看世界——記第四屆世界婦女大會非政府組織論壇》，頁 8-9。

可以這麼說，要待至《北京宣言》與《行動綱領》的簽定，才為女性主義話語打開了一個能夠通往腹地的缺口，因為這兩份文件已不單關乎學術，更關乎如何在國家的層面，將社會性別與婦女的問題納入所有政策和方案的考慮當中。如此說來，把《北京宣言》與《行動綱領》視為中國婦女研究界對女性主義話語的當代接受史上，其中兩個最重要的女性主義文本，似乎也不為過；而這兩個文本的主題之一：「(婦女)發展」，正好與當代中國對現代化與解決「婦女問題」的訴求，相互呼應。³⁴

當然，《北京宣言》與《行動綱領》等所蘊含的、對現代性以及與國際接軌的想像，也構成了中國婦女研究界以至中國政府對這兩份文件的部分接受條件。例如，在世婦會通過《北京宣言》和《行動綱領》之後的一年，中央黨校婦女研究中心所召集的一次有關「將性別觀點納入所有政策和方案的主流」的專題研討會上，中央黨校婦女研究中心副教授李慧英便提到：「性別意識與環境意識、人口意識、人權意識具有同等的意義和價值，是所有決策者和行動者應當樹立的**現代意識**之一。將性別意識納入決策主流，已經成為**國際社會的重要發展趨勢**。」³⁵可見，在當代中國的文化語境中，人們對《北京宣言》和《行動綱領》以至女性主義話語的接受，跟人們對現代性以及國力政治的想像是不可分的。可以這麼說，從整個中國現代化的語境看，《北京宣言》與《行動綱領》關乎性別，卻又不止關乎性別。

然而，《北京宣言》與《行動綱領》始終只是呼籲性的文件，本身並無法律或政策上的約束力，文件的簽定只代表了聯合國相關成員國的承諾。文件能否被具體

³⁴ 帶著對西方女性主義一向的保留態度，李小江把這一次女性主義話語的大幅進入，視為「國際社會的介入」，「將西方女權主義話語(諸如 Gender)和策略(諸如 Empowerment)帶進中國」，見李小江著：《女性/性別的學術問題》，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2005年，頁186-187。暫時撇開李小江對西方女性主義的立場不談，她把《北京宣言》與《行動綱領》視為女性主義文本的看法，倒是準確的。

³⁵ 李慧英著：〈將性別意識納入決策主流的討論〉，頁6；重點為筆者所加。

落實，還有待各國的世婦會後續行動，而《北京宣言》與《行動綱領》在中國的落實的具體情況是：國務院早在世婦會舉行以前，已審議通過與正式頒布了《中國婦女發展綱要(1995-2000 年)》，把婦女事務納入「九五」期間中國的總體國家規劃當中。³⁶ 可以這麼說，《中國婦女發展綱要(1995-2000 年)》的頒布，在某意義上，是「將性別觀點納入所有政策和方案的主流」等提法，得以在中國落實的最重要的條件之一。

《行動綱領》與《中國婦女發展綱要》之間的文化協商

根據全國婦聯副主席黃啓臻的複述，³⁷ 關於《中國婦女發展綱要(1995-2000 年)》的制定，有國際和國內的背景。在國際背景方面，《中國婦女發展綱要(1995-2000 年)》的制定，明顯與世婦會的籌備與召開有關。黃指出，中國作為第四次世婦會的東道國，參與了《行動綱領》架構的討論與磋商；而全國婦聯認為，中國政府不一定要待至《行動綱領》正式通過後才行動，可以在世婦會之前，即把婦女發展問題納入國民經濟與社會發展的總體規劃。於是全國婦聯向國務院婦工委建議制定《中國婦女發展綱要(1995-2000 年)》。

國內背景方面，則與改革開放有關。黃認為，當今以科技、經濟為主要標誌的綜合國力競爭，說到底是民族素質的競爭，而婦女的素質(作為國民與母親)對民族素質的關係極大，所以有必要根據中國現代化發展的主要目標，制定中國婦女發展的主要目標與措施。此外，黃又指出：全國人大於 1992 年 4 月制定《婦女法》以後，雖然法律規定了婦女享有許多平等權利，但並不等於事實上已實現了兩性平等。由於受經濟、文化發展水平與觀念的影響，中國婦女在教育、就業、參政、暴力侵害等方面，還存在著不少問題。故此，有必要通過《中國婦女發展綱要

³⁶ 1995 年 7 月 27 日，《中國婦女發展綱要(1995-2000 年)》於李鵬親自主持的國務院常委會議通過，全文見「新華網」(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3-09/08/content_1068085.htm)。

³⁷ 黃啓臻著：〈談談婦女問題〉，《中國婦女研究年鑑：1991-1995》，頁 14-17。

(1995-2000 年)》制定階段性的目標，動員各級政府、政府各部門、各社會團體、各企業單位，以保證《婦女法》規定的婦女權利得以落實。

可見，《中國婦女發展綱要(1995-2000 年)》的制定，有國際間的國力政治考慮，也有中國國內的具體婦女問題的對應。可以這麼說，世婦會的籌備與召開為《中國婦女發展綱要(1995-2000 年)》的提出與制定，創造了部分的契機，反過來說，《中國婦女發展綱要(1995-2000 年)》的制定，則為《行動綱領》提供了重要的落實條件，在某意義上，也為女性主義話語打開了部分的體制大門。

當然，在《中國婦女發展綱要(1995-2000 年)》上，「將性別觀點納入所有政策和方案的主流」、「賦予婦女權力」、「社會性別」、「女性主義」等命題或概念，是找不到的，但若果我們把《中國婦女發展綱要(1995-2000 年)》與《行動綱領》作出比對，二者在內容上是有一定程度的重疊的：

中國婦女發展綱要（1995—2000 年）	行動綱領
<p>婦女發展的具體目標是：</p> <p>（一）提高婦女參與國家和社會事務決策及管理的程度。</p> <p>（二）組織婦女積極參與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推動社會生產力發展。</p> <p>（三）切實保障婦女的勞動權益。</p> <p>（四）大力發展婦女教育，提高婦女的科學文化水平。</p> <p>（五）進一步提高婦女的健康水平，保障婦女享有計劃生育的權利。</p> <p>（六）提倡建立平等、文明、和睦、穩定的家庭。</p> <p>（七）有效遏制對婦女的暴力侵害及拐騙、買賣婦女的犯罪行為和賣淫嫖娼違法活動。</p> <p>（八）重視和扶持邊遠、貧困和少數民族地區婦</p>	<p>戰略目標和行動：</p> <p>（一）婦女與貧窮</p> <p>（二）婦女的教育和培訓</p> <p>（三）婦女與保健</p> <p>（四）對婦女的暴力行為</p> <p>（五）婦女與武裝衝突</p> <p>（六）婦女與經濟</p> <p>（七）婦女參與權力決策</p> <p>（八）提高婦女地位的機制</p> <p>（九）婦女的人權</p> <p>（十）婦女與媒體</p> <p>（十一）婦女與環境</p> <p>（十二）女童</p>

<p>女發展。到本世紀末，基本解決貧困婦女的溫飽問題。</p> <p>（九）改善婦女發展的社會環境，提高她們的生活質量。</p> <p>（十）擴大我國婦女同各國婦女的友好交往，促進世界和平。</p> <p>（十一）建立婦女狀況的動態研究、資料獲取和資料傳播機制。</p> <p>政策和措施：</p> <p>（一）政治權利和參與決策</p> <p>（二）就業和勞動保護</p> <p>（三）教育與職業培訓</p> <p>（四）衛生保健</p> <p>（五）計劃生育</p> <p>（六）法律保護</p> <p>（七）改善婦女發展的社會環境</p> <p>（八）扶持貧困地區婦女事業的發展</p> <p>組織與實施：</p> <p>（一）《綱要》由國務院婦女兒童工作委員會負責組織實施。</p> <p>（二）實施《綱要》是各級政府義不容辭的重要職責。各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要在《綱要》的指導下，結合實際情況制訂本地區的婦女發展規劃，並將其納入當地經濟和社會發展的總體規劃，統一部署，統籌安排。</p> <p>（三）各級政府都要逐步增加用於婦女事業的資金。</p> <p>監測與評估：</p> <p>（一）建立健全勞動監察、衛生監測、教育督導、統計評估、法律監督機構，完善監測機制，以確保《綱要》總目標的實施。</p> <p>（二）要加強國家級的婦女發展綜合統計，建立婦女資料庫，增設性別統計指標，做好有關婦女的資訊採集、整理、反饋和交流工作，為預測發展趨勢、制訂規劃、科學決策、檢查評估等提供</p>	<p>體制安排：</p> <p>（一）國家一級</p> <p>（二）分區域／區域一級</p> <p>（三）國際一級</p> <p>財政安排：</p> <p>（一）國家一級</p> <p>（二）區域一級</p> <p>（三）國際一級</p>
---	---

<p>依據。</p> <p>(三) 要建立國家級的婦女狀況監測系統，制定切實可行、科學規範的監測評估方案，全面地、動態地監測婦女發展狀況。</p> <p>(四) 為瞭解和評估《綱要》的實施情況，要建立定期檢查、審評制度，以便及時發現問題，採取相應的對策。在實施《綱要》的過程中，要採用多種調查方法，全面、系統、及時地反映婦女狀況的發展和變化，進行有重點的專題評審和中期評審。到 20 世紀末，要進行中期全面評審，做好實施《綱要》的總結和評估，並制定 21 世紀的婦女發展綱要。</p>	
--	--

然而，若果我們仔細審視二者的目標，我們會發現一些微妙的差異。首先，《行動綱領》中「婦女與貧窮」、「婦女的教育和培訓」、「婦女與保健」、「對婦女的暴力行為」、「婦女與經濟」、「婦女參與權力決策」等六項目標，我們都可以在《中國婦女發展綱要(1995-2000 年)》中找到呼應，但每一項都有著一定程度的文化轉譯。例如，「婦女與保健」在《中國婦女發展綱要(1995-2000 年)》中，被強調的是「保障婦女享有計劃生育的權利」；「婦女與貧窮」被轉譯為「重視和扶持邊遠、貧困和少數民族地區婦女發展」；「對婦女的暴力行為」被轉譯為「有效遏制對婦女的暴力侵害及拐騙、買賣婦女的犯罪行為和賣淫嫖娼違法活動」，被強調的是這些活動的違法性質；「婦女與武裝衝突」變成了「擴大我國婦女同各國婦女的友好交往，促進世界和平」，略去了國際舞台上國族間的戰爭的酷烈；「婦女的人權」則被收窄為「婦女的勞動權益」。

與此同時，《行動綱領》中「婦女與媒體」、「婦女與環境」、「女童」等三項目標，是《中國婦女發展綱要(1995-2000 年)》所沒有的。儘管《中國婦女發展綱要(1995-2000 年)》有提及「改善婦女發展的社會環境」，但這始終跟《行動綱領》中自然生態平衡的關懷，有一定距離吧！可見這兩份文件所分別開列的目標，並

非如黃啓璪所形容般的那麼「互相銜接、互相呼應」。³⁸

可以看得出，以上的轉譯，有政治上的考慮，也有後發國家在現代化進程中的經濟計算。但《中國婦女發展綱要(1995-2000 年)》最突出的地方在於，它對如何具體落實政策、監察政策的進行、評估政策的成果方面，都有相當具體的說明。可以這麼說，《中國婦女發展綱要(1995-2000 年)》與《行動綱領》的關懷重點，各有不同，但二者卻存在著很大的文化協商的空間，讓二者在互相借助的情況下，各自取得其所需。

當然，《行動綱領》與《中國婦女發展綱要》之間的文化協商，以至整個世婦會的籌備與進行，並非如中國官方所對外呈現那樣的風平浪靜。事實上，世婦會的前後以及進行的期間，官方與民間之間，便顯得暗流處處。例如，「非政府組織婦女論壇」最終被安排在距離北京市(世婦會官方會議進行地點)約三小時來回車程的懷柔舉行，便是在顯示出中國官方與民間非政府組織，以至學界之間有形無形的張力。³⁹ 根據李小江，隨著世婦會的逼近，國內有關的刊物甚至被告知，不得刊登她的文章和照片；大會期間不準展出她所撰寫以及主編的著作；而她所創辦的鄭州大學國際聯誼女子學院，更被新上任的鄭州大學校長曹策問先生，以「代管」為名解散了；而不少民間婦女組織或個人，也在不同的理由下承受了相似的政治壓力。⁴⁰ 她認為：

將這次有關全世界婦女命運的國際會議與中國政府形象如此緊密地聯在一

³⁸ 黃啓璪著：〈談談婦女問題〉，《中國婦女研究年鑑：1991-1995》，頁 16。

³⁹ 具體情況可參考：洪雪蓮著：〈我看北京婦女大會官方會議〉，《用女性的眼睛看世界——記第四屆世界婦女大會非政府組織論壇》，頁 14-15。

⁴⁰ 李小江著：〈女權主義的抉擇——中國大陸首間女子學院創辦人拒絕出席世婦會〉，香港：《明報月刊》1995 年第 10 期，頁 83。另外，鄭州大學國際聯誼女子學院的情況可參考：李小江著：《告別昨天——新時期婦女運動回顧》，鄭州市：河南人民出版社，1995 年，152-162。此外，有關民間婦女組織與個人在世婦會前後或進行期間的受壓情況，亦可証諸部分中國婦女研究學者本身的相關敘述，可參考：杜芳琴著：〈我的婦女研究歷程〉，李小江主編：《身臨「奇」境——性別、學問、人生》，頁 184-185。

起，使中國婦女處於非常尷尬的境地：即使在「非政府論壇」上，也沒有任何人能夠以個人意志發言或為婦女代言反映她們中間存在的問題。國家嚴格控制下，根本沒有可能自由討論問題。⁴¹

在上述的背景下，對於《行動綱領》與《中國婦女發展綱要》之間的文化協商，筆者認為起碼有幾點是值得注意的。首先，在中國改革開放的語境中，「發展主義」話語差不多成為了整份《中國婦女發展綱要》的必然前提；而我們不難看到在這樣的國家意志下，《中國婦女發展綱要》在呼應《行動綱領》所開出的一系列目標的同時，作出相應的文化轉譯。因此，「婦女與保健」在《中國婦女發展綱要》中，被強調的是「保障婦女享有計劃生育的權利」；而「婦女與環境」中對自然生態平衡的關懷，則被轉譯為《中國婦女發展綱要》中的「改善婦女發展的社會環境」。

第二，國家安全與社會的整體隱定性仍然被放在凌駕性的首要地位。因此，《行動綱領》中的「對婦女的暴力行為」，在《中國婦女發展綱要》被轉譯為「有效遏制對婦女的暴力侵害及拐騙、買賣婦女的犯罪行為和賣淫嫖娼違法活動」，被強調的是社會治安與控制；而「婦女的人權」則被收窄為「婦女的勞動權益」。

第三，《中國婦女發展綱要》中的「重視和扶持邊遠、貧困和少數民族地區婦女發展」，固然是對《行動綱領》中的「婦女與貧窮」的文化轉譯，也跟持續惡化之中的中國婦女、尤其是底層婦女的生存狀況相關。但正如筆者將會在第五章所指出的，九十年代中國社會最突出的社會事實，是貧富的加劇分化，而貧富的二極分化在現實中則表現為階級、性別、民族(漢族 vs. 少數民族)、城鄉和地域(沿海 vs. 內陸地區)之間差距的進一步擴大。如此看來，《行動綱領》與《中國婦女發展綱要》之間的文化協商結果，在效果上，恐怕更多地是「性別」、「貧困」與「社

⁴¹ 李小江著：〈女權主義的抉擇——中國大陸首間女子學院創辦人拒絕出席世婦會〉，香港：《明報月刊》1995年第10期，頁82。

會弱勢」等問題對「階級」問題的取代，在突出「性別」、「貧困」與「社會弱勢」等問題的同時，也對愈演愈烈的「階級」問題，形成了某種話語的遮蔽。⁴²

《行動綱領》對中國婦女研究的影響

但無可否認，《北京宣言》與《行動綱領》對於中國婦女研究來說，是影響深遠的，尤其是「將性別觀點納入所有政策和方案的主流」、「賦予婦女權力」、「社會性別」等提法或概念，在世婦會之後，(起碼在中國婦女研究界內)更是甚囂塵上。

我們知道，一個概念或命題的意義，並不是自足的。一個概念或命題的意義，往往由同一話語序列中的其他概念或命題所界定，反之亦然。由是觀之，挾著「將性別觀點納入所有政策和方案的主流」的令牌，「社會性別」概念在世婦會後的開花結果，也不光是一個概念的事。事實上，「社會性別」正正挾帶著「貧窮」、「教育」、「保健」、「暴力」、「經濟」、「參與權力決策」、「人權」、「環境」與「女童」等等《行動綱領》中的核心概念，在後世婦會的中國婦女研究界中，掀起了一場幅員廣闊的話語重構運動。

若果我們把《中國婦女理論研究十年》、《中國婦女研究年鑑：1991-1995》、《中國婦女研究年鑑：1996-2000》等三本婦聯系統的重要著作的內容作比較，⁴³ 我們會發現：《北京宣言》與《行動綱領》的確對於婦聯系統有關整個婦女研究的話語，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⁴² 在中國九十年代，有關性別與階級議題及其話語的互相借和遮蔽的情況，見本文第五章；另可參考：戴錦華著：〈「故事」裡的故事——後社會主義時代的性別與階級表述〉，《性別中國》，台北市：麥田出版社，2006年，頁125-158。

⁴³ 熊玉梅、劉小聰、曲雯主編：《中國婦女理論研究十年》，北京：中國婦女出版社，1992年；陶春芳主編：《中國婦女研究年鑑：1991-1995》；劉伯紅主編：《中國婦女研究年鑑：1996-2000》。

首先，相比於代表了中國婦女研究的八十年代成果的《中國婦女理論研究十年》，在《中國婦女研究年鑑：1991-1995》中，「婦女健康研究」、「婦女與環境」、「女童工作與女童問題研究」、「女性與宗教研究」、「婦女與現代化研究」、「婦女與科技發展」、「少數民族婦女研究」、「老年婦女現狀及問題」、「婦女史研究」、「台灣大學」婦女研究十年研討會」簡介」、「美國女性主義與中國婦女研究簡介」與「量化方法中國婦女研究的應用」等等，都是新課題。若果我們把這些新的課題與《行動綱領》的內容比對，「婦女健康研究」、「婦女與環境」、「女童工作與女童問題研究」等等，明顯是對《行動綱領》的回應。此外，「婦女與現代化研究」、「婦女與科技發展」等課題，則可視為《行動綱領》中「婦女與經濟」、「婦女的教育和培訓」等內容的引申，而「少數民族婦女研究」則是「婦女與貧窮」的中國本土版本。至於「女性人才學」、「城市婦女就業研究」、「婦女教育研究」、「婦女參政研究」等《中國婦女理論研究十年》中所原有的課題，則可以順利過渡，成為《行動綱領》中「婦女與經濟」、「婦女的教育和培訓」與「婦女參與權力決策」等內容的對應。

但值得注意的是：像年鑑這一類出版物，本身不一定就完全反映相關研究領域的所有實況，年鑑書寫也是一種話語實踐，它不斷的劃界、包納、排除，並重組它也身在其中、受其制約的話語型構。可以這麼說，借助《北京宣言》與《行動綱領》，起碼婦聯系統的確進行了一場有關中國婦女研究的關鍵性的話語重構。

來到《中國婦女研究年鑑：1996-2000》，「婦女法律與人權研究」、「婦女與家庭暴力研究」、「婦女與反貧困研究」、「婦女與媒體研究」、「婦女組織研究」等新課題，則明顯是對《行動綱領》的內容的進一步回應，《中國婦女研究年鑑：1996-2000》的編者在該書前言中，便開宗明義的指出：「這些研究領域是受第四次世界婦女

大會的影響新興起的研究熱點。」⁴⁴

至於《北京宣言》、《行動綱領》等文件的出現，到底對中國婦女研究的個別領域產生了怎樣的具體影響，打開了怎麼樣的話語空間，如何被人們具體地應用或挪用，其間又存在著怎樣的張力以及文化協商，由於筆者將於下一章就「婦女與發展」概念的個案，作一補充性的引申研究，故此暫且按下不表。

「社會性別」在《婦女研究論叢》中的概念簡史(1992-2000)

最後，關於「社會性別」的概念本身，筆者想以《婦女研究論叢》的個案作為一個切面，簡略的看看它在九十年代的中國婦女研究的接受情況。

Gender 概念最早在《婦女研究論叢》的出現，大概可推算至 1993 年第二期的一篇有關「上海市中外婦女問題研討會」的綜述。⁴⁵ 該篇綜述在提到當時仍在美國攻讀博士學位的王政的會上發言時，便曾提及「文化性別」的概念。⁴⁶ 至於那是該文作者的再轉譯，還是王當時對 Gender 的譯法，則不得而知。但可以比較確定的是，那大概是 Gender 概念在《婦女研究論叢》的首次亮相。

當然，「社會性別」概念在《婦女研究論叢》的正式亮相，肯定是在同年第四期上一篇有關「第一屆中國婦女與發展研討班」的綜述文章中。根據該篇綜述，「社會性別」的概念主要是王政、徐午等留美博士研究生所提出。儘管「第一屆中國婦女與發展研討班」一直被認為是大陸首次較有系統地引介與探討社會性別理論場合，該篇綜述的作者劉伯紅對「社會性別視角」的「轉述」跟其原義相比，並

⁴⁴ 中國婦女研究年鑑編輯部著：〈前言〉，《中國婦女研究年鑑：1996-2000》，頁 5。

⁴⁵ 該研討會由上海市婦女學學會協助市婦聯主辦，於 1992 年 11 月 5 至 9 日舉行；詳情見：章黎明著：〈婦女的今天和明天——上海市中外婦女問題研討會綜述〉，《婦女研究論叢》，1992 年第 2 期，頁 58-60。

⁴⁶ 章黎明著：〈婦女的今天和明天——上海市中外婦女問題研討會綜述〉，頁 60。

不算有太大的偏離，但劉在該文中卻逕直把「社會性別視角」理解為「女性視角」。

⁴⁷ 可見，當時的《婦女研究論叢》對於「社會性別」概念，仍然處於充滿誤譯的格義階段，主要以既有的「性別意識」話語轉譯「社會性別」的概念。

翌年，《婦女研究論叢》第一期發表了王政的〈美國婦女健康運動的起因與發展〉，才首次正式介紹了「社會性別」的概念與理論。在該文中，作者王政在引介美國婦女健康運動的概況的同時，對「生理性別」(Sex)與「社會性別」(Gender)之間的區別，作了簡要而明確的理論說明。⁴⁸ 值得注意的是，同年在《婦女研究論叢》第四期的一篇名為〈從文化性質看中國女運動員的成就〉的文章中，作者任未多已運用上 gender 的概念分析中國女運動員的表現。在該文中，作者曾分別以「生理意義上的性」與「文化意義上的性」來翻譯 Gender 與 Sex 這一對概念，但不少時候，卻因為「中文目前尚無可以分別生理意義上的性和文化意義上的性這兩個有區別的詞」，而直接採用 Gender 與 Sex 這兩個英文詞。可見，在 Gender 與「社會性別」之間，仍然處於暗晦不明的過渡期，但遇上 gender role、gender role ideology、gender role stereotypes 等概念時，作者仍然傾向把當中的 gender 翻譯成「性」，而從上述的組合詞看來，作者主要還是傾向從功能主義的角度，把 gender 看待成兩性在社會上的「性角色」。⁴⁹

然而，要待至 1996 年，「社會性別」的概念，才比較持續地在《婦女研究論叢》上出現。首先，在該年四期的期刊中，已有不少文章採用了「社會性別」的概念，而「社會性別平等」、「社會性別公正」、「社會性別角色」等詞語組合亦有被使用。

⁵⁰ 與此同時，亦有文章以「性別」翻譯 Gender 的概念，而「性別意識」、「性別

⁴⁷ 劉伯紅著：〈“中國婦女與發展”——研討要點綜述〉，《婦女研究論叢》，1993 年第 4 期，頁 59-62。

⁴⁸ 王政著：〈美國婦女健康運動的起因與發展〉，《婦女研究論叢》，1994 年第 1 期，頁 55-59。

⁴⁹ 任未多著：〈從文化性質看中國女運動員的成就〉，《婦女研究論叢》，1994 年第 4 期，頁 17-19。

⁵⁰ 例如，Lisa Stearns 著：〈非政府組織與《行動綱領》〉，《婦女研究論叢》，1996 年第 2 期，頁 8-11；鄭新容著：〈北師大首開「婦女與研究」課程〉，《婦女研究論叢》，1996 年第期，頁 61；

觀點」等則屬於同一概念家族的支裔。⁵¹ 可見，對應於 Gender 的概念，「社會性別」、「性別」等不同譯法，均有作者使用，沒有一定。

當然，有文章只是提及「社會性別」的概念，內文不一定以「社會性別」理論為分析架構。⁵² 但亦有文章開宗明義的以「社會性別」的概念和理論為重心。⁵³ 反過來說，有些文章儘管仍然沿用一般人所熟悉的以「性別」概念，但內文所提及的論點卻處處有著「社會性別」理論的迴響。⁵⁴ 可見，「社會性別」的概念與理論在《婦女研究論叢》的論域中的滲透，正漸次增長。

究其原因，「社會性別」概念之所以開始比較持續地出現，大概跟《婦女研究論叢》於 1996 年舉辦了一連兩期(第二、三期)的「世婦會與《行動綱領》」專輯有關。當然，世婦會後國際上的連串後續活動，大概也促成了「社會性別」概念的加快引入，因為聯合國世界婦女地位委員會在 1996 年，即根據《行動綱領》的十二個關切領域，確定了 1996 至 2000 年的委員會工作方案，逐年審議《行動綱領》各個關切領域在各國的落實情況。⁵⁵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婦女研究論叢》的編者，亦開始在雙語(中英)的目錄與文章內容的英語摘要中，以 gender 反過來翻譯「性別」、「社會性別」等中文詞，

胡玉坤著：〈全球婦女運動的地方性與差異性——《來自地方女權主義的挑戰》序言譯介〉，《婦女研究論叢》，1996 年第 3 期，頁 53-57；趙捷著：〈健康與女權：婦女衛生保健的非醫學模式思考〉，《婦女研究論叢》，1996 年第 4 期，頁 13-16。

⁵¹ 例如，黃啓瓏著：〈黃啓瓏談：性別觀點納入決策主流〉，《婦女研究論叢》，1996 年第 3 期，頁 4；李慧英著：〈將性別意識納入決策主流的討論〉，《婦女研究論叢》，1996 年第 3 期，頁 5-7、18；劉伯紅著：〈農村流動人口與性別——“中國農村勞動力流動國際研討會”有關論點綜述〉，《婦女研究論叢》，1996 年第 4 期，頁 53-56。

⁵² 胡玉坤著：〈全球婦女運動的地方性與差異性——《來自地方女權主義的挑戰》序言譯介〉，頁 53-57；馮媛著：〈婦女：對象？主體？〉，《婦女研究論叢》，1996 年第 3 期，頁 62-63。

⁵³ 杜芳琴著：〈婦女史研究：女性意識的“缺席”和“在場”〉，《婦女研究論叢》，1996 年第 4 期，頁 4-8。

⁵⁴ 劉伯紅著：〈農村流動人口與性別——“中國農村勞動力流動國際研討會”有關論點綜述〉，《婦女研究論叢》，1996 年第 4 期，頁 53-56。

⁵⁵ 馮淬著：〈國際社會落實世婦會的後續活動〉，康冷主編：《婦女發展與對策——第四次全國婦女理論研討會論文集》，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8 年，頁 7-12。

但文章本身卻不一定跟「社會性別」理論真的有關。事實上，這一種反過來的概念翻譯，往後亦逐漸成為了該刊的一種固定做法，gender 一詞，也就屢見不鮮。不過，該刊卻不時有以 social gender 翻譯「社會性別」的情況出現，這或許是外語水平的問題，也可能是譯者對「社會性別」理論尚未完全把握的反映，亦可能是「性別意識」話語仍然在作遂。基於與國際接軌和交流的想像與欲望也好，基於理論旅行的雙向迴路也好，但可以肯定的是，對於《婦女研究論叢》的編者來說，「社會性別」概念的引入，已不單是一個純粹被動的舉措，它更是編者主動出擊的一種話語實踐。

基本上，打 1997 年以後，「社會性別」的概念與理論在《婦女研究論叢》中的滲透，是與日俱增的。雖然，「性別」、「社會性別」等譯法一直並存，但「社會性別」愈來愈為人所接受與使用，卻是不爭的事。而且，人們採用「社會性別」一詞，已不單流於字面，對「社會性別」概念的理論綜述、引介與辯析愈來愈多，⁵⁶ 而直接採用「社會性別」理論作為分析架構的經驗研究與評論，⁵⁷ (尤其是 1998 年之後)亦開始出現。在 1999 年第一期的《婦女研究論叢》上，甚至有高達 58% 的文章討論「社會性別」的概念和理論，或以之作為經驗研究之理論依據。⁵⁸ 可

⁵⁶ 例如，王政著：〈“女性意識”、“社會性別意識”辨異〉，《婦女研究論叢》，1997 年第 1 期，頁 14-20；榮維毅著：〈“女性主義與女性主義哲學：理論和實踐研討會”概述〉，《婦女研究論叢》，1997 年第 1 期，頁 61-64；齊文穎著：〈加強對國外的婦女研究〉，《婦女研究論叢》，1997 年第 3 期，頁 11-13；張艷霞著：〈1996 年中國婦女研究走勢〉，《婦女研究論叢》，1997 年第 4 期，頁 12-15；李霞編譯：〈從“婦女參與發展”到“社會性別與發展”〉，《婦女研究論叢》，1998 年第 3 期，頁 32-34；李慧英著：〈我國社會性別研究的發展及其意義〉，《婦女研究論叢》，1999 年第 1 期，頁 46-48；金一虹著：〈社會性別理論：新視角、新思維方式與新的分析範式——《社會性別研究選譯》評介〉，《婦女研究論叢》，1999 年第 1 期，頁 58-60。

⁵⁷ 例如，崔鳳垣、程深著：〈婦女地位研究方法新探——性別平等發展指數〉，《婦女研究論叢》，1997 年第 1 期，頁 9-13；李慧英著：〈電視刻女性形象中的性別意識〉，《婦女研究論叢》，1997 年第 3 期，頁 43-49；張李璽著：〈夫妻衝突：家庭性別分工模式重構中的一個必然現象〉，《婦女研究論叢》，1998 年第 3 期，頁 4-8；田禾著：〈東南亞流動婦女的社會地位述評〉，《婦女研究論叢》，1998 年第 4 期，頁 38-43；李新建著：〈性別歧視與女性就業：理論、問題、對策〉，《婦女研究論叢》，1999 年第 1 期，頁 4-8；榮維毅著：〈社會性別視角與熱線諮詢服務〉，《婦女研究論叢》，1999 年第 3 期，頁 23-26；李洪濤著：〈單親母親現狀研究〉，《婦女研究論叢》，2000 年第 2 期，頁 18-22。

⁵⁸ 該期共收十七篇文章，其中有十篇文章論及「社會性別」的概念和理論，或以之作為經驗研究之分析架構，見《婦女研究論叢》，1999 年第 1 期。

見，在九十年代下半葉，「社會性別」的概念和理論已逐漸得到一定程度的本土化。

第五章

改革開放中的「婦女與發展」話語

關鍵詞：發展、婦女與發展研究

本章是第四章的一個進一步的引申，關鍵詞是「發展」和「婦女與發展研究」(Women and Development Studies)。

正如筆者在前一章所言，gender(社會性別)的概念是在九十年代，才較有系統的被引入中國當代婦女研究領域的。而隨著 1995 年北京世婦會上對《北京宣言》和《行動綱領》等兩份綱領性的國際文件的簽定，以及同年稍早前國務院對《中國婦女發展綱要(1995-2000 年)》的頒布，gender 的概念更以「社會性別」的面貌，大幅地進入中國當代婦女研究以至婦女工作的不同領域。筆者在前一章中曾經指出：「一個概念或命題的意義，並不是自足的。一個概念或命題的意義，往往由同一話語序列中的其他概念或命題所界定，反之亦然。」¹事實上，「社會性別」的概念正正是夾帶著不同的概念，或隨著不同的理論，舉步進入中國當代婦女研究以至婦女工作的不同領域的。「婦女與發展研究」正是其中一個這樣的新興研究領域，而其中被主要引介與引入的，正是該一研究領域中的「婦女參與發展」(Women in Development, WID)、「婦女與發展」(Women and Development, WAD)與「社會性別與發展」(Gender and Development, GAD)等模式。²

¹ 見本文第四章。

² 有關「婦女參與發展」、「婦女與發展」與「社會性別與發展」等模式的具體內容，可參考本文第四章，不贅。另外，「婦女與發展」(Women and Development)一詞兼指西方發展研究(Development Studies)中的一個研究領域，以及在該個領域中的其中一種理論模式，為免混淆，筆者將在後一個意思的使用上，另外標出其英文簡稱 WAD，以茲識辨。

固然，「婦女與發展研究」在九十年代的興起與發展，跟 1995 年北京世婦會的舉行，以及《北京宣言》、《行動綱領》和《中國婦女發展綱要(1995-2000 年)》等文件的簽定與頒布，有直接的關聯，但筆者認為，這個新興領域之所以能夠在九十年代出現，更關鍵的因素卻在於改革開放話語在九十年代的歷史性轉折，以及九十年代中國加速進入全球化的歷程，其間的關鍵詞是「發展」。本章希望透過「婦女與發展研究」這一個切入點，嘗試把女性主義話語放回中國九十年代以來的現代性語境，進一步探討這一個接受過程的話語條件，並指出女性主義話語在中國現代化大計中的具體作用、位置與歷史困境，以及走出歷史困境的可能性。

第一節 「婦女與發展研究」的中國境遇

根據文獻，1993 年於天津師範大學舉行的「中國婦女與發展——地位、健康、就業研討班」，可算是國內首次較有系統地引介國外「婦女與發展」理論研究的場合。在該次研討班上，仇乃華宣讀了〈以婦女與發展研究的視角看婦女與社會經濟變革〉一文，對國外「婦女與發展」研究的成立背景與學科特點，作出了介紹與討論，³ 是天津班上唯一涉及「婦女與發展」研究領域的文章。但值得注意的是：儘管仇在該文中也提到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對自由派女性主義的批判、「性別視角」、「性別分析」、「戰略性性別利益」(Strategic Gender Interests)、「實用性性別利益」(Practical Gender Interests)等「婦女與發展」研究中的關鍵概念，

⁴ 仇對該一研究領域的介紹仍然比較簡略，全文隻字未提「婦女參與發展」

³ 仇乃華著：〈以婦女與發展研究的視角看婦女與社會經濟變革〉，杜芳琴主編：《中國婦女與發展：地位、健康、就業》，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 年，頁 73-81。

⁴ 在社會性別理論與「婦女與發展研究」的領域中，「(社會)性別視角」是深刻觀察性別關係、認識性別差異與歧視的工具，通過「(社會)性別分析」，比較女性相對男性而存在的關係，人們確定了兩性在社會上的地位，並豐富和補充了以往對性別不平等起源的認識，從而增強「性別視角」、提高「性別敏感」；見李秋芳主編：《半個世紀的婦女發展：中國婦女五十年理論研討會論文集》，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2001 年，頁 624。至於「戰略性(社會)性別利益」(也叫「戰略性(社會)性別需求」，Strategic Gender Needs)，指以改革現存社會性別關係、實現性別平等為目標而需要滿足的需求、實現的利益；「實用性(社會)性別利益」(也叫「實用性(社會)性別需求」，

(WID)、「婦女與發展」(WAD)、「社會性別與發展」(GAD)等重要模式。及至 1995 年，中華海外婦女學會主編的文集《西方女性主義研究評介》在國內出版，而仇乃華則在天津班所發表的論文的基礎上擴充，改寫而成〈婦女與發展：理論、實踐與問題〉一文，對「婦女與發展」研究領域中的各種概念與理論，有較詳盡的交待，其中包括「婦女參與發展」(WID)、「婦女與發展」(WAD)、「社會性別與發展」(GAD)等等重要的理論。⁵ 然而，仇文的兩個版本都偏重於國外理論的介紹，基本上並未結合中國的具體情況，作出相應的挪用與分析。可以這麼說，國內至此對於「婦女與發展」研究的介紹還是比較少與初步，而中國的婦女研究與婦女工作界，則要待至 1995 年世婦會以後才開始對相關的理論有較廣泛和深入的引介、認識與討論。

正如前一章所提及的，由 1993 年起，中華海外婦女學會一共主辦了三屆的「中國婦女與發展研討班」，而合辦機構亦由當初的天津師範大學婦女研究中心(1993 年)變成後來的江蘇社會科學院(1997 年)，以至四川婦女聯合會(1998 年)，可以看得出，其策略正針對性的往「對應現實中的婦女問題」的方向轉移。若果我們把三屆「中國婦女與發展研討班」的整體佈局作出比對，以上的走勢就更為明顯，而「婦女與發展研究」則成為了這種走向的最終接合點。

就以「第一屆中國婦女與發展研討班」的整體佈局來說，在「現代化、婦女與發展」、「社會文化、婦女地位與健康」、「社會轉型與婦女就業」以及「女性人口與婦女教育」等四大主題的板塊中，如前所述，只有仇乃華的論文〈以婦女與發展

Practical Gender Needs)，則指在現存社會性別關係中，為履行現存社會性別角色而需要滿足的在生活上的迫切需求、實現的利益；見 Caroline O. N. Moser, "Gender Planning in the Third World: Meeting Practical and Strategic Gender Needs", *World Development* 17, 11(1989), pp. 1799-1825；中譯：卡羅琳·摩塞 (Caroline O. N. Moser) 著，劉東曉譯：〈第三世界中的社會性別計劃：滿足實用性和戰略性社會性別需要〉，王政、杜芳琴主編：《社會性別研究選譯》，北京：三聯書店，1998 年，頁 266-304。

⁵ 仇乃華著：〈婦女與發展：理論、實踐與問題〉，鮑曉蘭主編：《西方女性主義研究評介》，北京：三聯書店，1995 年，頁 203-239。

研究的視角看婦女與社會經濟變革〉涉及「婦女與發展研究」的課題(該文收歸「現代化、婦女與發展」的主題下)，而整個研討班的內容則仍然跟中國婦女研究一直以來所涉及的範圍相去不遠，由〈以婦女與發展研究的視角看婦女與社會經濟變革〉(仇乃華著)、〈經濟改革與農村婦女〉(高小賢著)、〈婦女社會地位制約機制〉(鄧微著)、〈傳統性別文化和中國婦女地位〉(杜芳琴著)、〈美國婦女健康運動的起因與發展〉(王政著)、〈毀塔者的聲音——論聶紺弩的婦女觀〉(舒蕪著)、〈婦女生育健康項目介紹〉(全國婦聯婦女研究所)、〈從“妻管嚴”現象看中國婦女解放〉(袁芳遠著)、〈社會轉型與中國婦女就業〉(譚深著)、〈婦女地位與人口問題〉(易小冶著)到〈女性：走出婚姻困境——轉型期婚姻與女性抉擇〉(陳一筠著)，不一而足，內容相當廣泛。⁶

至於 1997 年於南京舉行的「第二屆中國婦女與發展研討班」，則由「理論篇」、「經濟篇」、「文化篇」以及「健康篇」等主題的四大板塊所組成。⁷ 值得注意的是：(一)筆者在前一章所提到的那種因《北京宣言》、《行動綱領》、《中國婦女發展綱要(1995-2000 年)》等文件的簽定與頒布而在婦女研究界內部產生的話語重構，明顯地對南京班的整體佈局產生了關鍵性的影響。例如，在「文化篇」這個大板塊中，絕大部分的論文便是有關大眾傳媒的研究，這明顯是對《行動綱領》中所開出的「婦女與媒體」課題的呼應，也應合了大眾傳媒在九十年代中國的火速發展。

(二)直接涉及「婦女與發展研究」課題的論文多了，其中包括仇乃華的〈社會性別與發展——從“婦女發展”與“婦女與發展”的異同談起〉、馬笑東的〈婦女與發展〉和李小雲的〈發展進程中的婦女與性別問題〉。⁸ 究其原因，這其實也跟《北京宣言》、《行動綱領》、《中國婦女發展綱要(1995-2000 年)》等文件的簽定與頒

⁶ 杜芳琴主編：《中國婦女與發展：地位、健康、就業》，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 年。

⁷ 金一虹、劉伯紅主編：《世紀之交的中國婦女與發展——理論·經濟·文化·健康》。

⁸ 仇乃華的論文收歸「理論篇」的主題下，至於馬笑東與李小雲的論文則收歸「經濟篇」。

布有關。因為在世婦會效應的帶動下，國際基金的婦女與發展項目開始於九十年代中加速進入中國的婦女研究界與婦女工作界，⁹ 這連帶地也讓「婦女與發展研究」的理論和實踐得以進一步被介紹和引入。就以上三篇論文的具體內容而言，雖然仍以介紹國外的相關理論為主，但有兩點是尤其值得注意的。首先，三篇論文的問題意識都明確地指向本土。例如，〈發展進程中的婦女與性別問題〉一文甫一開首便指出：

這裡我將「婦女」與「性別」列為兩個並列的概念，主要談的可能還是實踐方面的問題。這幾年婦女或性別問題非常時髦，幾乎所有的發展項目都在喊婦女參與，好像沒有婦女參與就沒有項目了。但是大家也不難發現：婦女與性別的問題仍然屬於「洋奴買辦」事業。幾乎所有的國際項目都強調這一問題，而國內的發展項目則幾乎無一涉及婦女與性別問題。¹⁰

而作者李小雲所關心的主要問題則是：「從客觀來看，在我國發展的實踐中基本上還存在著性別盲點或者說完全缺乏性別意識的現象，那麼為什麼在農村發展中一定要有性別意識呢？」¹¹ 正如引文所示，這樣的問題意識的出現，大概跟「婦女與發展研究」的理論開始在中國與具體的相關實踐磨合有關。可見「婦女與發展研究」在當時大概已踏前了一步，並非純粹停留在理論引介的階段。當然以上的問題意識只是整幅圖像的一端，至於中國婦女研究界與工作界對「婦女與發展研究」的概念和理論的接受，到底在九十年代還受著其他那些問題意識以及話語條件所制約，由於本文將於第二節一併處理，故暫且按下不表。

其次，雖然以上三篇論文對於其背後的問題意識著墨不多，但我們仍然可以從中看到其若干的具體指向。比如在〈發展進程中的婦女與性別問題〉一文中，作者

⁹ 高小賢著：〈婦女與發展在中國：對實踐的分析與再認識〉，徐午、許平、鮑曉蘭、高小賢主編：《社會性別分析：貧困與農村發展》，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頁10。

¹⁰ 李小雲著：〈發展進程中的婦女與性別問題〉，金一虹、劉伯紅主編：《世紀之交的中國婦女與發展——理論·經濟·文化·健康》，頁202。

¹¹ 同註10。

李小雲用來說明「沒有考慮婦女問題的發展項目」、「有考慮婦女問題的發展項目」、「婦女參與發展」(WID)項目¹²和「性別與發展」(GAD)¹³項目等項目框架之間成效差異的例子，便全部來自與「農村婦女」或「脫貧」有關的發展項目，¹⁴而這基本上與「婦女與發展研究」往後在中國的發展走勢吻合。雖然該文的重點在於理論介紹，但我們仍然可以從中取得點滴有關現實的消息。

及至 1998 年在成都舉行的「第三屆中國婦女與發展研討班」，「婦女與發展研究」的種種理論模式，基本上已成為了整個研討班的理論與討論的框架，而且研討的內容本身比此前更為焦點化，高度集中在「貧困」、「農村婦女」與「少數民族婦女」的議題上，「著重於用社會性別分析方法解析貧困、特別是農村中貧困的女性化和少數民族化的問題」。¹⁵在該次的研討班上，既有理論性的討論，也有個案研究、發展項目介紹、從社會性別角度出發分析的發展項目評估報告，以至發展項目的前期可行性研究等等，不一而足。¹⁶究其原因，大概部分地與中華海外婦女學會推廣「婦女與發展研究」的策略有關。因為自 1997 年起，中華海外婦女學會便開始在四川、雲南、陝西、江蘇、天津等西部地區先後贊助了十四個關於社會性別與貧困的小型研究項目，故此在第二、三屆「中國婦女與發展研討班」上，除了國內外的婦女研究學者外，亦開始有發展項目工作人員、婦聯與基層的婦女工作者參與其中，¹⁷而研討班則為「這些項目的立項構思提供了『碰撞』的空間」，¹⁸並為《行動綱領》中有關「將社會性別納入政策主流」的說法，提供具體的範例和對實際操作的指導。¹⁹

¹² 原文為「婦女與發展」(WAD)，但從上下文的語境推斷，應指「婦女參與發展」(WID)。

¹³ 該文作者採取「性別與發展」來翻譯 Gender and Development(GAD)一詞，跟該詞的一般譯法「社會性別與發展」有別。

¹⁴ 李小雲著：〈發展進程中的婦女與性別問題〉，金一虹、劉伯紅主編：《世紀之交的中國婦女與發展——理論·經濟·文化·健康》，頁 205-209。

¹⁵ 徐午、許平、鮑曉蘭、高小賢著：〈序〉，《社會性別分析：貧困與農村發展》，頁 1。

¹⁶ 詳情見徐午、許平、鮑曉蘭、高小賢主編：《社會性別分析：貧困與農村發展》。

¹⁷ 同註 15，頁 4。

¹⁸ 徐午、許平、鮑曉蘭、高小賢著：〈序〉，《社會性別分析：貧困與農村發展》，頁 4。

¹⁹ 同註 18，頁 4。

因此從整體的佈局出發，綜合三屆「中國婦女與發展研討班」的發展走勢，我們大概可以歸結出兩點：（一）雖然早在 1993 年的天津班上已有學者開始引介「婦女與發展研究」的理論，但在世婦會以前，國內的婦女研究與婦女工作界在這方面的介紹和研究還是比較少與初步，要待至 1995 年以後，在世婦會效應的帶動下，她們才開始對相關的理論有較廣泛和深入的引介、認識與討論，並嘗試結合中國的具體情況，作出相應的挪用與分析。（二）隨著「婦女與發展研究」在國內的真正著陸與發展，「貧困」、「農村婦女」與「少數民族婦女」等領域，最終成為了相關的研究和發展項目的主要集結地。

以上主要是學界帶動的情況。至於中國婦女研究界的整體情況，從婦聯系統出版的重要著作《中國婦女研究年鑑》，我們亦發現類似的發展趨勢。固然，《中國婦女研究年鑑》是婦聯系統的出版，在某程度上多多少少反映了該系統本身對於「婦女與發展」理論的取態以及接受程度，但由於《中國婦女研究年鑑》本身的概覽性質，在一定程度上，亦反映了中國婦女研究界內整體對於「婦女與發展」理論的接受情況與發展趨勢。

情況是這樣的：在《中國婦女研究年鑑：1991-1995》中，有直接提及「婦女與發展研究」方面的概念和理論的，包括了金一虹的〈婦女與現代化研究〉、高小賢的〈農村婦女研究綜述〉以及有關「促進華北地區婦女對農村發展的參與」項目的介紹。²⁰ 在這裡有幾點是值得注意的：（一）就《中國婦女研究年鑑：1991-1995》的內容所示，「婦女與發展研究」方面的概念和理論，在這階段主要在現代化研究與農村婦女研究等領域中被直接提及。（二）〈婦女與現代化研究〉一文主要分為「婦女與現代化理論研究方面」和「現代化及經濟發展對婦女發展

²⁰ 金一虹著：〈婦女與現代化研究〉，陶春芳主編：《中國婦女研究年鑑：1991-1995》，北京：中國婦女出版社，1997 年，頁 206-213；高小賢著：〈農村婦女研究綜述〉，同前，頁 155-163；林志斌著：〈華北地區婦女對農村發展的參與〉，同前，頁 256-260。

的影響及婦女在現代化中地位作用研究」兩大部份，而有提及「戰略性性別利益」、「實用性性別利益」、「社會性別發展」、「社會性別發展規劃」等「婦女與發展研究」領域的重要概念的，是第一部分。但該文在論及「婦女發展理論研究」(第一節)時，只提到馬克思主義的發展觀，而西方「婦女與發展」研究的各種概念與理論，則分別分佈在「現代化及經濟發展與婦女發展關係研究」(第二節)、「社會性別發展規劃」(第四節)等兩節的名目下，可見該文仍視馬克思主義的發展觀為婦女發展理論研究的核心。(三) 在〈婦女與現代化研究〉一文中，作者在綜述這個領域的發展之時，雖然也有提及「戰略性性別利益」、「實用性性別利益」、「社會性別發展」、「社會性別發展規劃」等「婦女與發展研究」領域的重要概念，但所倚仗的材料主要是純粹理論介紹的文章。²¹ (四)至於〈農村婦女研究綜述〉，則僅視「婦女與發展」為九十年代上半葉農村婦女研究所關注的其中一個主要問題而已。該文既沒有怎樣具體提及「婦女與發展研究」領域的任何理論和概念，也沒有通過這些理論和概念貫串整個綜述，由此類推，「婦女與發展研究」在這階段大概仍然只算是個「新的來客」，入「鄉」未深。

可見在九十年代上半葉，「婦女與發展研究」基本上仍然處於「待發」的階段，但其往後愈加明顯的焦點化發展走勢，在這階段已有跡可尋，其中「農村婦女研究」領域更成為了「婦女與發展研究」日後的高度集結地之一。

及至《中國婦女研究年鑑：1996-2000》，有提及「婦女與發展」研究方面的概念和理論的，有〈農村婦女研究綜述〉(江波)、〈婦女與反貧困研究綜述〉(林志斌)等二文。²² 綜合而言，有幾點是值得注意的：(一)就《中國婦女研究年鑑：1996-2000》的內容所示，「婦女與發展研究」中的分流情況仍然延續，且愈趨明

²¹ 主要是仇乃華的〈婦女與發展：理論、實踐與問題〉，原文見仇乃華著：〈婦女與發展：理論、實踐與問題〉，鮑曉蘭主編：《西方女性主義研究評介》，北京：三聯書店，1995年，頁203-239。

²² 江波著：〈農村婦女研究綜述〉，劉伯紅主編：《中國婦女研究年鑑：1996-2000》，北京：中國婦女出版社，2004年，頁76-87；林志斌著：〈婦女與反貧困研究綜述〉，《中國婦女研究年鑑：1996-2000》，頁88-95

顯，「貧困」、「農村婦女」與「少數民族婦女」等成為了「婦女與發展」研究的概念和理論的主要集結地。(二)而且，「婦女與發展研究」的理論和概念在這些領域中所起的作用，也愈來愈重要。例如，〈農村婦女研究綜述〉一文便明確地指出，這一階段的農村婦女研究的其中一項特點，是以婦女與發展(WAD)為理論基礎，在社會性別與發展(GAD)範式的指導下，推動農村婦女研究。至於〈婦女與反貧困研究綜述〉一文，則通過「性別敏感性」、「性別分析」、「實用性性別利益」、「戰略性性別利益」等「婦女與發展研究」中的重要概念和理論，貫串了整個綜述，可見「婦女與發展研究」的概念和理論在「婦女與反貧困研究」領域中，已取得了理論上的樞紐位置，而性別尤其被視為婦女致貧、解決婦女貧困等等的重要因素。

至於其他出版方面，在世婦會前後，亦開始出現了不少有關「婦女與發展研究」或有引介相關理論的文集、譯文集，甚至教材；而在九十年代中後至今，婦女研究界在這方面的出版，更是有增無減，可見相關研究的引入與學科化進程已漸次深入與本土化。²³

但問題是：為什麼會是「婦女與發展研究」的理論和概念？而中國婦女研究與婦女工作界，又為什麼會在九十年代中以後，開始廣泛和深入接受這方面的理論與概念？而「貧困」、「農村婦女」與「少數民族婦女」等領域，又為什麼會最終成為這些理論和概念的主要集結地。換言之，構成了這些理論和概念的引入、接受以及流向的條件，到底是什麼？

²³ 例如，《西方女性主義研究評介》、《社會性別研究選譯》等文集與譯文集，均有收有引介或討論「婦女與發展」研究的文章，見鮑曉蘭主編：《西方女性主義研究評介》，北京：三聯書店，1995年；王政、杜芳琴主編：《社會性別研究選譯》，北京：三聯書店，1998年。至於《社會性別與發展譯文集》，則更是有關社會性別與發展的專題譯文集，見馬元曦主編：《社會性別與發展譯文集》，北京：三聯書店，2000年。而《社會性別與婦女發展》則是相關領域的課程教材，見鄭新蓉、杜芳琴主編：《社會性別與婦女發展》，西安：陝西教育人民出版社，2000年。

第二節 「(婦女)發展」意味著什麼？

在一次李小江跟美國東北大學歷史系教授柯臨清(Chris Gilmartin)的對談中，當李被柯問到 1995 世婦會後，她認為中國的婦女研究與組織有什麼變化時，李提出的其中一個明顯變化是：世婦會之後，「...『發展』成為主題，由『啓蒙』轉向『發展』，向婦女弱勢群體傾斜。」²⁴ 從本章第一節有關「婦女與發展研究」的接受史的描述，李的判斷大致跟現實中的情況吻合。但問題是：在世婦會後，中國的婦女研究與組織的主題，為什麼會由「啓蒙」轉向「發展」，並向婦女弱勢群體傾斜？事實上，自八十年代改革開放以來，「發展」一直都是整個中國當代社會的重要主題，那麼，說中國婦女研究界與工作界的主題由「啓蒙」轉向了「發展」，又是什麼意思？換一個方式問：跟八十年代的「發展」概念相比，中國婦女研究與工作領域在九十年代所言的，到底還是不是同一個的「發展」概念？若果已不是同一個的「發展」概念，人面桃花，新的「發展」概念的意含又到底是什麼？在九十年代的婦女研究與工作領域中，它又為什麼會跟「婦女弱勢群體」毗鄰連結？並為「婦女與發展研究」的理論和概念，打開了話語接受的大門？

鄧小平：發展才是硬道理!!

我們知道，中國改革開放在九十年代的其中一個重要的歷史轉折，是 1992 年的「鄧小平南巡」。1992 年春，鄧小平南下拜訪經濟特區深圳，並發出著名的「南巡講話」，²⁵，而「經濟體制改革」亦隨即再次被全面發動。但正如中國學者王

²⁴ 李小江、柯臨清著：〈關於“啓蒙”〉(1998 年)，李小江等著：《女性？主義：文化衝突與身份認同》，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0 年，頁 254。另外，李小江所言的「啓蒙」，首先指的是對女性性別意識的啓蒙，因為在「男女都一樣」的性別意識形態下，「解放後很長時間，女人丟失了自己，啓蒙就是找回自己」(見同書，頁 246)。當然，李所言的「啓蒙」並不是孤立的，需要被放回八十年代的整個人道主義思潮語境，始能被充分地理解。有關李小江的啓蒙論述跟中國八十年代的人道主義思潮之間的關係，詳情見本文第二章的相關分析。

²⁵ 「南巡講話」的具體內容見：中共深圳市委宣傳部編：《一九九二春 鄧小平與深圳》，深圳：海天出版社，1992 年，頁 1-14。

曉明所言：

但在根本上，1990年代的新一輪改革已經不再是1980年代從「聯產承包」開始的經濟改革的自然延續，更與1980年代從「思想解放運動」開始的政治和文化改革不相干。改革的指向明顯變了，它所遭遇的各種社會條件更是大變了。在1990年代，改革似乎僅僅意味著創造一個以利潤為唯一準則的新的經濟秩序，它要的只是效率、財富和經濟的競爭力，它應許的也只是社會的物質生活的改善，至於其他的那些事情：政治民主、環境保護、倫理建設、文化教育 都不在它的視野之內。²⁶

事實上，「南巡講話」的主調的確是經濟發展，鄧小平在講話中的名言「發展才是硬道理」²⁷，所言的「發展」便主要指經濟方面的發展。但問題是：中國八十年代所先後推行的「農村聯產承包」、「鄉鎮企業」、「城市國企改革」、「價格體制改革」等改革舉措，那有一項又與經濟體制改革無關？那麼，我們又該如何理解不少論者口中的，中國改革開放話語在九十年代的歷史性轉折？²⁸

要回答上述的問題，我們需要簡略地回顧1978年至「鄧小平南巡」以前中國改革開放的進程。首先，至1989年六四，中國改革開放可以區分為兩個階段，即1978至1984年的農村改革階段及1984年以後的城市改革階段。1978至1984年的農村改革，其重心在於局部地改變因(透過單位制)「城鄉分割」的二元社會體制而產生的，城鎮居民的社會地位普遍高於鄉鎮居民，以至城鄉收入有所差距的現象。這一改革主要包括了兩方面的內容：一，解散人民公社，國家重新均分農村土地，實行家庭「聯產承包」的責任制度；二，通過國家的政策調整，調高農

²⁶ 王曉明著：〈1990年代與「新意識形態」〉，《半張臉的神話》，桂林市：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3年，頁13；重點為筆者所加。

²⁷ 中共深圳市委宣傳部編：《一九九二春 鄧小平與深圳》，頁8。

²⁸ 關於1980年代到1990年代中國改革開放的歷史過程的變化，除了王曉明的分析，本章還參考了汪暉與戴錦華等的相關論述。見汪暉著：〈「新自由主義」的歷史根源及其批判——再論當代中國大陸的思想狀況與現代性問題〉，「天益網」(<http://www.tecn.cn/data/detail.php?id=12659>)，原文刊於《臺灣社會研究季刊》，第四十二期，2001年6月；戴錦華著：〈「故事」裡的故事——後社會主義時代的性別與階級表述〉，《性別中國》，台北市：麥田出版社，2006年，頁125-158。

產品的價格，鼓勵農民多種經營，發展鄉鎮企業，以抒緩毛澤東時代爲了城市工業化而被制度化的城鄉差別。農村改革的結果是，從 1978 至 1985 年，城鄉收入的差距逐漸縮小。但正如汪暉所言，這階段改革的成功，並不單純地由於開放了市場，而是由於體制改革所容許的生產靈活性，誘發了農民的積極性；加上國家通過價格調整爲社區性的農貿小市場提供了某種保護，抒解了一直以來不平等的城鄉二元結構。²⁹ 可見這階段的農村改革主要靠的，仍然是政策上的傾斜，而非純粹的靠市場，這跟九十年代當道的新自由主義邏輯相比，不可同日而語。

至於 1984 年以後的城市改革，重點則在於國有企業的改革，即從國家將部分權力下放給企業到對有些企業進行關、停、併、轉，最終從改變經營權轉向改變產權關係(即私有化)。此外，國家亦透過改革原先的計劃價格體制，開始營造市場環境。但跟第一階段的農村改革不同，城市改革帶來了新的社會動盪、矛盾與不平等。首先，由於國企改革，下崗與失業的問題開始冒現。第二，由於原有的大型國營工廠在資源佔有上具有壟斷性的優勢，當國家開始將部分權力下放給企業，甚至改變產權關係，在沒有相應的民主監察過程和經濟體制配合的情況下，原有資源佔有上的不平等瞬即轉化爲收益上的不平等，加上價格體制的改革尚未完成，爲腐敗與官倒提供了空間，國家內部(不同階層、不同部門、中央與地方政府)開始出現嚴重利益分化。第三，由於城市改革的推進與農村改革的裹足不前(集中表現在價格體制、戶口體制、勞保體制、生態問題，以及基層社會組織問題等方面)，城鄉差別再度擴大，1985 至 1989 年間，農民收入已經開始下降。但由於農村尚未如九十年代那樣捲入全面市場化的過程及其危機，農村並沒有直接捲入 1989 年以追求政治民主化改革、重申社會平等爲部分目標的民主運動。

然而，89 民主運動最後卻以悲劇告終。國家透過暴力的干預與威脅，把社會上

²⁹ 汪暉著：〈「新自由主義」的歷史根源及其批判——再論當代中國大陸的思想狀況與現代性問題〉。

對上述危機的不滿壓縮在極小的範圍(經濟領域)內，結果部分的社會政治力量，事實上被轉移到中國九十年代的全面市場化、資本主義化以至全球化的進程之中。而上述的階級和利益分化，則在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保護下，取得一定程度上的合法化。根據汪暉，所謂中國九十年代的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其核心內容是在沒有民主制度保障的前提下全面推進自發私有化進程，並通過立法程式將這一階級和利益分化的過程合法化。³⁰ 結果，九十年代中國社會最突出的社會事實，是貧富的加劇分化，而貧富的二極分化在現實中則表現為階級、性別、民族(漢族 vs. 少數民族)、城鄉和地域(沿海 vs. 內陸地區)之間差距的進一步擴大。

在上述語境的觀照下，也部分解釋了在《中國婦女發展綱要(1995-2000 年)》中，《行動綱領》的目標之一「婦女與貧窮」，為什麼會被轉譯為「重視和扶持邊遠、貧困和少數民族地區婦女發展」。因為在中國九十年代進一步捲入全面市場化、資本主義化以至全球化的過程中，農村瞬即成為了重災區之一，不少農村陷入危機甚至破產，大量農民被逼壓到社會的底層；而農村中的貧困，在八十年代以降愈演愈烈的多重不平等的社會結構下，則再進一步衍化為貧困的女性化和少數民族化。³¹ 這也是「婦女與發展研究」的理論和概念在九十年代的中國被接受的部分語境。此外，值得特別一提的是，正如高小賢所指出的，儘管中國政府自五十年代年開始，即透過土地改革、人民公社、農業合作化運動以至法律上的改革，動員農村婦女全面參與農業勞動與經濟發展，釋放農村婦女的勞動力，但並沒有從根本上改變在農村生產活動分工的兩性不平等(表現為(一)部分男性退出農業勞動，專門從事管理、社隊辦的工副業、飼養以及農業技術推廣等較重要與報酬高的新工作(二)由於農業社工分的標準是「男 10 分，女 7 分」，這使得婦女的勞動報酬遠低於同樣從事農業勞動的男性)，也沒有挑戰傳統的性別(家庭)分工，家裡幾乎所有家務勞動仍由婦女承擔。此外，婚姻的從夫居和以男性為戶主等父權和

³⁰ 汪暉著：〈「新自由主義」的歷史根源及其批判——再論當代中國大陸的思想狀況與現代性問題〉。

³¹ 具體情況亦可參考徐午、許平、鮑曉蘭、高小賢主編：《社會性別分析：貧困與農村發展》。

夫權文化習俗繼續保留，使得婦女在新的單位制中仍然無法取得經濟與社會上的獨立。隨著七十年代末開始的改革開放，國家和集體對農村控制的減弱和靠工分吃飯壓力的取消，本就已然存在的父權和夫權文化得以進一步加強，農村婦女相對低的教育程度以及繁重的家務勞動和再生產任務，在農村產業結構調整後都突顯了出來。³² 可以理解，在父權和夫權文化的影響下，加上中國農業的女性化在集體化大興水利年代(五十年代)已露端倪³³，在中國九十年代農村的進一步貧困化，為什麼會表現為貧困的女性化。³⁴ 由此可見，由五十年代的集體化時代的體制改革到七十年代末以來的改革開放，都沒有從根本上挑戰並改變傳統的父權/夫權文化。

當然，「婦女與發展研究」的理論和概念之所以集中流向「貧困」、「農村婦女」、「少數民族婦女」等領域，也跟國際發展組織和機構在方針上的調整有關。正如陝西省婦聯研究室主任高小賢所指出的：「到了 90 年代，隨著第四次世界婦女大會的召開和《行動綱領》的出台，國際上的多邊、雙邊以及各種非官方組織在我國各地、特別是貧困地區支持了大量的有關農村婦女的發展項目。」³⁵ 所謂理論/觀念隨著援助走，「婦女與發展研究」的理論和概念在九十年代(尤其是世婦會後)的中國，也就自然集中地流向「貧困」、「農村婦女」、「少數民族婦女」等領域。

然而筆者認為，「婦女與發展研究」的理論和概念的接受情況，也取決於集結於「貧困」、「農村婦女」、「少數民族婦女」等領域的中國婦女研究者與婦女工作者

³² 高小賢著：〈婦女與發展在中國：對實踐的分析與再認識〉，《社會性別分析：貧困與農村發展》，頁 4-7。

³³ 同註 32，頁 6。

³⁴ 此外，父權和夫權文化的復歸，亦表現於在城市改革中出現的「下崗女工」、「婦女回家討論」等現象；見戴錦華著：〈「故事」裡的故事——後社會主義時代的性別與階級表述〉，《性別中國》，頁 125-158。

³⁵ 高小賢著：〈婦女與發展在中國：對實踐的分析與再認識〉，《社會性別分析：貧困與農村發展》，頁 10。

本身的問題意識。固然，中國改革開放在九十年代的歷史性轉折、國際發展組織和機構的援助方針，的確為這些理論和概念提供了重要的接受條件，但前線的婦女研究者與婦女工作者本身的考量，卻實際地決定了這些理論和概念是*如何*被接受與被挪用，以對應她們所處的研究/工作領域的特定問題。事實上，「婦女與發展研究」的晚近發展(尤其是對「社會性別」概念及理論的強調)，在前線的婦女研究者與婦女工作者本身的眼中，正跟她們所面對的中國國情若合符節(詳後)。

話語的策略與現實的張力

跟中國八十年代以降引入西學的情況相像，中國當代婦女研究界與工作界對於「婦女與發展研究」方面的理論和概念的接受，在時間上，也是壓縮了的。當然，此種現象自晚清的現代化轉型以來，便從來如此，用金觀濤與劉青峰的話講：「...一種思想還沒有站穩，另一種觀念又來了。現代史的動盪代表了當代文化的混亂，中國人的頭腦似乎一直是外來思想的跑馬場。」³⁶ 就以中國八十年代「文化熱」期間對西學引入的情況而論，各種在西方文明花了好幾百年先後出現且帶著或批判或傳承的關係之思想，每每是同時或在短短幾年間如潮水般突然「湧入」當代中國的各個領域的。

九十年代，中國當代婦女研究界與工作界對於「婦女與發展研究」的理論和概念的接受，情況似乎也是如此。就以「婦女與發展研究」中的三種主要理論模式而言，即「婦女參與發展」(WID)、「婦女與發展」(WAD)與「社會性別與發展」(GAD)，它們便是該一領域中在時間上前後出現的幾種主要思想，而且後來者的建立，往往建基於對前行者一定程度上的批判，但中國當代婦女研究界與工作界，在九十年代基本上是「同時」引入上述的理論模式。然而有趣的是，儘管這些理論模式

³⁶ 金觀濤、劉青峰著：〈中國當代思想形成的歷史結構〉，宋曉霞主編：《『自覺』與中國的現代性》，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6年，頁27。

的前提與關注點不同，有時甚至互相矛盾，但當它們落在部分前線的婦女研究者與工作者的手中，卻在一定程度上被策略性地「混合地挪用」，以對應這些前線研究者/工作者在她們所處的工作環境中所碰到的特定現實問題。

那麼，對於這些前線婦女研究者與婦女工作者來說，她們在九十年代的中國所面對的到底是一個怎麼的大環境？如前所述，她們目下所正在面對的，是一個正在急速地進一步捲入市場化、資本主義化、全球化過程的(後)社會主義中國，而這個浩烈的大環境對於婦女(尤其是農村婦女與少數民族婦女)是相當不利的，改革開放以來出現的所謂「婦女問題」，便部分由此而來。*儘管新自由主義的邏輯在現實中日漸當道，但當代中國仍在骨子裡保留了一定程度上的社會主義體制，而「婦女與發展研究」正好為部分的前線婦女研究者與婦女工作者提供了好些概念和話語工具，在新自由主義邏輯與社會主義體制之間，為現實中的婦女建構一個迴轉與生存的環境。*

例如，美籍中國學者仇乃華在第二屆「中國婦女與發展研討班」上，便曾經就「婦女參與發展」(WID)、「婦女與發展」(WAD)、「社會性別與發展」(GAD)等三種理論流派，指出它們對於前線的中國婦女研究者與婦女工作者在實踐上的借鑒意義。³⁷ 她認為，在三種理論模式中，「婦女參與發展」(WID)目前在中國的影響最大，也最容易有影響力，而「婦女與發展」(WAD)和「社會性別與發展」(GAD)等可供我們借鑒的地方則沒有被充分地發掘。

仇乃華指出，「婦女參與發展」(WID)模式有幾個特點：對於現代化與市場機制，屬於女性主義自由派的「婦女參與發展」(WID)是不加批判地認同的，它不談體制問題而只講擴大婦女參與發展與生產的機會，而這種想法在國內都可見到。她

³⁷ 仇乃華著：〈社會性別與發展——從“婦女發展”與“婦女與發展”的異同談起〉，《世紀之交的中國婦女與發展——理論·經濟·文化·健康》，頁 49-67。

指出，在國內婦女與發展的實踐中，工作重點往往在於提高婦女本身的素質，這與「婦女參與發展」(WID)強調婦女在市場的競爭下，要提高自己的人力資本與自身價值有相似之處，但對性別與國家的發展目標、戰略以及政策的關係卻甚少談論。但她又指出，強調自由競爭的市場機制只講經濟原則，不講經濟和社會的平等和公正原則。市場機制以忽視甚至剝削弱勢社群為特點，因此以經濟增長為唯一目標的發展模式不會「自然地」導致兩性平等，而事實上，婦女往往是這種發展模式的最大受害者。她接著指出，中國向市場經濟轉型，實現現代化的願意逼切，容易由於急於追求「經濟效益」而忽視「社會公正」的問題。加上中國以社會主義立國，政府有促進男女平等的公開承諾，容易產生大方向已由國家解決，只待民眾參與的傾向。她重點指出，所謂參與，最重要的內容是參與對國家政治經濟政策的制定，使國家的政策反映出女性視角，並符合女性的需要。

接著，仇乃華又指出，當代中國在九十年代進行全面市場化之餘，同時也捲入了資本主義全球經濟體系與全球化的過程，而建立在新馬克思主義基礎上的「婦女與發展」(WAD)模式中，最值得我們借鑒的是它對資本主義全球經濟體系以及全球化過程的批判。她指出在全球經濟體系下第三世界婦女成為高度流動的國際資本的廉價勞力已是不爭的事，而這將會如何對地方經濟、勞動市場、文化、性別分工以至婦女本身產生影響，我們應借鑒「婦女與發展」(WAD)的模式來加以考察。此外，她又指出，國際發展組織和機構借著全球化的過程，也對第三世界的發展戰略以及項目產生了重大的影響，而且不少是負面的影響。因此，借鑒「婦女與發展」(WAD)的批判資源，我們需要小心考察國際發展組織和機構的資助，會否對中國的經濟發展以至婦女本身產生任何負面的影響。

有趣的是，仇乃華首先借助了「婦女參與發展」(WID)模式作為原型，對改革開放當下的主流發展話語，作出了重點的描述；然後從「婦女與發展」(WAD)的角度，指出資本主義全球經濟體系以及全球化過程，對於國內經濟發展以及婦女本

身的影響，慎防在世界範圍內的新自由主義思潮對經濟管理領域的入侵；之後再從「社會性別與發展」(GAD)的立場出發，指出當下的主流發展話語本身的盲點，而且這盲點甚至也存在於國內婦女與發展的實踐當中，即只談提高婦女本身的素質、擴大婦女參與發展與生產的機會，而忽視對性別與國家的發展目標、戰略以及政策的關係之討論。雖然仇對於現實中的性別不公正，並沒有作出直接的描述和分析，但她卻從「社會性別與發展」(GAD)中的「社會性別規劃」(Gender Planning)的觀念出發，重點地指出婦女從自身的角度介入國家政治經濟政策的制定之重要性。換言之，仇的分析重點在於從社會性別的視角出發，指出性別不公正結構性的體制根源，以及介入體制本身的重要性。

但與此同時，在仇乃華看來，正正是中國社會主義的體制本身，反過來對現實中的性別不公正問題形成了某種遮蔽。首先，在社會主義的官方意識形態下，男女不平等問題仍然被不少人看作是經濟不發達和落後的封建意識形態的反映，在婦女理論研究的主流中，社會性別仍未被看作為一與經濟政治等因素(階級)有關，但又具有相對獨立性的體系。其次，由於中國是社會主義國家，男女平等又是基本國策，故此要從「社會性別與發展」(GAD)出發，檢視整個現行的體制，並進行結構性的改變，便似乎顯得不那麼重要。

但不無吊詭地，正正因為中國仍然是一個將男女平等列為基本國策的社會主義國家，「社會性別規劃」在體制上才具有較為有利的實現條件。因此，有必要借助中國本身已有的社會主義體制力量，讓社會性別視角能夠被納入體制與政策的層面，以反映婦女的要求和聲音。這也是不少中國婦女研究者與婦女工作者的發展論述的其中一個或顯或隱的重要主題。³⁸

³⁸ 例如，在第三屆「中國婦女與發展研討班」上，便不乏這樣的例子，具體情況見金一虹、劉伯紅主編：《世紀之交的中國婦女與發展——理論·經濟·文化·健康》，而本文最後則將以韓嘉玲在會上宣讀的論文〈貧困地區農村婦女發展模式探討〉為例，作出進一步的具體說明。

當然，中國舊有的社會主義體制本身，也在轉型(解體)當中，並日漸趨近新自由主義的邏輯。北京社科院社會學所副研究員韓嘉玲在第三屆「中國婦女與發展研討班」上，便曾經以貴州省雷山縣的貧窮婦女個案為例子，指出八十年代改革開放以來，這種體制上的轉變對貧困地區農村婦女的深遠影響，並強調國家在政策上的干預對反婦女貧困的重要性。³⁹ 韓指出，八十年代以來，在市場經濟的競爭機制下，國家的政策重心從追求公平轉移到經濟增長，國家對地區、民間以至人民的生活的行政干預開始減弱。這種轉變的其中一項表現是國家對婦女所提供的福利和保護的減弱，其結果是貧困農村婦女的醫療條件、教育和讀寫能力的急劇下降，其中特別是醫療條件的急劇下降對貧困婦女產生了極為重大的影響。

具體來說，對農村的醫療衛生服務產生最大影響的，莫過於中央地方財政體制的改革以及集體農業的取消。隨著財政體制改革，農村衛生事業由所在縣級鄉級負責，有些地方出現了衛生院、婦幼保健站不願做沒有經濟收入或收入甚微的婦幼保健及預防工作，其中特別不願做沒有經濟收入的產前檢查、產後訪視等工作。在交通不便山區，初級衛生保健網的名存實亡、村衛生員及接生員的流失嚴重影響婦女的健康，更何況貧困的農村婦女根本無力負擔昂貴的醫藥費。

借助「社會性別與發展」(GAD)模式對「社會性別規劃」的強調，韓嘉玲指出，中國政府要實現自身的承諾，讓「人人享有衛生保健」的人民基本權利得到落實，就必須下大力氣，在資金和政策上對農村合作醫療進行扶持。之後，韓通過雷山縣的婦女醫療衛生的個案又進一步指出：

可知貧困婦女的发展在政治經濟結構不利的障礙尚未排除之前，只有通過國家積極干預才有可能實現。以「自由主義」為理論、自發的發展，不可能用

³⁹ 韓嘉玲著：〈貧困地區農村婦女發展模式探討〉，《世紀之交的中國婦女與發展——理論·經濟·文化·健康》，頁 93-114。

於解決發展中國家的貧困婦女發展問題。⁴⁰

由以上的例子，我們可以看到部分的前線婦女研究者與婦女工作者，是如何策略性地借助「婦女與發展研究」的理論和概念，在新自由主義邏輯與社會主義體制之間，為現實中的婦女建構一個迴轉和生存的環境。

⁴⁰ 韓嘉玲著：〈貧困地區農村婦女發展模式探討〉，《世紀之交的中國婦女與發展——理論·經濟·文化·健康》，頁 108。

第六章

結論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現代化始終是當代中國各個領域的一個中心議題。作為中國現代化進程的時代產物之一，中國當代婦女研究也通過對於女性主義話語的接受以及建構，以它自己的方式建構著自身的現代性。本論文自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中國當代婦女研究的兩個發展階段(1980 年代初至 1993 年、1993 至 2000 年)，分別抽取了一系列關鍵概念，透過一些具有分析意義或重要的相關話語事件個案，借助知識考古學的方法，以話語分析考察了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當代婦女研究對於女性主義話語的接受、建構與變遷，尤其是其間種種的文化協商。

正如筆者在導論中所提出的，本論文的主要立論是：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中國當代婦女研究對於女性主義話語的接受與建構，是一個充滿文化協商的過程，它開始於後文革與改革開放的雙重語境之中，面對中國社會主義的遺產與債務，其間障礙重重，無法得到真正的開展，而直至 1995 年聯合國第四次世界婦女大會的舉行、聯合國成員國對《北京宣言》、《行動綱領》等兩份全球性的綱領文件的簽定，契機才逐漸出現。可以這麼說，在這一個文化協商的過程中，借著歷史性的契機，中國當代婦女研究透過對於女性主義話語的接受和建構，在新自由主義邏輯與社會主義的既有體制之間，在話語以至體制上，為現實中的婦女以及自身建構了一個迴轉與生存的環境。

論文的第二至五章構成了論文的主體，透過對幾個具體研究個案的分析，探討了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中國當代婦女研究的兩個發展階段中，中國當代婦女研

究對於女性主義話語的接受與建構情況。其中，第二章以中國當代婦女研究的重要開拓者之一李小江的著作為分析個案，從「婦女問題」在改革開放年代的大量湧現，人道主義話語在後文革時代的興起，人們對現代化/現代性的想像等文化語境，考察了性別是如何廣泛地成為一個社會議題，人們是如何談論性別，而這些與性別有關的話語，又是如何形塑並同時限制了作為外來話語的中國當代女性主義話語的接受與建構，其間存在著怎樣的文化協商。該章重點分析了李小江的「有性的人」理論，通過把它與其時的馬克思主義人道主義話語、新啟蒙主義話語和西蒙·德·波娃的「有性的」存在主義哲學作比較，指出前者和後三者話語形構上的相似性。與此同時，該章亦透過考察李小江八十年代前後期著作背後的歷史哲學觀念，指出李小江與同代人所分享著的，一種與改革開放的時代籲求相互呼應的中國現代性(歷史)想像。

第三章則探討了八十年代的中國婦女研究界(包括婦聯系統與學術界)，面對中國社會主義的遺產與債務，是如何透過「婦女學」的建構，自政治意識形態的領域漸次分離，以取得婦女研究自身的相對獨立性。然而，在八十年代對於婦女學的初步接受與建構，對於學界與婦聯來說，意義顯然是各有不同的。如果說在這一場學科建構與話語轉移運動中，婦聯系統的婦女研究逐漸突顯出作為社會問題的「婦女問題」的相對獨立性，並在後文革的語境中，透過婦女學的建構，嘗試重申其作為代表了廣大中國婦女利益的組織的代表性與認受性；那麼，學界的婦女研究則響應了後文革氛圍中對於個體性以及思想/學術自主的籲求。該章透過重點分析八十年代初至九十年代初幾場有關婦女學建構的論爭，以及李小江的《夏娃的探索——婦女研究論稿》和孟悅、戴錦華的《浮出歷史地表——現代婦女文學研究》等具體個案，考察了八十年代的中國婦女研究界對於婦女學的初步接受情況，看看其間種種的文化協商，並從中透析出種種有關現代性的想像。正是這一場自我疆界劃定與建構的運動，為九十年代的中國當代婦女研究，打造了進一步接受與建構女性主義話語的話語空間。

第四章則通過考察九十年代中國當代婦女研究對「社會性別」概念及其理論的接受與建構史，以及其間種種的文化協商，指出婦聯與學界（尤其是婦聯）之所以廣泛接受「社會性別」的概念，一方面是因為在後文革的語境中，提倡性別差異、性別意識（尤其是女性意識），對於對治現實中的婦女問題、填補性別平等政策在條文與實踐之間的落差，有其必要性，而「社會性別」一語正正保留了「性別」二字、這個現實中的性別政治所仍然需要的文化包袱；另一方面則因為「社會性別」的概念與理論所強調性別本身的社會文化制度面向，同時又為婦女研究界提供了一件火力強大的分析工具，在保住性別差異這個基點的前提下，復又能夠穿透這個基點本身，在社會結構與文化體制的深處，尋找現實中赤裸裸的性別不平等的真正根源。與此同時，該章亦論述了第四次世婦會對於《北京宣言》、《行動綱領》等綱領性文件的簽定，以及國務院於世婦會同年頒布的《中國婦女發展綱要(1995-2000 年)》，對於整個中國當代女性主義話語的接受與建構史的重要意義。正正因為社會性別概念在《行動綱領》中被高調地主張，在跟《中國婦女發展綱要(1995-2000 年)》充滿張力的文化協商之下，社會性別概念及其理論終於得以在九十年代下半葉，有條件地大幅進入中國當代婦女研究的不同領域。

至於第五章，則透過考察「婦女與發展」研究這個九十年代中後期興起的研究領域，從一個側面，進一步探討女性主義話語在後世婦會的語境中的文化協商以及發展的情況。關於「婦女與發展」研究在國內的接受和發展情況，可以歸結為兩點：（一）在世婦會效應的帶動下，加上國際發展組織和機構在方針上的調整，在九十年代中以後，中國婦女研究才開始對相關的理論有較廣泛和深入的引介、認識與討論，並嘗試結合中國的具體情況，作出相應的挪用與分析。（二）隨著「婦女與發展研究」在國內的真正著陸與發展，「貧困」、「農村婦女」與「少數民族婦女」等領域，最終成為了相關的研究和發展項目的主要集結地。固然，「婦女與發展研究」在九十年代的興起與發展，跟 1995 年北京世婦會的舉行，以及《北

京宣言》、《行動綱領》和《中國婦女發展綱要(1995-2000 年)》等文件的簽定與頒布，有直接的關聯，但筆者認為，這個新興領域之所以能夠在九十年代出現，更關鍵的因素卻在於改革開放話語在九十年代的歷史性轉折，以及九十年代中國加速進入全球化的歷程。因為在中國九十年代進一步捲入全面市場化、資本主義化以至全球化的過程中，農村瞬即成為了重災區之一，不少農村陷入危機甚至破產，大量農民被逼壓到社會的底層；而農村中的貧困，在八十年代以降愈演愈烈的多重不平等的社會結構下，則再進一步衍化為貧困的女性化和少數民族化，而這也是「婦女與發展研究」的理論和概念在九十年代的中國被接受的部分語境。此外，筆者認為，「婦女與發展研究」的理論和概念的接受情況，也取決於集結於「貧困」、「農村婦女」、「少數民族婦女」等領域的中國婦女研究者與婦女工作者本身的問題意識。就以「婦女與發展研究」中的三種主要理論模式而言，即「婦女參與發展」(WID)、「婦女與發展」(WAD)與「社會性別與發展」(GAD)，儘管這些理論模式的前提與關注點不同，有時甚至互相矛盾，但當它們落在部分前線的婦女研究者與工作者的手中，卻在一定程度上被策略性地「混合地挪用」，以對應這些前線研究者/工作者在她們所處的工作環境中所碰到的特定現實問題。筆者認為，對於這些前線婦女研究者與婦女工作者來說，她們在九十年代的中國所首要面對的，是一個正在急速地進一步捲入市場化、資本主義化、全球化過程的(後)社會主義中國，而這個浩烈的大環境對於婦女(尤其是農村婦女與少數民族婦女)是相當不利的。然而，儘管新自由主義的邏輯在現實中日漸當道，但當代中國仍在骨子裡保留了一定程度上的社會主義體制，而「婦女與發展研究」正好為部分的前線婦女研究者與婦女工作者提供了好些概念和話語工具，在新自由主義邏輯與社會主義體制之間，為現實中的婦女建構一個迴轉與生存的環境。

如前所述，跟一般的思想史描述有所不同的是，本論文從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中國當代婦女研究的一系列關鍵概念入手，借助知識考古學的方法，以話語分析所要探討的，是女性主義話語在中國當代婦女研究領域中得以被接受、建構以至變遷的歷史條件和話語規則(話語型構)，由這個過程而引發的種種話語實踐，以及其間種種的文化協商。本論文所要主要確定的，既不是一些在話語中隱藏或顯露、有待闡釋的所謂思想、描述、形象、主題或關懷，也不是什麼所謂形而上的歷史目的或者時代精神，而是話語本身，即服膺於某些規則的話語實踐。更具體的說，誠如本論文在導論中所言，如果中國當代婦女研究對於女性主義話語的接受與建構，可以首先被視為一項「理論旅行」或「跨語際實踐」，而我們又可以把話語理解為一個由一系列相關概念所構成的概念空間，那麼，中國當代婦女研究對於女性主義話語的接受、建構與變遷，則大概可以被理解為一種跨語際和語言內部的概念空間的重構與(再)創造。

值得注意的是，同一的話語可以包含各種不同甚至互相衝突的理論立場，但關鍵是它們必須符合一定的話語規則，始有可能在該一話語領域中提出一些被認為具有真假值意義的命題。換言之，本論文所要主要做的，並不是辨析特定理論命題的真假，而是考察讓這些或真或假的命題本身得以被提出的歷史條件和話語規則。按照以上的方法論設定，我們會發現：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無論是李小江、她在婦女研究界的同代人，還是她的論敵，都以不同形式受到後文革的人道主義話語(在這裡則顯現為強調性別差異或女性意識的性別話語)、改革開放的中國現代性話語以及中國社會主義話語的共同制約。例如，李小江在八十年代提出「有性的人」理論，儘管一方面站在中國社會主義的高度，與西方(資產階級)女權主義話語劃清界線，另一方面又採取一種接近人道主義女性主義的立場，將自己跟強調集體主義的官方馬克思婦女理論作出區別，但她跟同代人甚至論敵之間的立場差異之所以能夠以某種形式被提出，還是主要受著上述的話語條件所共同制

約。

類似的情況在八十年代中國婦女研究界(包括婦聯系統與學術界)幾場圍繞「中國婦女學」的建構而開展的辯論中，就更為明顯。誠如筆者在第三章中所言，在這個過程中，面對中國社會主義的遺產與債務，無論正反雙方均希望透過「婦女學」的建構或其他形式，逐漸突顯出作為社會問題的「婦女問題」的相對獨立性，讓自身能夠自政治意識形態的領域漸次分離，以取得婦女研究本身的相對獨立性。在這裡，中國當代婦女研究界對「婦女問題」的相對獨立性的突顯，不單讓「婦女問題」以至婦女研究自身能夠自中國官方的政治意識形態漸次分離，在實際的效果上，它更讓「婦女問題」以至婦女研究自身，能夠自所有的政治意識形態(包括被認為是女權主義的主要意識形態背景的西方資產階級意識形態)分離，而正是這一場自我疆界劃定與建構的話語運動，為九十年代的中國當代婦女研究，打造了進一步接受與建構女性主義話語的話語空間。

在某意義上說，話語可算是時代的產物，但這並不同時意味著，話語是其所處時代的直接反映。跟一般的思想史研究有所不同的是，本論文所主要關注的，與其說單單是(個人)思想系統內部觀念間的結構和縱向演變(內部研究)，或思想觀念與時代之間的相互關係(外部研究)，倒不如說是介乎個別思想觀念與社會歷史環境之間的話語本身的構成(此或可稱之為「中部研究」)。可以這麼說，我們總是置身於特定的時代中發言，但對於我們的發言產生直接制約作用的，是發言所由產生的話語，而非時代本身。由是觀之，正如筆者在第四章中所指出的，固然1995年第四次世婦會舉行，聯合國各成員國對於《北京宣言》、《行動綱領》等綱領性文件的簽定，以及國務院於世婦會同年對於《中國婦女發展綱要(1995-2000年)》的頒布，對於整個中國當代女性主義話語的接受與建構史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但社會性別概念及其理論之所以最終能夠在九十年代下半葉，大幅進入中國當代婦女研究的不同領域，如前所述，卻部分地主要得力於八十年

代一系列的話語重構運動；而《北京宣言》、《行動綱領》、《中國婦女發展綱要(1995-2000年)》等文件，亦主要是作為特殊的歷史性話語事件，透過錯綜複雜的文化協商過程，部分地引發了中國當代婦女研究領域內部在九十年代中以後一系列的話語重構(詳情見本文第四至五章)。

因此，對於話語變遷的問題，本論文除了關注話語內部的規則重構、因不同的話語的遭逢碰撞而產生的新的話語局面外，也關注特殊的歷史性話語事件。換言之，本論文除了關注話語內部的規則，也關注因具體的話語實踐而生成的偶然和特殊。這跟思想史研究對於思想觀念之間的過渡和連續性的強調，顯然是有所不同的。

總而言之，對於本論文的研究課題來說，相對於一般的思想史研究，本論文所採取的話語分析的方法，無疑具有更強的解釋力。如果說一般的思想史所關注的，是不同作者、哲學家或思想家的「作品」中，所隱藏或顯露、有待闡釋的所謂思想、描述、形象、主題或關懷，甚至是貫串一個以至幾個時代的所謂形而上的歷史目的或者時代精神，那麼，話語分析所關注的，顯然是「話語」本身，即服膺於某些規則的話語實踐。正是這一種方法論的設定，讓本文能夠從根本上穿透中國當代婦女研究領域中，各種表面上不同甚至互相衝突的理論立場和派別，尋找女性主義話語在中國當代婦女研究領域中得以被接受、建構以至變遷的共同制約的話語條件(話語型構)，由這個過程而引發的種種話語實踐，以及其間種種的文化協商。而這些都是一般的思想史研究所無法穿透的。

二

但八十年代以來，在中國當代婦女研究的領域中，女性主義話語又到底構成了一個怎樣的觀念空間？而期間這個觀念空間的變化，又怎樣通過引入/創造新詞，

或者挪用/重新定義已有的詞彙，去引入或創造新的概念，讓女性主義話語最終得以以某種形式被接受與建構。此外，作為一項跨語際和語言內部的概念空間的重構與（再）創造，中國當代婦女研究對於女性主義話語的接受與建構，又意味著一個怎樣的文化協商過程？中間的矛盾和衝突及其化解又到底是一種怎樣的跨語際實踐？

綜合全文所論，可以這麼說，作為一項跨語際和語言內部的概念空間的重構與（再）創造，中國當代婦女研究對於女性主義話語的接受與建構所意味著，是這樣的一個過程：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中國當代婦女研究對於女性主義話語的接受與建構，開始於後文革與改革開放的雙重語境之中，面對中國社會主義的遺產與債務所引發的，在意識形態上的重重矛盾和衝突，中國當代婦女研究工作者首先透過有關性別、婦女學等議題的具體論述，以及婦女學的學科建設，讓「婦女」、「性別」等議題終於得以在一定程度上鬆脫「馬克思主義婦女解放理論」的話語束縛，自傳統的「階級」話語漸次分離，為自身劃出了一片相對獨立的話語和體制的領地。而正正是這一場自我疆界劃定與建構的運動，為九十年代的中國當代婦女研究，打造了進一步接受與建構女性主義話語的話語和體制的空間。及至九十年代，隨著第四次世婦會對於《北京宣言》、《行動綱領》等綱領性文件的簽定，在跟國務院於世婦會同年頒布的《中國婦女發展綱要(1995-2000 年)》充滿張力的文化協商之下，社會性別概念以及有關「將性別觀點納入所有政策和方案的主流」等等的提法，終於得以進入國策的層面，被納入中國的總體國家規劃之中。結果，社會性別概念及其理論終於得以在九十年代下半葉，有條件大幅進入中國當代婦女研究的不同領域。換言之，八十年代以來，中國當代婦女研究對於女性主義話語的接受與建構所首先意味著，是一個讓一片相對獨立的話語和體制的空間得以逐漸出現的文化協商過程。

在這一個文化協商的過程中，婦聯、部分長期跟官方系統緊密合作的國內外婦女

研究學者，都站在不同話語和體制的位置，以不同的方式，建設這一片相對獨立的話語和體制的空間。在這一個過程中，婦聯在國家體制中的特殊位置對於這一片空間的打造，可謂至關重要。首先，婦聯在國家體制內有一定的力量讓基層的意見「下情上達」化而為具體的婦女政策，而正如筆者在第四章所論証的，正是婦聯的這種特殊位置，讓女性主義話語終於得以借著 95 世婦會的歷史性契機，在跟國務院於世婦會同年頒布的《中國婦女發展綱要(1995-2000 年)》充滿張力的文化協商之下，進入國策的層面，被納入中國的總體國家規劃之中，為女性主義話語以及中國當婦女研究進一步打開了體制的空間。其次，正如筆者在第三章所論証的，對於八十年代中以降的婦女學學科建設，無論在話語建構上，還是實際的學科建設上，婦聯都扮演了極其樞紐的角色；而與此同時，這也為學界對於婦女學學科建設的開展，提供了必要的體制和話語的基礎。

至於國內外學界的婦女研究學者，在這個過程中，則主要扮演著觀念創造(例如李小江所提出的「有性的人」理論以及她對婦女學的學科建設構想)或觀念引介(例如王政等對「社會性別」概念及「婦女與發展研究」理論的引介)的角色，這對於中國婦女研究界如何鬆脫「馬克思主義婦女解放理論」的話語束縛，打開缺口，自傳統的「階級」話語漸次分離，從而劃出了一片相對獨立的體制和話語的空間，提供了必要的話語資源。

此外，正如汪暉所言，現代性的方案是一個領域獲得自主性的過程，例如經濟與政治逐漸分離，成為一個自主的領域。但他又指出，「經濟與政治的分離」並不能証明這兩個合理化的領域已經成為真正自律的領域，它只不過說明了這兩個領域的關係有了一些也許是很重大的改變。¹ 其實同樣的過程，在現代社會中的其他領域中，也有出現，例如學術與藝術等文化領域。由此引伸，*婦女學學科建設在中國改革開放年代的被提出，在某意義上，固然是現代性方案的其中一項表*

¹ 汪暉著：〈現代性問題答問〉，《死火重溫》，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0 年，頁 36。

現，但若果將之放回中國後文革與改革開放的具體的雙重語境中，正如本文的分析所示，則婦女學似乎從來沒有發展到自其他領域(尤其是政治領域)徹底分離的地步。

至於八十年代以來，在中國當代婦女研究的領域中，女性主義話語又到底構成了一個怎樣的觀念空間？可以這麼說，在中國當代婦女研究對女性主義話語的接受與建構這個觀念空間的重構過程中，「性別差異」、「性別意識」(尤其是「女性意識」)等等一直都是其中主要的構成概念。因為在後文革與改革開放的雙重語境中，提倡性別差異、性別意識(尤其是女性意識)，無論對於反撥毛澤東時代所倡導的「男女都一樣」的性別意識形態，對抗國家以「抹消性別」或「無性」狀態壓抑人性與個體(見第二、三章)，還是對於對治現實中的婦女問題、填補性別平等政策在條文與實踐之間的落差(見第三、四、五章)，都有其必要性；而對於女性主義話語的接受與建構(尤其在「社會性別」概念開始被廣泛地接受之後)，正正為中國當代婦女研究，提供了一件火力強大的分析工具，在保住性別差異這個基點的前提下，復又能夠穿透這個基點本身，在社會結構與文化體制的深處，尋找現實中赤裸裸的性別不平等的真正根源，並借著 1995 年世婦會所帶來的歷史性契機，在新自由主義邏輯與中國社會主義的既有體制之間，在話語以至體制上，為現實中的婦女以及自身建構了一個迴轉與生存的環境(見第四、五章)。

但問題是：儘管八十年代以來，通過對女性主義話語的接受與建構，中國當代婦女研究的確為自身是以至現實中的婦女，打造了一片相對獨立的話語和體制的空間，但與此同時，由於體制及策略上的考慮和限制(見第四、五章)，中國當代婦女研究在九十年代的發展(以至對女性主義話語的接受和建構)，也就不得不局限在體制內的這「一片相對獨立的領地」。

當然，面對中國九十年代全面市場化以及全球化資本主義的掠奪性經濟邏輯，對

於中國當代婦女研究與女性主義者來說，對女性主義話語的接受與建構，在一程度上，的確為她們在中國社會主義的既有體制中打開了一定的缺口。事實上，隨著第四次世婦會對於《北京宣言》、《行動綱領》等綱領性文件的簽定，在跟國務院於世婦會同年頒布的《中國婦女發展綱要(1995-2000 年)》充滿張力的文化協商之下，女性主義話語(通過社會性別概念)以至有關「將性別觀點納入所有政策和方案的主流」等等的提法，的確終於得以進入國策的層面，被納入中國的總體國家規劃之中，並讓女性主義話語得以在九十年代下半葉，有條件地大幅進入中國當代婦女研究的不同領域(見第四、五章)。但問題是：正如筆者在第五章所提出的，由五十年代的集體化時代的體制改革到七十年代末以來的改革開放，都沒有從根本上挑戰並改變傳統的父權/夫權文化，因此僅僅「將性別觀點納入所有政策和方案的主流」，而非從觀念與文化上作根本的改變，則恐怕只是集體年代以來的「從上而下」的政策邏輯之重複。

此外，筆者認為，若果所謂體制上的改變，僅僅是指「將性別觀點納入所有政策和方案的主流」，把女性主義僅僅局限在性別問題之上，而並非從女性主義的根本公義觀(反對任何形式的宰制與社會不公義)，甚至廣義的社會主義公義立場出發，改變中國當下對社會弱勢社群不公不義的體制本身，則中國當代婦女研究與女性主義者心目中的性別公義，甚至廣義的社會公義，將不會真正的到來。

如此說來，在一個講求個體間的競爭、資本掠奪、私產累積的全球化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年代，作為一個有著**豐富的革命傳統**以及社會主義實踐最為成功的最後一個社會主義大國，婦女解放與二十世紀的中國社會主義實踐之間的密切關係以至整個中國社會主義的**豐富革命傳統**，有必要被再度正視，在對這份歷史遺產作出批判反省的前提下，尋找解決婦女解放、性別公正以至社會公義問題更適切的方式，以突破中國當代婦女研究的現代性困局。

三

也許，走筆至此，是結束，同時也是作出全文檢討以及進一步展望的時候。正如筆者在導論中所提出的，作為一門年青的學科，文化研究並不滿足於對文化僅僅作靜止、客觀與抽離的研究，而是積極地介入現實，故此這一門學科對於現實具有強烈的干預性和實踐性。因此，作為一項文化研究，本論文以中國當代婦女研究對女性主義的接受與建構史為中心，作出深入的話語分析，對於像中國當代婦女研究這樣一個尚在建構的領域來說，無論在理論或實踐上，無疑都具有深遠的意義。

如前所述，本論文所要主要做的，並不是辨析特定理論命題的真假，而是考察讓這些或真或假的命題本身得以被提出的歷史條件和話語規則。正是這一種方法論的設定，讓本文能夠從根本上穿透中國當代婦女研究領域中，各種表面上不同甚至互相衝突的理論立場和派別(例如李小江、王政、婦聯系統等)，尋找女性主義話語在中國當代婦女研究領域中得以被接受、建構以至變遷的共同制約的話語條件(話語型構)，由這個過程而引發的種種話語實踐，以及其間種種的文化協商。故此，站在後設研究與話語分析的高度，對於釐清中國當代婦女研究內部的種種話語糾結，本文無疑具有一定的貢獻。

當然，由於論題的設定所限，本論文也有未及處理之處。例如，婦聯與非婦聯系統的婦女研究、婦聯系統與國外的婦女研究、海外基金與中國當代婦女研究、海內外中國婦女研究學者之間的張力及關係，本論文便未克一併處理，惟俟他日有機會再作進一步的修定與擴充，才一併補上；或另行發展成相關的獨立研究，在本論文的基礎上，進一步深化對於相關問題的研究和論述。

參考文獻

文章

中文

白立君著：〈馬克思主義婦女觀在中國的實踐與發展(上)——第三次全國婦女理論研討會綜述〉，《中國婦女報》，1991年10月11日，第三版。

〈編者按〉(「提高社會性別主流化能力」系列)，《中國婦運》，2005年7月，頁14。

陳來著：〈思想出路的三動向〉(1987年)，甘陽主編：《八十年代文化意識》，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頁541-547。

陳新欣、古剛著：〈馬克思主義婦女觀在中國的實踐與發展(下)——第三次全國婦女理論研討會綜述〉，《中國婦女報》，1991年10月18日，第三版。

陳順馨著：〈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在九十年代：中國的實踐概述〉(1998年)，「中國現代文學研討會：研究方法與評價」，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主辦，1998年。

崔鳳垣、程深著：〈婦女地位研究方法新探——性別平等發展指數〉，《婦女研究論叢》，1997年第1期，頁9-13。

戴錦華著：〈歲月留痕 Simone de Beauvoir——西蒙娜·波伏瓦在中國〉(手稿)。

戴錦華著：〈女性主義：文化立場、性別經驗與學術選擇〉(1998年)，《猶在鏡中：戴錦華訪談錄》，北京：知識出版社，1999年，頁136-190。

戴錦華著：〈流行文化與女性形象再現：性別、階級與化裝表演〉(2000年)，《差異與平等——香港婦女運動的新挑戰》，香港：新婦女協進會，2000年，頁33-35。

戴錦華著：〈大眾文化中的階級和社會性別〉(2000年)，杜芳琴、王向賢編：《婦女與社會性別在中國(1987——2003)》，天津市：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頁243-266。

戴錦華著：〈「故事」裡的故事——後社會主義時代的性別與階級表述〉，《性別中國》，台北市：麥田出版社，2006年，頁125-158。

丁娟著：〈我國婦女學科體系研究狀況〉，熊玉梅、劉小聰、曲雯主編：《中國婦女理論研究十年》，北京：中國婦女出版社，1992年，頁192-201。

丁娟著：〈論婦女解放與男女平等〉，《中國婦女管理幹部學院學報》，1994年第4期，頁32-35。

杜芳琴著：〈婦女史研究：女性意識的“缺席”和“在場”〉（1996年），《婦女研究論叢》，1996年第4期，頁4-8；亦見杜芳琴著：《中國社會性別的歷史文化尋蹤》，天津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頁44-52。

杜芳琴著：〈理解與分享——《女性的崛起》導讀〉（1997年），《中國社會性別的歷史文化尋蹤》，頁208-215。

杜芳琴著：〈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西方女性主義研究評介》之評介〉（1997年），《中國社會性別的歷史文化尋蹤》，頁216-222。

杜芳琴著：〈健康新觀念：以婦為中心的生育健康——《以婦為中心的生育健康》評介〉（1997年），杜芳琴著：《中國社會性別的歷史文化尋蹤》，頁223-228。

杜芳琴著：〈我所瞭解的國外中國婦女史研究〉（1998年），《中國社會性別的歷史文化尋蹤》，頁170-207。

杜芳琴著：〈多樣與創新：中國民間婦女組織〉（1999年），《婦女學和婦女史的本土探索——社會性別視角和跨學科的視野》，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頁303-312。

杜芳琴著：〈婦女的身體和健康：一個反思我們文化的新視角——《我們的身體，我們自己》（中文版）評介〉（1999年），《婦女學和婦女史的本土探索——社會性別視角和跨學科的視野》，頁333-340。

杜芳琴著：〈不止為了證明，更為了創造〉（1999年），《婦女學和婦女史的本土探索——社會性別視角和跨學科的視野》，頁356-359。

杜芳琴著：〈在認識差異與共性中發展亞洲婦女學〉（2000年），《婦女學和婦女史的本土探索——社會性別視角和跨學科的視野》，頁30-42。

杜芳琴著：〈西方女性主義的發展及其在文學批評中的運用〉（2000年），《婦女學和婦女史的本土探索——社會性別視角和跨學科的視野》，頁72-90。

杜芳琴著：〈發展高等院校的婦女學和婦女教育：做甚麼和甚麼做？〉(2000 年)，《婦女學和婦女史的本土探索——社會性別視角和跨學科的視野》，頁 91-96。

杜芳琴著：〈“運命”與“使命”：高校婦女研究中心的歷程和前景 (2000 年)〉，《婦女學和婦女史的本土探索——社會性別視角和跨學科的視野》，頁 313-329。

杜芳琴著：〈我的婦女研究歷程〉(2000 年)，李小江主編：《身臨“奇”境——性別、學問、人生》，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0 年，頁 171-211。

杜芳琴著：〈中國婦女研究的歷史語境：父權制、現代性與性別關係〉(2001 年)，《婦女與社會性別在中國 (1987——2003)》，頁 45-76。

杜芳琴著：〈全球視野中的本土婦女學——中國的經驗：一個未完成的過程〉(2001 年)，《婦女學和婦女史的本土探索——社會性別視角和跨學科的視野》，頁 3-29。

杜芳琴著：〈身份與認同，空間與能動：我的婦女研究(學)編年史(1985-2000) (代跋)〉(2001 年)，《婦女學和婦女史的本土探索——社會性別視角和跨學科的視野》，頁 360-388。

杜芳琴、蔡一平著：〈中國婦女史學科建設的理論思考〉(1998 年)，《中國社會性別的歷史文化尋蹤》，頁 1-26。

杜芳琴等著：〈婦女學：稱謂·理念·策略——中國婦女與社會性別學 5 人談〉(2003 年)，《婦女與社會性別研究網》(<http://www.chinagender.org/chinas/young/y1007.htm>)。

杜芳琴著：〈婦女學：稱謂·理念·策略——中國婦女與社會性別學 5 人談〉，《社會性別》2004 年第 1 期，頁 3-15。

馮媛著：〈婦女：對象？主體？〉，《婦女研究論叢》，1996 年第 3 期，頁 62-63。

馮淬著：〈國際社會落實世婦會的後續活動〉，康玲主編：《婦女發展與對策——第四次全國婦女理論研討會論文集》，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8 年，頁 7-12。

Goldman, Moore(戈德曼)著：〈中國婦女對於解放的新觀點〉(1993 年)，李小江編：《婦女研究運動：中國檔案》，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7 年，頁 213-218。

高小賢著：〈農村婦女研究綜述〉，陶春芳主編：《中國婦女研究年鑑：

1991-1995》，北京：中國婦女出版社，1997 年，頁 155-163。

高小賢著：〈婦女與發展在中國：對實踐的分析與再認識〉，徐午、許平、鮑曉蘭、高小賢主編：《社會性別分析：貧困與農村發展》，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 年，頁 4-17。

高小賢著：〈婦女與發展在中國：對實踐的分析與再認識〉(2000 年)，《婦女與社會性別在中國（1987——2003）》，頁 137-153。

高小賢著：〈中國民間婦女組織的空間和策略〉(2000 年)，李小江等著：《身臨"奇"境——性別、學問、人生》，頁 215-236。

郭秋惠著：〈中國當代女性主義藝術的語境〉，《山花》2003 年第 9 期，頁 116-122。

韓嘉玲著：〈貧困地區農村婦女發展模式探討〉，金一虹、劉伯紅主編：《世紀之交的中國婦女與發展——理論·經濟·文化·健康》，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8 年，頁 93-114。

禾女著：〈北京大學中外婦女問題研究中心〉(2004 年)，荒林主編：《中國女性主義》，2004 年春號，頁 145-148。

和鐘華著：〈中國少數民族社會性別研究概述〉(2003 年)，張曉、徐午、和鐘華、馬林英主編：《社會性別、民族、社區發展研究文集》，貴州人民出版社，2003 年，頁 2-11。

賀桂梅著：〈當代女性文學批評的三種資源〉(2003 年)，當代文化研究網 www.cul-studies.com。

賀正時著：〈婦女學理論體系的構想〉，《中國婦女》，1997 年第 4 期，頁 19-21。

黃啓璫著：〈黃啓璫談：性別觀點納入決策主流〉，《婦女研究論叢》，1996 年第 3 期，頁 4。

黃啓璫著：〈談談婦女問題〉，《中國婦女研究年鑑：1991-1995》，頁 5-19。

胡新穎、張艷霞著：〈新中國 50 年婦女研究綜述〉，李秋芳主編：《半世紀的婦女發展——中國婦女五十年理論研討會論文集》，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2001 年，頁 543-591。

胡玉坤著：〈全球婦女運動的地方性與差異性——《來自地方女權主義的挑戰》

序言譯介》，《婦女研究論叢》，1996 年第 3 期，頁 53-57。

胡玉坤著：〈女權主義的差異話語與我國的社會現實——對少數民族婦女研究的若干思考〉(2003 年)，《社會性別、民族、社區發展研究文集》，頁 41-60。

金一虹著：〈婦女與現代化研究〉，《中國婦女研究年鑑：1991-1995》，頁 206-213。

金一虹著：〈社會性別理論：新視角、新思維方式與新的分析範式——《社會性別研究選譯》評介〉，《婦女研究論叢》，1999 年第 1 期，頁 58-60。

金觀濤、劉青峰著：〈中國當代思想形成的歷史結構〉，宋曉霞主編：《『自覺』與中國的現代性》，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6 年，頁 27-47。

康正果著：〈序言〉(1994 年)，《女權主義與文學》，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頁 1-3。

康正果著：〈交織的邊緣：學術、性別和自我〉(1996 年)，《婦女研究運動：中國檔案》，頁 127-139。

江波著：〈農村婦女研究綜述〉，劉伯紅主編：《中國婦女研究年鑑：1996-2000》，北京：中國婦女出版社，2004 年，頁 76-87。

Jaschok, Maria(葉瑪麗)著：〈跨文化的探索之路：西方人視野中的中國婦女研究〉(1997 年)，《婦女研究運動：中國檔案》，頁 177-191。

羅崗著：〈理論的”傲慢”與”偏見”〉，《面具背後》，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 年，頁 76-83。

羅崗著：〈尋求”第三條道路”〉，《面具背後》，頁 226-253。

羅琮著：〈改革，開闢了婦女施展才華的廣闊天地〉，《中國婦女報》1986 年 2 月 28 日，第三版。

羅琮著：〈讓中國婦女運動的歷史告訴現在〉，《中國婦女報》1989 年 12 月 25 日，第三版。

羅曉露、趙憶寧著：〈中國婦女問題理論研究的現狀與發展〉，北京：《瞭望》，第 51 期，1986 年，頁 32-33。

李霞編譯：〈從”婦女參與發展”到”社會性別與發展”〉，《婦女研究論叢》，

1998 年第 3 期，頁 32-34。

李小江著：〈馬克思主義婦女理論的研究起點和要點〉，《未定稿》1984 年第 1 期，頁 7-17。

李小江著：〈女性自我認識〉，《中國婦女》，1985 年第 12 期，頁 6-8。

李小江著：〈中國當代婦女的現實處境——女性自我認識(之二)〉，《中國婦女》，1986 年第 1 期，頁 6-7。

李小江著：〈「夏娃」的探索：與「亞當」商榷〉，《中國婦女》，1986 年第 4 期，頁 8-9。

李小江著：〈馬克思主義婦女學的體系架構〉，《中國婦女》，1986 年第 9 期，頁 8-10。

李小江著：〈序：我為甚麼主編‘婦女研究叢書’？〉（1987 年），《夏娃的探索：婦女研究論稿》，鄭州市：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頁 1-12。

李小江著：〈怎樣看當前婦女問題和婦女研究〉，《求是》1988 年第 11 期，頁 32-36。

李小江著：〈婦女研究在中國〉，《未定稿》1988 年第 22 期，頁 22-26。

李小江著：〈婦女研究在中國〉（1989 年），《婦女與社會性別在中國（1987——2003）》，頁 5-18。

李小江著：〈新時期婦女研究和婦女運動之我見〉（1993 年），《婦女與社會性別在中國（1987——2003）》，頁 387-408。

李小江著：〈序言〉（1993 年），李小江等主編：《性別與中國》，北京：三聯書店，1994 年，頁 1-8。

李小江著：〈男女平等在中國社會實踐中的失與得〉，《社會學研究》（北京：中國社科院社會學所），1995 年第 1 期，頁 92-97。

李小江著：〈公共空間的創造——婦女研究運動：一個檔案的自我分析〉（1995 年），《婦女研究運動：中國檔案》，頁 141-175；亦見《身臨“奇”境——性別、學問、人生》，頁 3-38。

李小江著：〈重建跨越“性溝”之橋〉，《東方雙月刊》，1995 年第 4 期，頁 14-16。

李小江著：〈女權主義的抉擇——中國大陸首間女子學院創辦人拒絕出席世婦會〉，香港：《明報月刊》1995年第10期，頁81-83。

李小江著：〈編者前言〉(1996年)，《婦女研究運動：中國檔案》，頁vii-viii。

李小江著：〈關於“婦女發展”的研究與實踐〉(1996年)，中國《社會學年鑒》(1992-1995)，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6年，頁193-199。

李小江著：〈序：識讀‘緣邊’〉(1997年)，李小江等編：《主流與緣邊》，北京：三聯書店，1999年，頁1-6。

李小江著：〈女性審美主體的兩難處境〉(1999年)，葉舒憲主編：《性別詩學》，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9年。

李小江著：〈婦女研究“學科化”進程中的若干問題〉(2000年)，李小江、朱虹、董秀玉主編：《批判與重建》，北京：三聯書店，2000年，頁1-23。

李小江著：〈前言：誰能告訴我，甚麼是Feminism？〉(2000年)，李小江等著：《女性？主義——文化衝突與身份認同》，江蘇人民出版社，2000年，頁1-5。

李小江著：〈引文〉(2000年)，《女性？主義——文化衝突與身份認同》，頁1-12。

李小江著：〈結語〉(2000年)，《女性？主義——文化衝突與身份認同》，頁281-286。

李小江著：〈前言：“奇”在哪裏？〉(2000年)，《身臨“奇”境——性別、學問、人生》，2000年，頁1-6。

李小江、Chris Gilmartin 著：〈關於啓蒙：與Chris Gilmartin教授的對話〉(1998年)，《女性？主義——文化衝突與身份認同》，頁242-255。

李小江、Peggy McIntosh 著：〈關於本土化-與Peggy McIntosh博士的對話〉(1998年)，《女性？主義——文化衝突與身份認同》，頁256-264。

李小江、屈雅君著：〈關於啓蒙-與屈雅君副教授的對話〉(1997年)，《女性？主義——文化衝突與身份認同》，頁265-280。

李小江著：〈世紀末看“第二性”〉，《讀書》1999年第12期；修訂本見李小江著：《女人讀書：女性/性別研究代表作導讀》，江蘇省：江蘇人民出版社，2006年，頁205-217。

李小江、上野千鶴子著：〈“主義”與性別〉(2004年)，《讀書》，2004年8月，頁39-49。

李小江著：〈重理「宗師」遺產——讀馬克思的《人類學筆記》及其他(1840s-1880s)〉(2006年)，《女人讀書：女性/性別研究代表作導讀》，頁12-26。

李小雲著：〈發展進程中的婦女與性別問題〉，《世紀之交的中國婦女與發展——理論·經濟·文化·健康》，頁202-210。

李楯著：〈我是誰/我與婦女研究〉(1996年)，《婦女研究運動：中國檔案》，頁77-105。

李慧英著：〈將性別意識納入決策主流的討論〉，《婦女研究論叢》1996年第3期，頁5-7、18。

李慧英著：〈電視刻女性形象中的性別意識〉，《婦女研究論叢》，1997年第3期，頁43-49。

李慧英著：〈我國社會性別研究的發展及其意義〉，《婦女研究論叢》，1999年第1期，頁46-48。

李慧英著：〈計劃經濟時期男女平等立法與政策——社會性別與公共政策研究之一〉(2003年)，《婦女與社會性別在中國(1987——2003)》，頁340-352。

李洪濤著：〈單親母親現狀研究〉，《婦女研究論叢》，2000年第2期，頁18-22。

李靜之著：〈婦聯系統理論研究機構一覽〉，《中國婦女理論研究十年》，頁567-579。

李新建著：〈性別歧視與女性就業：理論、問題、對策〉，《婦女研究論叢》，1999年第1期，頁4-8。

梁軍著：〈女性教育十年回顧——自我的成長：從小家走向大家〉(1996年)，《婦女研究運動：中國檔案》，頁1-36。

林春著：〈走向中國的女性主義〉(1995 年)，《婦女研究運動：中國檔案》，頁 61-75。

林春著：〈國家與市場對婦女的雙重作用〉(1998 年)，《婦女與社會性別在中國（1987——2003）》，頁 327-339。

林志斌著：〈華北地區婦女對農村發展的參與〉，《中國婦女研究年鑑：1991-1995》，頁 256-260。

林志斌著：〈婦女與反貧困研究綜述〉，《中國婦女研究年鑑：1996-2000》，頁 88-95。

劉伯紅著：〈“中國婦女與發展”——研討要點綜述〉，《婦女研究論叢》，1993 年第 4 期，頁 59-62。

劉伯紅著：〈農村流動人口與性別——“中國農村勞動力流動國際研討會”有關論點綜述〉，《婦女研究論叢》，1996 年第 4 期，頁 53-56。

劉伯紅著：〈譯者序言〉(1997 年)，《美國婦女自我保健經典——我們的身體 我們自己》，北京：知識出版社，1998 年，頁 1-4。

劉伯紅著：〈中國婦女非政府組織的發展〉(2003 年)，《婦女與社會性別在中國（1987——2003）》，頁 409-425。

劉伯紅著：〈什麼是社會性別主流化〉，《中國婦運》，2005 年 7 月，頁 14-18，37。

劉禾著：〈個人主義話語〉，《語際書寫——現代思想史寫作批判綱要》，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1997 年，頁 23-56。

劉今秀著：〈民間婦女學術團體一覽〉，熊玉梅、劉小聰、曲雯主編：《中國婦女理論研究十年》，頁 580-584。

聯合國：《北京宣言》、《行動綱領》，見「中國婦女研究網」(<http://www.wsic.ac.cn/>)「北京+10」專區。

聯合國：〈世界婦女大會〉，「新華網」(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3-06/25/content_936402.htm)。

馬元曦及康宏錦著：〈前言〉(1998 年)，馬元曦主編；康宏錦及杜芳琴副主編：《社會性別與發展譯文集》，北京：三聯書店，2000 年，頁 1-3。

孟慶仁著：〈“五階段”，還是“三階段”——人類社會歷史發展的普遍規律探析〉，《未定稿》1986年第20期，頁6-11。

閔冬潮著：〈Gender(社會性別)在中國的旅行片段〉，《婦女研究論叢》，2003年第4期，頁3-9，19。

卡羅琳·摩塞(Caroline O. N. Moser)著，劉東曉譯：〈第三世界中的社會性別計劃：滿足實用性和戰略性社會性別需要〉，《社會性別研究選譯》，頁266-304。

全國婦聯研究所著：〈當前婦女研究的熱點問題及主要觀點〉，《半世紀的婦女發展——中國婦女五十年理論研討會論文集》，頁592-640。

齊文穎著：〈加強對國外的婦女研究〉，《婦女研究論叢》，1997年第3期，頁11-13。

任未多著：〈從文化性質看中國女運動員的成就〉，《婦女研究論叢》，1994年第4期，頁17-19。

伊娃拉·M.斯格博(Eva M. Rathgeber)著，仇乃華譯：〈婦女參與發展、婦女與發展、社會性別與發展：研究與實踐的趨向〉，王政、杜芳琴主編：《社會性別研究選譯》，北京：三聯書店，頁170-190。

蓋爾·魯賓 (Gayle Rubin)著，王政譯：〈女人交易：性的“政治經濟學”初探〉，《社會性別研究選譯》，頁21-81。

賽義德著，馬海良譯：〈理論旅行〉，《賽義德自選集》，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年，頁138-139。

琼·斯科特(Joan W. Scott)著，劉夢譯：〈社會性別：一個有效的歷史分析範疇〉，李銀河主編：《婦女：最漫長的革命》，三聯書店，1996年，頁151-176。

Simon, Sherry(西蒙)著，吳曉黎譯：〈翻譯理論中的性別〉，許寶強、袁偉編選：《翻譯的政治》，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0年，頁283-325。

Spakowski, Nicola(斯巴克夫斯基)著：〈論中國當代婦女研究：起源、問題及理論〉(1996年)，《婦女研究運動：中國檔案》，頁219-234。

Lisa Stearns 著：〈非政府組織與《行動綱領》〉，《婦女研究論叢》，1996年第2期，頁8-11。

孫歌著：〈前言〉，《翻譯的政治》，頁 vii-xxxii。

孫曉梅著：〈中國婦女學研究綜述〉，《婦女工作》，第 6 期，1991 年，頁 23-24，28。

鄧偉志著：〈迎接婦女學的黃金時代〉，《中國婦女報》，1986 年 1 月 27 日，第三版。

〈編者的話(「理論探討」欄)〉，《中國婦女報》，1986 年 1 月 27 日，第三版。

〈鄧偉志〉，陶春芳主編：《中國婦女研究年鑑：1991-1995》，頁 416；原文刊於《解放日報》，1982 年 11 月 26 日。

田禾著：〈東南亞流動婦女的社會地位述評〉，《婦女研究論叢》，1998 年第 4 期，頁 38-43。

童瞳著：〈中國應該有婦女學——與羅琮同志商榷〉，《社會報》，1986 年 3 月 25 日，第三版。

曾嘉燕著：〈激流暗湧——平等、發展、和平與《行動綱領》〉，《用女性的眼睛看世界——記第四屆世界婦女大會非政府組織論壇》，香港：新婦女協進會，1996 年，頁 8-9。

曾文卿著：〈聯合國世界婦女大會背景簡介〉，《用女性的眼睛看世界——記第四屆世界婦女大會非政府組織論壇》，頁 6-7。

熊秉純著：〈質性研究方法芻議：來自社會性別視角的探索〉(2001 年)，《婦女與社會性別在中國(1987——2003)》，頁 429-468。

Venuti, Lawrence(韋努蒂)著，查正賢譯：〈翻譯與文化身份的塑造〉，《翻譯的政治》，頁 327-349。

汪暉著：〈現代性問題答問〉(1998 年)，《死火重溫》，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0 年，頁 3-41。

汪暉著：〈「新自由主義」的歷史根源及其批判——再論當代中國大陸的思想狀況與現代性問題〉，「天益網」(<http://www.tecn.cn/data/detail.php?id=12659>)，原文刊於《臺灣社會研究季刊》，第四十二期，2001 年 6 月。

王金玲著：〈民族、階級和性別的閱讀——中國大陸彝族女商業性服務者個案研究〉(2002 年)，《婦女與社會性別在中國(1987——2003)》，2003 年，頁 97-121。

王麗華著：〈社會性別意識在 20 世紀的變遷與回歸——從“五四”到九四的爭論談起(1919-1994)〉(2000 年)，《浙江學刊》，2000 年第 5 期。

王政著：〈美國婦女健康運動的起因與發展〉，杜芳琴主編：《中國婦女與發展：地位、健康、就業》，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 年，頁 182-204。

王政著：〈“女性意識”、“社會性別意識”辨異〉，《婦女研究論叢》，1997 年第 1 期，頁 14-20；亦見杜芳琴、王向賢主編：《婦女與社會性別研究在中國：1987-2003》，天津市：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 年，頁 77-93；《越界：跨文化女權實踐》，天津市：天津人民出版社，2004 年，頁 25-52。

王政著：〈《社會性別研究選譯》序〉(199 年)，《越界：跨文化女權實踐》，頁 53-64。

王政著：〈當代中國婦女研究〉(1998 年)，《越界：跨文化女權實踐》，頁 65-91。

王政著：〈心智的選擇〉(2000 年)，《越界：跨文化女權實踐》，頁 1-24；亦見《女性？主義——文化衝突與身份認同》，頁 203-226。

王政著：〈突破單一的“地位”分析框架〉(2000 年)，《越界：跨文化女權實踐》，頁 157-173。

王政著：〈淺議社會性別學在中國的發展〉(2001 年)，《越界：跨文化女權實踐》，頁 92-114。

王政著：〈社會性別與中國現代性〉(2002 年)，《越界：跨文化女權實踐》，頁 174-182。

王政著：〈關於 Gender 的翻譯〉(2002 年)，《越界：跨文化女權實踐》，頁 183-192。

王政著：〈婦女學的全球化與“本土化”〉(2003 年)，《越界：跨文化女權實踐》，頁 193-207。

王政著：〈面對女權主義學術〉(2003 年)，《越界：跨文化女權實踐》，頁 208-238。

王政著：〈前言〉(2004 年)，《越界：跨文化女權實踐》，頁 1-4。

王政等著：〈高等教育中的婦女學—中美比較〉(2002 年)，《越界：跨文化女權實踐》，頁 120-156。

王若水著：〈人是馬克思主義的出發點〉，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國內哲學動態》編輯部編：《人性、人道主義問題討論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年，頁 34-49。

〈編者說明〉，《人性、人道主義問題討論集》，無頁碼。

王曉瑜著：〈十年婦女解放基本理論研究概述〉，《中國婦女理論研究十年》，頁 296-309。

王曉明著：〈1990 年代與「新意識形態」〉，《半張臉的神話》，桂林市：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3 年，頁 1-26。

魏國英著：〈我們的理論思考——《女性學概論》導言〉(2004)，《中國女性主義》，2004 年春號，頁 149-153。

仇乃華著：〈以婦女與發展研究的視角看婦女與社會經濟變革〉，《中國婦女與發展：地位、健康、就業》，頁 73-81。

仇乃華著：〈婦女與發展：理論、實踐與問題〉，鮑曉蘭主編：《西方女性主義研究評介》，北京：三聯書店，1995 年，頁 203-239。

仇乃華著：〈社會性別與發展——從“婦女發展”與“婦女與發展”的異同談起〉，《世紀之交的中國婦女與發展——理論·經濟·文化·健康》，頁 49-67。

奚杏芳著：〈建議開展“婦女學”研究〉，《中國婦女》，1985 年，第 12 期(總第 328 期)，頁 5。

徐午著：〈從社會學性別觀的角度看第三世界的婦女與健康〉(1993 年)，《婦女與社會性別在中國(1987——2003)》，頁 122-133；亦見《中國婦女與發展：地位、健康、就業》，頁 205-218。

徐午、許平、鮑曉蘭、高小賢著：〈序〉，徐午、許平、鮑曉蘭、高小賢主編：《社會性別分析：貧困與農村發展》，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 年，頁 1-6。

榮維毅著：〈“女性主義與女性主義哲學：理論和實踐研討會”概述〉，《婦女研究論叢》，1997 年第 1 期，頁 61-64。

榮維毅著：〈社會性別視角與熱線諮詢服務〉，《婦女研究論叢》，1999 年第 3 期，頁 23-26。

季晶整理：〈用女性的眼睛看世界〉，《中國婦女報》，1995 年 10 月 30 日，第三版。

章黎明著：〈婦女的今天和明天——上海市中外婦女問題研討會綜述〉，《婦女研究論叢》，1992 年第 2 期，頁 58-60。

張敦福著：〈依附理論的發展歷程和新進展〉，「就愛學習網」
(<http://www.92study.com/lunwen/jingjixue/200512/20051217130717.html>)

張曉著：〈前言〉(2003 年)，《社會性別、民族、社區發展研究文集》，頁 3-10。

張京媛著：〈前言〉(1992 年)，《當代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2，頁 1-15。

張抗抗著：〈我們需要兩個世界〉(1985 年)，《女性？主義——文化衝突與身份認同》，頁 180-185。

張艷霞著：〈1996 年中國婦女研究走勢〉，《婦女研究論叢》，1997 年第 4 期，頁 12-15。

張李璽著：〈夫妻衝突：家庭性別分工模式重構中的一個必然現象〉，《婦女研究論叢》，1998 年第 3 期，頁 4-8。

鄭必俊著：〈走進女性研究〉(2000 年)，《身臨"奇"境——性別、學問、人生》，頁 152-170。

鄭新蓉著：〈北師大首開「婦女與研究」課程〉，《婦女研究論叢》，1996 年第期，頁 61。

鄭永福著：〈八年回顧與反思——我與中國近代婦女史研究〉(1996 年)，《婦女研究運動：中國檔案》，頁 107-125。

鄭新蓉著：〈教育政策與社會性別公平〉(2002 年)，《婦女與社會性別在中國（1987——2003）》，頁 353-384。

趙捷著：〈健康與女權：婦女衛生保健的非醫學模式思考〉，《婦女研究論叢》，

1996 年第 4 期，頁 13-16。

趙捷著：〈賦權婦女的途徑——關於農村社區發展項目中的社會性別與發展的實踐及思考〉(2002 年)，《婦女與社會性別在中國（1987——2003）》，頁 154-173。

趙勇著：〈法蘭克福學派的中國之旅——從一篇被人遺忘的“序言”說起〉(2004 年)，當代文化研究網 www.cul-studies.com

趙士瑞著：〈馬克思主義哲學中的事物發展觀與物質觀〉
(http://big5.china.com.cn/xsb/txt/2005-10/13/content_5997364.htm)。

鍾雪萍著：〈“女人味”大觀：論當代中國大眾文化中的“女性話語”〉(1999 年)，《婦女與社會性別在中國（1987——2003）》，頁 267-286。

《中國婦女發展綱要(1995-2000 年)》，全文見「新華網」
(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3-09/08/content_1068085.htm)。

中國婦女研究年鑑編輯部著：〈前言〉，劉伯紅主編：《中國婦女研究年鑑：1996-2000》，頁 1-8。

英文

Barlow, Tani E., “Politics and Protocols of *Funü*: (Un)Making National Woman”, *Engendering China: Women, Culture, and the State*, Edited by Christina K. Bilmartin & al.,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London, England: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 339-359.

Davidson, Arnold I., ‘Preface’, *The Emergence of Sexuality: Historical Epistemology and the Formation of Concep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 ix-xvi.

Davidson, Arnold I., ‘Style of Reasoning: From the History of Art to the Epistemology of Science’, *The Emergence of Sexuality : Historical Epistemology and the Formation of Concepts* , pp. 125-141

Davidson, Arnold I., ‘The Epistemology of Distorted Evidence: Problems around Carlo Ginzburg’s *Hisotigraphy*’, *The Emergence of Sexuality: Historical Epistemology and the Formation of Concepts*, pp. 142-177.

Davidson, Arnold I., ‘Foucault and the Analysis of Concepts’, *The Emergence of Sexuality: Historical Epistemology and the Formation of Concepts*, pp. 178-191.

Davidson, Arnold I., 'On Epistemology and Archeology: From Canguihem to Foucault, *The Emergence of Sexuality: Historical Epistemology and the Formation of Concepts*, pp. 192-206.

Foucault, Michel, 'The Discourse on Language' (1970), *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 translated by A. M. Sheridan Smith, London ; New York : Pantheon Books, 1972, pp.215-237.

Foucault, Michel, 'On the Archaeology of the Sciences' (1971), *Essential Works of Foucault 1954-1984. Vol.2*, The New Press, 1998, pp. 297-333.

Foucault, Michel, "Discourse of History", *Foucault Live: Collected Interviews, 1961-1984*, edited by Sylvère Lotringer, New York: Semiotext(e) (1996), p. 19-32.

Koselleck, Reinhart., "Historia Magistra Vitae: The Dissolution of the Topos into the Perspective of a Modernized Historical Process", in *Futures Past: On the Semantics of Historical Time*, translated by Keith Tribe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 London: MIT Press, 1985), pp. 21-38.

Li, Xiao-jiang, "Economic Reform and the Awakening of Chinese Women's Collective Consciousness", *Engendering China: Women, Culture, and the State*, pp. 360-382.

Moser, Caroline O. N., "Gender Planning in the Third World: Meeting Practical and Strategic Gender Needs", *World Development* 17, 11(1989), pp. 1799-1825.

Rathgeber, Eva M., "WID, WAD, GAD: Trends in Research and Pracice", *Journal of Developing Areas* 24 (1990), pp. 489-502.

Rubin, Gayle., "The Traffic in Women", Rayna R. Reiter ed., *Towards An Anthropology of Women*,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1975, pp. 157-210.

Said, Edward W, "Traveling Theory", *The World, the Text, and the Critic*, Can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pp. 226-227.

Sandford, Stella., 'Contingent Ontologies: Sex, Gender and "Woman" in Simon de Beauvoir and Judith Butler', *Radical Philosophy*, No.97, Sep/Oct 1999 , pp. 18-29.

Scott, Joan W., "Gender: A Useful Category of Historical Analysis", *Gender and the Politics of Histor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8, pp. 28-52.

Wang Zheng, "How Did the CSWS Started? - A partial history in Wang Zheng's Memory" (<http://xiaolan.wikispaces.com/wangzheng>).

書

中文

鮑曉蘭編：《西方女性主義研究評介》，北京：三聯書店，1995 年。

蔡一平、王政、杜芳琴主編：《賦予歷史以社會性別》，天津市：天津師範大學婦女研究中心，1999 年。

陳寶瑩等編：《用女性的眼睛看世界——記第四屆世界婦女大會非政府組織論壇》，香港：新婦女協進會，1996 年。

陳志紅著：《反抗與困境：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在中國》，杭州：中國美術學院出版社，2002 年。

陳順馨著：《中國當代文學的敘事與性別》，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 年。

陳順馨、戴錦華選編：《婦女、民族與女性主義》，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4 年。

荆子馨著，鄭力軒譯：《成為「日本人」：殖民地台灣與認同政治》，台北市：麥田出版，2006 年。

戴錦華著：《縱橫交錯的目光：後 89 大陸藝術電影中的多重認同》，嶺南學院文學與翻譯研究中心，1998 年。

戴錦華著：《猶在鏡中：戴錦華訪談錄》，北京：知識出版社，1999 年。

戴錦華著：《隱形書寫：90 年代中國文化研究》(1999 年)，江蘇省：江蘇人民出版社，2004 年(第二版)。

戴錦華著：《印痕》，石家莊市：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年。

戴錦華著：《涉渡之舟：新時期中國女性寫作與女性文化》，西安：陝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2 年。

第四次世界婦女大會、'95 北京非政府組織婦女論壇叢書編委會編：《第四次世界婦女大會中國組委會工作紀實》，北京：中國婦女出版社，1998 年。

杜芳琴著：《女性觀念的衍變》，鄭州市：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 年。

杜芳琴主編：《中國婦女與發展：地位、健康、就業》，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 年。

杜芳琴著：《中國社會性別的歷史文化尋蹤》，天津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 年。

杜芳琴著：《婦女學和婦女史的本土探索——社會性別視角和跨學科的視野》，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 年。

杜芳琴、王向賢編：《婦女與社會性別在中國（1987——2003）》，天津市：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 年。

米歇爾·福柯著，謝強、馬月譯：《知識考古學》，北京：三聯出版社，1998 年。

公羊主編：《思潮：中國"新左派"及其影響》，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 年。

賀桂梅著：《人文學的想像力：當代中國思想文化與文學問題》，開封市：河南大學出版社，2005 年。

賀照田著：《當代中國的知識感覺與觀念感覺》，桂林市：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 年。

黃平、羅紅光、許寶強主編：《社會學·人類學新詞典》，長春市：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 年。

熊玉梅、劉小聰、曲雯主編：《中國婦女理論研究十年》，北京：中國婦女出版社，1992 年。

金一虹、劉伯紅主編：《世紀之交的中國婦女與發展——理論·經濟·文化·健康》，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8 年。

康正果著：《女權主義與文學》，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 年。

康冷主編：《婦女發展與對策——第四次全國婦女理論研討會論文集》，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8 年。

李鵬程主編：《文化研究新詞典》，長春市：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 年。

李秋芳主編：《半世紀的婦女發展——中國婦女五十年理論研討會論文集》，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2001 年。

李小江著：《夏娃的探索：婦女研究論稿》，鄭州市：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 年。

李小江著：《性溝》，北京：三聯書店，1989 年。

李小江著：《女人——一個悠遠美麗的傳說》，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 年。

李小江著：《走向女人：新時期婦女研究紀實》，鄭州市：河南人民出版社，1995 年。

李小江著：《告別昨天——新時期婦女運動回顧》，鄭州市：河南人民出版社，1995 年。

李小江等著：《女性？主義——文化衝突與身份認同》，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0 年。

李小江等著：《身臨"奇"境——性別、學問、人生》，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0 年。

李小江等著：《性別論壇：文化、教育與性別——本土經驗與學科建設》，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2 年。

李小江等著：《性別論壇：文學、藝術與性別》，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2 年。

李小江編：《婦女研究運動：中國檔案》，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7 年。

李小江等主編：《性別與中國》，北京：三聯書店，1994 年。

李小江等編：《主流與緣邊》，北京：三聯書店，1999 年。

李小江、朱虹、董秀玉主編：《批判與重建》，北京：三聯書店，2000 年。

李小江著：《女性性別的學術問題》，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2005 年。

李銀河著：《女性權力的崛起》，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2003 年。

李銀河主編；林春及譚深副主編：《婦女：最漫長的革命——當代西方女權主義理論精選》，北京：三聯書店，1997 年。

林樹明著：《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在中國》，貴州人民出版社，1995 年。

林樹明著：《多維視野中的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 年。

劉伯紅主編：《美國婦女自我保健經典——我們的身體 我們自己》，北京：知識出版社，1998 年。

劉伯紅主編：《中國婦女研究年鑑：1996-2000》，北京：中國婦女出版社，2004 年。

劉禾著：《語際書寫：現代思想史寫作批判綱要》，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1997 年。

劉禾著，宋偉傑等譯：《跨語際實踐：文學、民族文化與被譯介的現代性(中國，1900-1937)》，北京：三聯書店，2002 年。

劉小楓著：《現代性社會理論緒論：現代性與現代中國》，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6 年。

劉慧英著：《走出男權傳統的樊籬：文學中的男權意識的批判》，北京：三聯書店，1995 年。

聯合國：《第四次婦女問題世界會議報告》(內部資料)，1995 年，北京。

馬元曦主編；康宏錦及杜芳琴副主編：《社會性別與發展譯文集》，北京：三聯書店，2000 年。

馬元曦、康宏錦主編：《社會性別、族裔、社區發展譯選》，北京：中國書籍出版社，2001 年。

孟悅、戴錦華著：《浮出歷史地表：中國現代女性文學研究》，鄭州市：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 年。

西蒙·波娃著，桑竹影、南珊譯：《第二性—女人》，長沙市：湖南文藝出版社，1986 年。

譚琳、劉伯紅主編：《中國婦女研究十年：(1995-2005)：回應《北京行動綱領》》，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 年。

唐翼明著：《大陸新時期文學 (1977-1989) 》，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95 年。

陶春芳主編：《馬克思主義婦女觀概論》，北京：中國婦女出版社，1991 年，頁 4-5。

陶春芳主編：《中國婦女研究年鑑：1991-1995》，北京：中國婦女出版社，1997 年。

陶東風、石磊著：《文化研究》，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 年。

汪暉：《死火重溫》，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0 年。

王斑著：《全球化陰影下的歷史與記憶》，南京大學出版社，2006 年。

王政著：《越界：跨文化女權實踐》，天津市：天津人民出版社，2004 年。

王政、杜芳琴主編：《社會性別研究選譯》，北京：三聯書店，1998 年。

王曉明著：《半張臉的神話》，桂林市：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3 年。

王宇著：《性別表述與現代認同：索解 20 世紀後半葉中國的敘事文本》，上海三聯書店，2006 年。

西慧玲著：《西方女性主義與中國女作家批評》，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3 年。

徐午、許平、鮑曉蘭、高小賢主編：《社會性別分析：貧困與農村發展》，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 年。

徐賁著：《文化批評往何處去——一九八九年後的中國文化討論》，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1998 年。

徐坤著：《雙調夜行船——九十年代的女性寫作》，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 年。

許寶強、袁偉編選：《翻譯的政治》，牛津大學出版社，2000 年。

許寶強、汪暉選編：《發展的幻象》，中央編譯出版社，2001 年。

楊莉馨著：《異域性與本土化：女性主義詩學在中國的流變與影響》，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 年。

尹寶珊、熊景明編：《中國大陸婦女文獻目錄：1949-1994》，香港：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1995 年。

艾莉斯·馬利雍·楊(Iris Marion Young)著，何定照譯：《像女孩那樣丟球：論女性身體經驗》，台北市：商周出版，2006 年。

查建英著：《八十年代訪談錄》，香港：牛津大會出版社，2006 年。

張京媛編：《當代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2 年。

張曉、徐午、和鐘華、馬林英主編：《社會性別、民族、社區發展研究文集》，貴州人民出版社，2003 年。

葉舒憲主編：《性別詩學》，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9 年。

鄭新蓉、杜芳琴主編：《社會性別與婦女發展》，西安：陝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 年。

鍾雪萍等主編：《越界的挑戰——跨學科女性主義研究》，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3 年。

中共深圳市委宣傳部編：《一九九二春 鄧小平與深圳》，深圳：海天出版社，1992 年。

英文

Barlow, Tani E., *The Question of Women in Chinese Feminism*, Durham and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4).

Boserup, Ester., *Women's Role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70.

Davidson, Arnold I., *The Emergence of Sexuality: Historical Epistemology and the Formation of Concep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Foucault, Michel, *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 translated by A. M. Sheridan Smith, London ; New York : Routledge, 1992(1972).

Foucault, Michel, *Essential Works of Foucault 1954-1984. Vol.2.* The New Press, 1998.

Hsiung, Ping-Chun, Maria Jaschok and Cecila Milwertz ed., *Chinese women organizing : cadres, feminists, muslims, queers*, New York : Berg, 2001.

Johnson, Richard., Deborah Chambers, Parvati Raghuram and Estella Tincknell, *The Practice of Cultural Studies*. London, Thousand Oaks and New Delhi: Sage Publications, 2004.

Kusch, Martin, *Foucault's Strata and Fields: An Investigation into Archaeological and Genealogical Science Studies*,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1991.

Liu, Lydia H.. *Translingual Practice: Literature, National Culture, and Translated Modernity — China 1900-1937*,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Rahnema, Majid. and Victoria Bawtree ed., *The post-development reader*, London ; New Jersey : Zed Books, 1997.

Rist, Gilbert, *The History of Development: from western origins to global faith*, translated by Patrick Camiller, London : Zed Books, 1997.

Sachs, Wolfgang ed., *The Development dictionary: a guide to knowledge as power*, London; Atlantic Highlands, N.J: Zed Books, 1992.

Simon, Sherry, *Gender in translation : cultural indentity and the politics of transmission* , London ; New York : Routledge, 1996.

Wang Jing, *High Culture Fever: Politics, Aesthetics, and Ideology in Deng's China*,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6), pp. 37-117.

Wesoky, Sharon R., *Chinese feminism faces globalization*, New York : Routledge, 2001.

Zhang, Xu-dong, *Chinese Modernism in the era of Reforms: Cultural Fever, Avant-garde Fiction, and the New Chinese Cinema*,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7.

中文期刊

《婦女研究論叢》1992 年第 1 期-2000 年第 5 期，中華全國婦女聯合會婦女研究所。